郭堡，你可曾记得

——个人的不堪往事与群体的历史责任

首 集

始于2005年

成于2007年

前　言

谨以此书献给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营三个锻炼大队的战友兼难友们，他们在 1958 年，分别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直单位及各军兵种直属单位来到这里，并从此开始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含冤苦难生涯。

每一个个人的回忆看似仅记录了自身的苦难与不堪往事，但是，郭堡战友兼难友们的集体记忆，则承担着真实记录历史的责任与道义。

目　录

第一章　我是谁？

第二章　泥沼中的跋涉

第三章　苦涩的亲请

第四章　人性仍在闪亮

第五章　安魂曲轻奏

一座无字纪念碑（代序）

——记郭堡水库劳动直属营的三个锻炼大队

陈　挺 执笔

一

反右派运动已经过去了50年。5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为纪念反右50周年，我们出版这本回忆录，以回顾过去，并让我们的后代了解历史，记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共建和谐社会。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曾许下诺言："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组织处分。" 仅仅半年多时间，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就划定了右派分55万人。所有这些人全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非常严厉的处分，在22年的漫长岁月中，成了政治贱民。于是毛泽东当时的承诺，就成了举世愕然的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阳谋"带来的阴影，也笼罩着经历过千锤百炼的人民解放军，就在全军的军官队伍里，据说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打出来的右派中的320人，于1958年4月下旬，陆续被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这320名右派，就是我们这本小书中的主人公。

郭堡水库建在太谷县的象峪河上游，位于东沟、小西沟和佛峪沟三流会合处，计划是建一座集灌溉、防洪、养鱼、发电为一体、容量为30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正处在大跃进的岁月，在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影响下，太谷县委提出：要求水库工程在1958年年底竣工，并做到当年受益。就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而言，这是个非常大胆而困难的设想，但郭堡水库却成功了，为什么？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郭堡水库来了这不同凡响的320名右派。这很难令人相信，信不信由你，这的确是不夸张的事实。

这320人，按照到达水库时间顺序，编成了三个锻炼大队。

第一锻炼大队：由原海军直属机关、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及驻山西第十、第十二航校、山西军区的135人组成，大队长彭承楦，副大队长周湘生、戴沂蒙、张丕泉；

第二锻炼大队：由原空军直属机关的105人组成，大队长沈保民；

第三锻炼大队：由军委三总部及直属五院、防化兵学校的80人组成，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华涤。

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各级干部都是由组织上从这320人中

指定的。

这 320 名右派中，原系党员的有 92 人，原系团员的有 135 人。许多人原来在部队时都是政治、军事、技术、文艺等方面的骨干和人才。有几位少年时即从军入伍，他们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老八路、新四军干部，在抗日及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曾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陈挺、周宏达、戴沂蒙、张丕泉、常征、陈广、张文炜、聂荣廷、郑淑芹……还有留学苏联军事院校，刚刚回国就积极参加整风的如朱兆极……还有驾机起义，为建立人民空军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何健生……还有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与敌人奋战，并立有战功的飞行员杨时瑞、坦克手唐廷雄……还有活跃在部队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公刘，音乐家欧阳枫 （李祯祥）、陈志昂，舞美设计家赵森林……全部人员中大部份都是在建国前后抱着满腔热情来参加革命军队的青年知识份子，从初、高中生到大学毕业、留学的都有。从年龄上来看，从 20 来岁到 30 来岁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集体，排起队来很像兵却又不是兵，因为没有领章帽徽，政治待遇上像犯人，却又不是犯人，他们干活的积极性不但犯人无法比拟，而且远远超过了一般劳动者。在工地上他们热情欢畅地投入每一项劳动，时不时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笑声，可到了深夜人们都睡下时，他们那颗曾被撕裂的心都在暗暗地颤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之一：灿烂的礼花，隆隆的礼炮，掩盖了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冤屈和不平。

在水库工地上，大跃进战歌高奏，要求全国人民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何况这些戴着帽子的右派呢，他们既被大跃进的形势所鼓舞，同时又被自己的赎罪心态所推动。他们积极热情，拚命干活，只怀着一个可怜的期望：早一天能被承认是“人民”。

二

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在 1958 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曾要求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部份技术力量，以修建郭堡水库。部队当时没有转业干部可派，就将这 320 名正待处理的军中右派支援了山西。从当时郭堡水库对锻炼大队的使用来看，这个传说也许是可信的。三个锻炼大队在水库建设中，确实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如苏祖德、陈维衡参与了大坝的设计，朱文明指挥大坝施工，唐廷雄、葛福两位坦克兵则驾驶着拖拉机、碾压机驰骋在大坝上，乌维达、赵森林、邢从周等从事机械维修，李淑琴负责质量监控，可以说，水库建设的每一个重大环节，都体现出锻炼大队成员的贡献。他们不但亲自参加工程管理及技术设计，同时还培训来自各县的民工，使得工程的進展有了更可靠的保证。

郭堡水库工地总指挥是太谷县副县长要进之，政委是太谷县县委书记靳广杰，他们都是老革命，经历过政治运动的风雨，对于我们这些“犯了政治错误”的人是理解的，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因而，在劳动中，大胆放手地要我们进行自我管理。

三个锻炼大队中，除少数人参加技术工作外，绝大部份人还是从事与土疙瘩打交道的劳动。如铲土、装车、拉平车、上坝、卸车等等全是力气活。可以说在水库上任何艰巨的劳动场合，都少不了这些穿着褪色的军服，咬着牙、挥着汗干活的右派们的身影。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水库的民工越来越多，最多时据说曾达到上万人，附近各县都按照民兵连的组识形式，投入到水库工地上来，有些公社青壮年强劳力另有他用，但又不敢不派人，于是派了些老婆婆老妈妈和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来充数。另外又调了不少的劳改队，在水库旁安营扎寨。实际上玩的就是人海战术，什么“挑灯夜战”，什么“苦战几昼夜，誓达什么目标”的战斗口号层出不穷，但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整个水库建设中没有一支强劲的突击力量发挥作用，想按预定计划建好这个水库是不可能的。这支突击力量，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其中就有似军非军，似民非民，似囚犯又非囚犯的这三个锻炼大队。

譬如说广大民工们全都是按八小时劳动，劳改犯们也是八小时就要收工，而锻炼队呢，一个班干上十小时以上，不算什么稀奇事，逢到工地上有些活是要连轴转的，那么干活的时间就更没底了。如锻炼一大队所建的内径 1.5 米、长 196 米的输水洞和高 35 米、内径 2.5 米的水塔，从设计到施工，从模板的安装到拆卸，从水泥的搅拌到浇灌、捣固……每一阶段都耗去了战友们日以继夜的心血和精力。更何况有许多项目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如当大坝填到一定高度时，运土上坝就成了难题，这时锻炼大队提出了修建窄轨铁路的建议，用卷扬机将重列车与空列车连接起来，装满泥土的重车从山上冲滑下来时，同时将空列车从坝上拽到山上，免掉了用人推空列车上山的劳动。两列斗车这样交替上下作业，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超过国家规定的斗车运土的定额，在山西省农业展览会上，曾以模型形式展示这种运土方法，备受好评。锻炼大队的战友们不但在劳动上一直站在前列，而且还始终保持着革命军人的风范。举例而言，这年夏季连降大雨，水位猛涨时，锻炼大队的战友们曾下水组成人墙，以挡住洪水冲击坝面。而当几位民工不幸落水时，有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友挺身而出，跃入水中，救起了这几位落水的民工。有位劳改队的警备人员不幸落水身亡，溺水者的尸体也是由锻炼队的小伙子下水库去捞起来的。锻炼队员们头上戴的是无形铁帽，但心房里仍怀着一颗颗革命军人的心，仍热情高唱着“军民一家人”动人的歌曲。

三

在修建水库的过程中，三个锻炼大队协同作战，互相支援，同时又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创造性。各个队都留下不少生动的故事，在这里，不妨举几个小例子：先说一大队，郭堡水库大坝合龙后，一部分归国志愿军将来太谷参加建设，太谷县决定在乌马河上再修一座小型水库——庞庄水库，一大队副大队长戴沂蒙带领 10 多人先期前去搞测绘和设计，他们组成一个小分队，住在庞庄村口，分测绘和设计两个组，安顿下来之后就干了起来。因时间紧迫，他们只能日日夜夜连续奋战，时常饿着肚子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拚搏，最终按时完成了地形测绘和水库设计。地形测绘之精确，设计图纸之严整，在省里博得一致好评。当时主持水库工作的太谷县要县长知道后，亲自赠送一大筐太谷饼以示慰问。几位打前站的归国志愿军领导同志，更是深受感动，看完设计后，有位领导拍着老戴的肩膀轻声说：“你们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谢谢……再见……”他们走后才发现他们悄悄留下了两条香烟。啊，毕竟同是部队来的，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他们对这些流放在山西的战友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又如二大队，其主要组成人员来自空军部队，当时适逢全国各地都在大放卫星，一位太谷县的工业口负责人知道锻炼二大队来自空军，其中有会造飞机的人才，他心血来潮，异想天开地提出太谷县要放特大卫星，要造架飞机飞上天！于是他去二队挑选了十五个人，集中在太谷铁厂，讨论和研究造飞机。这十五人明知困难很大，但迫于形势，又不能拒绝这项任务，只好表态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任务。以黄养光、吴亦寿、余慰明、林大任、徐力等五人为主，黄、吴二位任正副组长，加上其他十人，由原空军订货部的李基地回空军去求援，空军订货部热情支援了一台发动机、一副机轮和一些仪表等，就利用铁厂仅有的几台打铁炉和皮带机床，因陋就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用手工制成了一架飞机，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确确实实是架能飞的飞机。

1958 年 12 月 20 日 11 时 20 分，由昔日的战斗机飞行员、二队的杨时瑞驾机飞上天空，飞行了二十九分钟，圆满完成试飞任务。《山西日报》上还登载了有关自制飞机上天的新闻报导，但又不说明是谁造的。因而民间盛传：三个农民造出了飞机。自制飞机上天，在当时确实是条惊人的新闻，现在想想，倒有点后怕，如果这架飞机飞不上天，或者上了天却又栽了下来，这十五位造飞机的战友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真教人想都不敢想。

再说三大队。1958 年 8 月，大战钢铁的火焰燃遍全国，郭堡水库分出部分劳力，

转向找矿石，炼钢铁，第三锻炼大队首当其冲。大队长陈挺，根据他幼年找金矿的经验，带队伍跑遍山野，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可以投入冶炼的矿石，这一发现，使工地总指挥大喜过望，当即表扬三大队为太谷县找矿石立了头功。随后副大队长周宏达和队员赵森林用坩埚最先炼出一块仅重 250 克的生铁。这是太谷县炼出来的第一块，为此，县里开着披红挂绿的汽车到省城去报喜。

随后，又砌出一座一米多高的小高炉，几经周折，终于从这座小高炉里淌出点铁水来。一座小高炉炼出铁来，震动很大，各队都纷纷效法。采矿、运矿的队伍迅速扩大，既有三个大队，也有民工。很快紧靠大坝下面广场上竖起一排小高炉，营造了顺应形势红红火火的氛围。

出了点生铁，就考虑炼钢了。不知从哪里学到的，许多座所谓炼钢炉蜂拥而起。传说，炼钢需要枣木，于是就兴师动众，大砍枣树，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砍下作贡献。胡折腾了一顿，只炼出来一些不成形的碎渣。实践证明，土法炼钢是痴人说梦。

大战钢铁不仅本身劳民伤财，而且殃及了农民，秋收季节颗粒未收，这是导致以后发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之一。但不管怎样，就锻炼大队而言，却是在形势和压力下，付出了实实在在的超出常人想象的精力和汗水。

1958 年 12 月底，郭堡水库按计划及时竣工了，三个锻炼大队的“劳动锻炼”也宣告结束。1959 年元旦后，全体人员集中到太谷县招待所作劳动总结，有十人被当众摘掉右派帽子，其用意不言而喻，是敦促其他人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人民中来。然后无论摘帽与否，统一分配到当时的晋中地区各县（包括阳泉市和后来吕梁市的大部分县）及太原市工作和劳动，继续改造。

四

当劳动正处于高潮时，从河南省参观回来的郭堡水库工地副总指挥曹汉英，很欣赏河南用捆绑、打骂的办法强化劳动，在他召集的大队长会议上，批评我们锻炼大队右倾、心慈手软、连打人都不敢。他决定在工地展开批斗，要找几个对象以现行反革命罪来逮捕法办。

一天晚上收工后，批斗会开始。第一个被批斗的人叫徐中行，原是文化教员，在水库劳动中干活还是卖力的，只是牢骚话多，批斗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建高炉时，他敲的弧形砖碎的多，浪费大，诬陷他是有意破坏，被当场逮捕。后来听说他竟然冤死在狱中。接着批判了刘惠民和张世彩，也是小题大作，批斗拖到深夜，劳动一天的人们感到疲倦，

批不下去了，只好收场。但刘、张两位战友照样被逮捕押监。

在建设水库期间，这三位战友突遭横祸，是一些水库负责人事前策划和安排的，也是来郭堡水库的 320 人中最先受到迫害的。但当时大家都还没意识到这已是一个信号，说明了厄运将长久长久地附着在这些右派的身上，避也避不开，甩也甩不脱！事实正是如此。

从 1959 年初水库工程结束以后，晋中各县陆续都有不少战友被摘了'右派份子帽子'。本来大家对摘帽都寄予极大的期望，在想象中，摘了帽就是回到人民队伍，所有的屈辱都将一扫而尽，降了级的以后可以再升上去，荒废了的业务以后还可以拿起来，想到了甜美处，则觉得恢复党籍、团籍、军籍也是指日可待之事。但现实是残酷的，1958 年以后，运动不断，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中，一开始的打击对象总少不了右派份子，已摘帽的被称为'摘帽右派'，同样在打击之列。在一些自封左派的人们眼里，无论摘帽与否，右派仍是右派，永远是一些没有做人尊严的政治贱民。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二十二年，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不幸的这 320 人中，据近年不完全统计，已有 80 余人与世长辞，约占全部三个大队人员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很多人都是非常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佟惠林，水库建成后他被留在水库工作，在文革中，因不堪受辱，最终饮恨跳入自己建造的水库淹死；还有帅学立，水库建成后先是留在水库工作，文革中被遣返贵州老家，因出身不好挨批斗后又送回山西，往返三次。在水库身无分文，不得安身，无可奈何，投水自尽，偏偏又淹不死，他回到岸上找块石头绑在身上，从桥上滚入水中终于离开了他本不想离开的人间。现在，当我们站在郭堡水库旁欣赏着美丽的湖光山色时，我们怎能不悼念这两位蒙难的冤魂？

在文革中，分配到各地的右派们在其所在单位无不成了被斗争的对象，被迫害致死或经不住折磨而自缢的，有朱士增、孙友乙、吕惠民、徐恭寅、谢金星、张宇洲……；曾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战斗的坦克手唐廷雄，文革中不堪凌辱而惨烈地头撞钢刃自杀；文革中受尽摧残、精神失常的李淑琴（女），终因苦难所酿成的不治之症而早逝；又如张正中，因经不住文革中的摧残投井自杀，被捞出后又遭毒打，心力交瘁，染上胃癌而去；因妻离子散、孤独成疾而早期撒手人寰的，有吴天南、唐晓梅、刘耿直、莫维松，张凤春、刘红玉；……文革中没有死的，活着也极艰难，不少人有戴两次右派帽子的经历，陈挺、张英敏还戴过三次右派帽子，真令人叹为观止。至于再次戴了右派帽子后又加戴反革命帽子或坏分子帽子的，那就更大有人在了。今天，面对已经撒手人寰的众位

战友的英灵，我们沉痛悼念，叩首一拜。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当反右的迷雾全被扫尽，阳光更加灿烂时，你们于九泉之下，也就能闭目安息了！

五

1979 年底，改正的一刻来临了，当然，人所周知，改正不是平反，这里面有什么玄虚，不是我们说得明白的，但是我们深信历史，总会有一个定论。至于我们这些历尽百劫仍存活的老人，则自有自己的人生态度，我们不是什么这派那派，我们都是普通的战士，是天地之间的堂堂正正的人。

星移斗转，反右斗争已过去近 50 年。当年在郭堡水库劳动的 320 人，今天还在世的，都已经是八旬上下、两鬓斑白的老人。这些年以来，有些战友重获生机，再度焕发青春，如锺新淮，曾获省和国家的科技奖和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医学奖；如李道性、周一鹤，因在水利、机械、气象……等方面的贡献而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再如徐永涛（已故）在薄壳结构的研究上取得突破，应邀参加国际会议，曾任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刘则明，荣获省劳模称号，并被选为市人大副主任；还有些战友在大专院校任教授，在研究部门任总工程师……他们在改正后有限的岁月中，用辉煌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和才干。有些战友，环境没得到多大改善，又失去机遇，虽空有一身本领，只得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但求一个平安的晚年。有些战友，谈起旧事，嗟叹不已，为已失去的年华而叹息，岁月悠悠，并不能调整好内心的失衡。有些战友，担心后代儿孙不知历史，也担心这段历史会被人无端抹去，为此而正在执笔奋书，以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录。他们如今的处境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郭堡这一段生活，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时刻会在心中激起阵阵隐痛。这就是这本回忆录必需要写出来，必需要印出来的最充分的依据。

郭堡水库如今已成为太谷县的美景胜地，在水库旁衬着青山绿水，建了一座纪念碑，据说在碑文中只字未提当年的三个锻炼大队，乍听此事，不由得有点不平之情，后来一想，不必了，那巍峨的大坝——不，更准确点说，那整个郭堡水库就正是一座巨大而雄伟的无字纪念碑！那埋有忠骨的黄土，那荡漾着劳动号子的湖水，那记载着年轮的树木、还有那明镜般映照着历史的天空……都在与我们一起深沉地纪念，纪念什么？纪念一群真诚而受难的战士，纪念一个激情而荒诞、狂热而悲凄的难忘的年代！

注 1：此文由陈挺执笔，由陈通鉴、余慰明、章士寰、黄养光、江铸原、周永熙等同志提供资料或参与修改。

注 2：郭堡水库劳动后期，水库总指挥部建立了劳动直属营，营长由一位县武装部的现役少尉军官兼任，副营长为锻炼三大队大队长陈挺。劳动直属营下面除了原来的三个锻炼大队以外，又建立了第四锻炼大队，90 余人，成员来山西省高级党校等地方单位所划的右派。我们这本回忆录内容仅限于由部队转来的三个锻炼大队。

心语　吴明祝

这是一册凄艳的画卷——展示了在黄土高原、在象峪河畔的全幅图景

这是一枚纪实的光盘——录下了在风暴夜，在深水下，一群冤魂哭哭笑笑的声音。

这是一出滑稽的悲剧——编导无比英明，演员集体沉论，观众都得了革命痴呆症。

这是一本染血的启示录——告诫着我们：知识是人类的骄傲，尊严是做人的起点；任何政治谎言都是泡沫和烟尘。

这是一束真理的素花——敬奠给那些被预支了生命的战士，虽然他们直到死神降临，也没能看清当时的魔幻世界。

这是一声虔诚的祝福------祝愿在世的郭堡战友们活得更好，更精神，永远追求着真理、真实和真诚。

第一章　我是谁？

革命者吁天录

朱天浩

作者小传：

1928 年生。1948 年 7 月参加工作，1948 年 10 月入党，1949 年 3 月入伍，建国后在空军第四航校、第八航校、空军第十师等单位任职，来郭堡前，在空军训练部、军校部任上尉参谋，曾多次立功受奖。改正前在山西省祁县中学任教，高级教师职称。1988 年离休。曾编译出版《航空仪表学》，《飞机自动驾驶仪》等著作。

解放前夕，我在北大读书时，因为追求进步，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学生运动，在地下党员的帮助和指引下，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再加上已去解放区的好友丁力派来通信员作向导，便于1948年7月初，我们三个大学生(还有两位，一位是清华的、一位是南开的)结伴从蒋管区穿过重重封锁线到了冀东解放区，投身革命。在冀东反围剿胜利结束之后，又出生入死地被派回北平搞地下工作。解放后参加创建人民空军，学习工作表现俱佳，称得上是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却不料祸从天降，1955年从反胡风运动开始，转而为全国性的规模宏大的肃反运动。在运动中，我突然变成受重点审查的人，被怀疑为"特务"，并被限制了行动自由，转瞬之间，我由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就像川剧"变脸"一样，迅急而奥秘，如此风谲云诡，真是莫明其妙！

在肃反运动中我无端受了审查和批斗，又找不到任何对我不利的证据，最后就说我对肃反运动不满，仍不让我正常工作,我的行动自由还受到一些限制，从1955年直到1957年春还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当时我想：在肃反运动中，通过严密而广泛的调查，已充分说明了我投奔解放区和参军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光明磊落的，说明了我对党是忠诚的。为什么还会被人指斥为投机革命和别有用心！每念及此，当初我那为革命、为劳苦大众献身的崇高的感情，似乎被人们看得一钱不值，因而在心境上无比苦闷。

以前我在部队的个人生活只是学习、工作、再工作。已届而立之年尚未成家，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大学毕业，共产党员，品德高尚，才貌双全，而且彼此都很中意，却因肃反领导检查信件，禁止通讯，使可能的美好婚姻被迫中断。对此我想得很多。以前是不够军队规定的结婚条件（五年以上的军龄，连以上的干部，经

组织政治审查合格才能批准），不准谈恋爱，等到够了条件又因肃反而告吹。今后政治问题若不解决，很难再找对象，找上了恐怕也过不了组织批准这一关，因为这种事情不乏先例。

我有许多北大同学和地下工作时的战友在北京工作，却咫尺天涯。因为我在空军首脑机关工作，我本人也被作为保密件保密起来了，除因公外，一般不得随便与外界人士接触。无论在大街上或火车上碰到熟人，就装不认识，或擦肩而过，或低眉垂眼视如路人。可是肃反之后，我不想自虐了，由于思想苦闷，便想找老朋友谈谈心、散散心。

一次周末，我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大同学和地下工作战友孙晔同志家做客，正好还有丁佑、老熊等几位朋友也在那里，大家多年不见，有说不完的话要谈，有的朋友还要给我介绍对象，并在一起热心地研究条件和物色人选。随后在孙晔家吃了晚饭，又玩了会麻将，不知不觉已到深夜。那时候公主坟驻地到远郊的公共汽车都收班了,我回不去了，只好在朋友家借宿一宵。

翌日星期天一早我就赶回去了。想不到这件事在军校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处里召开专门会议，责令我检讨："为何夜不归营？" 经我说明后，组织上又派人到我的各个朋友处去调查，果然与我所说情况吻合，可是还不算完，又召开会议对我进行思想批判和教育，说我革命意志衰退，贪图吃喝玩乐，堕落腐化，公然目无军纪，违反条例，甚至说我参加了'裴多菲俱乐部'，这种信口编造的罪名又怎能令我心悦诚服呢，相反，却使我感到荒谬，无聊和厌烦。我自己清楚当时自己确实在闹情绪，是精神苦闷，沉醉于悠闲而已，但又何必如此小题大做，无限上纲呢？难道革命军人都应该是些没有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完全听指令办事的机器人！于是我和组织之间因肃反受害而出现第一次政治裂痕之后，又加上了一条思想裂痕。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据说当时与会者听了，感到如沐春风。这一讲话后来由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按讲话的打印稿"不解释，不增减"的原则，原原本本向空直机关连以上干部进行传达，我有幸与会；后来我又听了毛泽东在中央宣传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都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变了味的修订稿），两个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在全国扩大民主，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党群关系得到改善，总之，对知识分子说尽了好话，许下了若干宏愿。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毛对肃反问题的讲话："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什么范围搞错，在什么范围宣布平反。" 我听

了这些传达报告以后，心头越来越热，使得我心潮澎湃，以为毛主席要领导我们走一条全新的民主的道路通向共产主义呢！因此我没有改掉政治上的幼稚病，放言无忌。并对未来充满幻想。

继社会上轰轰烈烈开展大鸣大放以后，空军党委和空军军校部党委都举行知识分子干部座谈会，帮助党整风，都通知我去参加。开始被我拒绝了，我对领导说自己对党没有什么意见，唯一意见是部党委在肃反中把自己搞错，而且长期不做结论。不过这方面的意见我已经当面对部党委书记陈熙同志汇报过，也没有必要再拿到会上去说了。可是领导就是要我去参加，我只好惟命是从了。殊不知这正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的阳谋！我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在李东流副部长主持的部党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干部座谈会上，我对本部在肃反运动中的问题谈了一些意见后，人们反映我的发言“有理论、有事实，讲得很好。”

在成钧副司令员（中将，老红军）主持空军党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干部座谈会上，从头到尾我是个听会者，一言不发，直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还未发言，成副司令员几乎是命令似的要我讲讲。于是我又把以前的讲话重复了一遍。成副司令员听出我的湖北口音，忙认老乡，说他是公安县人，是我家乡江陵的近邻，并且现身说法，说他自己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在肃反运动中，已经快要拉出去枪毙，却幸而把问题弄清了。他还说：“不仅没有杀了我，反而更信任我，派我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现在我不是当空军副司令员吗？”又说：“你现在历史问题清楚了，组织肯定会更加信任你的。”我听了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

我对军校部的肃反工作确有些不满情绪，但我所提意见却是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我的意见总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l、肃反运动之初，　部领导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不顾本部成员都是经过层层政审从航校或部队选调来的（几乎95％以上是党团员），硬说部里有5％的暗藏反革命分子！而且把解放前，不怕牺牲奔赴解放区的革命知识份子干部作为重点对象来整！但最后甄别证明军校部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

2、片面宣传“大胆怀疑”，以致弄假成真，强迫一些被怀疑有“特务嫌疑”的人交待问题，私设公堂，搞变相逼供信，“挤牙膏”，侮辱人格，打骂体罚。

3、领导官僚主义，不虚心检查自己，认为肃反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被整错了的人是“误伤”。说什么“即使最英明的统帅也不能保证不误伤自己的士兵”，根本不从领导本身找问题，更谈不上深刻检讨了。

不幸的是运动以诱骗开始，而到了时候就翻脸。人民日报在5日15日刋登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社论；6月8日，党内又发布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昨天的甜言蜜语，一变而为唇枪舌剑。说什么当初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其目的是诱发有敌对情绪的分子自我暴露，是“阳谋”和“引蛇出洞”。

反右风暴如千钧之势，横扫一切。空军领导机关各个单位都有反右任务，因而我也受到口诛笔伐，不过批判并不猛烈，声势远不如肃反那样吓人，涉及问题也有限（仅仅是肃反问题，别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因此只是在全地勤处范围内开过几次会，在会上如果有人出言不逊侮辱人格，我就拍案而起，强烈抗议。应该说，在肃反和反右的两个运动中我从来没有“低头认罪”过，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一切都能泰然处之。或许是经过肃反对我历史的内查外调，组织上已澄清了怀疑过的问题，也不一定再想搞下去了。所以在1957年反右期间，始终没有给我加过右派的罪名。我也照常工作，一切都好像平安无事。

1958年4月，军队要纯洁队伍统一清洗，听说各单位都要按比例（各占总人数的5％以上）完成划右的既定数字，否则，单位领导人本身便是右派！就是以这种泰山压顶之势，逼着军校部的领导人不敢手下留情，军校部领导只能把久悬未决的我的问题重新讨论定性，并做出了最简单和最残酷的决定，将我划为右派，空军军事法庭还煞有介事地下了缺席判决书，剥夺军衔，开除军籍，行政上降两级，月工资由105元降到57元，并且从北京发配到山西省去劳动锻炼。应该说，对我的处理是比较轻的。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其中较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我是“劳动锻炼”，这可能是属于处分较轻者。虽然我只降了两级，但我心中的痛苦难以名状，干革命出生入死，干工作呕心沥血，却落得如此下场！但转念一想 ：我还年轻，戴顶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只要我挺起腰杆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下去，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将以毕生的言行证明我的忠诚。当时领导也说：“只要劳动一段时间，表现好一些就会摘帽，重新工作。”所以我对帽子的恐惧感并不强烈。

我别无选择，只有违心地接受组织处理完事，不过在检讨的同时也表露出负屈含冤之意，就在为我定性的小型会议上，我就说过这类话：硬是把人分成左派右派，而且是非左即右，宁左勿右，甚至在开 大会时让整人的左派坐在左边，被整的右派坐在右边，这实在是形而上学盛行。难道就没有不偏不倚的中间派吗？在英文里‘右’（Right）是和公正、正确通用，而‘左’（Left）是和笨拙、错误通用。比如You have two left hands. 直

译为“你有两只左手”，而真正的含意却是：“你是个笨蛋。” 如果要让西方人来理解‘右派分子’的话，那就是一些大大的好人！可是按照东方大国中国现在的是非标准，我就该被划为‘左派分子’了！这真是叫我左右为难，东西莫辩了。”

会场上有人偷笑，有人怒目。

我接着又说：“我昨天还是革命军人、上尉军官，怎么睡了一觉，今天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反动派了呢？唐朝诗人李白曾说过：‘曾参岂是殺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自古以来就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三人成市虎。我就是：是非只因多开口，麻烦皆因说出来。”

与我同时被宣布为右派的还有空勤处的陈俊亚(空中机械参谋，系地下党员，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李序长（空中射击参谋，贫农家庭成分），防训处的沈保民（大尉副科长，新四军老战士），郭鲠（防训参谋）。另有地勤处的周锡祯（航空机械参谋，解放前地下党员，北洋大学航空系毕业）被定为‘中右’发配到北大荒思想改造。听说还有几个‘极右’被送去劳动教养所。军校部总人数不足百人列入右派另册约占8%。

据说全国共有五十五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当时全国的大小知识分子总数不超过五百万人，打击面大约是11%，不仅他们本人而且株连他们的家属、亲友。比如右派子女一律不许上大学，可叹：“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一件令我大喜大悲，悲喜交集，啼笑皆非的事情悄然而来：在我即将被发配山西的前夕，军校部肃反办公室突然通知我本人，说我在肃反中重大历史嫌疑问题，已经彻底查清，结论是“对党忠诚，历史清楚”。

我在看了结论材料并签字后，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在肃反运动中被当作重点来打。原来是在肃反中，我的老朋友——我奔赴解放区的革命引路人丁力因不堪逼、供、信的痛苦折磨，按照反特电影小说的故事情节胡编口供后，自杀身亡。死前“坦白交待”，他是暗藏的反革命军统组织的首领，并“检举”我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还胡说什么“计划在五一或十一阅兵时，炮轰天安门，一举消灭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好家伙！如此特大特务恐怖案！还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因此惊动了中央，中央责令公安部立案侦察。公安部用了几年时间认真调查取证审理核实，证明此案纯属子虚乌有，屈打成招！这一惊天动地的假案才被撤消。我的冤情得以昭雪，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是大喜事。但眼前又面临‘右派’罪名，开除军籍，劳动锻炼，我又怎能笑得起来呢？

尤其使我心灵震撼的是丁力之死，我和丁力从咸丰初中起到解放前夕，一直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好朋友，丁力原名孙宏圭，聪明好学，智略过人，思想敏锐，敢为人先，家庭成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本人是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革命大家门），

历史清白，对党忠实，绝非蓄意谋奸、欺心背友之人。丁力死亡的真相成了我猜不透的哑谜，惊不醒的噩梦。既然事已至此，我便向组织提出复议右派帽子问题，事实证明我在肃反冤情尚未昭雪之前，在帮助党整风之际，发言为自己申诉，是合乎情理的。至于对军校部肃反工作的意见，既是事出有因的不平之鸣，也是符合事实的善意进言，并非“反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和“否定肃反成绩”更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必要请织织对划我为右派的问题重新考虑复议。

想不到如此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请求遭到了组织的无情拒绝，其答复是：“肃反问题归肃反问题，右派言论归右派言论，这是两码事”（可是对我而言，自始至终是一回事，所不同的一个是祸从天降，另一个是祸从口出），“肃反虽然有结论，只解决了历史问题，右派帽子照样得戴，因为还没有解决思想改造问题和阶级立场问题！ 因此组织上对复议的要求，不予受理，安心改造去吧！”

闻听此言，我悲愤不已，有诗为证：

“反案初伏右罪起，一伤再害煎何急。

秦皇今日发阳谋，从此天下众生泣。”

1958年4月的一天，我来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我将和军委直属单位的其他右派们一起被送到山西去劳动锻炼，前来送行的军官很多，可以说是“冠盖满京华”，而此时的我却正是“斯人独憔悴”，心里充满着难言的痛苦，不禁想起1948年我去冀东解放区时也是从这里出发的，经过层层军事封锁到达长城脚下的遵化县茅山，开始了革命生涯，还在喜峰口和古北口一带打了二个月的游击。此后我一直在冀东军区城工部的领导下，在华北、东北、长城内外搞地下工作，提头干革命，忘我搞空军建设，又红又专整整十年，又要在离八达岭长城不远的地方，屈辱地被开除军籍，逐出了军营，结束革命的政治生涯！若从地理上说是兜了个大圈子，又重新回到了出发点，但此时我的希望开始破灭，激情似乎耗尽。悲愤填膺，感慨万千。不禁想引吭高呼：

“提头干革命，招来是恶名，

从此边缘化，吁天天无声！”

郭堡重聚　陈通鉴

晋中太谷放逐地，郭堡汇集解甲人。

腰斩象峪河谷处，粼粼碧波漾万顷。

彼时正是少年郎，相逢霜染华两鬓。

喜见水库存甘露，曲直评说待后生。

诗二首　黄养光

八十感怀　2005 年

几经风雨世事通，夕照征程尚从容。

目眩犹能观远景，耳鸣无碍听晓钟。

中华儿女宏图起，锦绣河山春意浓。

老叟激情潜纸砚，挥毫泼墨绘彩虹。

寓心声　2000 年

少小有志终难成，只缘此生多折腾。

个人得失平常事，半兆冤案流毒深。

响应号召献诚意，自投阳谋落陷阱。

功罪赏罚无法度，钦定比例是准绳。

百花初放一脚踩，华夏从此万马喑。

反右封堵志士口，文革毁灭万众心。

十年动乱重拳击，廿载沉怨草结轻。

否极泰来开新路，自有刀笔还史清。

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

许贻士

作者小传：

苏州人，1934 年生，1951 年入伍，在大连海军指挥学校学习，1954 年任海军后勤学校教员，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60 年摘帽，1971 年再戴右派帽，1973 年撤销。1978 年平反，1979 年改正，后任太谷汽修厂、农修厂厂长、书记。1983 年任晋中地（市）委党校教员，1987 年晋升副教授，1993 年晋升教授。1995 年退休。

几句闲话（代 序）

什么是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其内涵及是非也有待确定。而在当年，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却是我们党的主旋律，我高声歌唱了党的主旋律，在 1957 年就指出赫是修正主义者，却因此而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为此申诉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至右派帽子摘了再戴，直至 1978 年才得到平反，1979 年又得到改正。又是平反，又是改正，至今弄不清以何为准。真教是开头也荒唐，结束也荒唐，这可能也是现代中国政治史中的绝顶荒唐的一例吧。

一、骂了声赫鲁晓夫，戴了顶右派帽子

1957 年 4 月，我由天津市行政干部学校回原派单位海军后勤学校。5 月，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6 月，学校开展了整风运动。作为一个新党员，我当然义不容辞要做个积极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去。

当时的整风运动其实已经进入反右斗争了，但在部队里，仍在强调大鸣大放。在一次小组座谈会上大家找不到什么好说的，静坐了半天，在无序的闲谈中我说赫鲁晓夫（当时任前苏共总书记）排斥了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他是在排斥异己，他又把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有的还开除出党，简直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这本是信口说说的，不料在会上竟得到了同志们衷心的认同，主持学习的党支部书记也大力表扬。他一表扬，我的积极性迅速高涨，于是黑板报上不时地出现我的小稿件，提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正当我们这些积极分子意气奋发时，不料风云突变，学校里忽地刮起了“批判反苏思潮”的风暴。连续出现了一大批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矛头许多都是直指我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的发言。眼看形势大变，在这种

压力下，我不得不在小组会上作违心的检讨：说自己将赫鲁晓夫说成是修正主义者，情绪过激了，这是出于我对斯大林的热爱，因为赫鲁晓夫火化了斯大林的遗体，再也无法补救。说完，有人就批驳我说：许贻士热爱斯大林是假，反苏、反党是真！过不久，又出现了一张份量更重的大字报：《看许贻士的反动思想》，其内容是批判我曾说过的一句话："社会主义阵营万岁的口号是错误的。" 下午就召开了训练部所属单位的全体批判大会，会上指出我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万岁的思想，再加之反苏、反共，已形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必须彻底批透、打倒。最后叫我作答。让我说我就说，我说阵营是因两军相对而存在的。如果全世界都成了社会主义，就不必再提社会主义阵营了，社会主义阵营也是相对于资本主义阵营而言的，正如有西方才有东方、有南方才有北方一样，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万岁了，不是说资本主义阵营也万岁么？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理论。我这一番话说得有条有理，别人倒也无从反驳。大辩论本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辩明是非，探求真理最好的方式，但是在"普天之下一言堂"的反右运动中却成了最不讲理的方式。到 1958 年 3 月，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指出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的发言已属右派言论，要做好思想准备，好好改造。从此，即开始了打扫厕所的日常工作。4 月 17 日晚，海军后勤学校政委、副校长分别找我个别谈话，指明我将去山西太谷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当时我提出，我是"右派"，右在那里？请党委指示。但他们不指不示，我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958 年 4 月 18 日离校经北京海军司令部，23 日到达山西省太谷郭堡水库，从此进入了我一生中漫长的作为政治贱民的人生阶段。

在此后的多年中我认真地学习了《两论》、《九评》以及其他中苏论战的文章，越学越糊涂。这些年以来，我们党的各位领导人都多次公开认定了'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而我是在 1957 年在党内小组学习会上说了句：'赫鲁晓夫简直是修正主义'却有了问题。党中央的观点在我的口中说出来就成了反动的右派观点，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觉得实在太不公平了，故我曾数十次给县委、省委、海军后勤党委（海军后勤学校已撤消）直到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但都是泥牛入海，无人理睬。

二、无限上纲有神通、毛公成了毛太公

就现在来看，说赫鲁晓夫到底是个什么主义，除了研究政治史和苏共党史的专家以外，再也没有人感兴趣了。邓小平在 1989 年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指出：以前的事不用再

提了。于是结束了这场论争。他们当然不会想到：当年曾有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曾为此表达了和党中央完全相同的看法，却在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被两次戴上了沉重的右派铁帽。

因为我长期坚持我的‘右派’观点，始终认定“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这句话是和党中央的看法一致的，而且为此不断申诉，要求翻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来，我便成了当然的批斗对象，在被批斗的过程中，险象叠起，怪事丛生，我就写几段印象较深的批斗轶事吧。

1966 年 4 月，我因患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住进了山西省康复医院。5 月底的一天，院方突然通知我：“你们单位有重要任务，你必需提前办理出院手续。”于是就在我病尚未痊愈时，被迫出了院，住进了集中全县工业系统的干部学习班，人人都要过关，我明白了，让我出院就是想对我开展批斗，但是批我什么呢，我反而有点纳闷。

一天，工作组要我检查交待纠集右派搞‘翻案’活动，我承认了‘翻案’但否定了‘纠集’。在召开千人批斗大会上，一位摘帽右派的老 N 在会上发言：“我检举许贻士经常写反动诗词，矛头直指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不但我见过，缴如洲也见过。”老缴也是郭堡的战友兼难友。大会主持人马上指名叫老缴出来作证，老缴站起来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这种事”。听老缴这么一说，人们一下子愣住了，随后又发出了嗡嗡的议论声 。这下那位 N 兄有点着急了，他马上站起来补充说：这些诗词是抄在一本黑皮硬面的笔记本上的，指着我问道：“是不是！是不是!” 我说：“我是爱写旧体诗词，也的确是写在这样一个本子上的，本子还在。”主持人立即派人搜查了我的宿舍，找到这本黑皮本子，立即交到大会上，主席台上有人马上翻阅，会场中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时气氛极为紧张。翻本子的人翻了一阵，最后不翻了，会场上的人都等着静听他的惊人发现，不料翻本子的人，一言不发，闭着眼睛只是摇摇头。正当大伙儿失望之际，那位老 N 又发言了：“一定是许贻士把写有反动诗词的那几页都撕掉了!” 会上的人一听，又是一阵‘打倒右派分子许贻士’的怒吼，稍平静后，我指着主持人手中的本子说，这本子出厂以前就印好了页码，除去封面封底，一共一百页，请你数一数是否缺页。主持人随即一页一页清点，五十张共一百页，一张不缺。这一下大家都悄悄地一声不响了。我原以为已经没事了，不料主席台上有人念了如下四句：跃进超英美，卫星升太空，神州风火动，万载颂毛公。马上有人举手发言，说此诗有严重问题。为什么把毛主席称为毛公呢？《水浒传》里有个毛太公，是个恶霸，毛公就是毛太公。许贻士把毛主席比做恶霸，是可忍孰不可忍！面对这样惊人的联想力，真叫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这个人的发言启发

了许多人，只见会场顿时热闹起来，很多人纷纷要求发言……这些议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越来越不像话了，主持人大叫：安静！安静！许贻士要发言！一听我要发言，全场倒真地安静下来了。我说："我只提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说！" "请给我一杯水喝。"大家一听，哄然大笑，主持人甚感窝囊，大喊："今天的批判大会到此结束，散会!"于是全场作鸟兽散。

1967 年 6 月的一个傍晚，厂里的造反派们为了造声势又要对我批斗，这次气势更大，全厂职工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要对我开展批判，并通知我，要我认真先向全厂职工检查交待自己的反党活动。

这一次，我特意上穿一件纺绸衬衣，下穿一条派力司西裤，足登凉皮鞋，又戴了一副宽边眼镜，精神抖擞地到了会场。开始，由主持人说几句例行的革命开场白后，我就稳步走上台来，开始检查交待。但我只开口说两句，只听得下面尽是一片嗡嗡声，看来，群众也厌烦这种所谓的批斗大会了，怎么办？我顿时有了对策，只要我听见场上还有说话声，我就戛然而止，绝不开口。主持人摸不着头脑，问道：为什么不交待了？我说无人听我的交待和检查，我怎么说？主持人一听，我这话也确有道理，于是就大声喝令要全场安静下来。从而，出现了文革中批斗会从未有过的井然有序，我在上面侃侃而谈，而全厂职工在下面静静谛听。在会议进行时，恰巧有位山西农学院的老教授路过门口，就进来看看，一看到这比大学课堂还要安静的会场，就悄悄问站在他身旁的外孙：这是那一位领导在作指示，还是造反派的头头在作报告呀？他的外孙也是本厂的职工，答曰：站着讲话的是我们厂的右派分子，正在交待反党活动呢。老教授吃惊地"啊"了一声，愣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我检查完以后，群众开始批判发言，乱哄哄一团糟，谁也听不清谁讲什么，最后这次批判大会仍然是在一片混乱中收场。会后听见有人嘀咕：这个老许呀，真是铁嘴钢牙，谁说得过他！我心中暗暗好笑，这不是我嘴硬，而是我的理硬！

三、任凭一片风暴狂，世上仍有热心肠

在文革那场风暴里，一些人们的兽性抑制了人性，因此，一些倒霉的分子们，免不了都要尝到皮肉之苦，我，作为一个右派，当然不会例外。

1968 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由车间去厕所 紧跟着来了个造反派张春生，我原以为他是在监视我，可是他在小便池边突然自言自语的说：今晚是你演出节目，一块钢板，一根米丝（20 号铁丝）是你的道具。我一听全明白了，他是告诉我今晚将有一根 20 号铁丝挂着一块 8 毫米厚的钢板套在我的脖子上，将我批斗后再去游街。我望了他一眼，

他只当没看见，就走出厕所了。我一想，大事不好。下班后，我手拿一个信封，装作出去寄信，急急找到在南关照相馆工作的郭堡战友何健生，说了今晚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在场的还有照相馆的主任刘德锋及暗房的贾继尧，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刘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贾接着说：快走！何健生说：老许可能已经是走不出太谷城了。几个人稍事商量后，决定由老刘和老贾把我送出太谷城，到祁县上火车，以尽快离开山西。为了防止意外，老刘带了两件防身器械，老贾本来就有武术功底，他们各自推了一辆自行车，三个人还给我凑了几十元钱，用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到祁县东观车站，老贾紧赶跑去买火车票，老刘则再三关照：说火车到太谷站前，你要躲进厕所，避免被车站上的造反派发现。就这样，我顺利地离开了阴影笼罩下的这片是非之地。随后我在北京、上海、武汉各住了一段时间，直到 1969 年 7.23 大联合以后，我才结束逃亡生涯，回到太谷。事后想想，世上仍有热心肠，如不是张春生、何健生、刘德锋、贾继尧几位朋友的帮助，我恐怕就在劫难逃了。

到了 1971 年，已是寒风瑟瑟的初冬了，形势又有了变化，在厂的机加工车间又召开对我的批斗会。这一次造反派的面相特别凶狠，他们把我拉到会场，就命我跪下。当时有个姓武的铸工，端着自制的步枪对准我的胸口，大声喝叫：“不跪，毙了你！”同时有几只造反派的手把我紧紧按倒在地，那时两派早已进入武斗多年，故而许多造反派都手执武器，以示威风。造反派的头头同时是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的李喜录宣读了太谷县革委会的决定，再次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会后，几个造反派把我带到地下室，又要我跪下，他们觉得刚才还不够威风，一个姓李的举起自制的步枪对我当头打下，我闪身一躲，打在我的左腿上，由于过用力过猛，步枪竟然断成了两节。我疼痛难忍，但既不能反抗，又无法避让。这时，我听到一位名叫张跃杰的工人说道：“不许这样打人！”他这一声，人性的良知战胜了兽性的欲望，那个姓李的给镇住了，不敢再打，但嘴里悻悻地咕噜着：怎么不能打？怎么不能打？这是造反派的权力！咕噜归咕噜，但是谁也不再对我动手动家伙了。后来我常想，要不是张跃杰犹如张飞在当阳桥上的那一声吼叫，那一天，我即使不进鬼门关，活着身也残。于是我突然有所感悟，在任何疯狂的岁月，人的良知都不会完全泯灭，这也许是人类得以生存并进化到如今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我还发现了一条“谬误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可以战胜一切谬误，唯独战胜不了某些无产阶级当权者权力所造成的谬误。我想：将来如有人编一本《右派语录》的话，希望能将这句精彩的格言编进去。

因为再次戴帽，从这一天起，我成了少有的‘双料’右派。

四、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这两句是关汉卿《窦娥冤》杂剧中流传千古的名句，正好表达了文革中被批斗者的心情。然而，自从当上了‘双料右派’，我实在不甘心，任何阻力都挡不住我，我决心踏上‘翻双案’的漫漫长途。

‘加冕’的次日，我就一瘸一拐地走进了县专政委员会主任的办公室。这位主任姓宋，是驻太谷独立团的一位干部。初见面倒还客气，问我何事，我叙述了我的情况，并提出了申诉要求。宋说：“你和我们是敌我矛盾，你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处理。今天我本不该接待你，但我还是向你说明了政策，你回去要好好改造。”但我还是坚持递上了申诉书，他接过去翻了一下，丢在一边说：“你先回去吧。”

我回到厂里，三天未上班，车间主任来叫我，我说腿被打伤了，无法工作。中午就来了几名造反派，批我一顿，未果，只好让我歇着。我休息了三周，又去专政委员会，还是宋主任一人在办公室，见我就说：“你怎么又来了？你要知道，这是专政机关，你是专政对象，回去好好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帽子。”我站着未动，注视了他一会，他低下头看文件，未说话。他忽地抬一下头说：“你怎么还不走呀？”我说：“宋主任，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专无产阶级敌人的政，不是专批判修正主义分子的人的政，我是揭露与批判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人，我们的专政委员会不能对我专政。”我这两句话份量不轻，他反驳也不行，不反驳也不行，一时倒无言以对，只好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以后再说。”我仍然未走，他说：“你不走，我走。”站起来，收好文件，真的出去了。我呆站片刻，看到桌子上放有报纸，就坐到他的位子上看起报来，约十几分钟后，主任回来了，见我竟然坐在他的位子上，两眼一瞪说：“你怎么可以坐在这儿？”我说：“这个位子空着，我就在这儿看看报纸，这是学习呀，你不同意？你回来了，办公事，这儿还是你坐吧。”我站起身让开，他气呼呼地坐下了，翻了翻报纸，点了支烟，想想这样僵下去不是个事儿，只得和颜悦色地说：“老许，不是不处理你的事，这些日子我实在太忙，杀人的事还处理不过来呢，你也体谅我的难处呀？”到这个份上，我想也给他下个台阶吧。我说：“宋主任，你对我总算说了心里话，既然这样，我这就走，不过，我还会来的。”

以后，我基本上每周去一趟专政委员会，同时向地区支左办公室与省军区申诉，一共给地区送上了六份申诉。直至 1973 年春，先是听一位造反派在车间说，老许告状告准了，地区来人查案子哩？果然，过一会儿带班的叫我说：“楼上办公室叫你”。我走进

了办公室，看见办公桌前坐着的是工作队员白某，旁边站着的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李宝贵，他俩见我进来，根本不理不睬，我就坐在长凳子上也不理他们，大约过了一两分钟，白某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我未理他，他说："问你呢？" 我说："你们叫我来，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可能叫错人了。" 我站起身就走。白急了，"许贻士你怎么走呀？" 我转身望他一眼。"你们认识我还问我叫什么，是什么意思呀？"，姓白的给顶得懵住了，站在一旁的造反派李宝贵一拍桌子："右派分子许贻士，你不要摆地主资本家的臭架子!" 我沉住气慢慢回答道："我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告诉你，我入伍前是学生，入伍后是革命军人，摘帽后是国家干部，现在可以说是工人!" "你是资本家出身!" 对了，我父亲是资产阶级分子，他已去向马克思请罪了，你们可以去批斗他，与我无关!"这时白 、李二人只是干瞪着眼 ，说不出一个字来。对峙了几分钟 ，我说二位领导找我有什么事，请快说。白咳嗽了一声说："老许，我们说不过你。你坐下，听我劝你几句。现在你的案已定了，谁也翻不了，我们知道你上告，但没用，高岗、饶漱石、胡风、俞平伯等人不比你有本事，那一个翻案了。你还是老老实实，安心改造，不要再激化矛盾了，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谢谢老白，但我的所有问题都起源于 1957 年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一点我坚信没错，你们可以再读读人民日报的《两论》与《九评》，看看我们的党是怎样评论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的。至于案子能不能翻，谁也说不准，只有走着瞧。"李宝贵是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大草包，他一听，又想发横。但老白到底是军队干部转业人员，对《两论》、《九评》都还记得是怎么回事，他制止了李宝贵，然后只好耐着性子，听我从头到尾又申诉了一番，那种神态活像课堂上的小学生在听老师讲课。

到了 1973 年夏日的一天，一位部队的驻厂支左队员来通知我："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让你去一趟。"第二天我到了这个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姓要的原小学女教师，我们都称其为要老师。她说："你的右派问题，县革委批下来了，撤消原决定，你解放了。" "谢谢县领导，也谢谢你们"。"不过你还得接受一个处分。" "什么处分？" "记大过一次，" "为什么？" "你起码看过黄色小说吧？" "什么黄色小说？" "《红楼梦》你不自称看过几遍了吗？" 我一听，又好笑又好气，我客气地说："要老师，你作为教师也不读书，不看报呀？" "什么意思？" "请问《红楼梦》黄在哪里？" 姓要的一时语塞。我接着说："告诉你，两天前《人民日报》报道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首长正提倡革命干部要看《红楼梦》，不仅要看，还应该两遍、三遍地看，难道江青也鼓励大家去看黄色小说？" "不会吧？" "你到现在还不听江青'阿姨'的话呀？"

我便起身走出了这个办公大厅，留下了这位女教师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1973 年 10 月份，县革委会宣布了《关于撤消许贻士第二次定为右派分子的决定》。

在以上这几个回合的斗争中，不管是哪一级的干部，他们都说我翻案是错误的，但没人能正面回答我“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这句话错在哪里。我还告诉他们，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我就不能说。听的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所以，虽然每次碰钉子，但每次的钉子都给我增强了申诉到底的决心。

1978 年 4 月 23 日，我因公出差上海，路经北京时，再次到海军后勤部去看望在军队时的老战友，其中有以前我在后校时的教研室主任孙吉迟同志，我又谈起了申诉的事。孙说后勤党委已经讨论过，但还未形成决议。建议我去看张文进主任，张主任是我在后校时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说“你的申诉我已看了。要相信组织，会对一个同志负责到底的。”并请我在他家吃了晚饭，安排我住进海招三所。在上海完成任务返回太谷后，厂党支书韩廉同志转给我一份文件，是海军后勤党委于 1978 年 4 月 26 日通过的 《关于对许贻士同志问题的复查决定》。该决定称撤消原海军后勤学校党委对许贻士定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在政治上给予平反。韩廉同志与我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并告诉我，遗留问题，县委会正确解决的。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等待，但有关我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党籍、工资待遇，工作安排等仍无下文。韩廉建议我去请示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也说不清楚，我又跑了几次省委组织部，最后一次碰到了在省委工作的一位熟人，他说，省委说你现在是山西的干部，有关山西省右派的平反问题要由山西省统筹解决，所以海军党委的平反决定只能暂缓执行。据此，我再到海军后勤部见了有关首长，首长指示说，你要相信党，党委已经做了决定，一定会妥善处理的。

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在山西省级机关工作的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说，中央在烟台召开了五部会议，山西省委调了你的档案带到会上，在会上提出了你的问题讨论，该不该给你平反，但无人发言，后又把你的档案带回来了。于是我的平反又搁浅了。直至 1979 年初，当时中央的 15 号、55 号文件已逐步落实。战友黄元雄告诉我，听军校部的同志们说，许贻士的平反问题，山西省委给中央组织部打了请示报告，胡耀邦部长亲自批了一段话，“该人的核心问题是反对赫鲁晓夫，其他问题都是节外生枝。”这一段话干脆利落，解开了我结在心头二十多年的一个死疙瘩。

五、平反乎？改正乎？

不久海军后勤部首长派了马健政委到太谷，并带来了海军军事法院的判决书，该书

称“撤销（58）法字第 71 号对许贻士的判决”，正式宣布为我平反。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奇特之事，明明是‘平反’，而最后落实政策时，却又是一切都按‘改正’处理。为我恢复了党籍，调整了工资，安排了职务，但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平反’和‘改正’有什么差异，待我明白过来时，却是木已成舟，谁也不听我说了。虽说我二十余年的右派生涯，已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我手里仍拿着‘平反’和‘改正’两个结论，按次序是‘平反’在先，‘改正’在后，真想有人来为我作个解释，是讲个先来后到，以‘平反’为准呢；还是讲个后来居上，以‘改正’为准！我今已年迈，不知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够解开这一跨世纪的难题。

诗三首

袁愈湖

寒冬奇花

丹桂花开了
丹桂花又败落了
凭借温暖的艳阳天
也曾灿烂辉煌

红梅开了
红梅花也凋零了
直面漫长的寒冬
默默笑迎雪霜

无题

在我面前翻开一本书
完全看不懂的书
从扉页到底页没有一个文字
请问用什么根据去理解

翻开这一页又一页的空白
我忽然高兴起来
无需受什么约束了
乐得自由地驰骋

严冬的一抹朝阳

严冬的一抹朝阳
刺破寒窗射进来
活脱一柄双刃剑
悬空倒挂在石灰粉壁上
锋芒毕露

我欣喜这柄透明的剑
甚至想将它插入我的胸膛
剖开我的心脏
让殷红的血从透明中流出
书写一首正在呐喊的诗
用来充实我这冷清的书房

两份判决书之间的人生

余慰明

作者小传:

上海人，1927 生，1949 年 3 月在学校参加地下团组织，1950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1950 年 6 月参军，1950 年 8 月入党。参军后，历任华东军区空军工程部参谋，军委空军工程部野外修理处助理员等职务。上尉军衔，正连级。1955 年曾获空军直属单位先进工作者称号，受到《军旗前照相》的奖励，由中央领导人怀仁堂接见并摄影。1958 年后，赴郭堡水库劳动，参加过制造飞机。离郭堡后当过建筑工，任过技术员，进过干校，还上山去当过农民。1979 年后曾任吕梁地区农机研究所所长，农机局局长，山西省农机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委员，山西省水利厅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79 年 4 月，被评为“山西省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1990 年 3 月，在省水利厅离休。

二十一年冤案

下面是为了同一案件，作出截然相反判决的两份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法院判决书的全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法院判决书　　　　　　1958 年度法字第　　号

本院于 1958 年 4月 9日由审判员王士杰审查了右派分子余慰明的材料，现查明：余慰明，男，30岁，上海 皇渡路三义坊15号，出身地主，成份学生，1950年6月志愿入伍，1950年8月入党。原任空军工程部野外修理处助理员，上尉军衔。

余在整风鸣放中利用党小组长身份煽动点火，激起群众向党进攻，积极进行小集团活动，攻击领导等一系列反党言行。均已查对属实，据此判决如下：

开除其军籍，剥夺上尉军衔。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士杰　　1958 年4月9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事法院判决书　　　　　　（79）法字第60号

余慰明，男，现年五十二岁，安徽省望江县人，学生成份，一九五零年六月入伍，

原系空军工程部助理员，上尉军衔。一九五八年四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四月九日经本院（58）刑字第　　号判决，剥夺上尉军衔，开除军籍。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三日，经空军航空工程部党委复查，认为余慰明同志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提请本院撤销原判。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对余慰明的判决。

空军军事法院　一九七九年五日十日　　（印）

第一份的内容是：余慰明犯有下列罪行：1、在整风鸣放中利用党小组长身份煽动点火，激起群众向党进攻；2、积极进行小集团活动；3、攻击领导。判决是：开除军籍，剥夺上尉军衔。

第二份的内容简单：认为余慰明同志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判决是：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对余慰明的判决。

第二份的判决推翻了第一份的判决。

第一份判决书的时间是1958年4月9日， 第二份判决书的时间是 1979 年 5月10日 ， 其间相隔二十一年一个月零一天，也就是说我无辜地蒙受了二十一年冤案，同时也葬送了我从三十一岁到五十二岁的宝贵年华。

故事从1957年的春天开始。

1957年的春天

在北京复兴门外公主坟，有一座黄色的大楼，大楼与后面的宿舍区一起，被人们称之为空军大院。里面是空军工程部、空军订货部、空军修理部三个单位，都是搞飞机、发动机机务技术的，所以大学生很多，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当时我在工程部任助理员，上尉军衔。

在1957年的春天，我们接连听了传达毛泽东的两个重要讲话，一次是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意思是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次是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基调是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听的都是原话的录音。(注：这两个报告在后来发表时，对录音的讲话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两篇报告给人们的思想以很大的解放。前一年周恩来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力量。这些报告很大程度上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这段时间，空军大院里处处读书声，一片春意浓

浓，人人精神振奋。

我从苏联顾问那里得知，部保密室里有大量技术资料，有大本的飞机、发动机结构、维修手册、各种技术规范、条令，还有工厂的改装通报等，都是俄文的。我下决心用速成办法来突击学习俄文，不久就达到了看得懂，能笔译技术资料的程度，口译虽然还不行，但靠我所掌握的俄文水平，已足以解决我所承担的机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因此我立了功，被评为空直的先进工作者。空直党委的评语是这样写的：“(余慰明同志)显示出了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推动了空军技术水平的提高”。对我给予《军旗前照相》奖励。在部队里，这是一种很光荣的奖励。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朱德、董必武等同志在怀仁堂接见了我们，并一起摄影留念。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1957年的春天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老知识分子对它还感到早春的余寒，而我一个青年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感到的则是春色满园，踌躇满志。

历史无情地证明了我的无知与幼稚。就在兴奋地跨出怀仁堂不过两个月，我就成了反右斗争的重点对象，不久，终于被打成右派。(这里我用的是群众的说法，民众的语言多么生动，右派是被“打”出来的)。

事情的触发点是我为整风写的一张大字报。

阳谋就是阴谋

4月2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任务是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强调“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整风报告传达下来以后，工程部大楼里出现了一批帮助党整风的大字报。这时，社会上的鸣放也是引人关注的。到五月中旬以后，社会上的鸣放似乎出了问题，但我一时也搞不清是什么性质，我总认为在军队领导机关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因为这里绝大部分是党团员哟!

就在这个时候 ，空军大院里召开了一个极不平常的座谈会。座谈会只有少数人参加，无以为名，就叫做‘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吧，我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座谈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会上配有专人对每个人的发言都作了很详细的纪录，当时参会者也没有想得更多，只理解为组织上对每个人的意见非常重视。大家仍踊跃发言。不久，反右正式开始了，参加那次座谈会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成了反右斗争的对象。哀哉!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

在那次座谈会上，我虽然也发了言，但没惹上什么麻烦。麻烦是我在会后写了一

张短短的一百多字的大字报。这是我在整风中所写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顾虑》，内容是批评我们处长，党支部书记王华成对大鸣大放有顾虑，因为他的顾虑，引起了大家对鸣放的顾虑。笔名用‘未鸣’。就在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组织上就把我的整风小组长的职位给撤了(党小组长兼整风小组长)，并立即召开针对我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有人说大字报泄露了党支书王华成的讲话内容，这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因此不是善意批评而是恶意攻击；有人说王华成是党的支书，攻击支书就是攻击党，攻击党就是反党。几个人一说，三下五除二，就定了性。既有反党这个前提，于是在整风阶段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论对错，一概都是反党言论，统统成了“利用党小组长身份煽动点火，向党进攻”，什么‘言者无罪’，完全是个政治陷阱，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这一切都是事先做定的，我已掉入了陷阱，不管我再怎么据理力争，也将无济于事。

涸泽里三条反党的鱼

照理说，对我的批斗会开了几十次，时间用了几个月，写的检讨材料摞起来有几寸高，早就可以宣布结论了，然而却一直拖着，批我的人和被批的我都觉得乏味和疲累，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估计这些人虽然累积了不少材料，但高质量的实在不多，大概报到上级党委仍定不了案。他们想整倒我，必须另辟蹊径。

果然有一天，在批判右派的大字报丛中出现了一张别出心裁的大字报。大字报说：四支部的余慰明、于耀庆、余定章三人可能是一个反党小集团，根据有两条：其一，他们三人都写了攻击党的大字报，其二，在三、四月间，有几个星期天他们结伙外出，鬼鬼祟祟，定在进行见不得人的活动。可巧这三个人都姓Yu，大字报宣称要把三条鱼一网打尽。

反党小集团到处有，文艺界有胡风集团，政界有章罗联盟，党内有高岗、饶漱石集团，那些都是大人物，知名人士。现在竟轮到了三个小知识分子党员头上。群众的情绪大大高涨，批判的火力也大大加强，我们这三条鱼已掉进涸泽里，根本没有了辩解的余地，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口供和根据口供无限上纲的罪证。

我们三个人被分别审讯，三人中我的级别比于耀庆高，我的思想比余定章活跃，又是党小组长，因此被锁定为主谋和重点。三堂分审，互对口供，其间也不乏不太光明正大的诱供手法。这样不知斗了多少回合，没能得出半点罪证。事实终归是事实，思想可以胡编，事实却不能乱造。事实是：三个人虽然都写了“攻击党”的大字报，可是没有互相商量，甚至在贴出之前也没有看过。至于春天假日的“见不得人的活动”则更可

笑。当时我们年龄都在三十上下，到了成家找对象的时候，我的对象戴汝泉(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她是于耀庆的同乡、同学，也是余定章的朋友，假日外出无非是逛公园，看电影，别无其他。审判者既然什么也没有得到，只能承认不是什么反党小集团，然而还不甘心失败，在我的结论中勉强塞进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罪名，叫做什么‘积极进行小集团活动’，而且写进了判决书，使本身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既然不存在反党小集团，又那里来的积极活动？一开始就让法院产生了逻辑上的低级错误。

非常可惜，我的一大摞‘罪证’和检讨材料，在改正时被人从我的档案袋中抽出销毁了。幸亏我手中还有法院判决书，否则在写回忆录时还难以下手哩！

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有一本叫《哈姆雷特》的悲剧。剧中主人翁哈姆雷特在无比屈辱，极端悲痛的情况下，喊出了〝To be or not to be〞这句著名的台词，翻译过来就是：“活着，还是去死”。

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几乎降至冰点，我也曾想到死，甚至具体想到是选择跳玉渊谭还是选择跳水塔。但在高潮过去后，批斗会也逐渐减少了，我个人情绪也越过了最低点，也许是因为这世间还有着我所眷恋并且也眷恋着我的人，也许是不甘心以生命来换取自绝于人民的结语，总之，到宣布反右结论的时候，反而比较平静，一心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人悲愤的环境。

土法造飞机

反右运动结束，空军工程部党委给我戴上右派分子帽，开除党籍，降三级处分，空军军事法院作了开除军籍，剥夺军衔的判决。附带说一说，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领导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命令，叫我写一份“争取重新入党计划”。人民日报社论写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反动派要入党，岂不是痴人说梦？不管怎样想，还是写了一份天方夜谭的‘计划’。1958年春天，我带上‘计划’，被押送到山西劳改，走上了茫茫的，没有终点的“争取入党”的道路，太谷县郭堡水库是第一站。

水库劳动的初期，我参加运土的劳动，运土工具只有箩头、扁担和独轮车。推独轮车不但要两手把稳，还要扭腰用劲，弄不好就人仰车翻。运了一段时间，派我和战友费幼玉当露天仓库保管员，仓库没有围墙，保管员住的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顶上盖一块破油毡，下雨的夜晚，到处漏水，床铺也有一半是湿的，我们只好坐在那一半干的床上等天明。

1958年是大跃进年，太谷县委不满足于人力脚踏汽车、钢筋铁轨火车之类的小卫

星，要放大的。县工业局陈局长从水库把我们与航空有关的十五个人叫去造飞机。用木头和布料在铁厂造飞机，困难很多，风险更大。有多年保卫工作经验的战友周宏达替我们担心，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小心啊小心！"我们也知道飞机不比汽车、火车，从空中掉下来就是机毁人亡的惨剧。到时候如按政治事件处理，我们更吃不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只能接受任务，虽然也抱幻想，希望将来劳动锻炼结束后，由此而能给我们安排一个不牵涉保密的技术工作。当时太原工业大学也想造飞机，但没有基本航空知识，于是派了十五个机械系三年级的学生来太谷铁厂跟我们一对一学习 ，这些大学生们也挺辛苦的，因他们除了学技术以外，还带有另一项任务，就是每天都必须将我们的一言一行向党支部汇报，这是政治任务，可怜这些学生们，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这样做。

到1958年12月20日，《太谷一号》飞机在武宿机场试飞成功的时候，没有太谷县所希望的轰动而壮观的场面，没有想象中的很多群众来围观，重要领导也没到场，更没有大批记者前来采访，原因可能是担心飞机出事，也可能是大跃进的激情已经消退，人们对放卫星之类的事情似已失去了兴趣。这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自制飞机上天的任务虽然已经完成，但我们今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期望却成为泡影，于是，十五个人仍然分头下基层，继续进行劳动锻炼。

百搭技工

我的第二站是山西省建筑四公司榆次工地，先是当木工，因为没技术，成天斜着身子刨木板，使劲不当，加上受寒，左腿患了严重的关节炎。改当机械工，开混凝土搅拌机、卷扬机。开卷扬机要编钢丝绳，钢丝绳的钢丝又细又硬，常常扎得满手流血。三年困难时期在建筑公司度过。在饥饿的年代里，我吃过玉米芯、槐树叶子，混身浮肿。

1963年，由一位民主人士领导介绍，我调到了晋中地区农机局排灌站。因学的是飞机、发动机，搞农村水泵、电动机没有什么困难。亲眼看见抽水上山时，男女老少欢呼雀跃的情景，十分感人，我决心要从专业角度，为基层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帮助。我尽力收集有关的技术资料，费了很大劲，为基层水利、农机工作人员，编撰了一本厚厚的《小型机电灌站实用手册》稿，这本书后来由地区农机局印发到基层，在当时，技术资料极为匮乏，因而这本书在群众中很受欢迎。就因为我是右派，故而在印行时书上不许署我的名字，但我知道，我写的这本书发挥了作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的辛苦写作的最好回报。

1964年春灌紧张时，农村发生大量电动机被烧毁的事故，情况很严重。我对此作了专门调研，发现原因是农村电路老旧，三相电源中一相断电所致，找到原因，困难便可迎刃而解。当时正逢刘开基副省长到晋中下乡蹲点，他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了晋中地区水利、农机、电业局长，以及各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到地区招待所开会，叫我给他们讲解烧电机的原因和防止方法。从而顺利、及时的解决了当时农村中的一大难题。

这位刘副省长分管全省的农业、水利和农机，是一位实干家，他对农村情况常常比当地干部都了解得更清楚，他这人脾气特大，下面的干部都怕他，可是他对一般小技术人员却十分和气，有时还给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他认识了我以后，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后来在文革中，我也是多亏了他，才能离开农村生产队，重新回到地区的技术岗位上来。

下围棋的三家村

早在1959年还在建筑工地劳动的时候，建筑公司就宣布给我摘去右派分子帽子，为此还开了一个职工大会。对我来说，这样的作秀没有一点现实意义。因为众所周知，戴帽右派也好，摘帽右派也好，都是五类分子。到文化大革命更明朗化了，都是被横扫的牛鬼蛇神。

文化革命开始时，我下乡在外，接通知回到机关，铺头盖脸，院子里贴满了打倒三家村的大字报。北京有个三家村，这里也有，一个是农机局非党副局长郭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是我——五类分子右派，还有一个是水利局总工程师赵耿忠，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帝国主义培养的反动技术权威。三人爱下围棋，是棋迷，常常下到深夜，为了切磋棋艺，有时摆两付棋盘、棋子。这些都被革命群众侦察到了，三人两付棋，那神秘的第四人是谁? 一时间来势凶猛。我的妻子悄悄问我：“你们三人有什么事?没有就挺住。”这次我也有了‘反批斗’经验。闹了几次，除了下棋还是下棋，没有任何其它内容。于是三家村这一大案只能不了了之。

‘五七指示’下达后，晋中地区也办起了五七干校。干校设在吕梁山深处的一个小县——方山县的乡下。这里是一座国营养羊场，一部分是革命群众，一部分是专政对象。白天一起下地劳动，晚上、下雨天则学毛选，搞阶级斗争，搞来搞去，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

秋去冬来，羊儿要下山了，五七干校也只得解散，革命群众大部分回城，专政对象则被安排下乡插队。我家被插在靠近黄河的柳林县薛村公社高红大队。下去时被告知，

再给两年工资，以后就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这话把我吓坏了，以我们的体力，要在一个黄土瘦瘠，没有副业，每个工分值只有一角五分钱的山村，养活三个孩子(此时老三才出生)，简直不可能，幸亏这一条没有实行，否则不堪设想。

我们家到高红大队，身份没有向社员公布，由公社干部和村支书掌握。社员则有他们自己看问题方法，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好人不插队，插队没好人’。但是他们通过观察，发现我们的行李那样寒碜，人带书生气，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地主老财。经过一段时间的劳动，看到我们帮村里搞水利，定发展规划，种试验田那样认真，就逐渐改变了看法：这些人是受冤枉，挨整的。

在柳林县的南面有一条小河，叫三川河，河的对岸有一个镇叫青龙镇。平时三川河流量很小，只有三、四立方米/秒，洪水下来则流满了很宽的河床，河滩的庄稼全被冲走，人畜不能过河 。柳林县委决定要搞两个工程，一是建一座从柳林到青龙的水泥桥，一个是在河滩中间建条河堤造地。他们知道了我是学航空工程的，反正与工程有关，把我找去设计河堤，幸亏我学过空气动力学，对水力学的书还看得懂。我就按洪水流量计算河道宽度，按洪水水深计算河堤高度，在河滩沙层上用单脚踩出一道印，社员就按我的脚印筑河堤，垫土方，造成几百亩好地。

1972年，下乡插队人员有点关系的大都回了城。我的大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个女老师在石板桌 、石板凳的石头房里教十来个学生，包括1～4四个年级。我很着急。这时正逢刘开基到柳林开会，我去招待所找了他，他说：“你怎么还在这里?”他当下叫秘书把水利局长乔贵江找来，叫他告诉地委书记把余慰明调回地区，不然他就要调了。不出三天，将我调到吕梁地区农机局农机研究所工作的调令就到了高红村。离开的时候，很多社员来送行，还推举了一个木匠随车到离石，给我家搭好了厨房才回去。

1979年，我终于迎来了改正。

二十年后

江湖话“二十年后仍然是一条好汉”，说的是好汉不怕死。

我的二十年也仿同隔世。

1979年5月10日，工程部党委做出了改正结论，认为：“余慰明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属于错划”，“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来正连级级薪”。同时，空军军事法院也颁发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于是，一夜间，我从五类分子变成了老党员，老干部。

吕梁地区许多干部的党龄没有我长，我又是地区少数几个工程师之一。地委赶紧给我升官，加级。1980年7月9日任命为农机研究所所长，隔了两、三个月又任命为农机局副局长。当了副局长就有了坐小车，分单元房的权利。1981年6月加薪，一次给我调了两级。可我天生不是做官的材料，小车、房子对我的吸引力也不大，我一次又一次跑太原省委组织部，要求调到省里搞科研工作。还是靠刘开基帮忙，把我调到了省农机研究所，1982年1月7日被任命为所党委委员，副所长分管科研。这时我已55岁，到了提拔的极限。1983年调到省水利厅当一名不负行政职务的高级工程师，到1990年3月离休。

我的技术官员生涯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可喜的是我完成了几项重点科研课题，1979年4月评为山西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我的技术职称节节攀升，1981年6月评为工程师，1983年7月评为高级工程师，1989年3月与省长王森浩，科委主任庄国绅同科，评为山西省第一批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故事到此，以喜剧结尾。

历史自己会说话

今天，反右已经成了历史。我对这个历史问题仍有两处不理解，也没有人负责对此做出解释。关于反右运动，有的人认为它制造了五十多万个冤案，浪费了大批有用人才，造成了后来万马齐喑，一人作主的政治局面。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是错误的。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他在五次讲话中重复了这个看法。(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44，277，294，380，390页)。其中一次是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的，理所当然地写入了“决议”。我是搞技术工作的，政治水平低，但我习惯于计算数字，计算‘扩大化’的比例。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改正时，据说还留了五名右派不予改正，而且也是据说，连这五名也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了。从空军工程部(包括空军订货部和空军修理部)下来的十二个右派是全都改正了，郭堡水库锻炼大队全部三百二十名右派，也是全都改正了，其他单位也是一样。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家将如何来总结这项‘扩大化’的反右运动，怎样用准确的数字来表明这种‘扩大化’的程度？因为扩大的比例是12：0、320：0、以至于550000：0，其比值是无穷大！等于说‘扩大化’的含意就是无中生有！就是遍地冤狱！就是枉害无辜!!!

对于伤情的往事，本不想再提，促使我戴上一千度老花镜写这份回忆录的是一个信念：**历史必须还原于历史的真实，历史的错误决不允许重演！**

庆幸余生有感而赋

龙凡斯　**1979**

何事风霜雨鬓秋　　二十一年苦淹留

为盼曈曈千番意　　又梦霏霏百重愁

东风忽闻浩荡来　　老泪不禁纵横流

安得华发一朝染　　寸草心迹报神州

落难前后

張兆瑞

作者小传:

1930 年生。1950 年 1 月参加工作，在省委党校毕业后，于 1950 年 9 日参军，曾在海军葫芦岛基地、海军水鱼雷大队任参谋，参加海军首届团员代表大会，1956 年到 1958 年在北京海军航空多司会部任作战参谋。少尉军衔。1956 年 6 月入党，反右后，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离郭堡后，在祁县轴承厂及祁县化肥厂劳动和工作，改正后任祁县化肥厂工程师，1991 年 12 月退休。

短暂的青春

每当人们回顾往事时，都喜爱品味自己最美好的记忆，这些美好的记忆,滋润着你的一生，使你觉得来此世界一遭,不虚此行。我的最美好的记忆是1952年秋天，那年我刚二十出头，是个两年军龄的小战士，在葫芦岛海军基地施工部队当文书。

秋天的早晨绚丽多采，刚刚冲出朝霞的太阳，照耀着无边的大海，碧海、蓝天、片片红霞，蔚为壮观。

这一天，海军基地上班的号声刚刚响过，政治处的电话就来了：通知我立即去开会，同去的还有三位青年党员。

我预感到将有重要任务，于是急忙下山，但还是迟到了，会议已近尾声。我得知一位首长即将到达。首长的贴身警卫是自带的；外环警卫,由刚刚回国休整暂驻此地的志愿军某师负责；首长办公室及办公室周围的警卫,则由省公安厅的警卫人员和基地的海军战士们共同负责，我的重要任务，就是参加这项警卫工作。

为首长准备的下榻处，是基地司令部所用的一座二层小楼，我和另一位公安负责警卫楼下传达室附近。这间传达室实际上就是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到达岗位后，公安厅警卫提出要搞搞卫生，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要搞安全大检查：抽屉、柜子、我的枕头被褥，都打开共同整理一遍。三十几位公安都布置在小楼上下和院内院外。基地的另三位青年党员，其中魏秘书负责路口巡逻，张连富和赵国良负责接待工作。为了安全和安静，基地司、政、后、卫各部人员都集中到东边大会议室里由刘政委组织读报学习。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处在高度戒备状态,安静地等待。

一阵汽车马达声响过，几辆军用吉普停在我的面前，首先走下汽车的是我们过去

的基地司令員、现任省军区参谋长的李英武将军，他从车上搀扶下来一位老将军，我一眼便认出：啊呀，这不是朱德总司令吗！真是想不到，派我来警卫的竟是朱总司令！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凝固了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朱总司令在李将军陪同下，从我面前两米处缓步上楼，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总司令就在我身边，我向他行注目礼，心里想说：总司令，我是您的小兵，我是您的警卫，我保卫您，是我的职责，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最大信任。总司令老人家神态庄严而又慈祥,他迈着有力的步子,边走边谈,平易随和。联想到老人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一种肃然起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楼上是作战室，那里有地图、海图和各种资料。从窗口可以看到码头及岛上设施全貌。大约个把小时，总司令和随行的十多人走下楼来乘车驰去。不久首长一行便出现在远处防波堤外一片荒滩中的一块高地上。在那里观察，议论，指划着。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警惕地守卫着，执行着各自的使命。

突然,省公安厅的同志们集合走了。封闭在东边大会议室里的官兵们蜂踊而出——表明警卫任务解除了。战友们围着我争相问询：看到总司令了吗？和总司令握手没有？一位舰艇信号兵告诉我：他当时正面对窗子坐着，无意中看到总司令由车上下来，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唉呀！是朱总司令！"这一声惊叫，会议室立刻乱了套，不分级别高低、年龄大小，一下子都涌到窗前去看朱总司令。读报是读不下去了，大家的话题很快由兴奋转向牢骚：为什么把我们软禁在这里不让我们也去见见首长呢？当时激情难平，政治委员刘德垣不得不出来作些解释："总司令来了大家都想见一见，心情可以理解，我当了这么多年兵还没有见过总司令，我也很想见一见朱老总。可是，这是上级的安排，这是命令！我们作为军人都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啊！"

尽管有些同志有点牢騷和不满，但对于派我来执行这个光荣任务，大家是没有异议的。因为我刚刚立过一次三等功，曾获得大军区（东北军区）颁发的立功证书。在十二位同时立功者中，我又是唯一的被当选的团员代表，曾代表海军基地全体团员，去北京参加了《海军首届团员代表大会》，并和海军首长合影留念，因此没有人和我攀比。

我有幸为总司令担任警卫，虽然只有短暂的两三个小时，但使我感到十分自豪 ，我担任这次特殊的任务意味着什么？是表明我工作积极、思想进步？还是表明我学习刻苦、劳动勤奋？不！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党对我的信任，是革命事业对我的信任。得到这种信任是因为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理解到这一点，我心中充满了一种幸福感，这短短的几个钟头，应该是我所渡过的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为朱总司令作警卫之后，我常常自己勉励自己：应该到第一线去锻炼，力争作一个合格的军人。当时岛上敌特活动猖獗，夜间不时发射信号弹进行骚扰，我主动要求参加夜间巡逻。在漆黑的旷野里，那大海的涛声，摇曳的树影，处处都充斥着危险、惊骇，要随时准备打一场遭遇战、肉搏战，我没有退缩，和另一个战友提着手枪勇往直前，每次都很负责任地完成了任务。

1953 年夏，海军基地准备移师鸭绿江口，准备从海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正在待命出征的时候，朝鲜停战了，援朝计划中止，我被选送到参谋训练班学习。22岁时我被提升为团级单位的参谋，在水鱼雷轰炸机部队的高级教练机大队任飞行参谋，三年以后又调到北京，被提升为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作战处参谋，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其间还到刘伯承元帅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过短期培训。此时，我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比如1957年8月1日建军节这天，海防前线曾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空战，双方十多架战机在空中博杀，在粉碎了敌机袭扰之后，我方战鹰全部胜利返航，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作为这次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我在战前一天的深夜里，把敌方活动的情报准确及时地由北京通报给前线参战部队某师的师参谋长。我感到这次辉煌的胜利里也有我的一份贡献。什么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现在我的体会更深刻了：忠诚，并得到信任。

“春风得意马蹄疾”，正当我处于风华正茂、前途无限的时刻，也是我在总司令精神鼓舞下正准备迈开大步奋勇前进的时候，一个险恶的阴谋（有人说是阳谋）正向我悄悄袭来，于是我蒙难了。刚刚绽放的青春就此突然地结束。这年我27岁。

第六十五张大字报

1956 年夏天，得知要调我到北京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去，我简直不敢相信，消息一经传开，战友们为我高兴，为我祝福：“如此快速提拔，前程无量”。因为我是由团里的飞行参谋，越过师、军两级直接进入兵团级，成为兵种司令部作战参谋，他日相见，我将被视为上级机关的“钦差大臣”，自当刮目相待啦！

当我满怀喜悦踏上开往北京的隆隆列车，去迎接我无可限量的美好前程时，谁能想到竟是福兮祸所伏呢？

1957 年，整风运动开始了。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司令部作战处，上午工作，下午搞运动、学文件。上级布置：要积极给各级领导提意见，过点火也不要紧，保证不打击报复，要畅所欲言...。随即展开了大鸣、大放、大字报，不久又规定每人要完成一百

张大字报的任务。

作战处的十位参谋中，我年龄最小，级别最低（少尉），别人都是在多年战火中走出来的军官，我对他们十分敬重。运动中,他们一个个口无遮挡，放言无忌，对吹牛拍马之类的不正之风大肆鞭挞，往往指名道姓说某司令员、某部长,处长如何如何，说到激动处便是爹长娘短、祖宗三代都带出来了。原来我已写了六十四张大字报，内容平平，这时，受到会场激情的影响，当写第六十五张时，便写出了一张五百多字的，题为 《拍马列主义的马屁》 的大字报。在大字报里我没有用脏字，没有用套话。我想用一些比较辛辣的词，来讽刺一些不良现象，以期引起重视。我认为这是应该被允许的。

因为我平时语言比较严谨，出格的话很少说。故而大字报写成之后，深恐有失，文稿在桌上放了足足一个星期，也没敢张贴出来。先在我的挚友中征求意见，得到的全是一片喝彩声：写得好！没问题！既然大家认可（我相信他们绝无恶意）,那就发表吧，于是有人帮我抄写，有人帮我张贴，众人抬桥子，这株“大毒草”就这样出笼了！

几天之后，反右斗争开始了，负责催收大字报的张新华参谋告我：“有人说你的大字报是右派言论。” 我很不以为然，满怀自信地对他说：“说我是右派？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那时的我只有满腔热血，一片忠诚，对于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全无戒备。组织上号召鸣放，每人写100张大字报，过火一点也没有关系！……我都坚决照办。结果我才写了六十多张，写到这张五百字的大字报就惹祸了。不久,开始对我进行批判。

过去我在政治上是很自信的，“政治进步，工作积极”之类评语常常出现在給我作的鉴定上，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多么糊涂、多么愚昧，笨得让人不可理解。我已经糊里糊涂地被当成一条小毒蛇引出洞来了！很快将被送上政治生命的断头台！而我竟然毫无察觉，还自以为是响应号召，写出了颇受称赞的、高质量的大字报。

天哪！我不当右派誰当！活该！

但一转念，我释然了！“阳谋手段”、“引蛇出洞”、“先让他们暴露”……种种暗布陷阱的策略是太高妙了，让你。想象不到，防不胜防。在这样的大人物、这样的顶极高手面前败下阵来，何足为奇！

别了,亲爱的战友

1958年4月，司令员顿星云中将召集我们几个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打出来的右派，开了个颇有人情味的座谈会，安抚勉励了一番，一口一个同志们，下去之后一要如何如

何，二要如何如何……。之后由参谋长纪亭榭将军（军级）宣读处分结论，这位战功显赫语言流畅的知识型将军，在宣读百十字的结论时，竟多次语塞，不忍卒读。在读到我“情节很轻微”一句时，他突然言语流畅地加了一句旁白：“张参谋这个同志情节很轻微，主要是他那一张大字报。”我心里明白：我哪里还是参谋，哪里还是同志，有了这个结论，即使‘情节轻微’也改变不了我落难的命运啦！

几天前这位纪参谋长还对我说：“你那篇文章我看过了，那叫走了板儿啦！你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嘛！有启、承、转、合，有理论，有实际，可你不能乱扔手榴弹啊！你可要好好检查。” 他这番“过失犯罪 ”论的观点曾给我一丝安慰，可惜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效果和动机统一论” 的观点，即：错误的言行必然出自错误的动机。

第二天，海军直属机关打出来的三十多位右派在海军大院黄楼下集中点名，验明正身，准备用汽车送出军营，去山西太谷劳动。此时我对未来已经没有幻想，我知道，未来的我只能是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右派，我神情黯然地走上汽车，坐在那里等待发车。尽管我曾为了一个光辉的理想，奋不顾身忘我地工作过，尽管我多次立功受奖、被越级提升过，而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被否定了。沉思中，忽见刘永轩科长军装整齐的走上汽车，向我们敬了个军礼，我马上站起来迎上去，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半晌说了一句：“到了之后来信啊！” 我说：“一定！一定！”这位身经百战的硬汉子眼里充满了泪花，此刻已控制不住了，迅速甩过头去，他落泪了！早两天他还对我说：“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来！我们科里还用得着你！” 看来他也知道，他善良的期望已经落空了！

为了送刘科长，我又走下汽车，顺势抬头向黄楼的第三层望了一眼，那里是我两年来工作学习的地方——作战处的值班室和作战室。四月的天气还有些微寒，三楼的窗子竟全部打开了，参谋们正神情凝重地注视着我，耳边又响起几天来战友们安慰我的悄悄话：“运动一来血丝呼啦，运动一过屁事没有，先下去等着吧，会回来的。” “你走了我还在，一旦情况有变，我会马上告诉你！” “你这点错误算不了什么！我犯过的错误比你重的多！没关系，今后好好干！” ……此刻相对无言，无言相对，半晌，我又走上汽车。

汽车慢慢地启动了，在行将走出海军大院的一瞬间，我再次望了一眼黄楼的第三层，只见几支手臂仍在窗外深情地摇动着，使我感情上受到很大的振动！

再见啦！不，永别啦！亲爱的战友！永别啦！我曾经工作过的海軍大楼！

难耐的荒唐年月

集体来到山西之后，经过郭堡水库半年多的奋战，后来，我辗转落户于祁县。这里的方言很难懂，尤其是方言的发音那是比我学过的几种外语的发音还要难的多。我这个陌生的外乡人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是一个可以人人得而骂之的乱臣贼子。制服孙悟空的紧箍咒，世间只有唐僧会念。而制服我的紧箍咒则无论是谁，只要指着我的头念上一遍，我的心就会翻腾难耐、痛苦不堪。

当时一个流行的观点是："历史是用自己的言行写成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改变命运全靠自己积极劳动"。我信奉这些说教，苦干！

修建汾河水库时，以我们十几位郭堡战友和中央党校的两位难友为主要劳力组成的太谷民工团第二排，曾在几万人的大工地上夺得《一等模范排》的奖状，我个人曾在一天之内上坝四十二车土创造了全团拉车最高纪录。大坝合垅之日放假两天搞欢庆，在这两天之内除了必须要的吃、喝、拉、撒之外，我只作了一件事，睡！呼呼大睡！中央党校下来的胡乐云和郑海天见状商议："是不是病啦？唤醒问一问吧！"，"没病，我是太疲劳了！" 我答。

由水库回到祁县轴承厂打铁，锻造轴承毛坯。三年多以来，我一天最多打过四千锤，一般也要打一两千锤。超强的高温劳动，累得我吐过血，大量的血流进胃里，晚上吐了两大盆。工人们在叹息："一个人身上有多少血哟！他吐了这么多！"一起劳动的作家公刘下班后急匆匆地跑来看我，见我躺在炕上，首先试一试还有没有呼吸和脉搏，我醒来了，告诉他："我还活着！"他说："医生说了，你不要吃东西，不要喝水，不要动，安静地躺着。" 他陪护着我直到深夜。

在这荒唐的岁月里荒唐的事太多了。比如：我的家庭成份就忽上忽下，变动了五次。根据解放前连续三年的经济状况确定下来的阶级成分, 一经划定就终生不变，在当时, 它是一个人重要的政治标签，是在群众中划分敌友的重要依据。而一旦成为右派，即使划定的成份也会产生变数。

1950 年土地改革法公布了，官兵们一起学习，互相划成份，都说我是"手工业资本家兼小土地出租者"，我在军人登记表上就照填了。1951年土改时，我家订为中农成份，我经过请示及时进行了更改。1957年我即将成为右派，党支委告诉我："你的家庭成份不应该是中农。"我愕然！到山西之后，得知我家确是中农成份，于是三番五次申请调查更正，我甚至把生产队开具的家庭成份证明拿来，也得不到承认。文革中, 我的

家庭成份更是被简化成："资本家兼地主 "。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资本家，狗地主，剥削穷人代代苦！", 我一人身兼两个罪恶头衔，真是 "方今坏蛋，舍我其谁！", 直到1974年我又斗胆申请还原中农成分，党总支发信外调确认：我的成份确是中农。由于某种需要，被某些人篡改了的成份，让我受尽凌辱、吃尽苦头，最后终于改回来了，但是，此时的成份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了。荒唐吗？不！还有甚者！

我的共产党员预备期是24年又一个月，不知在我党七千万党员中如我者有几人。

我1956 年6月入党为预备党员，57年支部同意按期转正，因整风暂停审批转正 。79年为我改正时仍恢复预备党员。红卫兵出身的党支书，由于对我岐视, 说我："表现一般，应该延期一年！", 我当即指出：参加工作三十年的二十一级党员干部，完全和工人阶级实行三同，在铸工车间里長期抬铁水，全县如我者有几人？我的表现应該是很不一般！他怔了一下, 脸色馬上多云转晴，嬉笑着走开了。他没有道理，但他有权力。

还有更荒唐的！1961年我被认为是已经改造好了，摘掉了右派帽子。我原以为可以圆"到地方上另行分配工作"之梦了，不料却又成了摘帽右派。文革初期，升格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在牛棚里和还乡团长、中统特务、地痞流氓、职业乞丐、亡命之徒等一视同仁地接受改造。文革后期我又成了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给戴上的"准右派"。1979年改正之后，相当長时期内，我一直是双重身份：既是无产阶级中最革命、最先进的分子——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同时又是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落后的分子——"准右派"。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既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又是捣乱害人的恶魔。集菩萨和恶魔于一身。可算是当代又一大荒唐吧！

而最荒唐的是：经我们历代老祖宗，千秋万代，一代又一代珍藏至今、传到我们这代人手上的珍贵国宝，竟然被一批不肖子孙疯狂的、一次性地毁掉了。

那是1972 年，我带一批年青人在铸工车间制作铸铜配件，领回来十多麻袋、一千多公斤'烂杂铜'，其中绝大部分是珍贵文物，那是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的战利品：大批大批清代以前的古钱币，刀币，制作精美的各式香炉、祭器、酒具、佛像、铜制兵器，以及被砸坏的各式各样、不知何用的精美的器物，等等……。还有一件古代帝王调遣部队用的"虎符", 那可是皇室里也不多见的国宝啊！眼看着年青人把它们一锹又一锹的投进熔炉，至今尤感痛惜！

没有结束的尾声

在二十二年以后的1979年，我得到的重新评价是："对不正之风发表的批评意见，

不是右派言论。”（摘自海司党委给我的改正结论）。

二十二年后为了落实政策，我重回部队，在那里,我又重温了战友情谊，这家请，那家叫，情真意切，二十年前的同事,如今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当年我们的反右领导组长、作战处长已升任部长，原来他的亲人中也有右派，我俩“相逢一笑”，哀怨全消。他邀我在他家住两天逛逛北京，我则请他帮助我把全家调回故乡秦皇島。

这时我们已是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我自1950年参军夫妻分别，1965年才结束两地分居，可谓一生坎坷。妻子在1953年就早我三年入了党，二十多年让她一位共产党员和我一个右派患难与共，也够难为她啦！谈到调回故乡，我才知道，害人容易救人难！害人时上边有硬指标，救人时没有。大家虚张声势、以示关怀，热闹一阵，不了了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嘛！”我也只有遥望故乡，抱憾终生，作了这段荒唐岁月的牺牲品！

鹧鸪天　刘学锵

相依相伴四十冬，几番霜雪几春风；

天寒地冻围炉暖，屋矮灯昏端碗红。

辞峡谷、跋青峰，舒心放眼见霓虹；

夕阳影里双华发，犹会当年梦里踪。

注：为纪念结婚四十周年而作。端碗红者，碗中乃红高粱面食也。

重游郭堡水库有感　李道性

天高云淡寒风凛，月冷星稀霜雾浓；

夜海茫茫人影动，万马千夫抗狂洪。

改天改地憾山水、追风赶月锁蛟龙；

卸甲流放何所惧，报国何须剑染红。

巍巍大坝耸天立，沟溪河渠碧水流；

绿树青山禾苗茁，库湖春色醉人游。

立坝临风思往事，壮士悲歌几多愁；

昔日英雄今何在？无名功碑不记由。

告别飞沙走石的年代

沈伯英

作者小传：

1927 年出生，安徽凤阳人，1949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 年 9 月参军，1949 年 10 月入团。曾就读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原在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报社工作，1950 年 2 月调海军，在《人民海军》报社任编辑。副连级，中尉。1958 年以前曾立功、受奖，并当选为海直机关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1959 年水库建成后，在太谷文化舘等单位从事编刊物、修县志的工作，后在县营造厂劳动。1961 年 11 月，为解决家庭团聚，终于调到妻子杨非的工作所在地内蒙呼伦贝尔市气象局。1979 年后，任呼盟科协学会部长、盟科技局调研员等职，并兼任科技杂志主编。1988 年年底离休。离休后自学法律，获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任律师多年。

一、 在劫难逃

1979 年夏，赴京落实“改正”政策时，我去拜访一位反右前即已转业，二十多年未见的作家、道学家老战友，一见面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也被打成了右派，真是在劫难逃！”他说这话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我 1949 年 9 月参军后，工作表现一贯较好，是人民解放军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人民海军》杂志社、报社党支部首批党员发展对象。此前不久，我还曾立三等功一次，当选过海军直属机关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受过海军政治部的通令嘉奖。这些，都是这位战友所了解的。确实，在大鸣大放开始期间，我从未写过一张大字报，也未在任何会议上发过什么言。这期间，我正在大连两所海军学校采访，任务是报道“鸣放”。当时，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大鸣大放”，才是党的政策精神，任何压制鸣放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我到大连不久，我们海政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同志也来了，和我住在同一个招待所 。他向我透露了不少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了解的有关毛主席、党中央如何支持鸣放的信息（他向我说的话，我始终未向人吐露一字，否则，他的麻烦恐怕小不了），这更加坚定了我对“鸣放”的信念。因而通过座谈、专访收集了大量的鸣放意见，写成了一篇 5000 多字的长篇报道，和某海校一位新闻干事共同署名，发表于《人民海军》报第一版。就是因为这篇报道，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代言人”。实际我当时仅是个年届而立之年的小中尉，哪里当得起什么代言人？何况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和资产阶级连边也沾不上。

我在所谓“代言”中反映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教授对肃反中的意见。他们在肃反运动中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和批斗，有的还挨了打。有些批斗意见令人啼笑皆非。无论本人怎么解释说明都不相信，而又无法到国外去外调。结果，搞的这些人无所适从，工作积极性大受挫伤。其在归国人员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可想而知。

在动员鸣放阶段，有一次大连某海军学校的几位领导同志在一起研究问题，我作为记者也参加了。我听到有些领导人对鸣放并不是衷心赞同的，有人甚至想等到以后秋后算账。我将此事写成一份“内参”，交给海军报社的领导，后经政治部主任看后，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值得引起注意，批示转发全海军团以上党委。不料，这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从大连回来时，反右已经开始。也可能真是在劫难逃，我如早一天回来，即随海军一位首长出差到福建前线去了（他行前曾让秘书打电话指名叫我跟他去），那就不会有在学习会上发言的机会，也许能幸免此难。可我并没有认清此时风头已转，仍然在单位学习小组会上随意乱“放”。如说：“肃反运动中以检查保密为名，随意检查别人的信件，是违反宪法规定的通信自由的；不经法定程序将人隔离反省，更是侵犯人身权利。”有人辩说：“无产阶级不能以自己制定的法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我却愤然反驳：“这种说法缺乏起码的法律常识。法律当然是有约束力的，你感觉自己的手脚受到束缚了，那么请问你的手脚想往哪里伸？我因此被批判为‘讼棍’。

此外在学习座谈中，我还陆续提出以下一些意见：说海军政治部发展党员慎重有余，积极不足。发展那些勇于独立思考、对工作老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入党顾虑重重；说发展那些老老实实、唯唯诺诺的人入党虽没有错，但难以发挥一个党员应有的作用。还说在肃反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可能隐藏着贼喊捉贼的“娄阿鼠”……等等。这在当时都是很犯忌的。

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全由我们的老社长给记录下来了，并整理成十多页稿纸公布在报社的墙壁上。一开始我虽然觉得有些不安，但也没有想到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当领导组织群众对我进行批判时，我也能冷静对待，经历了几次批判会以后，我又投入了工作，我甚至于以为没什么事了。就在反右运动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整个报社即将转入“整改”的前一天，领导突然宣布 ：沈伯英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就在我被宣布“戴帽”后不久，老社长就曾向我说，他不该记下那些东西。我说：“您记的都是我的真实意思，我不怪您。” 后来，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

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曾说，他对我们报社几位同志被打成“右派”，深感内疚。他说：“作为报社的党政领导，我未能顶住，是有责任的。”他向我并让我代向其他三名受害的同志表示歉意。我为他的善良和自责而深受感动。诚恳地给他回信说：“我从来未把这看成是单位领导的个人责任。这是历史造成的。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您如真顶，恐怕把您自己捎进去，也救不了我们。”

我认为我是应上了那句老话：在、劫、难、逃！

二、 辛酸岁月

1958 年 4 月 25 日，我们海军直属机关的一批右派，在海政保卫部两名干部的‘陪送’下，乘火车前往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去劳动锻炼。这里说两名保卫干部是‘陪送’，而不是‘押送’，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都很好。他们都没有携带武器，而且态度和蔼，跟大家有说有笑，仍然管我们称‘同志’。也许他们真正是把我们看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谁也没想到，后来‘右派’竟被排在‘地、富、反、坏’的后面而成了‘老五’。

这一天全北京市的人都在投入消灭麻雀的运动。从位于公主坟的海军大院乘坐大卡车前往火车站，看见马路两旁的楼顶和窗口都站满了人，挥动着长竿和衣服、头巾等，高声呐喊，如临大敌。可怜这些麻雀们，被赶的到处乱飞，终至不堪劳累，坠地而死。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我们这些右派，不也像麻雀一样被毫不留情地赶出来了吗？后来事实已经证明，把麻雀视为‘四害’之一加以消灭，是完全错误的。最近有的国家已正式提出要为保护麻雀立法，因为麻雀是益鸟，而不是害鸟。据有关专家论证，它们每年吃害虫给农业生产所避免的损失，远远超过它们所吃的谷物。至于它们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笔者是外行，不敢妄加评述。对于麻雀这样的小动物，错误地加以消灭，而且并没有真消灭掉多少，可以说是对科学无知的失误，纠正过来也就算了。但是反右派事关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却不那么简单。在这次运动中，受迫害的干部达数十万人之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是各自战线上的精英；受迫害的时间长达 22 年之久，亲属、子女均受株连。这恐怕不是“扩大化”一句话所能交代得了的。而且错扣发的工资不补，也毫无道理。

列车开动了，离开了居住多年的首都北京，离开了早已立志为之奉献终身的部队，大家心里都非常沉重。我们乘坐的硬座车厢内，很少有人说话。尽管‘陪送’的保卫干部故意找人闲唠，也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致。我久久沉浸在和爱人分别的悲痛气氛中。

昨夜，我们几乎彻夜未眠。晨起，她连早饭都没吃，就离开了我们已收拾一空的小屋，泣不成声地回她求学的所在——北大去了。临别前，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安慰她，我们是去‘劳动锻炼’，而不是去‘劳改’，说不定一年半载即可回来了。压根就没想到，这次蒙冤竟长达 22 年之久。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右派，在当时受批判时曾说："20 年后，历史会证明谁是谁非的。"真可谓有先见之明！

列车向着太原方向继续奔驰。车厢喇叭传来列车广播员的声音："前方停车站是正定车站。"我忽然灵机一动，向坐在周围的同志说："我出个谜语给你们猜吧。谜面是古书中的两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打河北省一地名。当我把谜底"正定"("正"与"镇"同音）告诉大家时，坐在我旁边的原海政文工团创作组的周永熙难友，可能理解了我们 "面临厄运，应当镇定对待"的含意，连说："这个谜语有典故，有意义.。" 接着他也发挥了他的创作才能，讲了几个谜语、故事。车厢里开始恢复生气，互相攀谈的多了。我们之中唯一的一位女同志，原海政文工团小提琴手郑淑芹，又和往常一样跟人高声交谈了；还笑对我们说："你们可真够开心的！"——实际上，就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来说，不正是面临着"泰山崩于前"的形势吗！

到达郭堡水库施工地，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小干部（相当于部队的班长）。开始他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他让我们排坐在草地上，他也坐在前面地上跟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老同志，有的是首长、领导，这次来帮助我们修水库，我们非常感谢！"他也和送我们来的保卫干部一样，仍然管我们叫"同志"，大家也稍感快慰。谁知不几天，他就在一些集会场所，跟一些所谓的左派一起，大骂起右派来了。其实，许多人找岔骂我们，不一定是有意和我们过不去，而只是为了表明他和我们界限分明，他是左的，是革命斗士，而我们是右的，是政治贱民。按目前的时尚说法，这种心态就是作秀。

我们海军直属机关到郭堡水库施工地的这批人，和总参、总政、空军直属机关，还有山西军区等部队来的人，分别编成几个锻炼大队，实行自我管理。我们海军来的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从此开始了将近一年的兴修水库的艰苦劳动。

当时还有着一些幻想，心想只要好好劳动改造，不久就会回到革命队伍中的。所以我在修水库的劳动中，可以说是真能拼命。好在我自幼生长在农家，对推独轮车、抡大锤、挑土、抬石头……等劳动，都驾轻就熟，且不惜力。水库劳动结束到县里进行总结鉴定时，我被评为所谓"劳动模范"，发给一张荣誉证书却没有公章。但第一批宣布摘帽的并没有我。总结鉴定后，我被分配到太谷县文化馆编刊物。后又被抽到县里和中央党校一位下放教师一起编县志。接着我便被调到县营造厂（即建筑大队）去继续劳动，

并帮助厂办公室搞一些宣传鼓动、总结报告之类。1960 年国庆前夕摘帽，我是太谷小报报道的头一名；不久便被调到县工业局办公室工作，直到 1961 年 11 月调往爱人所在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气象局。

三、 团圆以后

我的爱人杨非，1949 年 9 月和我同时参军，原在海军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是我 1950 年 11 月由华东海军随同三位老领导调到海军政治部，与我交接干部介绍信的第一人，也是我到海政后认识的第一位女同志。文化大进军时，她调到直工部文教办工作。1954 年因部队正规化转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学习。由于她在湖南长沙上高中时，是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地下入团、入党，后又经过几年的部队锻炼，所以入校后颇受重视，一直担任校学生会部长、系团总支书记。1958 年毕业后，她本有条件留校或回海军，但由于受到我被划成“右派”的株连，她只好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最艰苦的地方去。先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呼和浩特），1960 年 4 月又调到呼伦贝尔盟气象局（海拉尔）。

我调到呼盟后，搞新闻本行当然已“不合格”，只得留在呼盟气象局。我通过努力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地面观测和资料审核业务，并在气象宣传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仅因当时单位有几个人给盟委写信揭发某局长及其妻子的违法乱纪和贪污问题，我和爱人都表示了对揭发者的支持，便受到了这位局长的猖狂报复。他把我打成了所谓“反领导小集团”成员，并抓住我观测记录中气压 0.1mb 更改不清的问题，诬我“涂改记录”，又给我降了两级工资。“文革”期间，更被当成“死老虎”，遭到了“关牛棚”、批斗和殴打。爱人也被诬为“反动技术权威”，受到批判、迫害。但她仍然一直坚持值班，甚至在武斗混乱、人人自危的时候，预报室已无人上班，她仍坚守在岗位上，终使天气预报从未间断一天。

搞气象，本非我之业务所长，亦非兴趣所在。正如海军老战友（也是难友）、翻译家范德一教授所说：“即使你成为气象专家，也没人承认你。” 而我就在这个用非所学、待遇微薄且饱受凌辱的岗位上，一直坚持 1979 年全国右派大改正的到来。

去安徽联系调动，当时未获结果。后承我的一位老领导朱大姐给安徽省一位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便很顺利地联系好了调《安徽日报》社工作，爱人杨非也联系好了调安徽省气象局；又因内蒙古气象局和呼伦贝尔盟委都坚决不放杨非（因她是北大毕业的，当地称之为“气象权威”，认为呼盟地区的气象服务离不开她），而未能调成。

调走不成，于 1980 年 1 月，我便被从气象局调到呼盟科协当了几年学会部长，并于 1985 年 4 月入党到 1988 年底离休。

从上中学时起，我就一直对法律很感兴趣。所以在“反右”学习会上能“放”出那些有关法律的言论，曾被人批判为维护资产阶级法律尊严的“讼棍”。改正后，调不走，曾要求调当地政法部门工作，结果，爱人和孩子们都反对。我们年仅 16 岁、刚上大学一年级的爱女说得很可怜：“爸呀，我还从未对您的工作提过意见，您别去搞政法吧！在这少数民族地区，办案不容易。我害怕您办案得罪人，遭到坏人报复。还是干别的工作，让我们全家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吧！”因此，调政法部门的要求虽已获准，我还是应科协领导的登门邀请，而同意调去科协就任学会部长。与此同时，我又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北京人文函授大学等函授学习法律，并先后获得毕业证书。后又在呼盟律师事务所当兼职律师，在呼盟管理干部学院讲授法学。1986 年参加成人自学高考，又以高分取得内蒙古大学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并在首次全国律师资格统考中，以优异成绩取得律师资格。简介已被收入《中国律师大辞典》和《中华名律师辞典》。所撰写的《期货经纪业务法律服务的商榷》一文，曾在东北三省律师业务研讨会上获得好评，现已被收入建国五十五周年《优秀论文获奖文库》等书，并获特等奖。

我在上学时还曾上过 8 年私塾，读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宋词等古书，在海政工作时当过两三年机关干部的兼职文化教员，在呼盟又当过两学期兼职中学语文教师；且自幼爱好书法，曾临习二王、怀素、孙过庭、文征明、邓石如等多家名帖，能写楷、行、草、隶、篆几种书体。数十年来，朝朝暮暮，挥毫不止，也有了一定功底。1996 年，曾有一幅草书作品入选司法部、律师协会、中国书协、中国美协四家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律师书画展；2002 年又有四幅书法作品入选《中华当代书画艺术集锦》一书，并在首届“中圣杯”中华书画展览中获优秀作品奖。现为大庆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虽年逾古稀，仍每日临池不辍。

1992 年 5 月，因女儿工作关系，我随老伴经组织联系易地安置来大庆（由女儿工作单位大庆石油管理局供水公司提供一套住房，转来户口、党组织关系和老干部管理关系；工资福利仍由原单位负责)。次年春，我协助当地一位青年律师办起大庆市第一家民办律师事务所，担任副主任，并将本所命名为“黑龙江四维律师事务所”“四维”，语据《管子》一书，“礼义康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赋予的新义是：“维护事实真相，维护国家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律吁自身形象。”几年后，我又转到距位处较近的庆城律师事务所。近几年，律师不当了，是老伴和孩子不让再当，

因我年纪大了，怕我因司法机关办案不公而生气伤身。无事，我便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并应聘为老伙伴们讲授古典文学。近年朱，经常参加一些书法展览。特别值得告慰诸位战友、难友的是我和同甘共苦、已过金婚之年的老伴、湖南妹子杨非（她也是海军的老战友），身体都很健康。子女都还算学有所长，事业有成，工作、生活都很好。孙女已上大学三年级，外孙女今年又以高分考入大学，均品学兼优。我们终于盼来了如此安祥、如此和美的日子。

这说明时代的确是变了，那个以斗争人为纲，以斗争人为乐，以斗争人为荣的飞沙走石的年代，已经不大可能复返了。但愿历史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附诗述怀：

年上八十随思 沈伯英

少壮哪知世事艰

敢骑虎背进诤言

蒙冤受辱廿三载

近老幸逢改革年

丙戌年春节

三戴‘桂冠’

张英敏

作者小传：

1930年生。1949年12月入团，1950年12月参军，1985年1月入党。空军一航校领航系毕业，来堡前在空军司令部情报处任侦察参谋，少尉军衔。离堡后，先后在太谷园林学校及农机修配厂任职，1961年后调祁具农机站当工人，1966年至1975年，被遣送到原籍河北农村劳动，1976年复职回山西，1979年改正前后，一直在祁县中学任地理教师，1991年10月退休。曾编著《综合程序教学法》及《综合地理教材》，获县教一等奖、省三等奖。

荒唐年代竟荒唐，辛酸往事倍辛酸；

咒念金箍是真理，恩蒙三次有桂冠。

二十二年数日过，五十五万皆凄然；

今古奇观幸际会，留得余生苦笑谈。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七年，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次大阳谋，使中国有五十五万有识之士惨罹右祸，本人有幸，也名列其中，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并荣获开除军籍、团籍、剥夺军衔、降四级并送地方劳动锻炼的待遇。这是我第一次戴上桂冠。

在戴上右派帽子的第四年，也即1961年10月，经过了一千五百多天极其繁重的劳动后，这顶帽子总算是给摘去了，原来‘右派’的称呼改成了‘摘帽右派’。其实乃换汤不换药，对我而言，工作不但没有调整，反而更加重了，由修理工农机手改成抡大锤打铁。在那人为饥荒的日子里，我写过两句诗：“挥锤庆丰年，稀汤照面孔”，可谓其时的真实写照。

文革开始了，我这个老运动员岂能逃脱被整的命运，因为我是另册人物，斗罢走资派后接着揪牛鬼蛇神，就将我揪到台上，斗了个不亦乐乎。接着是抄家，抄走了我的书籍、相册、日记、信件等等，凡是有文字的车西全被抄走。造反派们开始东查西找，也没查出个什么结果，后来却在我的日记中查出了一段话，我在日记中写道：“三年灾荒明明是人为的偏要说成是自然灾害，肚子饿得受不了，还得说生活提高了。”这本是说的大实话，可他们认为这是我不满社会主义的言词，说这和《燕山夜话》同出一辙。反胡风运动时也是一样，那时就说我写的日记和胡风的言论是一致的。天哪，我有那么高

的水平吗，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到运动，我就被抬高了身价，居然能和专家、学者们相提并论。更奇特的，还有人问我："你从部队下来，你偷带的枪藏到哪里去了？"我回答道："我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座的也有从部队转业或复员的，请问，哪位带回了枪呀！"我回答得理直气壮，质问我的人无言以对，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会场上一片口号，"打倒张英敏！""不许张英敏反攻倒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此起彼落，热闹非凡。他们白天斗过，晚上还轮番接着斗，要战斗通宵，他们斗志虽高，身体却吃不消，往往斗到深夜，小将们自己就熬不下去了，一个个伏在桌上打鼾，到这时我才能席地而坐，稍息片刻。就这样斗来斗去，斗了一个多月，看看实在也斗不出什么油水，于是给我做了结论，说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将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农村劳动改造。这是第二次有幸重戴桂冠。

回原籍后，我被编入黑七类队伍，从此成了一名实实在在、正正规规的专政对象，享受了作为一名专政对象所能享受到的一切优厚的政治待遇：大会批、小会斗，不开会的时候又批又斗；劳动的时候地头斗，收工以后家族斗，为了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就在短暂的工间休息时，也要抓紧时间争分夺秒斗一斗；大清早，天蒙蒙亮，要起来扫大街；晚上，要对革命群众背诵那份背诵过无数次而又根本没人愿听的检讨书；中午，往往仪式更为隆重，我得头戴高帽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有时还要奉命游街，挂上白纸条，写明右派分子某某某，名字上还得用红笔打上三个叉。就这样，懵懵懂懂，窝窝囊囊地被专了几年政，可我还是我，还是 130 斤的一条汉子。适者生存嘛，就在这奇特的环境中我仍然活了下来。

后来，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政策有些放宽，县革委会为了显示对阶级敌人的教育改造的成果，将我和另一名右派同时摘去了右派帽子，于是我才又成了一名正式的公社社员。

在那个年月，当一名社员也是很艰难的，一整天的重活，才能挣一个工分，算一算只值五角钱。虽然我拚命干活，每年还要欠队里一百多块钱，几年下来，累积总数竟欠了 500 多元。我想，我必须另找出路，想了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回祁县要求复职。复职谈何容易！经过百倍努力，遭受无数冷眼，最后在等待了近一年的时间，才算等到了祁县革委会的一纸公文，这当然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份批准我复职的公文上，对我的复职提了个苛刻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我要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才能恢复工作。当初山西方面说我如何如何不好，给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并将我遣送到河北原籍农村去劳动改造，我改造了七、八年，河北方面说我改造得好，给我第二

次摘去右派帽子，山西这边倒又不认账了，这是根据什么政策？什么规定？什么精神？。难道河北的党给我摘了帽子，山西的党却可以不算数，他们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接受。于是我第三次戴上了右派份子帽子，在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中，至今还很少听说过有人三次戴帽，我有幸获此荣耀，站在这个队伍的最前列！

我曾捉摸，这些左派们为什么总想给我戴顶帽子，他们是出于什么一种心态？后来，我捉摸到一点了。就是这十几年以来，这些人左斗右斗，就想斗出点我的什么把柄来，可是什么也没捞着，于是就顺手再拿右派份子的帽子往我头上一戴，我只得服服贴贴听他们摆布，来运动的时候，想抓就抓，想捕就捕，这也就是过去做政治结论总要留个尾巴的道理。

回到祁县的一年以后，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同志，觉得对我的处理与政策不合，他通过驻祁县部队老首长出面，将我的复职结论改为：摘去右派帽子，按严重政治问题处理。这是我第三次被摘去右派帽子。其实，‘按严重政治问题处理’也是一条尾巴，我有什么严重政治问题呢？既未投敌叛变，又不曾盗窃国家机密，既不曾聚众滋事，又没有参加反动组织，怎么能扯得上严重政治问题！但对我来说，拖个小尾巴比戴顶大帽子可要强得多强得多了。

直到 1979 年全国范围右派改正，我的结论改成：‘按思想问题处理’。这个结论我比较中意，因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试问：古今中外，从所有圣贤哲人、帝王将相直到每一位凡夫俗子、左派右派，谁能说自己没有思想问题呢，既然大家都有，彼此彼此，也就不必多说了。所不同的是我为这个‘思想问题’，在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中，一顶无形的铁帽戴上又摘，摘了又戴，戴了再摘，摘了再戴，……犯得着吗！

我是我，我非我，我行我素

周宏达

作者小传：

1920年生。1937年12月参加工作，1938年3月入党，1939年5月参军。曾任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助理员，中校军衔。1947年解放战争中立过功。离堡后，在平遥县种籽站任工作员。改正后任山西晋中地区科协主席。

一个说真话的故事

一、我是谁？

我叫周宏达。从参军时起我就叫周宏达，现在还是叫周宏达。

我是在1937年参加革命的，那年我才十六岁，虽然积极，但也比较单纯，脑子里只想一件事：干革命！第二年，1938年，也就是当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入了党，成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我懂的比以往多了，我懂得作为一个党员，首先就是要对党忠诚。 第三年，1939年，这一年的我，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热血沸腾地参了军，成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的战士。党教育我，一个人民的战士，为了真理，为了革命，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1957年，整整二十年，我从十六岁成长到了三十六岁，革命战争考验了我，也锻炼了我，党信任我，也培育了我，我已经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的中校助理员。我认为我应该比较成熟了，我有理由相信自己能为党更多地做些事情了；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在我参加革命工作二十周年之际，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次没法预料的转折。

事情是从1957年整风“鸣放”开始的。

二、 我是我

1957年毛主席号召整顿‘三风’，总部直属单位也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在排演厅作动员报告，他传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讲话精神，并号召大家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开炮，他让同志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其所知提出意见，而领导者听后应是闻者足戒。最后甘副主任还玩笑似地说：“意见尽

量提，可不要开枪打人。”当时我听了以后，思想上有很大的触动。我想，我作为一个多年接受党的教育，又有着较多斗争经验的老同志，应该热情地积极发言、带头鸣放，这是我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虽然我过去曾经历过许多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也曾亲眼目睹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些并不正常的现象；但我认为，那是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难免发生的，现处在和平环境中，党进行整风正是为了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准备接受教训以改进党的工作。作为一个无限崇拜和信任毛泽东的小兵，我根本没想到这会是什么引蛇出洞的‘阳谋’。我至今仍宁愿相信甘泗淇副主任在动员整风时，他也不是蓄意在开展一场举世罕见的大‘阳谋’。当时，许许多多老同志也怀着和我一样的想法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我根据自己多年工作的经历， 首先对主观主义提了意见。我说以往工作中，往往是处于一种领导主观、下面盲从的状况，由此而造成了许多本可以不犯的错误。我举例说：“解放军总部直属单位解放之后经过五次严格的政治清理，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纯洁的， 但现在仍然提百分之五左右的清理对象，我认为这就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在工作方针上的表现。

在整风中，我还谈到抗日战争时，在敌后开展整风运动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太行五分区政治部保卫科工作，当‘抢救失足者’运动开始时，分区整风队的数百名所谓失足者，都被集中在一个大庙内。有天夜晚，召开全体大会发动坦白交待。大会主席台上站的是位分区党委领导同志，台下黑压压地站着数百名‘失足者’。这位领导同志手里端着一盏麻油灯，他走下主席台，高举着油灯，一个一个走过来，照着每一位被整干部的脸，并动员他们坦白交待。在黑夜里，那种逼人的压力，那种严酷的气氛，简直使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那时正年轻，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在会场后面扯起嗓子高唱了一句京剧《武家坡》：“一马离了——西凉界”，就从墙头跳出墙外，溜之乎也。而后来，事实证明那数百名‘失足者’，绝大部份都是挨整受屈的好干部。他们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都以实际的贡献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有许多人更是为了革命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谈到这段回忆时，我对此情此景玩笑地打了个譬喻，我说这简直就像日本鬼子搜山，漫无目标，却空造声势，穷嚷狂叫一番，白费气力，毫无收获。我觉得大家听到这里，都感受到了主观主义的确给我们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当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我说章伯钧、罗隆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当国民党执政时，他们不支持国民党而支持共产党，今天共产党执政了，他们作为朋友对党的工

作提了些意见，是对党的帮助，不能说是攻击。再说他们既不掌握兵权又不握有政权，在党号召整风时提提意见又有什么呢，即使有些意见并不都很正确，也不一定都很准确，但也不能就说是反对党的领导。

我还谈到过去在运动中，有一些同志，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受逼供信的影响，对前途感到绝望，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过去对自杀者一律称之为叛徒，我在鸣放中表示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凡是由于逼供信而自杀的好人不能称为叛徒，好人被逼而死，怎么能再背上叛徒的帽子呢？当时有位领导问我："不戴叛徒帽子该给个什么名义呢？"我说："首先应接受教训，决不能再搞逼供信，而这些被逼而死的好人，应称作是：为革命光荣牺牲。"

在整风中，我积极发了言，诚挚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都是我经常想到而没有机会谈出来的想法。我谈到这些想法时，我觉得我从内心里体验到的党的伟大和无私。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一时风头急转，党一再要求的'鸣放'，已被认定为反动资产阶级向党发起的猖狂进攻。风云突变，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许多人把过去并不错的发言全部收回，还把这些发言记录撕毁烧掉；还有些人紧跟形势变化，立刻转弯表态；可是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不跟着转弯。这时候，我做了一件使所有的人都想不到，但我自认为是正确、坦诚的事，我贴出了一份大字报，提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问题；而见风转舵、顺水推舟不应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于是，人们说我站在了运动的对立面，就这样我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

三、我，似乎不是我了

批判会开始了。会场上的气氛是严肃而紧张，群众的情绪是激动而昂扬，大家异口同声地指责我是乘整风鸣放之际恶毒地向党进攻，并列举我的发言为证：

我说过：因逼供信而自杀者不是叛徒，而是为革命光荣牺牲。这是为叛徒树碑立传。

我说过：章伯钧、罗隆基是共产党的朋友。这就是我勾结党外资产阶级向党进攻。

我将当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比作日本鬼子搜山，是攻击党的整风运动。

我说过：不分情况，提百分之五左右为清理对象是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在批判我的时候有人追问我："你所说的主观主义的领导，指的是哪一位领导？"又有人接着回答

说："周宏达不同意毛主席的百分之五敌情分析，他所反对的领导当然就指的是毛主席了。"根据这一分析，我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份子。

除了上述这些言论以外，我还有一大罪状是同情右派、支持右派。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批判我以前，我们保卫部还有一位助理员佟惠林同志已经受了批斗。佟惠林同志十四岁时还背不动枪，就参加了八路军革命部队，他因为对肃反运动提了点意见，说有些做法是"血淋淋的恐怖行为"。为了这"血淋淋"三个字，他被批斗了整整一个礼拜，虽然他自己承认了用词不妥,改用为"悲哀和眼泪"，但仍然被认为是对党恶毒攻击，并定性为右派 。我对此有不同看法，并为佟惠林说了几句公道活。于是我也为此而被批判，说我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为右派份子辩护。这一切总起来，我的罪名是严重的：说我是一个从抗战的整风运动起，直到建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对党不满的反党的'老右派'！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在别人眼里，我似乎真的不是我了。

四、我还是我，我行我素

最后，在军事法庭上宣读对我的判决书时，我说："我感谢党的不杀之恩!"我当时的确是这样想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有信心会看到这一天：是谁给我戴的帽子，将来谁给我摘帽。现在，我虽被开除出党，但我为党的事业终身奋斗的理想，并没有变，我将尽我的努力，积极地参加劳动，并做好今后我可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但同时也感到痛心和失望，本来正可以为党多做些工作、多作些贡献的大好青春年华，就将白白流逝。

离开部队，直接来到太谷并投入修建郭堡水库。当时已进入大跃进，全国上下，一片浮夸。在水库工地上，在太谷县委的要求下，大家都不得不按照上级要求虚报成绩，可以说都在自己骗自己。我们锻炼三大队的几位负责人，共同定下了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要说实话，办实事，绝对不说假话，不骗党、不骗群众、不骗自己。因为一直实干实报，不弄虚作假，不理会上级的虚夸要求，但为此我们却得到了不公正的回应。在总结时，在大坝指挥部的战报表上我们的成绩是最差的，标志着完成任务的红线是最低的。大坝指挥部命令我代表三大队将带有屈辱性的'母猪旗'扛回去，我拒绝了。我说按照你们统计表上的土方指数来计算的话，三个拦河大坝都修起来了，而实际上眼前连半截大坝都不到。这面'母猪旗'你们爱叫谁扛就叫谁扛去吧，反正我不扛。这时，我重又发现了我自己，虽然戴了帽，丢了党，离开了部队，但是我还是个我。

后来三面红旗越飘越高，牛皮也越吹越大，全民大炼钢铁，水库自不例外。众人都说太谷有铁，谁敢说太谷没有铁？众人都说水库也能炼铁，谁敢说水库不能炼铁？任

务既然压下来了，我们又怎么办？我和原来总政话剧团的舞工队长赵森林同志动起了脑筋，我们找来了一个风箱，又找到一个坩锅，就用拉风箱烧坩锅的办法，硬将一些成份很差，根本不够炼铁标准的贫铁矿石炼成了 500 克左右的铁渣。当时的太谷县委如获至宝，兴高采烈，立即将汽车披红戴花，装上这一市斤左右的铁渣，开到太原向省委省政府报喜。

紧接着是，全民大建小高炉，水库领导自不例外，立即组织劳力建土高炉，几天之内在半山腰里修起了好几座。有些土高炉只烧焦碳，不投矿石，看起来火光熊熊，实际上是做做样子，可见当时的浮夸风刮得有多厉害。最后据我所知，好像也只有我们三大队那座土高炉还炼出了一点铁。历经了千辛万苦，每天也只能练出 900 多公斤生铁，可指挥部让我上报日产生铁五吨， 简直虚夸无边 ！我不同意 ，我说 900 公斤就是 900 公斤，连一吨（1000 公斤）也不报。指挥部领导人把我找去进行个别谈话，说我不接受教训，不听党的号召，不能紧跟党走……旁边有些同志见了这情况，怕我吃眼前亏，就暗示我让我虚报，我只当没看见。我说：“办不到的事我不能说也不能做，我已经戴着一顶右派帽子，不怕再戴一顶!”再往后又刮起了全民炼钢的劲风，我和原《解放军报》社的周运峰一起干。说是说将生铁练成钢，实际上是将生铁炒成熟铁，或是将老百姓家的铁锅铁勺砸碎了炒成铁渣，还美其名曰“炒钢”。最后炒得我们两个人的衣服上千疮百孔；两人都戴眼镜，镜片上都被火星烧出了斑斑白点。这些都应是大跃进的珍贵遗物，很可以给后人留作纪念的，可惜后来均被丢弃了。

从拉土、修坝、烧坩锅、建土高炉直到炼生铁 、炒熟铁、办万能工厂……我样样都尽力去做了，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管我们如何竭尽心力，也只是在虚妄的指标上增添一些彩色的泡沫而已。但从个人来说，我总是尽可能将工作做得好一些， 做得更合乎实际一些，我掌握我自己的原则：不说谎，不做假，不骗自己不骗人。就是说：在坎坷泥泞的人生道路上，我周宏达，还是周宏达。

直到 1979 年，我得到了改正，恢复了我的党籍、军籍、行政级别，和撤消了一切加在我身上的不实之词，但最使我感到满意的不是这些，而是在结论中认定了我过去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合乎实际的真话。虽然，为此我付出了长达二十二年的青春。

至于今后，我说：我还是我，我行我素。

诗二首　张文殊

欣闻丁酉回忆文稿成集

功过是非难曲颂，

为民百死亦从容。

斗生业绩留青史，

展詠华章忆初逢。

反右斗争五十周年

匆匆五十秋，报国志难酬。

鬼蜮违真缔，真言沦楚囚。

诛心胜昔帝，欺世掩今猷。

风雨神洲路，无为是所求。

喜喜悲悲两重天

王书锵

作者小传：

1934年6月生，浙江宁波人。1951年1月在杭州市投笔从戎。1952年底至1958年在空军第十航校任教员，中尉军衔。1956年被评为空军教学积极分子，同年6月以出席首届“空军学校学员工作专题工作会议”；10月出席首届“空军学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彭德怀等首长的接见、合影。1958年4月到太谷郭堡水库劳动锻炼。1959年至1978年在太谷县水利局、农机局等单位工作，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晋中地区行政公署的嘉奖。1979年调回宁波市中专执教，1982年评为讲师。1994年退休前奉献给太谷县人民一篇文章《减轻农民电费负担的科技新方法》县委机关报上刊登，同年“山西农经”予以转载，1995年入选《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1994年后获得八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曾受聘在北京理工大学超特公司开发部担任技术主管、副经理。

上篇：从天堂转炼狱

1951年1月11日，在抗美援朝的炮火声中，我们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市读书的青年学生，热烈响应号召，毅然决定放弃各自在大专学校的专业，投笔从戎，来到空军第四预备总校，开始了我们的军旅生涯。

空军第四预总是所空军预备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培养革命军人的素质。除了较正规的军训课程以外，课余生活亦丰富多彩，体育和歌咏比赛经常有，处处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生活特色。华东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还常来看望我们，亲切地给我们作报告。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的培训，到了九月，培训结束，学员们都分配到各个航校进行专业学习，我也离开了美丽的杭州，被分配到济南空军五航校三期甲班无线电科，开始为期十三个月连续的纯航空技术的学习生活。

学习中，我们每天上技术课程都有两名教员，先由苏联教员讲授，后由中国教员接着翻译。由于语言的不同，在苏联教员和翻译之间，经常会出现理解上的差异，有时甚至于会出现笑话。苏联教员有一次上课，讲的内容是：《如何提高抗干扰能力》，这原来指的是在信号线外应套装金属丝编结的屏蔽套。中国教员翻译时，将这种屏蔽套翻译成金属丝编结的‘袜子’，这叫我们当学员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件事使我们深

深感到，由于语言的不同，要想快速提高教学质量，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及早培养出中国自己的空军技术专业教员，而这个责任正担在我们这批学员的肩上。

还有一件事，曾在我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年在朝鲜空战中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战斗英雄张积慧，正是我们五航校二期毕业的学长。学校特请他从前线回到母校来汇报空战战况，那一天，全校停课来听他汇报。张积慧讲得很精彩，听的人更是听得热血澎湃。汇报结束后分组座谈时，大家纷纷表示：现阶段一定要刻苦学习，牢固掌握航空技术，学习张积慧，为祖国争光。我自己更是暗暗下定决心：作为一名军人，我不能平平凡凡渡过一生，要像张积慧学兄那样建立功勋，发射出耀眼的光彩。

1952 年 10 月 15 日我们三期甲班毕业了，苏联人按照协议也陆续回国了，为了开创中国人自己办空军航校的需要，我们三期甲班大部分人被分配到北京南苑空军第六航校助教培训班进修，每天按指定的章节备课、练讲、试讲直到试讲合格授予助教职称为止。1952 年底，我们新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能独当一面的航校教官。1953 年 1 月 10 日，我们在太原市成立了空军第十航空学校（后期更名为第三航空机务学校）。那些年，我们这群年青人，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机务人才，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多年来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空军机务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及以后的长时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今已有不少人成为了我空军部队的主要业务骨干力量。其中如首期毕业生丁文昌，他在 1996 年 1 月已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

1956 年对我来说是我军旅生涯的艳阳天。8 月空军在长春召开第一次《空军学校学员大队工作专题会议》，十航校代表团共四人，由二大队长梁凯同志任团长，由我和另外两同志为团员。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加强学员大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与训练部密切合作，做到教学相长。过了两个月，刚刚欢度过国庆，空军司令部又决定在北京召开《空军学校教学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十航校代表团团长是校政治部周主任，副团长是校训练部华副部长，我作为十航校教学积极分子的代表，和另外三位教员代表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代表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独立自主办航校以来的经验教训，部署如何多快好省地办航校、拓展航校，特别是在发展中如何不断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提高空、地勤学员的军事素质。

由于这次会议很重要，关系到“创造强大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的落实，所以一九五六年十月廿八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彭德怀、林伯渠、贺龙、叶剑英等领导人在怀仁堂接见了出席空军学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代表，并摄影留念。当时被接见的代表，人人心潮澎湃，决心要为创建人民空军贡献力量。

才过了半年，到了 1957 年初夏，在帮助‘党的整风运动’的名义下，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同时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报刊杂志捷足先登，开导并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发表自己的意见，决不允许打击报复。正当人们大鸣大放，在会议上坦诚地提出各种意见时，突然风云变幻，乌云遮天，反右派运动开始了！暴风骤雨来了！顿时我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以“右派分子”而无右派言论的莫须有罪名被进行了批判。当时我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反党？动机在那里？在怀仁堂被毛主席接见才半年，难道说变就变，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可能吗？我绝不信！我深信自己无罪，因此在批判会上一直持对立态度，这时校首长找我谈话，说什么你年青、工作积极、还被毛主席接见过，是不会把你打成右派的，现在你要端正态度，不要与群众顶牛，要取得群众的谅解，群众谅解了，我们也就好说话了。谈话后我如同服了定心丸，会上再也不与群众顶牛，就顺着群众的意愿说，不久就过关了。接着就上课教学，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但不久，年终课程结束后，情况隐隐间似乎又有了变化，领导上不给我和王中敏安排工作，竟派我们俩成天去打麻雀、逮耗子、拍苍蝇，说是除四害。我此时心中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起来，最后，果然厄运降临：1958 年 3 月 18 日我和王中敏同时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我不甘心，还傻乎乎地去找了校首长。答复是：航校党委只报了材料，是上面定的性。同年四月三日，空军军事法院对我进行了判决：剥夺中尉军衔，开除军籍。航校据此做出相应的处分决定：开除团籍，撤销原有职务，行政降三级。送地方劳动锻炼。面对一棍子把我打翻在地，从天上摔到地下的残酷现实，真是感慨万千，忆当年在人间天堂杭州市投笔从戎、在抗美援朝的炮火声中参加空军，以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 ，歼灭残敌作为己任。现在的事实是：革命的敌人还没有被歼灭，而革命的我，却已被歼灭（开除）了。

在处分决定宣布后的一次座谈会上，几位领导人对十航校的三十多名右派谆谆告诫说：希望你们在劳动锻炼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欢迎你们一年后摘掉右派帽子后，再回到部队来。记得有一次十航校的杨有志副校长遇见我时，对我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一直牢记在心，致使我对重返部队，再次参与空军建设一直抱有极为天真的幻想。

大约就在开座谈会后第二天，十航校的一群右派分子携带个人物品，搭乘军车近三个小时，我们被送到太谷县东曲河安寨扎营。我和班上的人住在赵大娘家，她老人家心地善良，很疼我们。不久解放军三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和总政、空政、海政的右派分子陆续从北京来到水库工地和我们会合，他们分别住在北曲河、西曲河村，

我们这批人共有 320 人，其中十航校来的人就占十分之一以上。这些人统编为郭堡水库劳动直属营下属的三个锻炼大队。从此，我进入了长达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悲剧人生。

下篇：从炼狱回人间

郭堡水库开工后，我们锻炼队和民工共同建设大坝，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很融洽。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领导对我们很器重，也很信任：指挥部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原解放军报和海空军报的编辑；施工质量管理科由原防化兵、测绘等人员担当。我被分配到机械管理科，因此对这个科里的情况比较熟悉，科长是由县交通局长陈毓义兼任，副科长由锻炼大队乌维达（改正后曾任太原市经委主任）担任，我们的任务是维护、操作履带式推土机、履带式拖拉机（牵引铸铁羊角滚碾压）、空气压缩机、柴油发电机组及工地照明线路等。原坦克兵、工程兵的葛福、杨廷雄等日以继夜开着拖拉机碾压；我前期操作空气压缩机和风动工具，后来从事工地上照明线路的安装、维护工作。当时水库工地灯光通明，高音喇叭播出的节目扣人心弦（有诗人公刘写的劳动诗词、有作曲家陈志昂写的劳动歌曲），装满土的手拉车你追我赶，碾压机的轰鸣声响彻云宵，水平仪、经纬仪从不同方向监测着大坝高程，被碾压后的土样及时送到质量科检测，眼看着大坝一天天的长高，直至达到设计高程，虽然每天流汗也有人流血，但我们都非常欣慰，非常自豪而在我心中隐藏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回部队。

经过奋战，水库建成。一九五九年八月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兴奋之际，我提笔向十航校杨有志副校长报喜，同时要求重返航校工作。下面是杨副校长的回信：

“书锵同志：你好！两次来信都收到了，第一封来信，因经常不在家，所以没有及时函复，希谅解。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关于请求回部队一事，我认为你的心愿是好的，这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是我们所欢迎的。但是，目前条件尚不允许，理由是：重新入伍已由国家统一控制，不像过去志愿兵制那样随便了；当前部队为了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正在实行“精兵简政”，每年都在裁减人员。另外，你已在地方工作多年，学了一些技术，有了一定的工作位置，工作环境也较熟悉，因此，我建议你还是安心当前的工作吧！至于今后有什么新的情况，再告。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杨有志（印章）3，9

读了航校首长来信，感到重返部队的愿望变成泡影，但我没有完全死心。

水库建成后，根据地委 、县委和太原市人事局的安排，锻炼大队的人都回县招待所总结学习，而后分配到太原市和晋中各县工作：我和朱治民、佟惠林三人因工作需要暂留水库。由于我刚摘掉帽子需回趟部队，将近三年没有回家想探亲等原因，我坦诚地向水库领导提出想去原部队报个喜，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顺路回家一趟，水库领导批准了我的假期，令我非常兴奋，感激之情难以忘怀。

1959 年底我探亲回来后，水库管理部门决定尽快在干渠上建一座落差式水电站，让当年万人建库时的那台 56 千瓦发电机转起来，实现水库管理部门、王公村、东曲河村和郭堡村都水力电气化。在水库领导和村民的支持下，我加倍努力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木质水轮机图纸的设计，接着在机油浸煮的榆木板上划好线，由当地木匠按线锯下制成转子木件，铸铁皮带轮、主轴和铁配件委托县铁工厂加工而成，最后由我将铁、木件组装成水轮机并把它安装在混凝土砼板上。当木制水轮机（100 马力）带动 56 千瓦发电机转动发电后，山沟里的夜明珠又闪烁发光了。这时人们众口同声夸奖赵大娘的干儿子小王是能人，大娘听了就欣慰地微笑。

水库灌溉、发电实现后，1961 年初我被调回县水利局接着借调到县电气化施工委员会，协助省水电局实现县农村电气化，主要的工作是培训、组织、安装 10 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和变压器台，以后又调到农业机械管理局协助实现地下水排灌机械化和耕作机械化。几年后县里最大的庞庄水库要开工了，这时我又被调回水利局，负责混凝土坝后式水电站电气部分的设计、施工、安装、试车和并网发电的全过程。由于一直忙于太谷县农村现代化建设，我和朱文明一样被看成是县里比较受器重的人，我们俩从心底里感受到太谷县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正如太谷县委机关报主编董启祥 1993 年元月 9 日来信所述：“太谷实际上属您的第二故乡，人们谈论起来，都对您在太谷的工作表现表示满意。如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走走，虽然太谷比不上沿海地区，但在原有基础上，还是有点变化的。我希望您一定回来。”由于我在太谷的人缘关系比较好，所以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不论那一派掌权，我都是抓革命促生产，有时参加学习班，也能较顺利过关。

1963 年 1 月 23 日由亲戚介绍，经过自由恋爱（书信往来）与孙月娥（1958 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宁波三中教师）登记结婚。忆当初，我在第二封去信中明确地告诉她：“我是摘帽右派，请你慎重考虑。”信发出后，我忐忑不安地天天盼她回信，收到她的来信时不知是祸是福，又久久不敢拆阅，欣喜的是她的答复是那样的明确和坚决：“我相中的是你的人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就这两句话使她成为我的最爱，

她是我事业的支柱，是我生命的主宰。我在太谷能有所作为，全靠妻子心灵上的感应。婚后，我们分居两地整整十六年，盼啊盼！一年一度探亲假有时也因政治运动而被取消。在生养孩子的问题上，她胸有成竹、敢挑重担地说“我们只要一个孩子，万一你有个事，我一个人也能把孩子带大成人”当时像我们这般年纪生养二、三个孩子是极普遍的，而我们就只生一个女孩。总之，在感情上、心灵上、体力上她为我付出的真是太多了：她分娩时，我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照应她，她上班后，一个人把孩子带在身边 （住在学校里），每周讲授十二节课，天天还要备课、给孩子哺乳、洗尿布。而我却在千里之外连一点儿的忙都帮不上。我对爱人的眷恋、她对我的思念，我无法当作隐私埋在心底里，常常控制不住，自觉不自觉地要向周围的好友诉说，朋友们都知道她的名字，都持有我俩的结婚照片，大家都很敬重她。

1979 年 1 月右派问题改正前夕，通过组织调动我从太谷县调回宁波市省辖宁波机械工业学校（高中中专，该校现已并入浙江万里学院。）任教。1979 年 7 月 16 日，也就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整整廿年后，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派王之益、杨洋两同志专程到宁波机械工业学校和我家，具体落实错划右派的改正事宜。先到学校递交介绍信和军人编内（职工）供给关系介绍证（此证 7 月 5 日由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填发并签章），后到我家交给我一张《（79）政保改字第 039 号关于王书锵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并让我阅后签字表态。与此同时交给我一本转业军人证明书、转业费，军服和军大衣。当时我询问改正后的工资何时起供给？回答是：军人编内供给关系介绍证备注栏内第 1 项已有记录:《接供单位由 1978 年 10 月 1 日起供给。》但是机械工业学校没有据此执行，其实国务院、中央军委〔1979〕国发 124 号文中也是这样规定的。直到北空政治部保卫部再次给学校来信并附来124号文有关规定的复印件,学校还是没有执行。不知为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从 1951 年离开被称为天堂的杭州，参加了光荣的人民空军，1956 年 10 月底被毛主席接见，1957 年夏被当作敌我矛盾批判，1958 年春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1959 年夏又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真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王书锵啊王书锵，你的变化也真大，确是一年一个样。

在十航校，被错划右派共 30 余名，当时我 23 周岁，年龄算小的了，但陈通鉴、王中敏等只有 22 周岁，伍永琦等只有 21 周岁，都比我还小，我们美好的青春年华，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就这样被所谓错划无情地摧毁了，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但是，晚年生活还不错：老有伴、老有窝，知足常乐呗。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看今朝，中华民族在地球上和平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而今，我们都到了耄耋之年。回首半个多世纪难忘的经历，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民族和人民，无愧于子孙和后人。"

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空军军事法院判决书

(79) 法字第 **188** 号

王书锵，男，现年四十五岁，浙江省宁波市人，教员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五一年一月入伍，原系空军第十航校特设系教员，中尉军衔，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四月三日经空军军事法院判决，剥夺军衔，开除军籍。

一九七九年二月，经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复查，认为王书锵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经空军军事法院授权本院，撤销原判。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对王书锵的判决。

北京军区空军军事法院

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二日

羞辱备尝　悲愤难诉

凌士光

作者小传：

1934年生。1949年9月参军，曾在48军文工团、55军机要科工作，1957年2月调总参机要局任译电员。在部队时曾立功受奖。少尉军衔。离开郭堡后在和顺县文化舘工作，文革中，被判三年徒刑，1969年释放后，遣回原籍江西农村劳动。改正后在定南县工会及计生委工作。1993年5月离休。曾任定南县政协常委。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回忆起1958年1月批斗我十天即宣判我政治生命死刑的那段日子，虽然时间已经跨越了近半个世纪，斯情斯景犹历历在目，悲愤之情仍难自抑。

1957年2月，我从55军司令部机要处调到军委总参机要局工作，随即送北京机要学校学习。入校不久，就聆听了毛泽东的两篇重要讲话录音，一篇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另一篇是《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的浓重湖南口音，我不大听得懂，加上录音质量也不太好，有些语句听不清楚。但是讲话主要精神还是听明白了，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共产党要进行整风，欢迎党内外鸣放，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北京机要学校是地方学校，隶属党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座落在北京阜成门外甘家口。组织上送我到该校学习，是为了培养机要战线第一批电气化技术人员。学制三年，第一年主要学中专课本的物理、数学、电工学等。我1949年参军前，仅仅是初中毕业，入伍八年，以前学的一点东西早就荒废了，现在重新拿起书本，感到很吃力。但经过两三个月的刻苦努力，不但跟上了进度，且每次测验、考试成绩都是5分。

1957年的春夏，是个不平凡的季节，先是大张旗鼓的鸣放，接着是暴风骤雨的反右。但是，不管社会上如何风起云涌，机要学校校园内却风平浪静。同学们（至少是我）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想法，机要人员是经过多次政治审查的，是沙里淘金，政治上绝对可靠，绝对不会出现反党言行，机要部门也绝对不会搞反右运动。然而，这个对形势的估计大错特错了。

这年的暑假刚过，我们班的党支部发起了一个批判镇同宁的活动。镇同宁原是志

愿军司令部的机要员（团员），他有同学在北京大学，星期天他到北大看望同学，把北大校园内的大字报（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当作新闻消息在机要学校随意扩散。为此，党支部对他进行批判，以肃清流毒。对于此举，当时我是赞同的，而且我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思想斗争。镇同宁慑于反右声势，识时务地作了检讨。大家认为镇同宁的态度端正，认识了错误，批判会开了四天就收了场。没有对他下什么结论，也没有做出组织处理，我认为这作法是符合毛泽东讲话精神的。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党支部突然提出再次批斗镇同宁。从支部的部署看，火药味比上次浓，大有揪斗‘右派’的味道。在支委扩大会研究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时，我对这次的批斗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以为如果发现镇同宁有新的反党言行，可以组织批斗，够右派条件的可以按右派来斗；如果还是原来的已经批过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再斗了；即使要斗，也要遵循毛泽东两次讲话精神，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千万不要搞得像搞三反、肃反运动一样，使得许多同志受到伤害。

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呢，那是因为前几年的镇反、三反、审干、肃反运动，我都参加了，而且是骨干分子，表现十分积极。尤其是三反、肃反运动，开始时轰轰烈烈，战果非凡；最后一甄别，斗出来的对象几乎全部平反，严重伤害同志感情，还要向人家赔礼道歉。对于这样的历史教训，我认为有必要提出来供党支部引为借鉴。但是党支部书记许某（忘了名字，原在福建省委机要处工作）根本听不进去，认为我冲击了他的‘一言堂’，十分恼怒。当场他不动声色，没有说我的发言有什么不妥，却在批斗镇同宁的大会上不点名的把我批了一顿，说我是严重右倾，客观上破坏了学校的反右运动。对此我不理解，也不服气。恰巧与此同时，学校党总支召开了两次鸣放座谈会，让学员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就在这两次会上，我重复了在支委扩大会上的发言，并请求学校领导出面掌握会场，以避免偏差。遵照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决议和政策有不同意见，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可是，学校领导对我的发言不予理睬，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见我的发言引不起学校党总支的重视，此后也就沉默缄言了。我与镇同宁非亲非故，虽然同班但不同组，又不同宿舍，平时很少打交道。为什么我要帮他讲话，这完全是出于党性和公心，或者说是上了毛泽东讲话的当，他说过：“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当时我觉得他说得很中肯，故而我认定对镇同宁的批判应属整风而不是反右，方式上只能是和风细雨，而不应是暴风骤雨。

对镇同宁的第二次批斗，会场上虽然气势汹汹，但终因拿不出新的东西，最后还是由镇同宁把自己臭骂一通而收场，既未作结论，也未宣布组织处理。

镇同宁的事情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了，然而习惯于独断专行的支书许某，由于我在支委会上冒犯了他的威严，又两次到党总支告他的状，这使他恼怒难制，于是便处心积虑开始监视我的言行，搜集我的材料，为下一步对我进行打击迫害做准备工作，我的长达二十年的厄运也就从此开始了。

1958年1月，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整风运动进入整改阶段，学校开始了反五气（骄、娇、官、暮、怨）。一天下午，支书许某和宣传委员田德找我单独谈话，说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要到支部大会上检讨，罪名是'严重右倾思想'、'破坏学校反右运动'、'进行了反支部的活动'等等。这些突如其来的罪名，宛若晴天霹雳，一下把我震懵了。我万没有想到一个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白陈述自己对支部工作的看法，竟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招致了这么多的'莫须有'罪名。当时，我对他们的发难毫无思想准备，想与他们分辩，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不一会，又来了一名支委对许某说："会场已布置好了，该开会了。"就这样，我被带到了会场。一进会场，气氛果然不同，学校一名副校长、总参机要局一名保卫干事亲临坐镇，这是批判镇同宁会场所没有的。但我心中坦然，丝毫没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总以为手里有真理，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谁知从这一刻起，我便成了一名失去一切政治权利的'罪犯'，任人侮辱和宰割。

支书许某主持会议，田德第一个发言，宣读早就拟好的'反党罪状'，开列的罪名除了破坏学校反右运动外，还有一大堆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诸如'一贯对党不满'、'一贯伪装积极'、'一贯反领导'，是'混入党内的异已分子'等等。这个叫田德的人，听说是中央机要局的一个科长，三十多岁，是这期学员中年纪最大的，我跟他素不相识，从未说过一句话。这样一个陌生人竟然在会议上大谈我历史上这个'一贯'、那个'一贯'，而且没有举出一件事实，这不是恶意诽谤又是什么？恩格斯说过："卑鄙的手段是为卑鄙的目的服务的。"对于田德这种不讲事实，专事人身攻击的所谓批评，我不由得怒火中烧，拍案而起，针锋相对的予以反驳。我反驳的大概内容是：迄今为止，镇同宁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这就充分说明他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要求党支部按人民内部方式来处理他，是符合毛泽东两次讲话精神的，有什么错误？怎能说是破坏学校反右运动？再说我的三次发言，都是在党的会议上按照正常程序行使党员权利，怎能说是反党？至于我历史上是不是'一贯'……，可以把我的档案对着大家念一念。我的家庭出身贫苦，个人历史清白，十四岁初中毕业参军，除经历镇反、肃反、审干三次政治运动

外，还经历了中南军区机要干部训练班的一次更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进入了机要部门。田德凭什么血口喷人说我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我在机要战线上多年来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曾荣立三等功一次，会议嘉奖两次，这怎么成了‘伪装积极’？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是何年何月在何单位反的哪位领导？具体言行是什么？组织结论是什么？档案里有记载吗？

我与田德非亲非故，无怨无仇，在机要学校近一年时间，从未有过什么接触，他竟在政治运动中对我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我想也许是受了许某指使，当了一名打手；也许他就是专靠踩着别人头上往上爬的卑鄙小人。

原先支部布置了几个发言的人，看到我对田德的义正词严的反驳，一个个都愣住了，不知如何应对，会场陷入难堪的沉默，半个小时无人吭声。许某见势不妙，气急败坏的站起来说：凌士光这是向党公开挑战，是向党支部猖狂进攻，既然斗争已经挑起，支部要加以还击，要斗争到底……云云，随即宣布散会。

支书许某没有料到第一个回合会遭到我如此的顽强抵抗，居然在批斗会上让我拍了桌子。于是连夜召集骨干分子开会，确定下一步做法，首先是‘打态度’，非要把我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其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我的所谓反党言行。

第二天起， 更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起先是班里开大会，大家争相发言，发言者一个个慷慨激昂，唾沫横飞，其内容无非是重复田德式的谩骂，根本拿不出有事实根据、有说服力的东西。在支部的围剿面前，我仍然奋力抗争，多次要求发言反驳， 但都被剥夺权利 。第三天起，许某改变策略，把大会变成小会 ，每次七、八个人搞车轮战，他们轮番休息，而我从吃了早餐开始，直到晚上十点，每天挨斗十几个小时，加上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几天下来，弄得疲惫不堪。

这时，我一再问自己该怎么办？是忍辱屈膝还是硬顶顽抗？思来想去，我选择了后者。为什么？一来是我的宁折不弯的性格使然；二来是我对反右形势又作了错误估计，以为从前的三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在暴风骤雨之后，都有一个冷静的甄别阶段，凡是搞错了的都会得到实事求是的处理，雨过会有天晴。不想这次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这时已背离马列主义的实事求是原则，从一开始就把这场“阳谋”钦定为铁案，任何时候不得甄别平反。

‘打态度’打了六、七天，仍不见收效，于是又恢复大会批斗。除逼我承认反党外，再就是群众所谓的检举揭发，搞了几天，无非是鸡毛蒜皮之类；但许某却视之为宝，归纳起来并上纲上线。如：一曰攻击机要工作。1957 年鸣放开始时，总参机要局黄有凤

局长曾来机要学校召集部队学员开会，了解基层机要人员思想动态。我在会上如实反映实行军衔制后，由于译电员的军衔定的太低，最高不超过少尉，没有提拔余地，故部分译电员不安心工作，想改行。我希望总参机要局领导给予考虑，适当修改。这条意见当时主持开会的黄局长都没有说提得不对，而如今学校党支部却扣以'攻击机要工作'的大帽子；二曰反苏。1957 年 7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的消息后，学校党总支传达中央指示说，允许党员在党内自由议论，发表各自的看法，但不要到党外去乱说。传达之后，党小组开会时，大家议论纷纷，基本上异口同声谴责赫鲁晓夫是搞阴谋、搞政变，我的看法跟大家一样。结果独独我被扣以'反苏'、'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大帽子。三曰散布流言蜚语。就是我在和同学们聊天时，说过江青以前是电影演员，到延安后跟毛主席结的婚，党内有些同志不主张主席跟她结婚，但是主席还是跟江青结了婚。就这么一条'小广播'，被定罪为'破坏中央首长威信'。四曰反领导。学校有一名副校长，工农干部出身，文化低，口才不好，说起话来颠三倒四，生怕别人听不懂，因此惹人生烦。在大家背后议论他时，我曾嘲笑说："这个校长真窝囊。"对这四条，要说它是严重错误，虽有点过份，我还可以诚恳检讨，要说它是反党言行，我绝不苟同。

党支部一再逼我就范，我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就说我的发言充其量只不过反支部而已。许某说："支部是党组织的一个细胞，反支部就是反党。你必须按反支部等于反党这个公式写出深刻检讨。"于是我就按这个基调写了个检讨交上去。交上去后，学校宣布放寒假。这时离过春节只剩下几天时间了，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我没有离校，就在学校过了一个凄凄凉凉的春节。不久，学校开学，第一天召开全校大会，党总支书记宣布经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批准，给我戴右派帽子，开除党籍。

听到这个宣判，真是五内俱焚，痛彻肺腑。无数个疑问在头脑里转来转去，不得其解。为什么在镇同宁问题上，我按毛泽东讲话精神办事，却成了反党？为什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时间才过了半年多就不起作用。是机要学校胆大妄为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还是毛泽东的讲话本身就是一个骗局？为什么一个党员在政治运动中一挨斗，就被剥夺政治权利，不许本人申诉，连党章也不管用了？为什么党支部可以跟党划等号,给支部提意见就成了反党？为什么许某、田某等人可以自封为党的化身，只许他们肆意诬陷党员，而不许党员给他们提点意见？为什么自己多年来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一夜间却成了'混入党内的异已分子'？？？这么多的问号在头脑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真是羞辱备尝，悲愤难诉，冤屈到极点。

记得我从申请入党到正式批准入党，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可以说是经过了党组织的严格考察和多次考验；而这次从被揪斗到戴帽子，只不过半个月，政治生命就被夭折，既急促又草率，简直如同儿戏一般。以前在书本上见到过‘草菅人命’这个成语，虽懂其意思，但没有过细领会其深刻内涵。如今政治生命被夺，再来理解什么叫‘草菅人命’，真正有切身感受了。

从戴帽的那一天起，总参机要局派人把我接回了部队。回到部队无事可做，现实悲愤难忍。望前途一片渺茫。烦闷心情。无法排遣，就天天到北京图书馆去钻故纸堆。1958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机要局保卫干事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抬头一看，军事法庭四个字映入眼帘。法官、书记员入座后，保卫干事以公诉人身份宣读起诉书，接着是法官宣读判决书，一开除军籍，二剥夺军衔，三撤销职务。当场摘下肩章、帽徽、武装带。走出法庭，觉得刚才这一幕表演真如一场并不高明的闹剧。随即保卫干事把我带进机要局一位副局长的办公室，作离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这位大校副局长面容慈祥，语调和蔼，与一个月来在机要学校饱受的疾颜厉色成鲜明反差。走进办公室，本来我就作好了挨训斥的精神准备，不想他对我的所谓反党罪行提都不提，只是遗憾我在政治运动中不识时务，固执已见，以至不可收拾。同时他肯定了我在机要工作中几年来所作出的贡献和在机要学校勤奋学习的表现。接着他说："机要学校认为你拒不认罪，态度恶劣，建议加重行政处分，从二十一级降到二十六级。他们把你打成右派，我们无能为力，但对你的行政处分，我们不听他们的，级别不降，到地方仍是二十一级"。接着又说，刚才军事法庭的宣判，是军委统一规定，凡划定为右派的，必须离开部队。你的去向是到山西一个水库工地劳动锻炼，时间不长，一年左右，然后在山西安排工作。最后，他鼓励我说："你还年青，跌倒了爬起来还有前途，不要灰心，到了工地好好劳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

听了这位副局长一席话，觉得部队领导对我的情况是理解的，对我的处境是同情的，最大的收获是免去了行政降级处分。谈话不多，却足以让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谈话第二天夜晚，登上西去太原的火车，来到了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开始了 8 个月的劳动锻炼生活。在这 8 个月当中，我的劳动表现只是一般，没有偷过懒，但也无突出贡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已。1959 年 1 月，劳动结束，进入到总结甄别阶段，每个人都要写出思想总结以加深对自己‘反党罪行’的认识，人人都要过关。劳动再苦再累我不在乎，但要违心地承认反党，却使我犯难，是说真话还是蒙混过关？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坚守原来的立场，只承认反支部不承认反党。这样我的思想总结在班里没有通

过而且受到批评，评议类别时，被评为‘三类’，属于认罪态度不够端正的那一种。可是在最后全体大会上宣布摘帽时，出人意料，我被摘掉了戴了 10 个月之久的右派帽子。兴奋之余，冷静地想了想，凭我在水库的表现是不够条件的，为什么又摘了帽子呢？想必是总参机要局领导对我的又一次‘庇护’吧。

七律　　凌士光

闻《郭堡你可曾记得》付印有感

郭堡回首一挥间，韶华似梦白发添。

风雨磋砣五十载，霜雪严逼廿二年。

且看苍龙今安在，终见阳谋化乌烟。

来路坎坷君莫计，抬头瞩目霞满天。

在夹缝中奋战

陈 挺

作者小传：

1927年9月生于山东省招远县，1940年5月入伍。1944年1月入党，曾任营、旅保卫干事。1947年任团保卫副股长、组织股长。淮海战役中，在本团1营营级干部全部伤亡的情况下，主动请缨到1营代理教导员。晚上向敌人发起进攻时，新任副营长又负重伤。陈挺独自率领1营参加战斗，在79团1营的配合下，一宿攻占倪阁村，歼敌新5军137团，俘敌新5军137团团长以下2千余人。后继续打退敌人三次大反扑，坚守阵地。堵住徐州敌人西逃的一个口子，全营立一等功。1950年5月任27军81师组织副科长、科长，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8月调任总政组织部助理员。少校，副团。57年因批评肃反运动中一些“左”的错误被打成右派，1979年改正后调任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离休。

1958年8月，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响，震耳欲聋，一场全民大炼钢铁的序幕拉开。郭堡水库领导决定，要将锻炼队的大部分劳力转向找矿和炼铁。任务下达以后，我作为大队长，要带着50多人上山找矿，肩负如此重任，实在令人发愁，大队里并无找矿炼铁的技术人员，隔行如隔山，怎样才能找到铁矿呢？经过再三考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因我出生在生产黄金的山东招远县，小时候就跟着哥哥上山找过金矿。找金矿的经验是：先在沟口找到含金的转石(注：转石是地质术语，指山上冲下来的石头)，然后逆流而上找转石的矿源。按照这条经验，我把50多人带到离水库50多里的山区，安顿住下后，即把人带到众多支流汇合处的大沟口，众人散开，仔细寻找沉重的石头，用铁锤粉碎，碾细，再用水淘去浮渣，用磁铁吸出铁粉看看多少，一块一块地进行比较。连着几天，查遍数条大沟口，也没有找到理想的矿石。记不清在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终于发现一块黑灰色的矿石，它的含铁粉好像相当多，磁铁一吸满身皆是，我们便确定以它为目标，先把它砸成十几小块，把人分成三人一组，每组拿上一小块，各走一条支流，逆流而上，沿途找同类的矿石。我带领的一个小组，在一条支流的尽头山半腰里，找到了灰色矿石的原生地，是一条30公分左右的固定层，顺层追索，延伸很远。我们高兴地跳起来，终于找到铁矿了。呼唤别的小组来看清铁矿层上下岩石的情况，又沿着各个山

头仔细寻找，发现不少露头的这种岩石。这些岩石，如果含铁量能够达到炼铁的标准，就有开采价值。于是当晚，我由二小队副队长刘智田陪同，连夜赶回水库工地，找到在工地上担任化验工作的李淑琴同志，抓紧时间进行化验。化验结果，的确含有较多铁的成份。我们三人忘记了一夜未眠的劳累，兴高采烈地向工地总指挥王运广报喜。他正在为找不到矿石、炼不出铁来发愁，怕被批为“右倾”而丢掉乌纱，一听到这个大好消息，连连夸赞我们为水库、为太谷县找铁矿立下了头功，并马上命令广播站向全工地广播这一特大喜讯。同时他又当即为三大队解决了口粮不足的困难。因为要炼铁，需要开采和运输大量的矿石，所以他当机立断，工地上除斗车继续运土外，其余停工，一齐上山挖矿、运矿。这样一来，三大队变成了采矿和运矿的指导者。

后来，太行山地质队的业内人士说：“此类矿石虽有 41.5%的含铁量，但结构过密，工业价值不大，一般高炉不能用，采多了只能造成浪费。”一席话像一瓢冷水把我的发热的头脑冲了个透凉，使我清醒了，要讲科学，不能蛮干。然而这局势已非我们所能左右，我们只得冒着风险，继续往前闯。

大批矿石，经过翻山越岭，人挑肩扛，源源运到工地。周宏达和赵森林先用坩埚炼出来一小块铁（约一斤重），没想到这是太谷县炼出来的第一块铁，名声外扬，县委开着披红挂绿的汽车到省城报喜。形势把毫无把握的周宏达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硬着头皮带领队员砌出来一座仅一米多高的小高炉。没有耐火材料怎么办？就根据传说，用石灰石加热后掺碎石抹在炉膛上。没有吹风设备，就利用农村的鼓风机代替。这样七拼八凑，建起了小高炉。开炉熔炼后，最让人担心的是打开出铁口后能否流出铁水来。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淌出一些连油子带铁水来。这时全场激动得高呼：“出铁了！出铁了！”喜讯被浮夸风吹得不胫而走：都以为真的是太谷县找到了铁矿，炼出了铁。

既然三大队的高炉炼出了铁，各队当然都纷纷效法。一时间，王公村东头的打谷场上，五、六座大、小高炉先后树起，人欢马叫，形势一片“大好”。这种形势，使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工地领导得意忘形，脑袋一热，要放“大卫星”——要凭空把明知是虚报上来生铁日产量二、三十吨翻几番，甚至几十番。为达此目的，便把各锻炼队的队长、副队长召来开会。会上由太谷县工业股秦股长下达任务，要求三天内每个队再增建三座高炉，使产量大幅度上升。一听此话，各队领导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我沉不住气了，本着事实求是的一贯原则，不吹大话，不说假话，具体地分析了我们三大队的实际情况，说：“三天内拼命建起一座高炉是可能的，建三座高炉根本不可能。”没等我把话说完，秦股长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怒声呵斥：“你不要说了！你的

右派观点没有得到一点改造，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听党的话，照党的指示办？你已成了大炼钢铁的绊脚石。我代表指挥部宣布，撤销你陈挺大队长的职务，归队老实改造。由副大队长华涤任三大队队长！”

陈局长冲我当头一棒，把刚刚为找矿立下头功的我，一下子贬为大炼钢铁的绊脚石，判为撤职的罪人。在这种“顺者昌，逆者亡”的严峻气氛里，与会的队长们只能忍气吞声，敷衍了事。散会后，三大队三个队长走出会场，长时间的沉默。什么叫“左派”？什么叫“右派”？能吹牛，说假话，算听党的话，是“左派”；说真话，干实事，算反对党，是“右派”。撤了我的职倒无所谓，可是让其他的队长们今后怎么干哪？

回到三大队以后，接任大队长的华涤说：“不管谁当队长，咱们仍然是集体领导，凡事商量，重大问题集体决定。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原来怎么干就怎么干，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你老陈领着建高炉，我领人拉车运料，保证你用，周副大队长仍然负责炼铁。”说干就干，虽然夜已过半，不能睡了，我们三人各按分工领着人干了起来。我得到佟惠林、石鹤峰、郑开辰等人的积极支持，三昼夜没睡。华涤领着一些人，黑灯瞎火，毁旧庙，挖古坟，拆下砖，拉回来，供建高炉用。经三昼夜奋战，在工地上率先树起来一座高炉。一座还是拼命拼出来的，建三座怎么可能。在无可争辩的 事实面前，秦股长耷拉了脑袋，不得不恢复我大队长的职务。

时隔不久，指挥部又召开为日产百吨铁而奋斗的会议。会上要求各单位报出日产铁的数字。与会者心照不宣，只能顺应形势，浮夸虚报，唯独主管炼铁的三大队周宏达一声不吭，他心知肚明，日产百吨是自欺欺人。尽管会议主持人一再启发老周报产量，越多越好，他却不吐口，把标准降低到 5 吨，他也摇头。万般无奈，他说：“从这几天情况来看，每天出铁不到 900 公斤，就算报 1000 公斤，也是冒进了。”没想到第二天《山西日报》报导了“太谷日产铁百吨”的特大喜讯，把弄虚作假的生米煮成了虚报产量的熟饭，令人啼笑皆非！

炼出了生铁，就紧锣密鼓炼钢了。一时间，炼钢炉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听说炼钢需用枣木，理由是枣木质地坚硬，含碳量少，火力旺盛而持久，于是一窝峰似地上山砍枣树，不管它是哪一家的，不论它是几代人种下的，也不顾它是百年大树还是刚起的幼苗，只要进入眼帘，必然在劫难逃。胡折腾了一阵子，没炼出一两钢，只掏出一些不成形的碎渣，不啻于田野追风，劳而无功。事实证明，所谓的土法炼钢铁、全民炼钢铁，都是无视科学技术的无知之谈。难怪彭德怀说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者犯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殃及全国。搞得轰轰烈烈的大战钢铁运动，却在无可奈何声中收场。12 月 9

日党中央宣布：“1958 年我国人民夺取 1070 万吨钢的大战已经结束。但是其中有 300 万吨是土钢，基本上不能用，合格的钢只有 800 万吨。”我们郭堡水库究竟炼出来多少铁，没有统计，即使有一些，也是不合格的，只能作为废品堆在那里占地碍事。整个活动纯属劳民伤财。这场运动，无知地否定了技术专业的分工，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是出于决策者的主观臆断，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损失是必然的。在这个瞎指挥、胡折腾、搞强权政治的恐怖年代，处于人间最低层、任人摆布的锻炼队员们，忍辱负重、不悲不馁，在全国一片的“大战钢铁”的吆喝声中，在形势与压力的夹缝里、奋勇拼搏，艰辛地作了一场劳心劳力的无用之功。

选蛇出洞？

——记一段艰辛但可贵的经历

方坚予

作者小传：

女，上海人，1920年生。抗战时，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因不满日伪奴化教育而辍学，后投师自学英语和汉语，从事家教以维持生活。解放后，于1949年参加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后分配至北京军训部翻泽处。1953年曾立三等功。58年来郭堡，后辗转在祁县、太谷等地劳动。60年代与葛福战友结婚。1980年改正后，与葛福同赴河南铁道部铁三处工作。1989年离休。

1957年我被军训部全体女职工选为代表，参加鸣放大会，帮助党改进工作。为什么她们会选上我呢？说起来其中有一定的原因。

我于1949年在上海报考华东军政大学短训班，当时参加短训班的条件是：大学二年以上的学历，并经过笔试、口试及格，方能录取。我被录取后，集中在南京学习了六、七个月适逢军委要培养英语翻译人才，我曾经当过英语教师，所以就优先录用，而被选送到了北京。记得当时华东军政大学一共选送了十名学员，其中只有我一个女性。到军委后我被分配到军事出版局翻译处（后来翻译处全部编入军委军训部），1953年，我因工作表现突出，曾被授予三等功臣的称号。1955年部队女同志大量转入地方工作，少数有专业技能的作为军内文职人员留用，我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1957年鸣放的时候，军训部内的女职工约数十人，同为女职工，但从事专业工作的很少，大半都是作为军人家属的一般工作人员，而我是个外语翻译专业工作者，又是军内留用文职人员，她们对我很器重，所以就一致选上了我。

这在当时，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我能当上代表，说明了她们对我的信任，认为我能将她们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

这时在全国范围内整风运动已转入了反右阶段，我不断从报纸上读到'右派'言论和对这些言论的批判，我自认为一贯热爱党，与社会上的右派毫无关联。哪知沒过多久，到了反右后期，机关里突然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内容全是针对我在大会上发言而进行的批判，结论则全是'反党'、'毒草'等等。我读后茫然不解，不仅不害怕，反而觉得有些可笑，因为批判者的断章取义和东拉西扯，实在令人捧腹。那些批判者原来的理论水平和逻辑思维还是有一定素养的，似乎一下子，这些人全降格了，全变态了，他们写的这些大字报，无理而专断，霸道而蛮横，完全一反常态，实在有失水准。

不幸的是这些没水准的大字报却发挥了超强的战斗力，1958年，军委处理军内右派份子到山西劳动锻炼的前夕，领导通知我：我已被追补为右派群中的一员。

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一场阳謀中，按計划进行的。我只不过是被女职工们选出来发言的一个代表，可以说，不论我提什么意见，总是会当右派的。当初如果选的是另外一位女同志来发言，只要她开了口，肯定她也会成为一名右派。所以，我是个被选出来的右派。不过，当初选我的人并不知情而已。

临走前领导找我谈话，告诉我下去三个月，表现好了就另行分配工作。三个月就三个月，我觉得这也沒什么。我单身一人，以部队为家，对党心怀感恩，故而我总是积极执行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不然我怎么会被授予功臣称号。如今党要我下去劳动，正好表现我对党的忠心，我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些批判我的人所说的‘反党分子’。然而，三个月、六个月……直到水库劳动结束，“另行分配工作”的诺言仍毫无音信。320名锻炼队员分散在晋中大地的各个县区继续劳动锻炼，仅有的三位女性，我、郑淑芹、李淑琴也各奔东西。我从此在工、农、商、学各界转悠。工：制农机、做玻璃、织布；农：放羊、种地、看场子；商：当过售货员；学：教过书。总之就在这祁县、太谷两地，前前后后蹉跎了二十来年。也许以前那位领导只是顺口编句谎言安慰我，也许他心中的革命历法与众不同，因为他的一个月，相当我八十四个月的人生历程。

进入文革，像我这样的另类贱民，又是一个女性，更是受到一些自封为‘左派’、‘造反派’的欺凌和污辱。我曾被挂牌、戴帽、挂破鞋……到处游行、批斗，甚至戴着这些有辱人格的装饰物，由两名‘解差’持棍棒押解，从学校到农场往返二十余里去劳动。说来的确可笑，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女起解》吗？只是少了个崇公道来发发议论：“你说你公道，他说他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在那些阴晴不分，是非不明的日子里，活着也是艰难的。我因经常饿着肚子参加劳动，而且劳动后还常常大半夜、大半夜地站在电灯下受批判，有时体力上实在支持不住，曾两次晕倒在批斗台上。待到文革结束时，我的腰部因持续受到损伤而无法治愈，导致我今日成为了行走艰难的半残老人。

回顾一生，我虽历尽坎坷，却仍感有幸。当年我在军委当翻译时，只是个充满理想、单纯热情的不懂世事的女青年，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以及其后的生活磨练，才使我真正经历了人世万象，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世间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使自己得以略明事理，虽说代价过高，但也不失為一种收获。我并不计较于个人的困厄和得失，但求还历史一个公正与真实！我再说一句：但求还历史一个公正与真实！

郭堡琐记

肖晓青

作者小传：

1929 年生。1950 年 1 月参军，同年 11 月入团，原在空军十二航校 2542 部队任特设师，少尉军衔。反右中曾受监督劳动处分，文革中，被遣送原籍四川安岳务农为生。改正后在山西平遥南镇中学任教，1992 年退休。

人的有些经历和体验，往往会在记忆中重现。

我在郭堡劳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对那些日子里所接触过的一些事和人，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像逛画廊似的进行回忆。真是感慨万千！因为，在那个年代，那片土地，那种环境中，不管你愿意，抑或不太愿意，都得面对，都得忍受。

一、高音喇叭伤人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高分贝的广播，无时、无处不在刺激着人们的耳膜；若以当今时代来看，这种“嗓音”，乃是严重的环境污染。

工地上的高音喇叭，每天清晨就早早地响开了。播放的歌曲不外是《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不但耳听，而且还要在出工、收工时要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掉”。每当听到或唱到这句话时，我的心好似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扪心自问：我并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呐！然而，现实呢！头上的“帽子”不是明扣着呗！还是好好“改造”吧！

除了播放歌曲，还在无休止地在重复：“人定胜天”、“东风压倒西风”、“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这种狂热的浮夸 ，为大跃进后的三年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埋下了伏笔。它透支了人民群众的热情与信任；也使人们真正感受到一种受愚弄的无奈。

二、天翻地覆大跃进

由于长时间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所以，对外面世界的感知很少，一旦出走这封闭的“集体”，就倍觉新鲜、自由。

大跃进那年的国庆后，因大炼钢铁建小高炉的需要，一大队副大队长周湘生派我们 4 人拉着两辆平车，去 15 里外的段村拉些耐火泥。装车后，已是时过晌午。我们进附近农村食堂找饭吃，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接待。当时吃的是“小米闷山药蛋”，并告知：

“不定量”、“管饱吃”、“不付钱”……我们听后。顿感惊喜！这真是太好了！农村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哩！

黄土高坡的山西，乃是红枣、柿子、核桃之乡。金秋十月，正是收获季节。可是，当时的农村、遍地成熟的庄稼，竟无人收取，任凭糟踏。有群众自编的顺口溜为证：

轰轰烈烈大跃进

大炼钢铁超美、英

亿万青壮去奋战

遍地庄稼遭践蹦

豆子放了炮

棉花挂了孝

红枣柿子满地抛

高粱玉茭上了吊

你说明年咋吃饱？

后来，当我读到彭总的《我为人民鼓与呼》时，才知道这位昔日叱咤风云，戎马一生的彭大元帅，因为讲了真话，而命归黄泉。痛哉！

三、“白旗”“帽子”漫天飞

所谓“拔白旗”，就是在工地上针对我们和民工中凡是消极怠工或者违反了所谓的劳动纪律的人，都树为“白旗”。一次，在休工闲聊时，听一些民工说起：现在农村的青壮年，都被组织起来进行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劳动。由于长期离家分居，所以出现了一些青年晚上熄灯后偷偷跑回家中与媳妇相会。当领导发觉后，就要给他作为“白旗”进行批判斗争。至于帽子漫天飞，是源于时任太谷县委的宣传部长在工地的一次集会上的训话。他说：“你们（是指我们）要认清形势……要知道，帽子还在你们的头上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落在谁的头上”……

我想：我已戴上了一顶，难道还要再戴一顶？或插一杆所谓的“白旗”？正当我提心吊胆的时候，忽然，人群中传出：“把右派分子徐中行、×××押上台来！”接着是揭露所谓的罪行。说徐将砌高炉用的耐火砖，在削棱角时比别人多报废了一点。当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后，即五花大绑进行逮捕。这一闹剧的目的是“杀鸡儆猴”。当时，我也像鲁迅先生《阿 Q 正传》中的“吴妈”，夹杂在人群中伸长脖子在看“热闹”，在看“枪杀革命党人”。这正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个秋哪，又是“秋

风秋雨愁煞人”……

四、同命战友今何在？

时届那年的腊月，郭堡水库工程已接近尾声。为了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领导决定把我们集中在太谷城内，进行一次“思想总结”——小组批判会。

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个组员叫季桂棠，浙江人。有浓重吴语口音，生性刚直、好健谈。就因为他平时曾说过一句话：“劳动改造，结果是使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竟遭到一些人的轮番“轰炸”。最后，叫季桂棠认识时，季当众承认自己是说过这句话，并表态说，“我对劳动改造就是这么认为的，你们看着办吧”！这种刚正不阿的气度实在令人可敬、可佩！

时空变幻，弹指一挥间。四十七年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季君啊！侬若仍健在人世，我还想再聆听侬的“吴侬软语”；若已驾鹤西去，则你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将会时时在我的耳畔响起……

有位哲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圣徒被骗”！

蝶恋花

1958 年 2 月集体创作 吴明祝执笔

——原空军十航校军械系过韬、陆曾涛、伍应天、萧庆忠、李道性、吴明祝，六“精英”姓名串词一首

过隙白驹七年间。
曾几何时，
释手在今天。
庆幸离伍去磨炼，
吴歌楚舞心相连。

祸起萧墙缘忠谏。
世事陆离，
涛骇又道险。
桃李正茂师韬晦，
祝君悟性应明辨。

五十年历程

童 骏

作者小传:

1925 年生于南京市。1948 年 8 月毕业于上海交大运输管理系，1948 年至 1949 年在中国航空公司工作，1949 年 11 月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参加中国民航。1950 年 12 月入团，来堡前在民航总局科学研究所任情报翻译。离堡后分配在山西中阳县电厂担任技术工作 1978 年调南京汽轮电机厂工作，改正后任电站公司副经理，高级工程师。1983 年任第七届政协委员，198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记得 1949 年 12 的一天，我在香港码头上送一位同班同学赴美留学。他现在是美国一所知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并兼任国内几个有名大学的荣誉教授，可谓功成名就。早几年他来南京讲学，约我会面，我一面祝贺他的学术成就，一面也不因自己的没没无闻而羞愧，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就命运各异，但是他们都是爱国的、勤奋的，在逆境中力求对社会做出贡献。这样的同志不是比比皆是吗？1999 年 4 月，苏州大学集会纪念我父诞生一百周年，称颂他是著名的爱国的民众教育家。“文革”期间，他在极“左”思潮冲击下，备受摧残。事后他谈及住“牛棚”及挨斗的情景，哑然失笑。母亲在一旁说，他居然笑得出来。正是他这种坦荡胸怀和爱国精神，一直在感染我。在他影响下，1949 年，我毅然参加两航起义，一心一意想回到祖国为新中国民航事业施展抱负。1950 年，在“革大”受了革命人生观教育，入了团，服从组织分配到民航总局政治部教育科工作。同年，政治部领导让教育科同志下去调查总局直属机关两航人员的思想状况，由我执笔整理出一个报告。那时我还年轻幼稚，又喜欢“独立思考”，感到两航人员思想问题很多，除了其它因素外，是否和民航总局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存在“左”的倾向有关。报告交了上去后，万没想到埋下了祸根。1955 年“肃反”，突然宣布将我隔离审查，查了一年，不了了之。不久又来了“反右”，尽管我噤若寒蝉，还是难逃厄运，终以“不满肃反，曾发表五点反党意见书”的罪名，被打成“右派”。1958 年，送至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八个月，然后送到黄河边十年九旱的偏僻的中阳县，继续在基层锻炼，一下子锻炼了十八年。

下放以后，痛定思痛，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什么地方“反党反社会主义”，倒是悟出来自己犯了可悲的政治幼稚病，栽了这么大的跟斗。记得 1950 年一位前辈曾对我说过：

“你在交大学管理的，不适合搞政治。”那时我也太自负了，以为一个交大高材生，干什么不出人头地。隔离审查时，我竟天真地要求看守人员为我借一套《资本论》来啃。下放以后，我没有消极，三十岁刚出头，来日方长，还是搞点实在的技术吧！那时正值大闹钢铁，这个小县城落后得连一盏电灯也没有。县领导将我和一个劳改释放犯（在狱中学过电工）召去，要我们搞发电。我们两个人用了三个月时间搞出了一套蒸汽发电，虽然容量只有 84 千瓦，但毕竟这里的老百姓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炼铁也有了电力拖动，我因此“立功赎罪”，在全县第一批摘去右派帽子。

1962 年县里筹建电厂，又把我抽调去。从建第一台、第二台到第三台机组，均由我负责技术。我愈搞愈有兴趣，整个身心都寄托在电厂上面。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动乱（无数的运动 ，造反，武斗，打砸抢……），我这里是平静的港湾。领导信任我，保护我，工人爱护我，尊重我，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好的工人群众，我成为县里没有头衔的名人，没有职务的“老总”，不挨批斗的技术权威，众人皆知的好人。山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上很充实。在民航的八年，我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在县里这十八年，无名无利，但做的事对社会有益，对人民有利。我们那里的山沟有好几个三线军工厂，用的电都是我们电厂供的。有趣的是干部子女安排在电厂工作；我的儿子却因家庭成份不好，被安排在水泥厂。因为电厂是要害部门，但他的老子却在电厂掌握技术大权。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妻子。在 1965 年，事先没有和我商量，她就把工作调来本县中学教书，这在县里还没有先例。县里有十来个下放的右派，没有一个人肯把老婆从大城市调来山区。那时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那有能力去保护她，我直怪她太冒失了。我说：“过去已经连累了你，万一将来遇有不测，我怎么再能保护你。”她说：“我认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原在天津工作的那所中学的老师们可遭了“小将”的大罪啦，她幸免了这一劫难；在这平静的港湾里，和丈夫过着贫困但安宁的生活。我笑着对她说：“好心得来好报。”

1978 年，经过五年的申请，县里终于同意放我走了，调回老家南京。县里鉴定上写道：“为本县电力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这十八年过得值。

1979 年，民航总局派人到我工作的南京汽轮电机厂为我的右派问题改正。来人说：“局党委研究，你的所谓五点反党意见书不仅不是什么反党意见，而且是正确的建议。”尽管改正等了二十年才来，但是毕竟来了，我相信它会来的，对党我从没有失去过信心，现在更热爱它了。我们党不愧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此后我努力创造条件，在 1984 年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路子顺了，个人的路

子也愈走愈顺。在职称上评了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务上升了科长、经理，还当选了南京市第七届政协委员。退休后继续受聘任南京市经委电力技术顾问多年，直到 1995 年我七十岁才退了下来。

作者附言:

“五十年历程”一文是我从《两航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的一篇文章中摘录的，遗憾的是我缺少郭堡水库这一段终身难忘的言难经历，本想补写一文，只是近二年重病在身，无法执笔，只能留在记忆中了。

童骏　2007 年 1 目 28 日

肠断《金 缕》

段星灿

作者小传：

1925 年生。1944 年 9 月参军，1947 年 3 月入党，曾任华北军政大学政法教员、报纸编辑及宣传助理员，来堡前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助理员，大尉军衔。离堡后曾在中学、师范、电大任教师，1979 年 3 月在新安当教师时获改正，1985 年离休。离休后著有《风雨萍踪》上、下册，约六十万言。

大约是 1958 年的三月末或四月初，总政的两位助理员拿来了我的“结论”，说是征求本人意见。告诉我对哪些地方不同意，要坦率提出。这个“结论”只有文字，而无标题，是一曲“无标题音乐”黑色的悲怆奏鸣曲。我问，是不是已定我为右派了？答：那是组织上的事，你只管帮助组织上把材料弄准确。我写了修改意见交给他们。过了几天，他们拿来修正稿，我发现我的有些意见并未被接受，于是我坚持要求再修改，他们只好又拿了回去。待第三次拿来时，加了个标题，在我的名字前面，还冠以“右派分子”。四个大字，赫然醒目。

啊，几个月迷离恍惚，终于苏醒了。我不再提什么修改意见，没什么意义了。“就这样吧!咎由自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关于我的定性，听到一种说法，颇像一个故事。据说，中央关于划定右派分子标准的文件下达后，军委的直属各单位初步定了个名单，拿到“直政部”(管理中央军委各大总部党务工作的专设部门)去汇报、平衡。而我所属的单位总政组织部的名单上，当时没有我。外单位有人问：怎么没有段星灿呢？我们部的同志讲：此人出身历史好，鸣放问题虽然严重，但检讨深刻，认罪态度诚恳，表现也好，准备定他为“中右”。……发问者立即表示：如果段星灿不划右派，我们单位一个右派也没有。此言一出，其它一些有关单位也群起响应，最后，听说直政部刘主任还对组织部作了批评。于是……。

这说法来源已记不清。根据我听到见到的一些蛛丝马迹，也不定是空穴来风。这里我就想到，划与不划，并非完全都是由基层决定的。上层压力下的比例数字，各单位的相互攀比，使本来可能漏网幸免的也尽收其中了。这也许只是“个例”。至于我，几十年来，无论什么场合，对什么人，我总是坦承，按当时形势，按我鸣放问题的面之广，度之深，言词之激烈尖锐，不划右派是难以想象的。我自然希望不划，划了，也在意料中。我只有伤心痛苦，而无怨恨。总政组织部八十多人，只划了三个，未达 5%要求，也

属难能可贵。看了最后结论，几个月的希望、幻想、终于成为虚妄，云散烟消。

幻想破灭了，却堕入新的漫漫长夜的恶梦之旅。这是真的吗?少年即追求革命，一向自分忠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梦么，当然不是，是真的。党当然不会错。绝不能朝相反的方面想。绝不能在思想深处对党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亵渎。刘副部长谈话也很温暖：“好好认识错误，努力改造，一年，二年，(他加重语气)甚至三年、五年，欢迎你们重新回到党内来。党的大门对你们是永远开着的。” 我相信他这是出自内心，是真诚的。他用了“甚至”，可知是极而言之。那么，这时，既是党的中央高级机关又是负责的高级干部，他也未曾想到，我那时一走，竟会一恍二十余年，“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开支部大会，宣读结论、处分。让我签字，不敢写“不同意”，怕加重处分；又不愿写“同意”，因为中有不实之辞略一思索，写了“我对不起党，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

处分是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大尉军衔，行政降三级，保留公职，下放劳动锻炼。

把军装染成黑色，交还了军衔、领章、武装带。把几个月跑古旧书店买的大批图书装了七个大木箱，其中线装书四大箱。发工资时，打开工资袋一看，只装有人民币五十七元；下午，又派人来收回了。莫非处分又改变，五十七元也不给了?第二天，再送来工资袋，说是昨非今是，深致歉意，已对有关人员严厉批评云云。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打开工资袋，再数一数：一百三十七元五角。明白了，我十四年革命军旅生涯的最后一个目，居然拿的还是原工资。当然，这也是员后一次的原工资。

当晚，辗转难眠。对着耿耿孤灯，夜深籁寂，挥泪展纸，我填了第一首《金缕曲》：

金缕曲 1958春 北京

受党雨露久。惊回首，深恩负尽，死生师友。

犹记当年烽火路，几多水寒山瘦。太牵惹春恨秋愁。

羞煞自诩柏与柳，波涛涌顿覆舴艋舟。

咎我取，何怨尤。

独坐泪湿戎衣透。未敢忘，东南海上，犹缺金瓯。

心碎肠断难再留。忍置手里吴钩!精卫微志今尚有。

永教灵台守丹魂，终此生重归百尺楼。

期再会，且相候。

四月末的一个夜晚，我和陈挺、苑青，带着行李离京赴山西。丁章胡同一号大门外站满了人，家属、小孩，无言相送。胡友之副部长，刘德裕副部长、几位处长送我们上了一辆大轿车；一一紧紧握手道珍重身体。几位助理员相伴到了车站，帮助把行李提上了火车，嘱咐把棉衣穿上，后半夜车入山西境；那里气候寒冷。

最后的温馨。

气候寒冷是短暂的，何况自然界已是春天，我默诵“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心上一阵悲凉，赶紧收住。政治气候的寒冷，那样漫长，不仅我自己，连他们谁也不会料到啊!

二十年后，1979 年，我赴京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在总部大院传达室，出来接待我的是一位文革后才调来的中校副处长。当我得知原部长刘其人将军已于文革中被迫害去世，不禁失声痛哭，久久难抑。我不曾忘记我到组织部后他对我的器重，尤其在反右中他曾有意识地对我作过一些保护。是的，他曾奉行了“阳谋”，他曾划了几个同志为右派，可他自己最后却成为更大阳谋的牺牲品。仔细思量，我们党的历史有多么沉重浓重的悲剧色彩啊!

这位年青的副处长没有对我进行更多的劝慰，他站起来，动情地说:“回家了，同志们都想见见你，走，回家看看。” 这么温暖的话语，二十多年天涯游子，几乎又是热泪满眶。我随他登上阔别八千个日日夜夜的总政大楼，组织部依然在四楼。一个室又一个室，他介绍:“段星灿同志回来了!……” 男同志纷纷伸手紧紧相握，女同志都睁大着眼睛，盯住我，好像审视欣赏一个希见的动物 。虽然大家一句话也未说，我却深切体味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心房的颤动。已是下班时分，我看出人们正待离开，只走了三四个室，便告辞了。暗思，怎么全是生面孔? 蓦然惊觉时间已隔多久了啊! 脑中浮现出陈与义的词句:“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物是人非，他们大概是在讨论给我们改正的会上，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当年，本来是长期一起工作朝夕与共的战友，一霎时电闪雷鸣，我就成了不可接触的右派分子；如今虽是素不相识，却一见我便视为同志和亲人。这巨大的，不，这绝对的反差是不能简单用“人间正道是沧桑”来解释的。它不是客观规律，是人为的扭曲。人扭曲了时代，时代又扭曲了人。

诗及嵌名对联　王正玉

八十述怀

半生改造瞎折腾，沉浮悲喜一梦中；

舌尽甘来逢盛世，童颜鹤发品余生。

题赠文荣贤妻

牛棚对泣，文革闹剧受欺辱

窗窥游斗你怜我

斥退回乡，荣辱皆抛忍苦寒

垢面蓬首吾爱卿

注：此联曾刊登于《中华当代嵌名题赠联宝典》一书

细事天禍

——从留苏（苏联）到 流堡(郭堡)

朱兆极

作者小传:

1926 年生。1944 年 6 月参加工作，1945 年 2 月入伍，1946 年 7 月入党。曾任新四军二团文化教员、抗大学员、航校学员、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员、后在空军司令部任翻译、五航校翻译室主任，并留学莫斯科考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授上尉军衔。离开郭堡后，在山西建五公司任技术员、机修队技术负责人。1979 年改正后，在山西省建筑工程学院任科付主任，高级工程师，高级讲师。1988 年离休。

开场白

留苏，就是留学苏联，在五十多年前，要说起留学苏联，那可是天大的喜事，是几几乎没边没底的幸福。流堡，就是流放到郭堡，也是在五十多年前，要说起流放到郭堡去修水库，那可是一场深沉的悲剧，是几几乎没边没底的大苦大难。这么两件大事都教我给赶上了，而且变化只在于转瞬之间，实在令人费解。但那个年代的历史就是这样，叫人看不清说不明、猜不透也理不顺。想知道实情吗？就让我这八十老人为你细细述来。

灿烂的前景

在五十年代初，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那是伟大的列宁亲自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世界的革命圣地，是全国人民响往的人间天堂。在那个年代，除了党中央的领导人以外，只有一些全国最最著名的作家、劳模和战斗英雄们才有机会像朝拜圣地似的到莫斯科转悠上三五天，用革命者内部语言来说：这叫做最高级别的政治待遇，在当时，能到苏联去，而且是去留学，而且是一去数年，就一般老百姓而言，那真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这一圈灿烂的光环，偏偏笼罩在我的头顶上，于是我成了同时代青年中的天之骄子。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一年，党中央决定首批挑选三十名青年军官到莫斯科的几所军事院校去学习武器制造技术，说是挑选，实际上是筛选，要经过极严格的各个方面的审查，才能筛得出来。当我知道自己体检和文化考核都已顺利通过时，真令我信心倍增，所剩下政治审查这一关，我是有充分把握的。 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这是我的强项，这是我的亮点。我在抗日根据地的家乡，十六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十七岁就当了

新四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参加过战斗，其中较大的一次是孝丰战役，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战后我受到领导的表扬，同时还嘉奖给我两条毛巾，可别小看了这两条毛巾，在当时，简直就是一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可引得不少小战士啧啧称羡呢。在解放战争中，我参加过泰安战役。我曾以勇猛艰苦的战斗精神，圆满完成了任务。在泰安战役后的第五天，我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这几点以外，我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的家庭。我家成份是农民，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在家乡任镇长，姐姐在家乡任乡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哥哥，他十六、七岁就在根据地参加工作，因为立场坚定，积极肯干，早早就入了党，并担任我们区的教抗会主任。十九岁时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调至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工作，全国解放后又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鲁艺”团长，省文联常委，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等职。应该说，我的父亲、姐姐、特别是我的哥哥，都曾经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使得我在革命军队的大家庭中茁壮成长。

果然，我的判断没有失误，结果批准了我，我成了赴苏留学的三十名成员之一。

从 1951 年 9 月开始到 1957 年 8 月为止，已整整学了六年，因为我以前在航校和哈工大学习和进修过，理工科专业方面具有一定基础，故而接受得比较快，这十二个学期的成绩一直处于前列，从来就和 3 分无缘，4 分也极其偶然，基本上全是 5 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当然是很不容易的，对专业本身的兴趣是原因之一，最根本的是我作为一名青年军人，已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为保卫祖国而努力学习，是党交给的任务，我必须坚定地去完成。在紧张的学习阶段，我还尽可能抽出时间研究红外线等课外科目……。

五十年代初真是美好的岁月，我们这些年青的一代的心境是紧张而舒畅，愉快而天真。

瞬间的变化

1957 年 6 月底，我和十一位留学苏联的同学奉命回国实习。

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北京。途经齐齐哈尔市时，我顺便去看望了一下正在齐市任文化局长的哥哥康蒙(原名朱兆机、朱郎)，我们匆匆见了一面。他知道了我正前往北京，临别时，他给了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齐市文化局副局长陈伯元，当时陈正带领齐市马戏团在北京陶然亭进行汇报演出，哥哥还说：“有时间的话，你带同学们去看看马戏，爱看的话就常去看看。”到北京后，我们事情头绪太多，谁也顾不上去看马戏，我则忙

得连转交的信也没空送去，结果还是陈伯元自己来取走的。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就这么一封极为平常的信，竟会使得展开在我面前的人生道路，突然来了一个大转折，拐向悬崖。

在北京休息了约一个月后，我们同学们按计划赴齐齐哈尔市 2740 部队实习。在实习快结束前的一个早晨，偶然从广播喇叭里听到报导，说是市文化局局长康蒙骑自行车带人上街，不遵守交通规则；第二天又听到广播，这回更严重了，说是康蒙反对市委领导，对市委进行了恶毒攻击；又说康蒙是假积极入党的，但是又没说出什么依据来。这些消息，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哥哥到底惹了什么祸。直待到实习结束，我们即将返回北京，在临上火车前我和同学一起去看了看我哥，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说："我的事你别管，相信党，一切一切都会弄清的。"因为我想起前不久在北京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告诫：现在全国正在进行反右运动，你们回来了就好好休息，不要乱说话。刘司令员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啦，我就什么也没多说。

我们的实习已经结束，在北京休息了十多天后，正准备动身返回莫斯科，就在起程的前夕，空政的一位宣传干事赶来招待所找我，他问我：从莫斯科回国途中，路经齐齐哈尔市时，我哥是否让我带过一封信？他还要求我说明信的内容。组织上派人来正式调查，我自然将转信的情况详详细细都说了一遍，同时，我也告诉他这封信的内容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哥本来是准备邮寄的，信是封着的。这位干事走了以后，我原以为就我而言，事情已经了结，不料到第二天上午，我和同学们正准备上机场时，只见那位宣传干事急急又赶来招待所，他通知我 ：暂留北京 ，待事情弄清楚以后再走 。这对我而言 ，当然有点意外，不过想了想，不就是多留几天嘛！多留几天也无所谓 ，因为我在苏联学习的毕业论文早就写好了。

荒唐的莫须有

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简单，在北京这一待就是两个来月，我这才有点焦急，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春节前的一天偶然在前门大栅栏街上碰见张汉鑫，我方知道事请比我想像的严重得多，张是与我同住招待所的空军干部，和我相处得还不错。他告诉我，齐齐哈尔市曾多次向空军司令部写信告我，并说空司后勤部长曾派他到齐齐哈尔市 2740 部队去作过调查，也没查出什么，只是据说我在实习时，正好我哥出了事，那些天我吃饭吃得少了。我告诉老张说："饭吃多吃少，我记不得，但我知道你去齐市是为了调查我转信之事，我想，有个问题组织上应该是清楚的，我转信是今年六月底的事，

而我哥他们两个文化局长被批斗是八月份的事，我转信的时候怎么会知道他们俩个人会在一个月以后挨斗呢？ 更何况他们当时也没有必要用黑话通信啊。

自和老张交谈以后，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觉得隐隐有一张网正在我周围铺开，好像有人在想方设法来整我。是谁呢？我捉摸不透，空司的几位首长对我都很了解，他们不会随便允许别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坑害我，我自信问题是会得到正确处埋的，不过吴法宪比较难说，因为我一直认为吴法宪是空军里的大草包，权欲熏心，喜欢摆弄自己，他是什么事也做得出来的。

我在焦虑中又度过了两个多月的难熬的时光 ，有一天，空司后勤部部长正式找我谈话 ，他指明我所转交的信中说的尽是黑话，他要我协助组织 ，搞清问题 ，要我大胆揭发我哥。 我说：信中说了些什么我全不知道，我怎么来揭发呢？他见我谈不出什么来 ，只好说 ：“那就写写你转送信件的详细过程吧，” 于是我按照他的要求，详详细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他。

看起来情况已急转直下，没过几天，在一个晚上，和我同住一个屋的老郝，他是吴法宪的秘书，他下班回来赶紧告诉我说：“坏啦，指着空军干部部杨春甫部长的鼻子说：该定右派的就定！像朱兆极就可以定嘛，你怕什么？”老郝的意思是吴法宪已拍了板，形势恐怕已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让我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仅仅过了一天，杨春南部长就带了好几个人，分别代表有关部门和军法处，对我正式宣布罪状和处分。从此，我就由一名忠贞的共产党员、人民战士，一下子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很耐人寻味的是判决书上关于我的罪状，只是说我给右派‘通风报信’，至于通的什么风，报的什么信，却只字未提。当时杨部長的态度很温和，他说很快就将派我到山西太谷去劳动锻炼，他还空口许愿，说锻炼六个月以后便可以回空司；他将太谷描绘成江南水乡一样，说什么那是一片水网地带，老百姓吃的都是大米，实际上那只是一片山沟沟，老百姓一年到头吃的尽是杂粮；最后他还告诉我：我留在莫斯科的行李物品，同学都给我带回来了，为出国而做的服装也都给我，后天，他们即派人派车送我上火车去山西太谷。

历史之一页

从 1958 年到郭堡水库开始，我和水库的三百多位锻炼大队的难兄难弟一样，一直在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时常会有战友带着一种惊诧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实际上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党和人民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化了那么大

的代价，经过了六年那么长的岁月，让我到苏联去学习，怎么会一跟头就让我栽到郭堡来了。我知道，我全部的‘罪过’都源于我为我哥哥带的那封信，我既不知内容，又无法打听，实际上也不敢打听，我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时，没有一个接待我的干部能讲得清楚，我就在这不明不白中，渡过了我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当然，现在我明白了，从1979 年右派改正以后我就明白了，那封信只是一封极其普通的信，我哥康蒙时任齐齐哈尔市文化局长，付局长陈伯元正带队在北京演出，这时陈伯元家乡有人来找他，我哥就是写信告诉他这件事。本来带封信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在我带信后一个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哥康蒙和陈伯元被打成了反党小集团，所以我这小事也被稍带而成为大事。

我哥是好样的，就在他蒙冤后被遣送回原籍务农的二十二年间，他通过自学中医与针灸，为当地群众免费行医，解决当地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在农村一直受到群众的赞扬。改正后，任黑龙江省文化厅电影处长和史志办主任，工作依然非常勤奋，一直到他 1994 年去世，他都是一位值得称道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我只为我哥哥带了一封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常信，这一封普通的信在特殊的时机，就成了一桩特殊的罪证，最后凝结成我头上所戴的一项右派帽子。当然，二十二年以后，一切都清楚了，可是那被荒废了的青春岁月，那被荒废了的热情和壮志，那被荒废了的学识和专业……也都随风而去了，向谁讨还？谁来偿还？谁能偿还？这些问题都留给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到这一段荒唐年代时再找答案吧！

自传《三著戎衣》节选

章士寰

作者小传：

1933年生。1948年参加工作，1949年6月参军，1949年12月入团。抗美援朝时，赴朝六年，曾立三等功并莱获军功章。离堡后1968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刑十年，后减为六年。1976年在绍兴某公社塑料厂任供销员，改正后调绍兴县手工业局，1992年6月入党，1993年离休。一生经历可以六句顺口溜归纳之：解放战争打老蒋，抗美援朝渡过江；反右斗争受冤枉，文化革命坐板房；三中全会春雷动，红豆发枝吐芬芳。

诗曰： 是非功过说原由，含屈蒙冤谪并州。
一夜风波天地怅，廿年炼狱鬼神愁。
金箍咒念唐僧舌，铁帽盔伤大圣头。
夕照青山活水动，桑榆霞蔚忆霜秋。

话说1957年6月我结束了七年的战地生涯，奉命从朝鲜轮换回国，被分配到国防部总干部部工作，国防部长是咱们志愿军的老司令员，彭德怀元帅，总干部部由赖传珠任部长。

办公室和宿舍都在国防部大楼院内，我住在二楼单人军官宿舍，一人一室，十分舒适。宿舍楼与北海公园仅隔墙之遥，臨窗近睹，北海美景尽收眼底，恍若人在琼楼玉宇。办公和住房条件十分优越，与朝鲜住坑道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为了自勉，我曾填过《望江南》词一阕，贴于墙上以作座右铭。

词曰： 梳洗罢，独依在东楼。
应觉融融红日暖，毋忘皑皑白山愁。
飞鸟箴言稠。
黄昏里，信步上东楼。
犹忆东邻山上雪，欣看北海水中舟。
情侣荡悠悠。

然而美景不长，一场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大潮正奔湧而来。我轮换

回国之时，正是全国反右斗争席卷全国之日。我党的整风运动，正从大鸣大放阶段转向反右派斗争阶段。事情正在瞬息万变，香花在变毒草，同志在变敌人，功臣在变罪犯。总干部部的整风进度，尚处在学习文件、小组发言、向党交心，帮党整风的和风细雨阶段，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大会上动员大家说真话、讲实话，并且说可以指着鼻子骂娘，言者无罪，只是不要开枪打人。

学习并不紧张，使我星期日有机会去拜访在北京的亲友们。我去得最多的是在新闻总署任专员的大伯章锡琛家和正在中国图书公司工作的五叔章锡洲家。在大伯家，我读到他帮党整风的一份交心书，对发展我国出版事业提出了一些我认为是很中肯的看法。在五叔家，我读到书店的一份小报，上面刊登了五叔的意见书，他对在历次运动中审查他的历史的做法有些意见。依我看，这仍是一种积极的表现，也无可厚非。过了些日子，忽见《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大伯父的文章，他还被划为新闻出版界的大右派；不久，五叔在单位里也被划为右派。这两个消息实在让我大惑不解，难以置信，我深信他们绝对不会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于是便主动地、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上交了心。殊不知这么一来，我自己却成了一个自己送上门的重点审查对象。不久，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站稳立场，划情界线，断绝与大伯和五叔的来往。随即将我佩带的五四式手枪和子弹都收缴了回去，同时并将我自 1949 年 6 月至 1957 年当天的十多本日记全部拿去审查。从这时起，阴影已经在我周围悄悄展开，可是我自己仍在混沌之中。

在整风运动中，组织号召要帮党整风，向党交心，要敢于说话，敢于批评，特别是党团员要带头发言。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引蛇出动”，或者叫“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钓鱼战术，我作为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更是责无旁贷地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是我在学习小组会上坦诚陈言。那时候年轻单纯，血气方刚，思想像一张白纸。加上从朝鲜回国不久，对国内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之复杂情况了解甚微，总觉得反右斗争是敌我矛盾，离自己十万八千里，说啥也反不到我的头上来。于是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一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是三个方面：

其一，对军衔制的看法：我当时认为部队在开始实行军衔制度的过程中，官兵出现了一些不融洽的裂痕。鸿沟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严重影响着上下之间的团结。若是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有碍于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革命传统，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我把平时在实际中接触到的情况，如实例举，以说明军衔制度不符合我军实际，不切合我国国情，它在我国没有优越性，此路不通，从将军到士兵都有意见等等。从现在看来，我不是研究现代军队制度变革的专家，我的这番议论可能有着一定的片面性，但确

实也反映了一件新事物在开始阶段必然出现的抵触，了解这些情况，对改进今后的工作，肯定也是有益的 。然而就此便定我为“恶毒攻击军衔制度”，定我是反党，这就有点说不过去，因为就在我戴上右派帽子不久，毛主席就批准取消了军衔制度 ，直到 1988 年 9 月，部队才重新恢复军衔制度。这起码说明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党、政、军领导人，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是和我的看法一致的。

其二，由于我的工作调动频繁，故而在调整级别和评定军衔时，难免不受些影响，几次失去了提拔和晋级的机会。有一次，在小组会上漫谈时，发了几句牢骚，说什么在德、才、资下面还要加个“机”字，还有人同声附和，认为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忽视的。这本是个人问题上的几句牢骚话，在实际中也是人人都可能遇到的现象，后来竟上升到“恶毒诬蔑党的干部政策”这样的高度，当然也属于右派言论。当我被打成右派之后，才有人私下里给我透露一个令人惋惜的消息。就在前不久，组织上就考虑到我曾多次立功受奖，每年都被评为先进，表现积极，有工作能力，而我的军衔和级别确实过低，本已确定要提升我两级，即从少尉越过中尉，直接晋升为上尉，从正排越过副连，直接提拔为正连。由于我被打成右派，正待下发的文件便戛然而止，胎死腹中。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哑然失笑，这不正好有力地证明了我说的那个机遇的“机”字，冥冥中在充分发挥作用吗！

其三，关于入党。我是在 1949 年 12 月进军大西南途中入团的，入朝前是党的发展对象，1952 年曾填过入党申请书，正要入党时，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通过外调，发现我父亲是国民党员，而我未曾向组织作过交代，落了个对党不忠诚老实，理所当然不能入党。而我的确不知此事，便函询父亲，他却矢口否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我既相信组织，又相信老实憨厚的父亲，真令人无所适从。后来文革中，当年的伪镇长施绍昌被揪斗时，方交待出镇里有一批“抄党员”，就是抄下的国民党党员名单，被抄了名字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成了国民党员，抄这名单目的是为了上报，以求获得奖金。这起父亲所遭受到的冤案，就影响了我入党。后来一直到 1992 年 6 月，我才入了党，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却我 40 多年的夙愿，这已经是后话了。

而当时，我因被拒于党的大门之外，我就觉得在地方上入党好像比在部队入党更容易些，我说我要是在地方上工作，早就入党了。这话被无限上纲后，就被转化为“共产党有两个党，部队一个党，地方一个党”，又成了分裂党的右派言论。

如果没有前面讲到的我大伯和五叔的问题，如果没有人给我加上“同情、支特、包庇右派亲戚”这一条主要罪状，则我虽有以上那些言论也就不一定会“升华”到右派

的档次上去，另外，如果那时的反右运动没有给各单位订出右派指标的话，我也不一定能排进右派队伍的浩浩大军，后来听说总干部部的右派指标是三名，当时已打出两名，尚缺一名，经过纵横比较、上下求索、综合平衡、权衡利弊，最后才排定敝人是最理想的人选，纵然半年前还是一位最可爱的人，是一位先进者，是一位功臣，然而名额指标，高于一切，我的领导也不得不挥泪斩马稷了。经过了几次的反复，终于 1958 年 4 月 10 日盖棺定论，经国防部直属机关党委正式行文，章士寰被定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那一年我正好 25 岁。从此，“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正是：一席忠言千古恨，满腔热血话凄凉；

古今多少不平事，都作昙花露水章。

踩雷记

周永熙

作者小传:

1929 年生，浙江温州市人，解放前，就读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专科部理论编剧组，在校时，曾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南京解放后，1949 年 5 月初参加了首先进城的三十五军，任文工团员，1950 年调海军，在华东军区海政文工团任分队长，创作员。1955 年 5 月调北京，在军委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曾立三等功两次、四等功一次。1949 年入团，1954 年入党。

1958 年后被遣送至山西太谷修建水库，1959 年调入太谷晋剧团任编剧直至 1969 年底，为家庭团聚，调回苏州。做过近三年搬石头的工人，后调至苏州市文化局群众艺术舘工作。1979 年后，任苏州市群艺舘副舘长、市文联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等职，1989 年离休。

一、喜讯频传，我沉浸在幸福的海洋里

以前，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海政文工团的团员，我是创作员，妻子是歌唱演员。1957 年反右以后，我们成了夫妻档的右派。1958 年以后，她是作为另类，开除后再‘军内留用’，每日每夜都承受着冰冷而蔑视的目光；我则被开除能在别人眼里恢复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清白的人。但无论如何党籍，并开除出海政文工团，从文艺 10 级降到文艺 16 级，然后被遣送到郭堡水库劳动锻炼，拚命地干，一心只想早日也想不到这竟是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漫岁月。往事如潮，经常翻涌在心头！

我的反右经历和肃反经历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谈到反右的往事时，必须从开始肃反的 1955 年说起：1955 年对我来说是个很不平凡的一年。就在 1955 年，我和相恋已两、三年之久的战友沈苏斐获准结婚了。

就我们而言，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两年前，我团的编导组长曾关心地对我说：沈苏斐有历史问题，她从台湾回来的事至今尚未搞清楚，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和她搞对象的。我听后一直在捉摸，他这是个人的看法呢？还是代表组织上给我通气？当然我还是谨慎为上，我和苏斐打了个招呼，以后我们在表面上要显得疏远一些。另外，对我们的结合还有一个不可抗拒的阻力，那就是所谓的二五八团的条件，这就是当时部队里结婚的条件。对男方来说，要在二十五岁以上，要有八年军龄(党龄？)，还得是团级干部。我除了年龄靠近以外，其他的都够不上标准，所以结婚之事就凉下来了，但实际上团里和我要好的战友们都清楚我们的关系，还好，团里的领导也心中有数，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只当不知道。

真没想到，情况很快有了好的转机，到了 1954 年，有一天华东海政直工部正式通知苏斐，她在 1949 年 5 月从台湾返回大陆的所谓历史问题已作结论(大概是已寻访到苏斐在台湾读书时的地下党员)并同意批准她长达数年的入团申请。也是在这一年，我到厦门海防前线去体验生活，在前线坑道里收到我入党申请得到批准的通知。好事不断，接着苏斐又被借调到北京的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作为主要演员之一，到旅顺、大连去慰问即将返国的苏联海军。而这一次的慰问演出使她作为花腔女高音的音乐才艺，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呢，运气也不坏，许多有影响的作曲家如：郑律成、陈田鹤、黎英海、龙飞、管荫深、洛地…还有我的老团长胡士平他们都谱写并发表了我写的歌词，上海的《文艺月报》杂志上又连续发表了我的小说与诗歌。

1955 年初，苏斐喜气盈盈地从北京回到上海，她是当时我们文工团第一个剪了长辮子并烫了头发的女演员。这时团里也由供给制改变为薪金制，我们俩的文艺级别在同批青年中是最高的。改了薪金制，所谓二五八团的结婚限制自然无形取消。5 月初，领导通知我们俩人同时调往北京，到海政文工团工作。我们华东海军的文化部曹部长关心地劝我们结了婚再动身，他说结了婚到北京，有利于帮你们解决住房。我们听从了他的劝告，很快去政府有关部门办理了结婚手续，并计划于赴北京的前一天晚上，就在文工团一间简陋的大会议室里开个茶话会，就算是举办婚礼。说起来，我们的婚礼应该是文工团里团员与团员结婚的第一对。

一波一波的喜讯，连接而来，我简直有点接应不暇，自己似乎感到每一根头发，都透着喜气。

世界太美好了，领导这么关心，同志们这么友善，革命事业的道路这么顺畅，我真想攀上高山的最顶端，向着茫茫的大地和海洋，向着所有的人群，尽情地大声呼唤：你们好，我爱你们！

在我的想象中，所有的人都在为我祝福，我也为所有的人祝福。

二、友情、爱情都开出花朵

因为是搞创作，文工团原来腾出了一间小小的钢琴房给我当卧室兼写作室。我和苏斐打算好了，待茶话会结束后，这儿就是新房。两个人将公家发的草绿色军被堆在一起，就算成家了。因为只预备用一天，所以什么喜庆的布置没有，连个红喜字也没贴。不过我还是略为打扫、整理了一下。

举办结婚仪式的前一天下午，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我好开心。他是我在参军前的老同学，我们同年入学，一同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就读，他在专科部表演组，我在专科部理论编剧组，我们同住在一座宿舍，而后我们又在同一天参军，先是陆军后又同时转入华东海军，只是早一年前他就被调到了海政文工团，这次是从北京出差来上海。我们别后重逢，分外高兴。我说：你别去找睡处啦，就在我这儿挤挤吧。他说：行，你这屋明天要做新房了，我就住这儿，还能讨点吉利喜庆呢。啊，太好了，结婚前夕，再和好友相聚，在这喜庆加喜庆的日子里，我完全可以自居为天下最幸福的人啦。

晚饭以后，我和老同学天南海北地大聊特聊，越聊越兴奋，一直到深夜还没有睡意，忽然，他在我枕头边发现了一本白色封面的书，他问我是什么书，我说是今天刚随文艺报送来的《胡风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书》。从这时起话头一转，就谈起文艺界的事来，我们都是毛头小伙，对军外文艺界的情况知之甚微，他从北京来，比我知道的稍多一些，但也有限。我们一边翻看着这本白皮书，一边感叹着文艺界的是是非非，最后的结论是这些都是上边的事儿，我们小兵腊子谁搞得明白呵。说到这里，正准备去睡了，大概是我又问了一句："胡风这是对周扬有意见吧？"

他说："他们俩都是鲁迅的学生，大概一个到了解放区，一个仍在国统区，时间长了，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这时，早已是下半夜了，实在该睡了，但我最后又嘟囔了一句："如果都照胡风说的办，文艺界可要天翻地覆了。" 说完这一句，我们都实在睏得不行， 瞬时转入梦乡。

过去'天翻地覆'是人们常用的俗语，只是说明乱七八糟、闹哄哄难以收拾的一种局面，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政治上变天的涵义，自从毛主席的诗："天翻地覆慨而慷"传世以后，人们才赋与了这句词汇以特殊的专门定义。这种认定虽有些勉强，但也只能随俗。可当时我的确没联想到这么多。

第二天，我按计划准备结婚事宜，先是拿出了几十元稿费，请老同学代我作主买点酒和酒菜，并找几位战友啜一顿。因我根本不能喝酒，就免陪了。晚上开茶话会也很热闹，有同志从道具箱里掏出两块原本扭秧歌用的红绸带，为我们俩各扎了一朵大红花，让我们佩戴着和全团的同志们度过了幸福的一晚。这两朵大红花至今犹是我们结婚唯一的一件纪念品。

第三天我和苏斐就去北京。到了北京以后，领导上也很关心我们，将我们安排在一间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我们好感动，抵京后的次日就照常上班，到了星期天，才抽空去参观了晌往已久的苏联展览馆，并在那里喝到平生第一次喝到的俄罗斯罗宋汤。

三、踩上一个地雷

北京景致很多，北海、故宫、天坛、颐和园…计划每个星期去一处，都要玩遍它。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只游玩了三两处，反胡风的学习展开了，于是大家天天什么事也不干，整天坐着开会。

我和老同学都在戏剧队学习，头两天还没觉得空气有何异样，学了几天，都是在窮读报纸，但我很快察觉到他有些变化，平时那个侃侃而谈的豪气好像突然消失了，在学习会上，他一股劲儿抽烟，沉默寡言，不理睬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我想问没敢问，在一本正经的学习会上，问这些是忌讳的。

我太天真了，直到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周围已有几个人在注视着我。反胡风开始后十多天，有一天黄昏，苏斐被领导叫去有事，我正独自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忽然戏剧队来了两个人，脸上挂着一副严肃得可怕的面色，低沉地说道："你被隔离了，拿上被子和换洗衣服，跟我走。"我明白了，什么也没说，但是我也没什么紧张，整理好衣物就准备出门，临走时，想了想，又问："可以给沈苏斐留张条子吗？" 他们迟疑半刻，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可以吧。" 于是我找了张纸 ，写了几个字：苏斐：我走了，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写完，交来人看过，我就跟他们一起进戏剧队的集体宿舍，也就是隔离我的地方。老同学也住这间屋，他见我进来时，头都不抬。这时我才明白，我已从幸福的峰顶掉到谷底！紧接着我从窗口看见，有个女同志住进了我家的小屋，我知道了，苏斐也在受审查。但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在戏剧队宿舍里，一共有三个被隔离的对象，三个人全都是从上海的华东海军文工团里调来的。一个是年纪比较大的老谢，他参军前曾在国民党的演剧队里作过演员，被隔离后，思想上很紧张，每天双眼瞪着天花板，咀里唸唸有词，好像神经受了很大的刺激。还有一个就是老同学，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每天一动不动地坐着写交代，我很奇怪，他和我一样，走出校门入营门，怎么会有那么多可写的！而我呢，最不安份，谁也不和我说话，当然我也只能沉默。要我写交代我又交代不出什么，干坐着又坐不住。于是我过一会就在房里打着圈圈踱方步，每次要转上几百个圈。不然我真没办法打发这分分秒秒。我成天走圈圈还有一个小秘密，就是转身的时候在一个角度上，可以看到我家房门的一角，偶然有时可以在瞬间看到苏斐闪过的身影。她毕竟是我的新婚妻子，更何况她刚怀了身孕。

四、谁埋下的这枚雷？

被隔离以后，我一直很纳闷，我到这个新单位才一个多月 ，来以前肯定也经过政治审查， 我参军都已经好些年了，组织上很了解我，怎么来这里才一个来月，我这人就变了？他们总应该掌握什么新的资料啊，可我每天大院门都不出，又能发生什么事呢？说有人诬告吧，也不可能，除戏剧队这十来个人以外，其他的人我连人名都叫不上，谁来告我呢。每天都给我几张纸，每天出不少怪题目让我回答，我回答完，又在会上批我不老实，总说我文不对题，答非所问。最后他们没办法，才提出了一个他们自认为是重磅炮弹的问题：“你说过，照胡风的话去做，文艺界就要天翻地覆了，这天翻地覆是什么意思？” 天翻地覆？这个词好熟啊，是我说过的呀，说过又怎么啦？我突然越想越细了，是的，是那天在我住的那间未来新房里说的，是的，是在结婚前一天说的，是的是的，是临睡前对着老同学说的， 我只对他一个人说过……这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他！难怪我来了没几天就成了重点，原来是我的这位爽快利落、豪气满怀的老同学告发的啊。随即我想，他是个为了朋友就能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型的人物，这种无端告发人的事，别人会做，而他是绝时不会做的。再说，我这人比较简单幼稚，就像张玻璃纸一样，是谁都看得透的，如果我要想编句谎话说说，自己就先把自己吓死了。在生活中，我这位老同学经常还以此来善意地嘲笑我呢。而今，他怎么会这样呢？

可是我当时还是谅解他的，我以为天翻地覆这几个字一定是别人用计把套出来的。

差不多一年之后，肃反快结束时，才有人告诉我，我的这位老同学兼好友，差一点就成了肃反重点，并说：幸亏他在运动一开始就痛哭流涕的找组织交代了，才躲过这一劫。我太吃惊了，他能有什么事呢，他这人性格这样爽朗，做事这么痛快，他怎么可能……我还为我的好同学打抱不平呢，这位说：“你给隔离了，什么事你都不知道。他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不过没做过什么坏事；”我说：“这样的大事怎么可以長年隐瞒都不向组织交代啊。”对方乐了，说：“那倒没什么，还有你想不到的呢，他在去剧专读书以前，十七、八岁时就结过婚、讨过老婆了，这你们当同学的都不知道吧。还听说他原来的家就在离我们汪家胡同不远处呢。”我一听，全傻了冒了，怎么可能呢 ？我知道前些年他在上海时还和一位姑娘谈过恋爱呢。后来我想起来了，“天翻地覆”这个词不就是他检举出来的吗，我调到北京来没几天就成了重点，现在这样一想就全想通了，他为了想立功赎罪，于是便努力指咬别人，以求组织上宽恕。刹那之间，我直觉得他很可怜。联系起他那言行上的豪爽也好，坦率也好，一幕幕在眼前映过 就变得活像都是在作秀，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并不突出，想不到他在生活上，在人格上的表演却那样的出神入化。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当我还是个右派或摘帽右派时，我也曾

来过几次北京，碰上这位老同学时，他常摆出一付不屑与我多谈的架势，我当然很知趣地回避开。改正以后，有时我去北京，当过去的同学、战友相聚时，他却不肯露面。终使得我很想原谅他也没有了机会和可能。而今，他己去世，我只好永远遗憾了。

这回我踩着了一个地雷，这个雷就是我这位老同学埋下的。还好，我没事，因为我没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错事，所以，这个雷没爆没响。

五、另一位能人斗士

肃反以后没隔多久，用句文艺化的词来说，就是从我被解除软禁以后，还没呼吸上几口新鲜空气，却又掀起了整风运动的高潮。这时我已学乖了，在鸣放会上，我很少开口，经常是闭着咀坐在会上听会，不管别人如何动员，我自是不动声色。我指望这一次运动不应该有我的麻烦。可是天不佑我，我又遇到了另一位能人斗士，此人来头不小，他就是我们海政文工团的一位团领导。

这位团领导本应该是一位能让人尊敬的领导，他很小参军，一直在部队的文艺队伍里成长，人又聪明，所以進城以后，组织上就送他到中央戏剧学院进修，他的老师有几位就是我在国立剧专时的老师。在五十年代初期高等院校调整时，国立剧专就併到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里去了。这位团领导可以说他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他是位年轻的老革命、老同志，经历过战争考验，有实际工作的经验，确实是刚参军三、五年的新知识份子们所万万不及的。另一方面，他却又有着一般老同志所不具有的高等院校的学历。在正常情况下，具有这两方面的优势，应该是更为人所敬重的。可这位却不同，他在一些老同志面前显得格外气粗，说起话来常喜欢摆弄几个艺术类的名词，以示与人不同。而在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面前又特则想摆老资格，有时还要卖弄式地唸几个外国戏剧家的洋名字，表明他的专业学问也不差。

他那张张扬扬的风格与我过去所接触到的老八路的领导人稳重谦虚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故而我到北京后，除报到时和他搭过几句话以外，和他较少答腔。在肃反运动中他作为领导人之一，本应管全团大事的，而他偏喜欢坐镇戏剧队，弄不懂为什么他会对我特别感兴趣，也许是他真以为他抓到了一条大鱼，也许只是为了在他的部下面前，显示所以每当小组批斗我的时候，他总是端着杯茶，拖着双鞋，很洒脱地过来一坐，小小的批斗会必然会引发一次又一次的高潮。他对我事事挖苦，极尽讽刺揶揄之能事，其他人时常被他说得掩口失笑。而作为审查对象的我，痛苦象一根粗糙的麻绳在拧着我的胸口，让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我觉得自己活像一个被涂了白鼻子的木偶，任人吐

唾沫，任人嘲骂。多亏那时的肃反运动，除了一部分被钦点的胡风分子被胡乱定罪以外，对一般群众的审查仍是要看真凭实据的。空谷来风原本就只是一阵风，人们想找一丁点对我不利的凭据，也徒然一场空。所以肃反运动结束后，当他每次看见我昂头走过时，常会露出满脸的扫兴。

但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虽然自以为聪明，但毕竟还不够精明，居然也会掉入了一个陷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在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中，军委总政也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举行了文艺座谈会，准备引蛇出洞。海政文艺部门也按照规定去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团领导，

大概是受了其他发言者的影响，或者是他太想展示自己了，当一些有过阶级斗争经历的老同志都缄口不言时，听说他在那次座谈会上洋洋洒洒地做了一次长篇的发言，大大发了一通牢骚。凭良心说，今天看起来有些意见也许是很有见地的，而他和所有的发言者都没领略这一类座谈会的真蒂，很快很快，当这些发言者还没来得及喝口水润润嗓子，形势已突然转变急转直下了。

我们这位团领导毕竟是经历过一定世面的，他也许是他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也许他在上级部门那里也已经受到了初探型或保护型的批判，总之，他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于是反右开始后，很长的一个阶段都看不到他端着茶、拖着鞋晃来晃去的潇洒姿态了。现在捉摸起来，大概也是在写检查吧。别的我不知道，但风向是可以品味出来的，如果再推不出顶替者，显然他自己就会变成被审查的对象，因为上面都有右派指标，他的确有些惶惶然了。

在这大风暴前的宁静中，我们夫妻俩和这位团领导一样都处于一种挣扎期待的状态，我们俩尽管在整风中没有什么言论，更没有大字报，但我们一到北京，就受了长时间的严酷的审查，团里的普通群众对我们的印象仍是一对政治嫌疑犯，在这种氛围中，有些人看我们很不顺眼，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言论，想要把我们当成对立面，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这位团领导呢，他倒是发表过一些所谓的“言论”，但他有机会在上级那里辩明他的是非，并力争能将功补过，所以他的言论材料，始终没有向群众公布。这是他的优势。这就是说，当不当右派，和有没有所谓的右派言论，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反右运动即将结束的最后六天，谜底终于揭开。海政文工团召开了全团性的大批判会，全团一百二十多名成员人人都得参加，而大会的主持人之一就是这位团领导。看着他那时又恢复了本色的得意形象，我知道他已从困境中解脱，而我和苏斐已成了他的顶替者，由他来主持对我们的批判，实际上就是让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声势是浩大的，在六天里，全团对我们夫妻二人连接开了八次批斗大会，几乎每次的开会时间都要长达三个小时左右，几乎每次参加批斗的人员都在百名之上。根据我保留了半个世纪的当场纪录，在会上作过长篇、系统的批判发言的共有 82 人次，另有 11 人次的临时性发言，加起来全部发言共 93 人次之多。最后做总结宣布给我们夫妻二人戴上右派帽子的，就是这位团领导。由于我们在整风鸣放时很少说话，找不到什么言论，我们的所谓反党材料基本上另另星星、七拚八凑拚组起来的。总起来说，就是我上次踩下的政治地雷，直到这一次运动方才引爆。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一段时期前前后后大大小小，批判我的会少说也有十几次，我注意到，我的那位老同学无论在哪个会上都从不开口，好似是有默契，那些运动积极分子们也从不点他的名，从不催他逼他对我进行批判。我至今仍猜不透，当他听着人们暴烈的言词如大雨倾盆而下时，他心里在想什么？是自豪还是痛苦？是得意还是愧疚？

我那位团领导终于在运动中脱身，但他毕竟有过‘言论’，反右后也受了处分而调出北京。过了若干年，当他再调回北京并在海政机关任职时，他早已锐气全消，从此，他非常低调，看来也不很得志。很可惜，前些年他也去世了，致使我想和他一起交流一下受了处分后的体会，也没有了可能。

六、看到了被扭曲的人性

说实话，比较起许多郭堡难友来，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员，在山西只待了 11 年，从 1969 年底开始，我在苏州有了自己的家。后来也遇过几次险境，但总有人良知未泯，往往在最后时刻，不肯再踏上一只脚，没有将我逼入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使我能健康地活到今天。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大家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以后，人们在道义上也有所觉醒，不愿将错事做绝，使自己将来没脸见人。而在 1957 年的反右时期，却不是这样，在巨大的政治冲击面前，人们很难自控，而品质上有缺陷的人，更是心怀恐惧，不顾一切地为求得自身安全而嫁祸于人。我的老同学和那位团领导就是此中的佼佼者。

他们两位都具有一定的文艺才能，从感情上说，我也不愿意把他们列为坏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两次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他们自身也陷入可怖的困境时，他们也可能不一定会想到要加害于我。然而在错误的政治运动的压力下，他们就会将正直、诚信、公正、善良这些人类的基本品德都会抛到九霜云外。我们都知道，发大水是灾难，发大水时想活命也是本能，然而为了想活命，就把别人揿下水，以夺取一块救生的木板，这种行为，可怜复可悲，可耻又可叹！

每当我们谈起反右等运动的不良后果时，但我们还不容易体察到这些运动在一代人的心灵和人性上所造成的扭曲和变态，我觉得这才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最深重最悲哀的伤害。政治经济上的损失，几十年可以补回来，人身和家庭的悲剧，隔一两代也会遗忘，但这种可怕的人性扭曲，这种残酷的心灵异化，也许是几个世纪也扳不回来的。

回想起过去的经历，我也并没有什么怨恨，我所感到遗憾的只是我竟没有机会和我那两位苦害过我的老朋友再谈谈心，让他们能了解和体察到别人被伤害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活是怎么度过的。看来，我只有在将来的天堂里(假如有一个天堂的话)和他们见面时，再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了。现在，只能希望我们的后人能接受这个教训，都能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应该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让这种无法、无理、无情、无义的地雷都能被彻底铲除，那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如今白发如银，回想起这二十多年艰辛岁月，回想起那些已去世的被整的和整人的同一代人，能不感叹！

附诗述怀

我不是第一个

周永熙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骑着疲惫的骆驼
想跨过中世纪的沙漠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仰望着飞瀑三千丈
解不了要命的干渴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整天磨损着自己的神经
用一把带锈的钢锉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扬起漫天的纸钱灰

却当作彩蝶飞过

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高兴的时候哭着唱歌

痛苦的时候笑着哆嗦

唉呀！我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呀

咬碎了我的舌头
依然学不会沉默

第二章　泥沼中的跋涉

情倾大坝　情伤大坝

定光强

作者小传：

1934年生。1949年12月考入广西军政大学学习，1950年4月入团，在该校文工团工作。1952年任放映员。1953年6月2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至1958年4月历任高级防空学校广播放映员、文化教员、助理员。离郭堡后分配至离石东关铁厂、离石县发电厂、离石化肥厂、柳林电业局当技术员。改正后，1979年6月任柳林电业局副局长，1984年任局长，1987年兼任党支部书记。1991年6月至2000年11月任吕梁地区电业局局长助理。曾获县和地区的劳动模范称号，并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地区优秀厂长(经理)，曾荣获山西省山区建设积极份子称号，并先后被记二等功、一等功各一次。

1958年4月18日晚上，我怀着苦涩与无奈的心情，离开了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修建的高级防空学校，政治部主任张卓之亲自带领几个处长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欢送”我们十三个人，由组织处干事李成林同志送我们到山西。

进到车厢里，只见里面全是和我们一样的身穿军装、没有佩带帽徽、军衔、领章的军人。李成林同志告诉我：这一节车厢是空军政治部向铁路局请求单挂的，专门用来运送空军系统内的右派到山西去的。我这才知道，原来这车厢内的一百多人全是“同类项”。

在高防校的十三个人中，除了孙苡乡、吴天南和我比较熟悉、过去到技术部采访，我曾经和周雨初有过一、两次交往外，其余的人我不认识他们。上车之后，任火车在夜色中行驶了一整夜，相互之间，不论私交深浅，都相对无言。列车进入山西后，夜更深了，穿不完的山洞一个接着一个，实在让人心烦！好像是掉进了无底深渊、黑咕隆咚地看不见一点光明。

那时的南北同蒲线依然是阎锡山时代铺设的窄轨铁路。因此，我们到达太原之后，必须换车。在等待换乘火车的时候，人们三五成群地走出候车室，到太原市内转了转。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这座城市是那样的冷清、陈旧、甚至是一种荒凉！下午，登车后继续向南前进。原来告诉我们在太谷县城下车。可是，到了临晨两、三点钟时，却突然

通知我们：要在东阳站下车。东阳是太谷县前面的一个小站，列车在那里只停留三分钟。大家立即动手收拾各自的行李。等火车一到站，除了打开前后两个车门以外，还把靠站台的所有的车窗都打开，一部份人从车门口、窗口往外递东西，一部份人在站台上接东西，不到三分钟时间，全部人马和行李都已到达站台。在逆境中，依然展示出了我们闻风而动的军人素质和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

初春的拂晓，晨风吹来仍有一丝寒意。东阳车站的站长看到一群“解放军”军官站在站台上，于心不忍。就把我们让进了候车室，并且很快拿来了已经点燃了的两盏马灯(那时，车站上还没有通电）。让我们一到太谷，就享受到山西人给与的光明与温暖。

天亮之后，有几辆马拉的大车和人拖的平车来接我们，我们这才知道，我们将参加修建郭堡水库。走了大约有十几里路，来到了为我们安排好的驻地北曲河村。高防校十三个人住在村头一户农民四合院的北房里。我们在麦桔上面铺上每个人的军用线毯。这就算搭好了我们的“窝”!

在北曲河住下的第二天，开会宣布.这批人的临时组织名称：太谷县郭堡水库北曲河村空军干部锻炼队。又过了不久，正式成立了锻炼大队。我们空军的一伙叫锻炼二队；大队长姓沈，副大队长一个是总政来的原中校周宏达、另外一个是我们高防校原大尉杨流芳，高防校的人编为第五班。耿开盛当班长，周雨初担任副班长。

刚参加郭堡水库劳动，大坝坝址上才只有郭堡、范村、胡村等几个乡的民工在那里挖坝基。指挥部让锻炼大队的人都在河滩上拣河砾石。每天的劳动量不算大，中午可以回村吃午饭，一天两出勤，其间还可以休息下来喝喝水。为时不久，大坝基础已经修好。开始须用大量的黄土倒在上面来夯实与修建。于是，工地指挥部又将锻炼大队调回大坝挖土、运土。

那时，虽然已经过了‘五一’,进入了初春天气。然而，大地上的土层仅仅是解冻了一尺多。地表层约 40 公分以下都还实冻着，用洋镐一挖一道印子，根本挖不下土来，后来，我们就采用在土坡下没有冻土的地方，一面向里面挖土，一面掏出一个深约一、两米，宽约三、四米的洞，然后，再在土坡上插上钎，用大锤使劲朝下打，这样一撬就是一大片。我们高兴地喊叫“放卫星啦！”

1958 年 5 月 6 号，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早上出工到工地后不久，事务长从王公村指挥部取来信件，在工地给大家散发。他递给了我一个小邮包，我看了一眼，见寄信的地址是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知道了这是蒋媛芳给我寄来的，当时就放在一边，准备等休息的时候再看。那时，耿开盛。刘效坤等同志正在土坡上面用大锤往下砸钢钎，计划

在休息前往下放这一批土。我那时刚从大坝上倒完了土回到大家挖土的地方，放下平车后，我抢过周雨初同志手中的铁锨来往车上装土，让他休息一会儿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又是高度近视眼。没想到，我和他们还没有将一平车的土装满，突然，"轰"的一声响、同时，恍惚还听到一些人嘈杂的声音，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苏醒过来，发现我正躺在施工现场一旁平日我们休息的地方，陈广、孙苡乡。刘效坤等同志、还有原来在空军医院的黄医生，都围在我身边。陈广告诉我：当我们正在装土的时候，面前的土坡上的一大片土，突然整个塌了下来，把装了半车上的平车打得老远，平车辕杆还打断了一条。同志们发现少掉了你，急急忙忙用双手刨土找你。附近几个班的人也闻声赶来帮忙。后来，还是黄医生跑过来之后说 ；"大家快用铁锨挖！即使碰出点点外伤也没有关系，抢时间救人要紧"。这样，才加快了速度把你找到。黄医生问我：你感觉怎么样？我说：就是左边小腿很痛。他让我抬了抬腿，又让我活动活动脚腕，见我的脚腕和五个脚趾都能自如活动。就说；"放心吧，腿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害怕的是你的头部、胸部和内脏会有什么问题"。孙苡乡告诉我，大家把我找到时，是有一张铁锨正好斜压在我的小腿上，锨把已经断成两节了。人们还说：幸亏那一堆土塌下来时，是先直接坐落到地上，然后才向我扑面压下来，这就有了一个缓冲的过程，若是土直接砸向我，那后果就比现在严重得多了！为了争取到一个好一些观察与治疗的环境，黄医生叫人借来了一扇门板把我抬到王公村水库指挥部，让我静静地躺着，他守在我的身边，经常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到了下午大约是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背上痛，而且一阵比一阵痛得厉害。黄医生让人把我搀扶着站起来，他把一只手平放在我的头顶上，用另外一只手在我头顶上使劲一击。我顿时感到脊背上疼痛得难以忍受，不禁"哎呀"的大叫了一声。黄医生忙说："坏了！脊椎骨上肯定有了问题"。他马上找到水库指挥部的王指挥，要求他把我送到县城的医院去接受检查和治疗。那位王指挥却说：不用到城里去！在这里就有一个在接骨方面很有经验的老大爷，一会儿把他叫过来给瞧瞧。这样，我们就只好在指挥部给腾出来的一间西屋里住下。孙苡乡在收工后来看我。他告诉我：塌下来的那一大堆土，我们二队的人，用平车向大坝整整运了一天，才把它运完。

晚上，果然来了一位年约七十岁的老汉。与他交谈之后我们了解到原来他是一个放了几十年羊的老羊棺。是没有少接骨，但都是为羊接骨，这弄得黄医生和我们啼笑皆非！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给治吧！老汉叫我趴在炕上，让陈广在炕上、我的头前面、从肩膀处将我的两只胳臂死劲抱住，他在地下握住我的两腿、来回狠命地拽、用力地抻。

更让我难受的是。他骑在我的屁股上，把他的两只手放在我的背上，用尽他全身的力气，在我的脊椎骨处，从上到下反复地锤打、揉搓。疼得我浑身出汗、直哀告他停手，我实在受不了啦。但他全然不理。黄医生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他说：老大爷、您累了！休息一会吧。他这才罢手。这一夜，对我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本来就已经很疼痛的身躯，被这位老人家折腾了将近两个小时，更疼得我整夜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黄医生再次与王指挥交涉，终于同意了一辆大卡车、将我抬放在车厢板上，向太谷县城驶去。了太谷医院，黄医生先进去联系好后，陈广同志就将我径直背到了外科诊疗室。刚一进屋，迎头就遭到一位姓董的女医生的训斥："你们怎么搞的？明明知道病人的脊椎上有问题，为什么还背着他？这不是要害他吗！"黄医生急忙向她解释说：我们没有担架，来的人又少，不能抬他进来。经医院初步检查，认为脊椎上有骨折可能，必须住院观察后方能确定治疗方案。

黄医生他们很快为我办完住院手续就返回水库去了。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住进了医院外科病房。病房内沿墙顺序放着六张病床，房子当中还放有三张、我就被安排在当中唯—一张还空着的病床上。屋内的病友，大多是折胳膊断腿的。其中有一个大约只有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在村里玩耍时，被人用一支猎枪朝他开了一枪，霰弹中的铁砂子有许多嵌进到他的头部、背部和臀部。我刚进院时，医生还没有给他取出铁砂子，他不论白天黑夜都在哭喊着，叫我觉得他很可怜。

入院的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了，确诊我是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医生当即叫护士将我床上的枕头、褥子全部撤掉，让我平躺在硬床板上，并且再三嘱咐护士："只能让他仰卧，不能在床上挪动，更不能让他翻身！"好难熬的几天啊，腰部疼痛还可以忍受，那睡觉不让翻身、不让动的滋味才真让人难受。我央告护士，求她们给我翻翻身，可一个个都说：医生嘱咐了不让你动！谁也不肯答应我的请求。

整个病房里的病号床前，都有各自的亲人在陪着，惟独我的床边是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朋友在我身旁陪伴着我。内心的那份伤感、那份烦躁、那份孤独，向谁去诉说？我至今忘不掉的是，就在我生活不能自理、孤独无助之时，病房里面有一位平遥籍的护士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快慰。可惜我当时没敢问她的姓名，按那时病房中的习惯，照护士们白大褂口袋上面的标记，喊她"六号"。当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时候，每一餐饭都是她过来给我喂着吃，即使不是她值班，也必然准时过来招呼我吃饭。而我躺在床上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更是麻烦的事，依然是她、这位"六号"护士，不避嫌、不怕脏、不说累地足足照顾了我一个多月。那时医院的病房的设施还相当落后，

为了方便病人晚上有事要喊值班护士，就在病床四周转圈挂了一条绳子，直通到护士值班室，与挂在那里的一个小铃铛系在一起，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也用一条绳子与挂在房间中的总绳子连在一起。这样，哪个病人需要叫护士，只要拉一下自己床头的绳子，护士那边就可以听到铃铛响了。“六号”护士还专门嘱咐我在她值夜班时，如果我要喊她帮忙、就拉三下铃铛，她就会知道是我在叫她。多亏她这样细心、耐心地伺候我，直到我能够下床走动为止。我心里很感谢她，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年伤痛住院的情景时，我还会想起这位“六号”护士的亲切的身影。

在病床上躺着无聊，想起了在工地时事务长交给我的那包蒋媛芳寄来的邮包。我请护士帮助剪开它一看：原来是她把她保存着的我以往写给她的信全部退还给我。用意很明显：关系到此为止！在病床上，我冷静地回忆这半年的初恋：它来得太突然，但又太过于痴情。至于蒋媛芳，一开始她是那样的热烈、那样的不畏人言，那样的执着追求，现在突然来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我不想以此来评价她的为人。起码我和她还是普通的朋友吧！就是要断交、连普通朋友也不想做了，写一封绝交信也是应该的！我反复想了几天，就请“六号”护士代我给蒋媛芳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并且也将我受伤住院的情况在信上对她讲了，我知道，她不会回信的，但是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同时，也是请“六号”护士代笔向武汉我的家中以及高防校政治部各写了一封信，将我受伤住院的消息分别作了报告。

我在硬板床上躺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医生决定为我治疗。当天，护士们把我抬到手术室后，一位医生用绷带将我的两只手捆住、让我高举两手，将我两脚不离地地吊住，且叫我把头抬起并向后仰、双脚挺直蹬住地面、身体尽量朝底下趴，使腰部向下凹。这一切就绪之后，董医生和另外一个男大夫用石膏绷带从我的双腋下到双胯以上来回缠了十几道。然后，放下我的双手叫我坐下，然后，由董医生拿一把手术刀在我的肚脐上下割开一个直径约有八公分的洞（让腹肌能够自由活动，便于呼吸）。整个手术历时两个多小时。童医生对我讲：这下给你用石膏背心把你的胸椎固定住了，你要安静地在床上再躺上两个月，千万不要乱动。

手术之后不久的一个中午，病房里走进末两位军官。原来是李成林和保卫处的石玉山代表高防校的领导专程从北京来看望我。李成林讲：学校领导收到我以及孙苡乡的信。知道我不幸受了工伤，很是关心重视，特意委派他们两人来慰问我。还带来了一封上端端正正盖着四四方方高级防空学校政治部关防的慰问信，小李子说，在他们临走时，李赤然政委对他讲：这次把定光强定成右派，真是“挥泪斩马谡”啊。其实，他是一个

很精干、也很有才华的年青干部。为人品行不坏，不论是在肃反运动还是在这次整风反右运动里，对组织上谈问题都是实事求是、从不顺竿爬 ，也不胡说八道。很可惜呀。我听了这些话，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孤独一人在医院里住着实在无聊，尤其是同屋的病友都有亲人陪伴在身边，而且还常常有人来看望他们，自己越发的烦闷。当我能够下地走动后，就多次向医生提出请求准许我出院休养的要求，但都遭到医生的拒绝。在六月初的一天，队里的事务长进城办事，专门绕道来看我。我立即借势又向董医生提出要出院："今天正好有人来。现在水库施工忙，人手少。如果以后出院还要派专人来接，那太浪费人力了。还是让我今天走吧!" 医生经不住我再三的哀求，最后同意我当天出院。但是，他告诉事务长，带我去之后，千万要叫我好好休息、不要叫我到处跑。回到驻地，我还真是安心地休息：白天，当大家上工走了以后，我就静静地或躺在地铺上、或坐在房东北屋前的石台上看书。同班的姚蕊宾带来了两箱书，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我看了"简爱"、"红与黑"、"安娜卡列丽娜"等名著和狄更斯、杰克伦敦、契柯夫等人的著作。到傍晚 ，同志们收工回来后，大家在一起谈今论古、有说有笑，人也并不觉得孤单寂寞。

但是，当开始修建大坝上的水塔和涵洞时，见锻炼队的同志们正昼夜不停地轮班在大坝上浇注涵洞与水塔。那时，水库工地上没有任何的机械施工设备，因此，无论是水泥、沙石过秤，还是清洗青石、豆砂，甚至连劳动强度最大的搅拌混凝土，都是靠这批年青的右派用双手在铁板上"三翻、九遍"（即：先把经过清洗的青石与豆砂相混合时，用铁锹翻三遍：加进水泥后又翻搅三遍；最后，倒入适量的水后再搅拌三遍），再倒进绑扎好的钢筋里面。在那一段时日里，同志们不论白天还是深夜，为了抢进度，三个队每天两班倒上工，每班上十二个小时，人人脸上、衣服裤子上到处都沾满了水泥泥浆，面容憔悴，疲惫不堪。有许多人，一放下手中的工具，躺在地铺上就睡着了，往往连饭也不起来吃。然而，一到了工地，他们个个又都生龙活虎，宛若换了一个人，大家将最好质量、最多数量的混凝土，连同自己的汗水倾注进大坝。我被这样紧张而充满激情的劳动所感染，不愿也不能再置身于这股洪流之外，我想到工地去，但我那时还走不了那么远，思来想去，终于让我想到了去炊事班去帮厨。炊事班原有四个人，分工烧饭、做菜及担水等，我刚到伙房时插不上手，只能干干轻活，任务是给一个个切下来的面团称重量，那时，每人的定量是两个三两重的馒头或窝窝头。我从称面开始，逐渐的可以帮忙拍窝窝头、切菜。一开始，队里的干部和同志们看见我在伙房帮厨，都让我休息，逐渐地看习惯了，甚至把我也看成了炊事班中的一员。我虽不能上工地，但每天劳动的

队伍一回来，我就在各班收集当天的新闻以及劳动中的好人好事，并在大家吃饭的时候，及时手拿喇叭筒向同志们广播。还有一些材料就组织刊登在黑板报上，“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时，还参加编写墙报，出庆祝专刊。

进入盛夏时节，为了防止洪水到来给还只有八、九米高的大坝造成威胁，太谷县委从外地借了轻型铁轨和“V”型翻斗车送到水库工地，由锻炼大队的同志负责安装与使用。斗车运土使每天运送到大坝上的土方量增加了好几倍。但是，挖土、装土的劳动量也大大增加，人力严重不足。我有一天试着跟随送饭的同志到大坝去看了看，到了晚上，我就向队干部提出，我可以到工地去管道岔，这样又可以腾出一个健康的全劳动力去挖土。运土。沈队长再三问我是不是能够坚持每天参加，我说：“没有问题！”

到了我有六七十天没见到的工地，从山坡上就能看到大坝上红旗招展，人声沸腾，那些拉平车的，把一车黄土堆得高高地冒了尖，活像拉着一个大窝窝头。从山坡上拉着土朝大坝下面跑时，有的人还借势扬起车把，将自己的两只胳膊压在平车的辕竿上，使整个人被悬空吊在平车上，双脚离地，依靠惯性向大坝上飞快地冲去。这边轻型铁轨上向大坝运土的“V”型翻斗车每一节都像一座小土包。每四节或者五节连接成一列、由锻炼队的一个同志（王宗壁）站在两节斗车的中间押车（大家都亲昵的叫他们“司机”）每当满装黄土的列车轰隆隆向大坝下驶去，头车上插着的小红旗迎风呼拉拉地飘扬，押车的人昂首挺胸地站在车中。这些场景、这样的画面、能不感染人，能不叫人激动！

我很快也投入到这火热的劳动洪流之中。说起来我的劳动量并不大，事情也很简单，唯一的任务就是管好道岔。发重车时，将道岔搬到左边，让满载黄土的列车朝大坝方向驶去；当空斗车一节一节被推上来时，赶快把道岔搬到右边，让空斗车安全到达人们挖土的地点，继续给斗车装土。另外一项任务是统计：把每天运送了多少车土、发了多少列车，都统计出来。

统计的事好办，我在头一天就把统计表格打好，发了多少列车、其中三个队各是多少列、运了多少车土、其中各队又分别是多少，到第二天劳动时逐项统计好，到收工时将全天向大坝运土的总量汇总起来上报给水库指挥部。另外，再把三个队在当天各自发了多少列车，向大坝运送了多少方土，也分别统计出来，作为劳动竞赛的考核成绩予以公布。优胜的队就把流动红旗抗走。扳道岔的事，看似简单，但操作时人的头脑必须十分清醒，要时刻清楚地知道：这一扳动是发重车；那一扳动是接空车。如果思想捎有疏忽，精神不集中，把道岔扳错了，让重车跑进了正在运送空斗车返回的铁轨上，那就会发生空、重车相撞，车翻人伤（亡）的重大事故。再有就是：扳道岔对一个身体健康

的正常人来说，只不过是弯腰曲背、举手之劳的事。但对那时的我来说，身穿石膏背心，要做弯腰曲背的动作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因此，每次扳动道岔，我都必须跪在地下，用一只手压在自己的石膏背心上，用另外一只手去扳动道岔。那时，己是炎热的夏季 ，推空斗车的许多同志， 脱下了身上穿的唯一的一件单衣，光着上身，把衣服垫在自己的肩上顶住斗车朝坡上推。在烈日的暴晒下，我头上、手、腿上躺下的汗珠，自己能够擦掉，但在前胸后背上的汗珠、尤其是后面，真正是“汗流浃背”，而我对它们却没有一点办法 。往往使我由难受而产生一股烦躁的心情。但一看到大坝上装土运土的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听着平车的咿呀声和斗车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不由得就感染了自己，使自己受到了鼓舞。

太谷县委又给水库调来了一支有二三百个犯人的劳改队，不知道各队指挥部是不是有意的把这支队伍恰巧安排在我们锻炼队劳动的对岸，无形中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为了维护我们的尊严（我们哪能容忍人们把我们与劳改犯等同看待？），大家憋足了劲，要在劳动效率上大大地超过他们：砍土、铲土的动作频率加快了；铁斗车的土拉得多跑得快了，卸土的不等来的列车停稳就把连接斗车的铰链拔开，卸掉鱼尾板，迅速将斗车一翻，只用十几秒钟就把车里的土铲干净。对岸的劳改犯们中午还要停下劳动吃一餐饭，而且还可以看见他们或躺、或坐的在休息、抽烟。而我们为了多运土，主动取消了休息下来吃饭的惯例：推空斗车的同志，一只手扶着空车用自己的肩膀顶着朝坡上推，另一只手拿着炊事员递过来的馒头或窝窝头，一边小跑着推车，一边啃着嚼着；挖土、装土和卸土的人就抓住斗车走了的短暂空隙时间吃上几口。这样的干劲，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群忘我劳动、干劲充沛的人，竟是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份子”，啊！历史的悲剧！

国庆节之前，我趁事务长到太谷县城办事的机会，跟随他进城，到医院去卸掉了我身上的石膏背心。去掉了穿了三个月的它，思想愉快极了。刚卸下来的几天，人觉得走路轻飘飘的，还不大习惯。但生活、劳动都轻松自如，与健康的人一样了。当然我也知道，我头上还有帽子，我心上还有重压，当水库修完以后，我前面的坎坷之路还很长很长……。

郭堡忆怀　徐培深

郭堡屯　王公村

水库工地人纷纷

石头硬　黄土沉

手指破裂腰腿疼

受此折磨为何因

夜间转侧难安枕

次早起　带个馍

整队出发重上坡

又是笑　又是歌

心中酸悲对谁说

蓝蓝湖面荡清波

几人知我苦和乐

往事琐记

古惠登

作者小传：

1932 年生。1950 年冬参军，先后就读于四野后勤干校俄文队，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解放军大连俄文专科学校；1955 年调海军旅顺基地任军事翻译；来堡前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工作；离堡后劳动和提任中学教师，改正后于 1984 年调回原籍广东任教；1993 年退休至今。

超　生

我是命途多舛的人。五七年在北京海军司令部蒙冤后，即被发配山西，从此年年挨斗，岁岁遭批。六二年摘帽后调任中学教师，仍以摘帽右派身份频遭劫难，备受煎熬。至大革文化命时期，游街、高帽、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其极。七〇年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开除公职，从山西打发回广东农村务农。一个饱经苦难的文弱书生要靠工分养活妻子及五个子女，其苦可知了。

村中有一个长工出身的人叫阿乔，他又红又赤，是专斗“阶级敌人”的打手。土改时分到地主的高堂大屋，得意忘形，飞扬乡里。地主之子阿旺，解放后即与家庭划清界线，毅然步我后尘，投笔从戎，既驰骋于血与火的朝鲜战场，又转战于热带雨林丛中的越南战场，赤胆忠诚，战功赫赫，文革时曾携妻儿回乡参观，照了几张故乡的风景相，阿乔见了竟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连续请人写了几次匿名信告到部队，污蔑他到处照相是想反攻倒算，结果部队只好让他转业了事。

生产队长见我不谙农事，手无缚鸡之力，就安排我当守林员。从此，我日日上山迎朝阳，浪迹于山水之间；傍晚送落日，苟延于竹棚茅舍之下，妻贤子肖，虽无衣无，倒也清闲度日。

摘帽右派竟能如此安闲过日，阿乔心里着实不甘之至，但他不是干部，奈何我不得，只能像阿 Q 似地愤愤然而已。有一次，我见社员们农间在大树下休息，也下得山来凑过去听他们聊天。其间，阿乔阴阳怪气地对我说：“你一个大学生，一个海军军官，也有今日。你现在已被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了，嘻嘻！”我心里猛被扎了一下。接着他唱出两句当地的山歌：“大风吹落阿鹊（喜鹊）窠，怎么跌杈（落难）这样凶（惨）啊！哈哈……”

我在辗转挣扎和浑浑噩噩中熬到了七五年。一个山岚雾重清爽宜人的早晨，我正

出发巡山，在涧边洗菜的他突然叫住我说：“阿惠，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还有什么出头之日，现在你真是打落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了，懂吗？嘻嘻。”我心里也发恨道：“走着瞧吧！世界不会永远黑暗下去的，极左路线完蛋之日，便是人民出头之时！”但，这话只能埋在心底。他见我清静得如闲云野鹤，便万分不乐意，我虽蛰居“地狱”，他也要不时刺激我，让我不得安生才舒服。

不料，风水轮流转，年底到我家。一封复职函从山西送到我手里，我终于结束了五年半的农民生活，终于离开阿乔的“十八层地狱”，终于脱离苦海，回到了我热爱的教育岗位。七九年回北京海司平反昭雪，重新发了海军衣服。是年底，我回广东接大儿子时，一身军装，阿乔见了说：“阿惠，你现在就好了哩，真没想到啊！”语气中充满妒意和无奈。原先视我如草芥的公社书记拉住我的手对人说：“我早就看出阿惠是个人才嘛，如果不是反右，早成出色的外交官啦，哈哈……”我无言以对。

我行也直，站也正，“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他们那种见人跌杈（落难）就高兴，见人风光就眼红的心态是各阶级各阶层都有的，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是人的一种共性，是不分贫富阶级的。

回首这段往事，百感交集，嗟叹不已。正所谓“人情似水分高下，世事如云任卷舒”啊。

相逢一笑泯恩仇

1958 年 4 月，我从海司被发配到山西，经二十一年炼狱般的磨难，1979 年 5 月返回北京海司，仿似前度刘郎，又似天外来客，江山依旧，人事已非，感从中来，愁肠百结，有诗为证：

花自漂零水自流，千回百转又重游。

已非人事肠堪断，故人不见使人愁。

昆明池水已经秋，西子湖边忆旧友。

何当共剪西窗烛，于无声处又添愁。

徜徉在昆明湖畔，徘徊在天安门前，除故旧好友外，想得最多的是整我、斗我、坑我、害我的元凶刘处长和帮凶协理员老盖。我一定要见见他们，让他们知道，我虽被你们弄得失去了一切，但我还有一副铮铮的硬骨在！

一天上午，在海司宿舍楼我找到了老盖。他已五十开外，形态痈肿，颜面无光，目光呆滞，行动迟缓，在错愕中请我入室坐下，用颤抖的双手给我倒茶。当时我四十六

岁，面目黝黑，形容枯槁，胡茬满脸，似人似鬼，远非当年英俊潇洒的古翻译可比。他老婆认出我后责怪他老公道："老盖，造孽啊，你看你们把古翻译整成什么样子了啊!"接着又问长问短，关怀备至，非留我吃饭不可。席间她又出人意外地说："老盖，其实真正的革命者是他们，不是你!"我忙道："大嫂，你言重了，那是时代造成的，老盖也是受害者啊。"饭后，老盖又带我重游了我曾经熟悉现又陌生的海军大院，介绍了文革时惨绝人寰的打砸抢事件，令人不禁唏嘘称叹!

刘处长已调国家海洋局任局长。第二天 ，我去东长安街国家海洋局找到了老首长。他从电话中听传达室说有个老部下古某来访，他随即请我到他办公室去。我一进门，他急步迎过来，抱住我 ，又用双手摇着我的肩膀说："惠登同志啊，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呢 ？我好想你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心想，你亲自把我整到山西劳改去，怎么倒先问起我来了？接着他又说："文革时我坐了八年牢，在牢里回忆往事时我才认识到，当年把你打成右派是完全搞错，极左路线害死人啊！惠登同志 ，我对不起你啊!"面对如此出人意料的高姿态，如此感人肺腑的真情，铁石心肠也会溶化的。 我激动地满含热泪说："老首长，那是时代的错，我不怪你的，我只是怀念你多年对我的关爱和教育啊。"现在他已九十多岁，前年过年时我还打电话向他拜年哩。当然，他高兴地接受了我衷心的祝福。

去年夏天，山西一位四十年前的熟人，趁来广东旅游的机会，专程来东莞看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无任欢迎的。然而一见面，他的老婆竟是当年文革时参予挑动红卫兵整我斗我的女教师程某某。言谈中得知她前夫于文革后被车闯死亡，后嫁给了我这位熟人。唉，她也受到了天理的惩处了，过去的已成过去，何必再眷念恩恩怨怨呢？于是，我拿出东莞人特有的热诚，盛情地款待他们两天。

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得饶人处且饶人；心高天地阔，万劫五行中，于是乎也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天道无情，物极必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天道轮回，世局日新，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什么舵手所能左右的。

七〇年七月起，我被开除公职，遣返广东农村务农；直到 1975 年 11 月，叼邓公福荫，才回山西复职，在农村前后共历时五年半时光。在这短暂却又漫长的时日里，我深深体味了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滋味。请看看当时我一家七口两个劳力的全部收入表：

时间	全年实做工分	劳动日工分值	折款数（元）
1970 年	700	0.27 元	18.90
1971 年	1900	0.38 元	66.50
1972 年	2000	0.34 元	68.00
1973 年	1800	0.20 元	36.00
1974 年	1700	0.23 元	39.10
1975 年	2500	0.15 元	37.50
1970-1975 年合计			266.00

那时节,大革文化命，硕果累累，战绩辉煌，该打倒与不该打倒的都打倒了，该清除与不该清除的都清除了，“社会主义好”响彻云宵，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啦，什么“莺歌燕舞”“遍地英雄”啦，真似个人间天上。但，现实却严酷得不容一丝篡改。七口之家五年半中夫妻两人无日无夜地劳作，才换来 266.00 元的收入，叫我如何度日？！这是莺歌燕舞的天堂么？这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乐土么？我不骂娘那简直不是人了！铁的现实只能证实一个事实，这个社会是阿乔所说的真正的“十八层地狱!!!”（铁杆贫农语）

物极必反。一切违背天道的东西都会消亡的！这就是公理，这就是民意，这是历史的必然！

1984 年 6 月，年届五十的我，叶落归根，调回东莞中学，乘开放改革的春风，过上了真正“一天天好起来”的幸福生活。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基本上年年带高三语文，真是“夜夜挑灯日日忙，铺罗织锦绣文章”，送了一批批莘莘学子上清华北大和其他大学，不少已成为县市领导或科技人材，我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奉献。退休后又改行为市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的档案现代化管理贡献出了我一份力量，五个档案室全部被评为省特级单位。在生活方面，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时我住的是竹寮茅舍，形同乞丐；现在，除了教育局分给我一套 90 多㎡福利房和学校给的一套 110 ㎡新房外，又住上了一幢自建的洋房，女儿早买了轿车，稍后小儿也快买入一部，现在的我，妻更贤子更肖，年方七十一便做了太公，逢年过节全家在酒楼设宴时，老少二十六人，熙熙攘攘，四代同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也许，许多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老难友都在关心我的退休金问题，我可以吐气扬眉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大家：五千有余！

我天生就不是歌德派，炼狱又把我铸成一块屈钢，追昔抚今，我不能不为开放改革放声歌唱！然而，我不能不打住，且听我道来。最近我陪北方友人在东莞参观多日后，他惊叹道：“古老师，如按你东莞人生活水平看来，你不过相当于‘贫下中农’”啊。我笑道；“然也。我虽月入五千，只不过停留于贫困线的水平而已。”所以，老夫仍须努力，奋力拼搏，待实现小康、中康或大康后再纵情放歌不迟。

愿沉痛的历史不再重演

杨国威

作者小传：

1935 年生。1951 年参军，于空军十航校第五期毕业，曾任航校军械维护系中尉教员，离开郭堡后，曾在山西祁县轴承厂、农具厂等地劳动、工作，后在锻压机床厂负责技术室工作。曾多次获厂先进工作者及生产标兵称号。改正后调南京曙光厂工艺科任技术员，退休前在南京钟表材料厂技改办任工程师。

1957 年 7 月中旬，全国整风运动进入鸣放阶段的后期，我所在的空军十航校也正处于鸣放晚期。那时我刚休完一个月探亲假返回部队，我所任教的军械维护系正分组提意见。其中老教员座谈会已进行了两天，我觉得经训练部党委同意组织的老教员座谈会，其意见更易引起领导的重视，就参加了这一座谈会。

由于我参加十三期军械维护系教材编写工作，五月份我们一行俩人出差到空军五师，二十三师了解部队对地勤人员的实际工作要求。到沈阳八航校时，见到同班毕业于十航校的八位校友。在战斗部队参观学习时，又遇到不少同学，并受到热情接待。6 月中旬我探亲回南京，路经济南，见到毕业于济南师范学院刚工作一年的同班同学 。在南京也会见了在海校学习的早我半年参军的同班同学。从南京陪母亲去福州看望大姐，途经上海华师大，见到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四位男女同学，并和一位刚毕业于林学院在上海实习的原同班女同学相伴一道回福州。在福州回到了母校也见到了留校任教的老同学。从五月份出差到探亲，处处使我感到友情的温暖和年青人的热情，大家对新生活的热爱，使我心中充满了阳光，在这一心情下使得我刚回部队时，更加懂得和珍惜同志间的战友情谊，在我 57 年 7 月 19 号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一切批评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改进工作，帮助同志，实事求是的以事实为根据，使对方接受为原则，从前我系就是因为以斗争歧视代替同志式的批评和思想教育，使被批评者得不到温暖和鼓舞，因而团结友谊气氛就不浓。”我自己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参加整风座谈会的。我于座谈会上发表了以下两点意见：

首先，我提出关于秦钢同志的问题。肃反时他是被审查的重点，主要审查他在抗日时期作为流亡学生，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的事。他本人一直否认，组织上也未调查出任何有关依据。就这样捕风捉影地审查了一个多月以后，依然没有结果，只得将问题挂

起。肃反后大家均授军衔时，就泰钢轮不上，他因此情绪较低落 。肃反时我是系里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直接参予对他的审查，当我和他分在一个教学小组后，我作为小组长曾同他谈过，我说他当时年龄很小，即使参加了三青团 ，在那样年龄下，也只是一般历史问题，交待清楚就行了。但秦钢回答说他的的确确根本没有参加过，我以为秦钢的话是可信的。肃反结束后这件事还拖了一年多，秦钢才被补授少尉军衔 。为此，我提出意见，指出肃反运动中的领导们心中无底，主观臆断，使一些同志无辜遭到怀疑；再加运动期间，在审查过程中，还出现过拍桌子瞪眼以势压人的情况，但运动结束后，领导又未诚恳做好善后工作，因而伤害了一些同志的革命感情，我认为应当接受教训。（秦钢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后获改正，现离休。）

第二，当我是一名新教员时，任我教学小组的组长是党支部委员吕昆岱，他是一位任教多年的老教员。有一次实弹射击，在校靶前一日，应将选用的飞机和机上三门炮擦拭检查好，我和吕都是校靶课的老师，选用的飞机武器擦拭检查的实习课，由他和我各领导一组学员进行。第二天校靶课全班集中在所选用的飞机上，当飞机由机场拖到靶场，正式实弹射击时，仅发射几发炮弹，就有一门武器无法装弹，经查看我已清楚问题出在气压筒前端垫圈上，当问及负责擦试组长时，回答是擦试完毕安装好武器，在下课前收拾工具时，才发现煤油筒内遗留下垫圈，已将垫圈交吕老师。我当即令他骑车回校找老师（吕本应随同上课，但因洗澡未到）因校院离靶场尚有一段距离，等拿到垫圈，吕也同时赶来。按装好后，继续校靶课，时间拖了近两个小时。机场值班向上汇报了此事，这也成了全校一次重大教学事件，我也很气愤，在系里为此召开的会上曾猛烈评击吕的行为，吕为此作了检查，批判了自己，此后，他再也不是党支委了，在全校也受到点名批评。当我这样航校五期毕业的留校任教的教员都被提升为中尉后，而作为航校二期毕业的吕昆岱这样的老教师，却仍是少尉军衔，这使他感到总难抬起头。我过去对他的批评是很尖锐的，那是为了对工作负责。但我同时认为一个人既使犯了错，也应对他关心和爱护。所以我在座谈会上提出，吕是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党员，老教员，犯了错误，已做了检查，还是个好同志嘛！不要一棒子打死。由于鸣放初期吕对支书提了意见，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这时我发表上述意见，自己竟毫未意识到会刺痛系支书，这给我自己走向深渊埋下了伏笔。直到进行反右斗争，在批判我时，这位以党的化身自居的系支书在会上说“你竞敢给吕××鸣不平，说他是好人，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现在部党委已研究确定（当时他是部党委委员）吕是右派份子。”（吕被航校第一批划为右派，尚未公布。）这话确实使我吓了一跳，原来我认为经过多次运动，大家都是历史

清楚，参加革命时都很年青，都是革命同志，系里根本不可能有右派份子，运动主要是一次思想教育，而现实和我想法完全两样，我觉得自己失去判断能力了。

鸣放尾声，系里召集骨干研究下一步重点对象，我是团小组长，也参加了研究，内定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也基本清楚，但我仍认为应以教育为主。

后来在按上面印发的讨论题开展讨论，当讨论到“十二个副总理都是共产党员是否是党天下？”时，组内没有人认为是党天下，我在发言中说：“我们党选拔干部是要求德才兼备，担任副总理这样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当然要求更严，而严格要求德才兼备的人，必然是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人，是共产党员是正常的自然的事情，怎么能说是党天下呢？如果说党外确有附合要求的德才兼备的人，当然也是可以担任的，这并不矛盾。”这一基本被接受的意见受到一位党员反对，他提出国家领导职务，必须是党员，非党人员是无资格担任的，我提出这样说法不策略，因宪法上在国家主席一节中有年满三十五岁公民享有被选举权，支书想结束这一讨论，开始时提出我认识有问题，我不同意使他生气，从而说我立场、观点有问题，我也被激怒了，心中认为支书爱用大帽子压人，当时我年青气盛控制不住情绪，就在会上表示：“别用大帽子压人，我参军七、八年没犯什么错，不怕大帽子压。”并说：“作为系领导自己不学无术，业务水平不高，对组织要求的示范教学，未能作好，处理问题总是压制别人。”我这一态度引起震惊，书记满脸通红，宣布休会。此时我仍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只感到自己太不冷静，意见过于激烈，会影响今后工作。谁知两天后铺天盖地批判我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而且分组讨论人员作了调整，我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了。

当时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会上有人已按指示精神有意引导提问：“你是否认为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国防部长必须是党员的提法不对，认为公民都有担任这些职务的权利？”我则表示除部队是党的绝对领导，国防部长必须是党员外，其余国家领导人，非党员也有被选举的权利，但我不认为有谁可以担任。如认为非要先获得党员称号，并不附宪法规定的原则，也否定了有党外布尔什维克。有人要我举出谁能算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我提出像过去的鲁迅，现在的宋庆龄，郭沫若。这一辩论的最终结局是：我被定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必须要共产党员担任。概念被偷换了，罪名也就成立了。结论中将我座谈会上的意见归纳为：反对肃反运动，攻击肃反运动斗争形式，说运动中拍桌子瞪眼，攻击校五人领导小组，说领导心中无底，并为肃反重点鸣不平。站在右派分子立场，为右派分子喊冤叫屈，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等。一纸罪状使我在年满二十二岁时就从光荣的革命军人变为右派分子了。

虽然我受到的是降级处分，被保留在干部队伍中，但分配到工厂后是被监控的，节假日的行动范围是受限制的，直到 61 年，我在祁县轴承厂参加生产劳动期间，因我在车工岗位上革新工具，生产一直超额完成任务，且在十道工序上创五道工序的日生产记录，在国庆节时被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方获自由，可请探亲假回家，在 62 年，我因不服 57 年结论，写了申诉。

摘帽后我调县农具厂工作，不久县工业局长因不满县里一些领导作风，而主动要求到农具厂任书记，此人是工人出身，也是位难得的实干家，精通铸造，来厂后挺看重我既会车、钳、铣、铇的操作，又能为当时生产的一些农业机具绘制机械图，如设计过切草机及电动水车。在 63 年调级时，在他主持下通过职工代表讨论给我定为 6 级工，工资由 40 元提为 57 元，相当于由行政 24 级提为 21 级的工资，在其支持下，我于 64 年为厂引进了新产品空气锤的生产。这在一个生产农具的小厂，厂内除一位木工师傅及少数机加工师傅略懂一点机械图的情况下，要按图制作铸件模型及按图加工是相当艰难的，而要上马新产品，首先要绘出全套产品图纸，且要设计出用于加工机身这样重达千公斤以上大件的专用设备，制作必要的加工工艺，这些在厂内别无技术人员情况下，只能靠我一人完成。在制作大型机身铸造模型时，刚下达图纸才一天，木模师傅就拿回图纸交还我，表示不能完全看懂，无法制作，于是我到木模车间为他讲解图纸，同时为了弄清所做的模型是否正确，我也要学懂铸造技术。在制订金加工工艺时，要保证气锤运行，需提出正确精度等级及同心度要求，为了保证产品加工质量，对主要零部件加工我一直跟踪，并亲自检查验收。当时厂内、外一些人，认为在一个仅有百人且设备差的小厂，要生产出只有正规机械厂才能生产出的空气锤是妄想。因而当生产出第一台空气锤安装好，正式试锤的晚上，厂内职工几乎全都围上来观看。而气锤的击打声也确实鼓舞了他们。这一产品很快受到许多生产农业机具的小厂欢迎。销售由地区到全省，发展到全国，后来还有出口，产品的品种由单一上升为四种，成为厂的主产品，人员也增加到三百多，成立了技术室。而厂因此被省重工厅列为关注重点，厂名也改为锻压机床厂。

64 年四清后，厂里换了一位完全不懂生产的政工干部任书记，文革中我是这位当权派用来大搞阶级斗争的批斗对象，这样既能说明其自身紧跟形势，又能防止群众斗争烈火烧到自己身上，我 62 年申诉，成了文革中现行罪状。当时领导感到在一般工人群众中难掀起斗争高潮，就发动了不了解情况，刚分配到厂的大学生，和刚进厂的复员军人。其中一位被当地人称“二憨子”的复员军人，总是在开会时被高音喇叭喊到前面，果然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就被他用 6 毫米钢筋抽打左臂，直到我毫无疼痛感觉。会后，

手臂发烧，我脱下衣袖发现手臂已肿，且完全变紫了。像掛牌游街，掛牌拉车，拉车时后面跟着人还故意扬着鞭子等，这类人身摧残我都经历过。到 71 年清理阶级队伍，因这位书记群众威信太低，又调入一位政法部门的法院院长来厂任正职书记，其人和原工业局长矛盾较深，那时县里将曾在我厂任过书记的原工业局长当重点批斗对象，组织几个厂联合到我厂开批斗会，我就成了陪斗对象，用来反衬这位领导是唯技术论，重用了像我这样坏人，但这位被斗领导兄长是烈士，本人出身工人又是实干家，无政治问题，最后仍归要解放，可我背着 57 年被划右派的包袱，最后又被重新戴上帽子，工资降回40 元，本计划将我发配农村，因中央政策提出对具有真材实学，在单位确实有用的要留用，方被免于赶到农村。到抓革命促生产时，在群众要求下，我被调回车间一面劳动，一面做些技术工作。到四人帮被打倒后，方正式调回技术室，撤消文革给予的处分，恢复63 年调级后工资待遇。究其原因就是因 57 年的历史，它成了我洗不清之罪源。直到79 年，中央拨乱反正，事隔 21 年后，我才被改正，落实为没有右派言论，恢复军籍，补发转业证，恢复原行政级。可是 21 年来，我是按行政降三级领取工资的，一直是被监控，低头做人的右派，61 年后也被看成是摘帽右派而并非是转业干部，这些并未有补偿，但当时为能恢复历史原貌，自己是真正的转业干部而感激不尽了。

回想 57 年我仅按宪法规定理解公民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就被定成反党，而当时我所提到的宋庆龄，在二十多年后，确实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我真不知那些自诩为真正左派的人会作何感想，至于加给我的所谓给右派分子鸣不平的人，他们当时是革命军官，而后来强加给他们右派之名也都被澄清，现在是离休干部，当然我被连带之罪不能成立。但我为此付出了人生最珍贵的青春，满怀壮志要为空军事业做出贡献成了泡影。后来的二十多年在一个小厂做技术工作中，为厂引进新产品，为加工新产品先后革新二十多种专用设备，从 61 年摘帽后到文革，每年都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使我颇受教育，也最出我意料的是，文革中我那么被批斗、游街，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的生产评比中，群众在全厂大会上提名评比标兵时，竞以压倒优势评我为生产标兵，而且后来又被地区主管局评为科技先进，这些总算在感慨万千中获得一点慰藉。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祖国建设事业日新月异，飞速发展，我欣慰的是在我走向老年时，能以一位真正技术工作者身份参加祖国建设事业，而不再是一位摘帽右派，整天提心吊胆被领导拿在手中的帽子，何时会又扣到头上。但可惜的是宝贵的青春年华已不会再来。对历史的回忆不应只是感叹，而应深深去反省，探求原因，吸取教训，从而使这样的历史教训再也不要出现。

自制飞机上天

黄养光 陈挺 等

作者小传:

黄养光，1924 年生。1949 年 5 月入党，1949 年 8 月参加闽中人民游击队，1949 年 11 月起在厦门市军管会空军组工作，至 1951 年 5 月起调军委空军工程部工作。大尉军衔。57 年 3 月被评为机关先进工作者，58 年 4 月被打成右派。离堡后曾在介休物资局工作，后调灵石中学任教，1978 年起在山西矿业学院任教。改正后，在矿业学院任机械工程系主任，1987 年 9 月离休。职称教授。

一九五八年中后期，在“大跃进”运动掀起“土法上马，技术革新”的高潮中，一架红色的土飞机——“太谷一号”飞上了天，顿时传为奇闻，引起轰动，为太谷县领导的脸上贴了金。这件事的由来还得从头说起。

第二锻炼大队人员多来自空军，其中大部分具有不同的航空专业特长。太谷县工业局陈局长突发奇想：何不利用这些人造架土飞机飞上天，放个特大卫星，为太谷县增光添彩呢！这个大胆设想得到了县委的赏识。他首先找部分人员摸底了解，物色了十五个人，集中到设在文庙的铁厂开会，传达了县委的意图，要求迅速完成任务，放出卫星。大家“临危受命”，未免有些紧张。经过反复讨论，统一了思想，认为：在当时简陋条件下，承担此事确有很大风险，但命令如山，丝毫犹豫不得；再看十五人各有专长，完全具备设计、制造和试飞的能力，缺乏的就是一些必要的器材和零部件，如能争取到原空军单位的支援，成功是有希望的。于是大家向县委表达了决心，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全体人员于 1958 年 8 月中旬搬进铁厂，日以继夜地开展工作。首先根据实际条件，参照前苏联教练机的有关资料，制定出一架木结构，布蒙皮，双座，上单翼，螺旋桨式通用飞机的设计方案，各人按照分工进行细部设计和加工计划。同时派李基地回空军订货部争取器材方面的支援。出发前，大家非常担心“右派分子”回娘家是否会被拒之门外。出乎所料，李基地受到热情接待，老首长慷慨地批示，可以从有关部门库存废旧器材中挑选可用的，给予无偿支援。共计：M-11 型发动机一套、主机轮一副、螺旋桨一副、仪表若干及其它一些器材。（其中 M-11 型发动机是由一大队乌维达从十二航校取回的。）

整个机体除机翼的斜撑采用钢管外，其余全部采用木结构。因找不到合格的轻质木材，就挑选优质无疖红松，裁成各种规格的木条，用乳胶粘结加固成机身的框架以及

机翼和尾翼，包括副翼、襟翼、方向舵、升降舵的主副梁和框架，各翼的翼肋都是采用优质五合板严格按设计翼型的要求裁制而成。各部木结构框架制成后，就用裁剪好的棉布（应该用亚麻布，当时不可能找到）外套，合身地紧缝起来。然后涂上透布油，凉干后绷得紧紧的像铜鼓一样。主机轮安装在机身前下方。缓冲装置采用马车轮胎内胎裁成皮条加工装配而成。发动机的安装是件大事。大家利用土起重机，经过反复调整才安装妥贴，并加装了整流罩。与此同时，操纵系统、仪表和电路系统、座舱设备都在同步安装调试。各操纵面都用钢丝绳通过传动机构与座舱的操纵杆及脚蹬可靠灵活地连接起来。高度表、空速表、地平仪、油量表等都在座舱仪表板上安装就位，并分别与皮托管和油箱稳妥连接。全部电路也安装完毕。在整个安装过程中，所有零部件加工和装配工艺几乎都是利用铁厂老旧的设备和工具完成的。整机安装结束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测量和调整飞机的重心和各部件，特别是机翼的安装方位和角度，以保证飞行的安全。在没有精密测量仪器的情况下，利用一架水平仪、一枚铅垂和一台磅秤，扒在地上反复测量和调试，才达到设计要求。经过三个多月的苦干和巧干，整机的安装和调试工作终于完成。大家提议漆成红色，并在机翼下面两侧分别喷上“太谷一号”几个大字。下一步就是等待地面试车了。

地面试车那一天，热闹非凡，县有关领导及参观人群挤满院内。地面人员作好一切试车准备，杨时瑞登机进入座舱。一声令下，发动机起动，螺旋桨开始转动，由慢到快，发出怒吼般的叫声，向后刮起一股狂风，机身像被困的猛兽上下跳动。与此同时，杨时瑞有序地检查了操纵系统、仪表电器系统等各项性能，地面人员密切地观察各部结构的强度和振动情况。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经过几个循环的运转，地面试车圆满结束。大家吊起的心放了下来。但是真正的考验－－试飞还在后头。大家又进入新一轮的准备工作。

回顾接受任务之初，大家深感风险之大。曾经长期做过保卫工作的三大队副大队长周宏达就一再提醒过：千万要小心，万一失败了，技术问题就会被扭曲为政治问题，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所以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都特别小心谨慎，认真负责，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太谷县领导一方面放手让大家干，另一方面又不放过对这些人的防范，从太原工学院借调来十五名机械系三年级学生配对跟班学习技术，暗中监视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及时向县里汇报。大家对学生的进驻毫无戒心，而是热诚相待，认真传授。大家那种忍辱负重，无私贡献的表现给学生们造成深刻的印象，双方和谐相处，教学相长。临别时，双方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发出会心的微笑。

当时，太谷县造飞机的消息已传播省内外，引起省委领导和中央巡视大员的关注，派员前来视察。参观交流的团体也相继前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系和交涉，空军第十二航校（在太原）同意“太谷一号”飞机到该校试飞。省里安排由省军区派士兵用汽车将分解后的飞机和人员“护送”到太原武宿机场。正式试飞时间定在 1958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9 时。先由航校某副校长试飞，仅滑行一圈就停下来，说什么“翼尖失速”，就交给该校某副团长试飞,离地数米就降落下来，也说有问题。这时试飞员杨时瑞也有些胆怯起来。大家胸有成竹，有理有据作了有力的论证和解释。终于使杨时瑞鼓足勇气登上飞机，滑上跑道，对准方向，加大油门，飞机加速前冲，不出 200 米就轻盈地腾空而起。此时正是上午 11 时 20 分。飞机在上空盘旋了三圈，然后平稳、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杨时瑞爬出座舱时面带笑容地说：“真是意想不到，操纵灵活，飞行稳定，比苏制雅克十八还好。”这次试飞，高度 300 米，时速 120 公里，空中飞行时间 29 分钟，检查了各个系统，记录了有关数据。试飞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县领导对造出了飞机，大加赞扬，至于谁造出了飞机，则讳莫如深。社会上却传出了“山西农民造出飞机飞上了天”的传闻。

当时，面临“劳动锻炼”行将结束，全体人员要分配到全省各地继续“改造”，而“土法上马，技术革新”的高潮也已偃旗息鼓。经省里决定，将“太谷一号”移交给省体委航空俱乐部使用。1959 年 4 月 6 日，“太谷一号”由省航空俱乐部飞行员孙伏庚驾驶，从武宿机场起飞，到殷家堡机场着陆。这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飞行。从此，“太谷一号”被长期闲置在机场的一角，任人凭吊。

本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违反科学发展规律的主观盲动闹剧，是注定要失败的。作为“大跃进”运动的产物——“太谷一号”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她是政治任务的催生儿，患有严重的先天不足症，只能一时作秀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不久也就夭折了。

无论如何，在那简陋得惊人的小小铁厂，仅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十五个人制造出确实能飞上天的飞机，就雄辩地证明这群制作者具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同时也烘托出他们热诚响应号召，勇敢承担责任的对党一片忠心。

1959 年初，这十五个人分别被分配到晋中和吕梁地区各县基层工作或劳动，其后又经历了长期政治动荡和“文革”的冲击，遭遇了不同的命运。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冤案终究会昭雪，为人民服务的志愿决不放弃。这个信念现在已经实现了，可惜的是，其中已有 6 人过早地离开人世，尚有 4 人至今还没有联系上，下落不明。

注：这篇文稿开始由陈挺执笔，后由黄养光、余慰明加入共同撰写，在此过程中，郭堡战友周运峰、江铸原二同志给予了很大支持及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附录

一、 制造“太谷一号”飞机的十五名成员：

黄养光，组长，49届厦门大学航空系毕业，原空军工程部助理员，负责操纵系统设计；

吴贻寿，副组长，原民航总局工程师，负责机翼设计（已故）；

余慰明，50届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原空军工程部助理员，负责机身和着陆机构设计；

林大任，49届厦门大学航空系毕业，原空军工程部助理员，负责尾翼设计（已故）；

徐　力，40届南京中央大学航空系毕业，原空军工程部助理员，负责动力及尾轮设计（已故）；

徐培琛，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原空军订货部助理员，负责仪表和电器系统设计；

余定章，49届西北工业大学航空系毕业，原空军工程部助理员。负责施工安装；

王伟仁，52届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原空军修理部助理员，负责施工安装；

于耀庆，原空军工程部助理员，负责施工安装(已故)；

王俊善，原空军订货部助理员，负责施工安装；

李基地，原空军订货部助理员，负责施工安装及飞机维护；

孙兴哲，原空军订货部助理员，负责施工安装（已故）；

李士宏，原空军场站技术员，负责机械加工；

席绪光，原民航总局技术员，负责物资供应及飞机维护；

杨时瑞，原空军24师飞行大队长，负责飞机试飞并协助操纵系统施工安装，(已故)。

二、“太谷一号”飞机主要数据：

飞机全长:	8.46 米
飞机高度（水平位置）:	3.25 米
翼　　展:	10.22 米
飞机重量:	1095 千克
正常飞行重量:	1400 千克

浪遏孤舟

江铸原

作者小传:

吉林省永吉县人，1931年12月生，大学毕业，51年10月参军，在总参军交部任翻译，58年来山西劳动锻炼后分配到山西省晋中几所中专、中学、技校任教，84年任煤中专副校长，91年离休，后任九三学社晋中市委名誉主委。

1958年4月，在总参军事交通部任翻译的我，经过排队、揭发、批斗一系列必要过程以后，我被打成了右派。并送到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锻炼，1959年1月，我被分配到阳泉，并从此改行当了教员。直到1961年底，才摘掉了右派帽子。原以为摘了帽，就不会再低人一等了，哪知摘帽只是换帽，换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政治上依然是个另类。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由此给我在生活上带来的悲剧。

1962年8月下旬，我奉命匆匆结束了在山西教育学院的数学进修，返回所在单位——已停办的晋中工业学校，得知对我的工作有了新的安排，并要求迅速到任。我带上自己的全部家当，从榆次经太原奔赴文水县中学。

当我到了文水中学后，正在铺展行李时，挤进一个女生对我说："江老师您来了，欢迎您来教我们俄语！"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把我给愣住了。我初来乍到，谁会认识我？经过一番盘问我才弄清楚。这个女生叫刘云清，是本县县委副书记刘佐的女儿。刘佐知道晋中工业学校有个从北京下来当俄语翻译的正待分配。为了给女儿铺平锦绣前程，让她学好俄语，就捷足先登，将我调来文水中学。当时俄语老师是"紧俏货"，为了怕被其它院校要走，故而令我火速赴文水中学报到。在文水中学，我担任全部高中三个年级四个班的俄语课，每周共20节课；每天平均上四节课，批改作业约100本，辅导晚自习，备课，给后进生"吃偏饭"等等，工作负担十分重，忙得不可开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勤奋工作一年，我改变了文水中学俄语高考不及格的现状，为本校提高了高考升学率。我的教学成绩震动了左邻右舍——汾阳县和交城县中学，他们纷纷前来取经。

刘云清是高一年级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堪称班里的尖子。我只求把课讲好，那里知道我的授课给了她良好印象。她很重视俄语，是课外时间找我问课最多的学生，不仅平时多，有时星期六晚上、星期日白天她也不惜从家跑到学校来。后来她直言不讳："江老师，我觉得您各方面都好，我愿意终身许配给您，咱们成家吧！"

"成家"二字使我感到突兀。我已过而立之年，何尝不想成家！但自被打入另册

后，这已是很不现实的奢望，于是，我冷静地告诉她："你现在才念高一，应以读书为重。何况我曾是右派，我的身份和你的家庭极不相称，你的父亲也决不会同意。另外，你今年才十七，咱们年龄相差太大，不合适。" 想不到刘云清回答得很干脆：

"第一，只要您跟我把终身大事定下来，我能坚持学习。第二，什么右派左派我不管，我认定您是好人。婚姻自主，我的父母管不着，实在不行我和他们脱离关系。第三，您年龄大我不嫌，再说相差比这大的也有。"

面对她的执著，我带着训教的口吻对她说："不要太任性了，你还不到考虑成家的时候。再说你父母会坚决反对的。"

"我父母的工作我去做。我跟您跟定了。"

姑娘抱着天真的想法在家里把自己终身的选择向父母摊了牌，当然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谴责。刘佐夫妻不同意女儿婚事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小清正值读书花季，应专心致志学习，不该考虑婚事。这也是我的看法。可小清就是着了迷，听不进劝说。她继续找我，对我无话不谈，甚致把父母训斥她的原话也搬出来，如她爸爸说"江是右派，是社会渣滓，一辈子好不了。"

这些话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你刘佐可以管教自己的女儿，但不能借机诬辱别人。于是我取出一张白纸在上清晰写出：刘书记，您说右派是社会渣滓，一辈子好不了，这种静止地、一成不变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小清真把纸条捎回去给刘佐看了，刘勃然大怒，顿足大骂："江右派胆大包大，竟敢教训我，说我反马克思主义。让他等着瞧吧！"

于是，刘佐夫妻俩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对女儿讲'道理'，讲不了几句，就又打又骂。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清从家里逃脱出来找我，让我给做主。我能说什么呢？只能一方面劝她听父母的话，免得皮肉受苦；另一方面觉得刘佐夫妻这种做法也太过份，我让小清自己去向县委书记张怀英反映。

为了阻止这桩婚事，刘佐治不了女儿，就将矛头对准我来。刘佐开始运用手中的权力：指示文水中学党支部搜集我的黑材料，文水中学领导接到"指示"后，左右为难，搞我吧，绝对不得人心！不搞我吧，顶头上司那里不好交代，万般无奈，只好采取拖延策略。 刘佐等了又等，催了又催，不见动静，便亲临文中党支部指挥起来。他通过党团组织搜集了不少揭发我的材料，可惜废话很多，能用的极少。刘往只好赤膊上阵，自己来组编材料。

一天晚上，刘佐在女儿杯里偷偷放入适量的安眠药，女儿喝了以后昏昏欲睡。乘

此昏迷之际，刘佐把他早已准备好的白纸、复写纸和钢笔拿出来，摆在女儿面前，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能睡觉，把你们江老师说的一些话给我写在纸上。"

女儿不从，父亲就软硬兼施，声嘶力竭地叫嚷："你写不写，不写我打死你！打死你算我白养！"逼得小清只能依从。刘佐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笔和纸，把笔给小清，吩咐道："我说什么你写什么，要工整地写，不准潦草。"小清遵命写出：

（1）污蔑、谩骂毛主席 ：1963 年 5 月 3 日，江铸原在宿舍里忿忿不平地说："毛主席专横独断，施阴谋诡计，发动反右派斗争，伤害无辜。"又说"毛主席表面温和，内心残暴"；

（2）反对三面红旗：1963 年 6 月 9 日，江铸原在宿舍里发牢骚：总路线是头脑发热，大跃进是大倒退，人民公社是瞎胡闹；

（3）江铸原与"苏修"有勾搭，他还订真理报。他常吹嘘说"苏修"好，而且表示要去那儿。

这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星期六晚上快十点了，小清在我的宿舍还不想走，我硬赶她回家。路过教室时，她说要进去拿一本书。教室里黑洞洞的，我也随她进去。在黑暗中她翻腾一堆书，摸到了课本，又略微整理一下，走出教室。我也尾随跟了出来，然后把她送出校门。这一过程，有人跟踪汇报给了刘佐，引起了他的特殊兴趣。他认为，这是给我制造罪状的绝好机会：教师污辱女学生，强奸罪，至少判 8 年。已是深夜，他硬把女儿叫醒，非逼她承认挨欺负了不可。女儿断然拒绝使父亲恼羞成怒，他要直接对我动手。于是我被告知第二天下午四点到县委宣传部找薛部长，我届时前往。这位部长对我耍起了官腔："今天叫你来是要通知你一件事。尽管你已摘了右派帽子，但是来文水中学后，你表现不好。限你五日写出检查。根据你的检查和态度，我们再研究重新处理你的问题。现在宣传部初步决定，一周后在文水中学召开批判大会，让群众教育你。"

薛部长咄咄逼人的气势，犹如晴天霹雳，蓦然把我给弄懵了。我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冷静下来，有所醒悟：这一定是刘佐利用职权搞的把戏。他把宣传部当作御用工具来对付我，薛部长被人利用还蒙在鼓里。想到这，我紧张的情绪顷刻消失，我理直气壮地说："薛部长，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少有精力顾及其它，缺点当然有，我想我没犯什么错误。这里我必须向您挑明一点：刘佳女儿不顾一切地追求我，他不同意也治服不了女儿，便想歪招来设计陷害我。今天宣传部唤我来就很蹊跷，我是低层的非党人士，我的事归学校党支部管，有什么大事值得惊动宣传部呢？这样做，您不觉得有点离谱吗？刘佐在假公济私，宣传部没有义务管刘佐的家务私事。因此我要明确表态：我没有什么

可检查的。如果按您所说，宣传部执意要开大会批判我的话，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否则我拒绝参加。”

我越说越激昂，薛部长似乎受挫，他故作镇静，不自主地问道:“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的条件是，开批判大会刘佐必须参加，因为我要检查的内容与他有直接关系。他若不去，我也不到会。这件事您作不了主，可以请示他。我等回音!”说完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扬长而去。结果不出所料，我没得到任何回音，令我写检查一事不再提起，批判大会销声匿迹。

在刘佐的操纵下，罗列了我的莫须有的罪名，拼凑成《江铸原的罪状书》，定性为“绝密”，准备上报晋中地委。事有凑巧，一天下午，女儿去县委找父亲。父亲不在，桌上放着《江铸原罪状书》，她惊奇万分，立刻塞进怀里，疾步跑到中学给我看。我迅速扫了一遍，立马让她送回。这件事对我来说如九雷轰顶，眼冒金花。一个负责公检法的县委副书记，为了一己之利，竟然动用组织，制造冤案，陷害无辜！

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我怎么办？我只能奋起抗争，但这事联系到小清，如果她不支持，则我和她都将前程毁尽，一败涂地。于是我找到她，就整个事件的利害关系，推心置腹地和她商量，小清明白她父亲的所作所为，故而态度明朗地表示：愿意同我站在起状告她父亲。这一个夜晚，我们伏案疾书，我写全过程，她揭发其父在其身上施的阴谋诡计。俩人一夜未眠，长达终于写成了这封长达 15 页的控告信。为避免不测，当日下午我跑到 30 里以外的交城县邮电局，用双挂号直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饭后，静坐在宿舍，我的纷繁心绪难以平静。小清的一切足以说明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我连在一起。她不愿离开我，我也不能离开她，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担承今后的风险。我不能再犹豫了，次日主动找她谈心，定下了终身。

刘佐担心的是那天把《罪状书》忘在桌上近一个小时，就怕女儿去了泄露给江。这个疑团要破解，非问女儿不可。可女儿一直说帮助江老师抄写俄语资料，父亲就是不信，大骂“骗人”、“混蛋”，动手就打。打得女儿阵阵惨叫，惊动了邻里，传到了我的耳里。我已同小清定了终身，岂能坐视。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直奔刘家。进屋就见到小清浑身伤痕。她一见我就进里屋迴避。不一会刘佐夫妻先后赶回来。刘一进门槛就指着我的鼻子叫嚷:“江右派你到我家干什么？你不要玷污我的革命家庭，马上给我滚出去!”

“刘书记，您不问我的来意，开口就轰我走，这不合适吧？”刘根本不听，横眉竖眼，开始骂人。

“你是文水中学最糟糕的教师，你思想反动，流氓成性，耍到我女儿头上了，我

很快就和你算账！”

刘佐，您随便污辱人有失身份。我正式通知您，在自愿基础上我已与小清定婚。”刘气急败坏抢嘴：“我不同意，我坚决不答应……”我继续说：“这不是您说了算的事。婚姻自主，我劝您不要强加干涉！”

“你胡说八道，你放屁！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门！”面对这类无赖，我觉得没有再费口舌的必要，于是郑重地说：“刘佐你随便打人禁闭人是非法的，打您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您身为公检法的领导干部，不但不带头执法，却违法乱纪。我要求您从现在起停止对女儿的迫害，。您若不听，咱们法律面前论理。这个天您遮不住，有管您的人，有治您的法。告辞了！”

我闹刘家，据理力争，很快传遍全城，成为居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笑料。

晋中地委接到《江铸原的罪状书》不久又收到中监委转来的对刘佐的控告信，信中批示：控告信指控执法者违法，性质恶劣，如情况属实，当严肃处理。为防止意外，晋中地委监委书记王荣先口头警告刘佐：关于你女儿的婚事，不准你再干涉。江铸原的问题由文水中学处理，你不要再插手。你的问题听候处理。

这一警告对刘佐似当头一棒。但是他仍不甘心，他想到的最后一个绝招是让女儿换个学校读书，同时也将我调离文水，让我们互相不知下落，断绝联系。但在我临走前，小清在严密监视下，仍然设法托人带给我纸条，告诉我她已转学到汾阳中学高二 45 班。让我在调走前务必去和她见一面。

这信使我惊愕，马上得去一趟。回行署报到的事只好推迟一天。到了汾阳，找到了小清，我们在一家小客店里促膝谈心近三个小时，最后小清要跟我走，可我当时前途未料、自身难保，我只能安慰她，望她再等待一段时间。没料到，这次的见面，很快又引来一场风波。

第二天，也就是 1963 年 9 月 1 日，我赶到晋中行署文教局报到，一位姓高的接待了我，弄清身份后，劈头盖脑地训斥我：“江铸原，你已丧失人民教师应有的品德，这次调你来不是什么重新分配工作，而是处分你。。。。。”一顿训使我摸不到头脑，不得不问：“我犯了什么错误了？”高反问：“你昨天去哪儿了？”这一反问使我顿时明白，又是刘佐，反映之神速，用心之卑劣，令人震惊！我心中有了底，从容地说：“要调走了，去汾阳看未婚妻。”“未婚妻，有什么证据？”

我答：“没有证据，双方同意就算，不信可去问对方。”

高一时语塞，只好说：“江铸原，组织上会弄清你的情况。根据局的布置，你必须

写检查，如实交待你去汾阳中学所做的一切。” 他既没有规定检查的内容，我就将计就计了。我以《刘佐对我的迫害》为题，写完后交了卷。

次日上午我见文教局王局长，他推脱说：“你写的我看了，你的问题发生在文水，我意把你介绍回文水处理完了你再回来。”这是他觉得烫手，踢开了皮球，我断然拒绝。无奈我只好找局长的上级，并直接上楼去见地委副书记苗峰。知情的苗峰回答很干脆：“没有什么好处分的，我告诉文教局分配你的工作”。次日文教局分配我到灵石县中学。

在灵石中学我牵肠挂肚的是杳无音信的刘云清。我知道刘佐封锁我的通信，给文水中学其他人写了六封信求转都石沉大海。用双挂号寄一封下场一样，全落到党支部手里。我不相信刘估会遮住文水中学的天，又给小清所在班俄语课代表宋玉仙写了信。信发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荒唐的信，信封上写：“江铸原野兽收”，“野兽”二字写得比“江铸原”大得多。拆开一看使我惊愕：

江混蛋加流氓，你狼心狗肺兔子肝熊下水，你这只王八羔子，我算看透你了。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白日作梦。你披着人皮，做的不如禽兽，简直是人间野种、败类。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下三烂。像你这样没羞耻的行尸走肉还不撒泡尿浸死算了。祝你狗命早日断送！彻底决裂、永远不再理你的刘云清。

几乎在收到这封信的同时，宋玉仙接到了我的信。这个小女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其中一页转给了小清。这样她才知道了我的下落。刘佐的苦心封锁至此破灭。小清给我写信深表思念之情，揭露了那封信的原委，正如我所想，是他爸爸所写，而逼她给抄的。于是我把那封荒唐信和小清的澄清信一起寄给晋中地委，供欣赏。

1963 年 11 月，宣布了对刘佐的处分：留党查看，党内通报。这是正义对邪恶的镇压。刘佐自然不服，也只能在家往女儿身上撒气。他狰狞面貌毕露，不仅辱骂，动辄就打，使小清忍无可忍，万般无奈，给我写了信：

我已无法在家生存，毫无顾虑，毅然离开家投奔你。不管前边有多大困难，我都不怕，不后悔。请速安排。小清

尽管我举步维艰，得到这则信息，只能克服困难，配合营救。11 月 22 日，按约定时间在太原汽车站等候。接近中午，汽车才到。我从人群中看到了小清，她穿着瘦小的旧黑衣，挎着沉甸的书包，冻得颤抖着走过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定了终身的两个天涯沦落人重逢太原，不胜喜悦，溢于言表……小清哭泣着说：“临走时父母不让穿好衣服，不给一分钱一两粮票，车票钱还是我借的，要求转学转户口本不行。”见此情，我有什么办法！思量再三，只能依靠组织。到晋中地委，找到苗书记和监委书记王荣。

他们听到小清的哭诉，心情沉重，寄以同情。权衡利弊，认为：事已至此，只有结婚才能顺利转户口，这就难顾上学了。

离开地委，我们思来想去，无计可施，只有照书记意见办，回文水给小清开结婚介绍信。在文水我住在小店里，小清在去开介绍信的路上遇见王校长。通情达理的王说；“情况我清楚，想转学的话我给办。”果然，下午小清办来了转学手续。我们喜出望外，有它不开介绍信了，回去上学，凭它再办户口。没想到不仅户口办不成，户警反倒替刘佐做起工作来。转户口事作罢。小清想既已转学，干脆把团的关系也转过去，于是去了团委，回答是：明天再来。经逐级请示，次日团委书记奉命这样告诉小清：“团委希望你有所悔悟，准备开个大会，在会上你好好检查一下，认识自己在政治上的错误——泄露了党的机密。如果你回头，不跟右派走，留校学习，我们可以既往不究。否则只有开除你的团籍。” 小清无法回答，回来问我。看来，我们又一次碰上了刘佐操纵的势力了。既然又挑战，我们只能应战。

我让小清去团委表态；愿意检查，接受群众教育。这个会定在明天下午四点半。在我的帮助下，小清做了充分准备。届时会场人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团委书记主持开会，他说：“今天这个会是帮助刘云清迷途知返，现在先让刘云清作检查。”刘云清站起来，不慌不忙，开始“检查”：

同学们：党教导我们说老实话，主持正义。今天我就要根据这些教导谈谈我的问题。昨天团委指责我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泄露党的机密，二是投靠右派，要批判我。下边我就澄清这两个问题。第一，县委副书记。我的父亲刘佐无理干涉我的婚姻自由，在家辱骂毒打我，使我浑身是伤，没脸见人。武力治服不了我，他就利用职权栽赃陷害江老师，我把这些告诉给江老师，就说我“泄露党的机密”。试问栽赃陷害人算“党的机密”吗？现在我应该告知大家，就因干涉我的婚姻自由和陷害江老师，我爸爸已受到党籍处分，这足以说明我没有错。第二，说我“投靠”右派，我想不通。江老师来校之前已摘了“右派”帽子，摘了帽子还叫右派于理不通。再说江老师是党派来当老师的。如果说他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坏，为什么不撤他的职？既然他是老师，我理应尊敬他，就算我投靠他，又有什么罪过，值得全校兴师动众来批判我吗？以上两件都是铁的事实，不容歪曲。团委压我说：“如果不听劝告，执迷不悟，就开除团籍。”我不知这是团委的意见，还是上边的指示？在这里我郑重申明；“我没有什么错误，如果团委硬要开除我的团籍，请便。今天开除，我明天就向团中央控告。我的话完了，请在座的同学原谅。

刘云清发完言，与会者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刘佐的馊主意等于自打耳光，阴谋

彻底失败。凭转学手续，小清在灵石中学上了学。11 月底王荣因公来灵石，小清没饭吃的哭诉激起了他的怜悯之心，当即表态："户口问题我给解决"。不久刘佐把户口乖乖寄来，这是他握在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至此，不服输的刘佐在女儿问题上输了个精光。

在校学习期间，因长期斗争受刺激，小清头昏痴迷的旧病复发，难以就学，需要疗养。养病需要有个适当环境，不能住在女生集体宿舍里，我和她尚未成婚，又不便常去照料。形势所迫，必须有个家，为此小清必须退学，明知这不是明智之举，也只能如此了。1964 年 3 月，我 33 岁，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庭终于组成。结婚办得十分简单：领结婚证花四角，买两口锅、两块枕巾、一斤水果糖、二两茶叶，总共不到 10 元钱。

成家后先后添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靠我 30 元工资在贫困线上挣扎，若没有我父亲的支援，我是支撑不住的。

十年动乱我受到了时间最长、受辱最重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惩罚，这种情况下，小清也承受了她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好容易熬过了这场劫难，可是我的多灾多难的家庭又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刘佐夫妻趁机通过各种手段，施挑拨离间之计。苦海无边的生活本已使小清心理扭曲，再加上这种拨弄、渗透的影响，她变了，在她看来这个家再也没有指望了，对儿女她也不愿尽母亲的义务，时常情绪失控，无理取闹，喜怒无常，日趋严重。这个家庭内部关系已到最后关头，我们曾多次交谈，但我们都知道，再谈也无济于事了，只好考虑分道扬镳。1976 年 10 月，我们这个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家庭，度过了风风雨雨的 13 个春秋后，终于破灭。就像是恶风浊浪中的一叶小舟，偿管拼死挣扎，但终于难逃被风暴掀翻的悲惨命运！

历史错案改正后，我曾把刘云清接回来，指望破镜重圆，能让孩子有个亲爹娘，一家四口，一疙瘩，一块肉。可事与愿违，她原来正常的精神状态已不能复归，我的善意并未得到对方的配合，复婚宣告失败。刘云清还是走了，孩子泪水涟涟，我仿佛作了一场恶梦。对于心理已变态的刘云清，我并无恼恨之意，而是同情她，她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各种极"左"思想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在那个不堪回首、令人诅咒的时代，多少人在混沌中迷失，多少人在恶梦中自残，其中包括以千万计的像刘云清这样本来可能有光明前途的青年。这笔罪孽在历史上该怎样记载呢？。生活犹如海洋，有时风和日丽，碧波荡漾，有时狂涛恶浪，倒海翻江。我走过了大半生，尝到的酸辣和苦涩实在是够多的了。

第三章　苦涩的亲情

相濡以沫

唐正光

作者小传:

四川成都人,1935 年 7 月生,1951 年 1 月参军。1951 年 2 月在西南军区机要学校学习 ,1952 年 4 月到青岛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无线电专业,1954 年 4 月毕业时, 立三等功一次, 提升干部,调北京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军校处任参謀,1955 年授少尉军衔。1958 年 4 月被打成右派,发配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 1959 年调太谷县农建局机电股; 1960 年调太谷农机修造厂劳动。1979 年改正后调四川农学院农机系任教,1986 年入党,1988 年提副高职称,1992 年退

1957年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热血男儿，如今成了古稀老人，回忆往事，心潮起伏，真似过眼烟云。有些人淡忘了 ，有些事不愿重提 ，但是有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平凡又而非凡的经历我不能不写。

1957年反右派运动席卷全国，机关、学校、军队成了运动的重点。在充满恐怖、人人自危的形势下，她不随大流，不但没有躲避风险，另寻幸福，而且认定我是个能够托付终身的人。她不顾领导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冒着受牵连的危险，拒绝了众多同学、同事、朋友的追求，毅然决定与我相濡以沫，长相厮守。几十年来，她不仅用真情和奉献来安抚我受伤的心灵，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她自己，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值得敬爱的人就是我的老伴---邱永淑。当提到往事时，我第一个要写的就是她。

一、短暂的相认

1957年五一节前夕，这天下午快下班了，我正站在海军大楼窗前观赏远处景色，突然身后传来老刘的四川口音：“看啥子？北农大两个老乡来了，是女的，一起去见见吧 。”我从中学到航校 ，所有的同学都是清一色的男生 ，可以说从来没有跟女生打过交道，心情不免有点激动和紧张 。到了传达室，踏进门就看见两位衣着朴素 、身材娇小的典型的四川姑娘。她俩热情大方的招呼，一时倒让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幸好老

刘及时介绍，才使我摆脱了尴尬。这两位姑娘都是 1954 年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的 ，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在愉悦的交谈中。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位叫邱永淑的，她园园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条又粗又黑的长辫子，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朦胧地感到，她似乎也对我有着良好的印象……

这次会见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但种下了友情的种子，海军大院与北京农大只隔着一条马路，来往方便，每逢节假日，四个老乡常常聚会在一起，唱歌、跳舞、郊游、打乒乓球，从此我那单调的军营生活里，激起了阵阵热情的浪花，我突然感到这周围的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多采起来。

可是好景不长，8月初我在党的整风学习讨论会上提了几条意见，比如：肃反运动要是多作些调查研究，就可以减少盲目性，少伤害一些同志；苏联援助是有偿的等等。这些本来很正常也很正确的话，却被别人当作把柄无限上纲，大扣帽子。我因此被停职检查，个人行动还受到监视和限制。当时实在想不通，特别是那位堂堂边副政委，在海军航空兵司令部整风动员大会上明确宣布：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帐的政策，怎么说变就变了？当然，后来才知道，他只是在忠心地执行上边制定的“阳谋”政策而已。从此，同事们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昔日关系不错的战友见了我，要不就避而远之，要不就利用一切机会与我划清界限。在我思想苦闷、孤立无援的时候，还敢于接近我的，恰恰是我认识才三个多月的老乡邱永淑。她知道我的处境后，没有疏远我，仍然很关心我，悄悄打电话约我谈心，在海军大院的球场边，在公主坟商场的书店里，在北农大后面的小河旁，都留下了我们来去匆匆的身影。不过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在行动自由已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心绪和胆量谈情说爱，倒是在政治观点上有了共同语言。她认为我讲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什么错，即使有不妥之处，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怎么可以无限上纲，乱扣帽子呢？她绝对不相信一个十五岁就参军，在党一手教育培养下已准备发展入党的人，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以善良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永淑的观点，只能使我在心灵上得到些许安慰，并不能阻止残忍的政治铁轮轰然碾压而来。我终于被列入了右派份子的行列。据说，对我的处理，当时军校处处长、反右领导组组长杨士勤是反对的，然而，他的反对不仅没有起到作用，结果自己反而被撤了职。

1958年四月下旬，正式宣布了对我的处分决定：开除军籍、团籍、剥夺少尉军街。祘是‘宽大为怀’，行政上免于处分，没有降级。

195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我和北京海军直属机关三十多名反右运动的牺牲者一道，

被解送山西太谷修水库。列车到达太原车站时，狂风骤起，黄沙蔽日，上天用沙尘暴迎接我们这批无辜的受害者，预示着前途险峻渺茫。第二天经东阳车站转赴郭堡水库。

和部队生活相比，郭堡水库的条件确实非常艰苦，睡的是大统铺加一堆干草，吃的是黄面、红面(玉米面、高梁面)窝窝头，每天要干十多小时的超强体力劳动，加班加点是常事。这些对于当时年青力壮的我们来讲，不算什么大事，而右派份子这顶帽子招来的岐视、侮辱和随时有被打骂批斗甚至入狱的危险，才是最大威胁。这时，永淑的关心，是对我最好的精神支持 。来自北京的每一封信，都会使我兴奋好几天，只要收到她的信，什么艰辛呀，什么劳累呀，全都被我抛得远远的 。信中的话语，会化作一股股清洌的甘泉，流进我的心房 ，我那掤紧的神经就会很快舒展 ，我那几乎已经丧失了的信心，也会重新恢复。我知道，自我离开她以后，虽然孤独一身在娘子关外， 但是永淑正时时刻刻在注视着我，牵挂着我。当时，她们四年级实习地点在北京郊区，到邮局去发一封信、取一封信，每次都要走很远的路，但是她从来没有间断过，每隔十来天，在那条僻静的山间小路上，总是可以看得见她那孤单柔弱的身影。我知道她平时是很胆小的，后来我曾问永淑，当时你一个人走来走去，难道就不害怕？她反驳说：“不，我不是一个人，这信里还有一个！”

在郭堡水库紧张的劳动中，在我们这劳动锻炼营里，也常常传来悲凉、凄惨的消息，有的正在热恋的女友，写来了带有鲜明阶级立场的绝情信；有的已结婚的对方，要求划请界限——离婚；就是没有离婚的战友，一些同志的日子也不好过，记得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战友，有一次看完家书后问我：想听我念一段吗？我点点头，于是他那略带颤抖的声音，声声传入我的耳中，也字字印入我的心坎‘……现在，我连你的样子都快忘记了，儿子过去只从电影里见过坏蛋，现在可好，咱家里就有……’这些话能不叫人心酸吗！每当遇到这类情况时，我更加感到我和永淑之间纯真的情谊，是多么可贵啊！

二、摘帽之后

1958年秋，永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央气象局农业气象研究室工作。开始领导很器重，很多重要工作都交她去办，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会务工作派她参加，局里来了苏联专家让她去接待、陪同，领导出差也让她同行。可是，情况很快就起了变化，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件件较重要的工作任务都陆续被旁人取代，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取代者，情愿到外单位暂借，却把她晾在一边。起初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请其中玄机，后来终于弄明白了，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由于我的存在。

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留太谷县工作的右派们首批摘帽，我名列其中，心情非常激动，立刻给北京永淑处发了报喜电报，她回电邀我尽快到北京见面。时逢春节，我在腊月三十日早晨到达北京，一下车，就远远望见永淑穿一件蓝色小花袄.一条粉红围巾在红润的脸庞下随风飘荡，正高举双手呼叫我的名字。我们迎着凛冽的寒风手拉手走出车站，兴高采烈地享受着摘帽后的兴奋和重逢的喜悦，我趁此机会才向她表达了心中蕴藏已久的爱慕之意，她建议双方慎重考虑后再定。 第二天，我们见面时我正式表态：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的态度和昨天一样没有变，将来也不会变。这时她向我讲了心里话：她在同我保持通信联络的同时，同班一个华侨同学追她追得很紧，对方是个好青年，四年同窗也有一定感情基础。另外，她特别向我说明，研究室领导也给介绍了一位对象，是领导的秘书，大学毕业，共产党员，工作骨干，室里的红人，只要她同意，领导自然满意，她就可能长期留在北京。但是,经过冷静考慮,最后她还是决定选择我。虽然论起政治条件来，我暂时不如他们，可是她喜欢我的许多优点；她还明确地告诉我，更重要的是，在我处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她的不应是别人,是我，她不能也不愿意放弃我，更不愿在我的伤口上抹盐。多好的姑娘啊，她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通过这一次倾心交谈，我们相互理解，相互爱慕，两颗滚烫的心靠得更紧了。我们一起为我的摘帽而欢庆，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一定会来临，然而事实很快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和无知 ，也粉碎了我们的黄粱美梦，原来摘帽只是个形式，我摘了帽就是摘帽右派，仍然属于内专对象，对永淑的影响也就不可避免，她在局里后来受到的冷漠遭遇，就是明确的证明。而且事情还在往坏处发展，在我们确定关系后不几个月，就在1960年，中央气象局借口把她调离北京，让她到新建的南京气象学院去教书了。

1961年春节我们准备结婚，她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开结婚介绍信的，因为系主任和团支部书记曾经多次要她慎重考虑，并明确的表达过反对态度，这一次，上帝保佑，他们总算没有阻拦。随后，我们约定在郑州车站会合，同车回到成都，在老家举行了最简单的婚礼。除了我的父母兄嫂外，没有通知任何人，包括她的家人。没有灯红酒绿的排场，没有欢声笑语的仪式，也没有鲜花，没有喜幛，甚至连一张双喜字红纸都不敢贴，恶劣的政治环境，迫使我们连合法、合理又合情的结婚大事都不敢声张，为的是怕牵连更多亲戚朋友，那将会增加我们内心的歉疚。

当年11月，大女儿在南京出世。在这以前，由于永淑她在南京无亲无眷，独自一人，我想，在分娩将临的时刻，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去陪陪她的，但是我请假不顺利，其原因不用说人人也都清楚。面临着这一窘境，我万般无奈，尽了最大努力，依然不能在

永淑分娩前赶到她的身边。分娩临近时刻，她不得不大腹便便独自一人乘坐轮渡，去长江南岸市区的妇产科医院，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生理上、心灵上的痛苦，生下我们的大女儿。这时候，我在山西好不容易请准假，立刻乘上最近的一班火车匆匆奔向南京，下车后，当我汗流浃背地赶到医院时，她已经带着新生的婴儿出院了，（当时医院规定顺产只能住三天，是医院打电话让学校派人去接她的。）在医院里，医生护士和病友见她一直孤身一人，都惊奇的问：生孩子这么大的事，你丈夫怎么没来？永淑含泪编了一席话来回答，别人听了谁都不相信，可是，在当时情况下，又能说些什么呢？时逢三年困难时期，医院的伙食很差，在医院的病友们，都有亲人陪侍，都能吃到家里送来的可口又富有营养的食物，而她，只能靠护士帮忙用医院饭菜充饥，整个住院期间，她连一个鸡蛋都没吃到口就出院了。此后，她深深感到在南京一个人带着幼小的孩子上班，困难太大了，当时学院新建正需要大量进人，她提出调我过去，业务领导很快就同意了，但是当他们正式向组织人事部门提出调人的申请时，却被告知：气象部门属保密单位，不能进右派，摘了帽的也不行。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久久两地分居，终究是个要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考虑，就在山西安家吧，但在山西解决永淑的调动，也非易事。后来想尽办法，又托她在山西农学院工作的同学帮助联系，总算才有了结果。1963年春天，永淑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来到了位于太谷县的山西农学院，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三、厄运接踵　牵连不断

太谷县是杂粮区，主食以玉米、小米、高粱为主，大米基本上看不见，白面粉供应很少，副食品则更加谈不上了，和南京相比差距实在太大。所以在她的同学同事中，大多数认为她不该到太谷来，有的说她太傻，有的干脆怨她为个摘帽右派作那么大的牺牲实在不值得……。可是永淑不这样看，她觉得自己没有选错人，她认为吃苦算不了什么，只要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她的心情特别好，干工作，做家务，总是兴致勃勃，似乎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1964年初夏，一个风和日丽、艳阳高照的星期日，永淑突发奇想，要骑上她刚买的新车，和我一同到邻近的祁县去看看，从太谷经过东观到祁县再返回，路程近百里，当时我在拖拉机站做修理工，跑农村早已习以为常了，而永淑刚学会骑车还没几天，这对她来说，那不啻是一次真正意义的“万里长征”。我们骑到半途，她已经大汗淋漓了，但在休息了片刻后再重新上路时，我觉得她兴致更高了，腿脚也显得矫健而轻松，我们

潇洒地一路骑，一路放声高歌，唱的是：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唉嗨哟……这些在北京时最喜欢唱的歌曲，引起了不少行人的注目。到了祁县，发现这座城很小，但街道整洁、请洁、宁静，颇具有北方小城市的特色，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到正街时，突然看见一栋老式房屋的大门上，仍悬挂着“超英公社”的大红牌，一望而知那是前几年大跃进时的遗留物，旁边墙壁上还有些巨幅标语口号仍赫然在目。读着这些吹牛不缴税的豪言壮语，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我们一路走走看看、说说笑笑，当踏上归途时，已经是夕阳西下了。走到最后一程时，我看永淑体力上有些不支，我用绳索将她的车牵引在我的自行车后面，这样，她骑起来省了不少力，而我可加了码。永淑满面笑容地打趣说：“正光，我们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哪。”这时，我们边欣赏着道路两旁绿盈盈的田野，一种幸福感油然升起在我们的心间，这是充满诗情画意,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但愿我们的未来，也能像今日的阳光这般灿烂！

不过，想是这么想，其实我自己明白，在我头上那顶无形帽子未获彻底解决之前，我们根本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在那些“左派”眼里，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是一码事，在任何政治运中,都是被整治和批斗的当然对象,处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没有人会在乎你表现好坏或贡献多少。我在太谷农修厂工作近二十年，几乎年年被评为厂模范，那是用辛勤的劳动、顽强的拼搏为厂里作出贡献换来的。我每天准时上班到车间劳动，下班后清理完工作场所才最后离开车间，加班加点几乎是家常便饭。在为厂里研制发电机、搞技术革新的关键时候，我就干脆吃住在车间里，几天不能回家。车间有同事说:嘿！唐师傅在厂里的时间，要比在家里的时间多得多。他说对了，实际就是这样的，可那又怎么样？我虽然作了最大的努力，却并不能躲过那一阵更比一阵狂的政治风暴。

1966年，伟大领袖发动那场惨烈而又荒唐的大运动后，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白天干活，晚上挨批斗，散会后还要写检查、贴大字报，待在家的时间就更短了。永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怕我太过劳累而病倒，就想尽办法来减轻我的体力负担，她不让我作饭，不让我洗衣，也不让我照看孩子。本来，她和大女儿从江南调到山西来以后，一到冬天，就会因不适应煤烟熏烤而发作气管炎，母女俩常常咳得很厉害，每逢晚间遇到这种情况，永淑就独自抱着孩子靠在床头，整夜不能安眠，以便为我争得一点点最起码的休息睡眠时间，而她自己第二天却还要照常上班。所谓上班，既不是坐办公室，也不是上讲台，而是到地里去干农活，还美其名曰“农业学大寨”。随着运动的发展，恐怖气氛更为加重。“革命群众”们在斗批厂内所谓的走资派时，将我这“牛鬼蛇神”一块儿捎

带上游街示众。妻子除了每天要提心吊胆地为我的命运担忧以外，还要担心孩子会不会受到伤害，还要提防那些红卫兵会不会突然来抄家……。我们失去了作为国家公民、干部应有的人格和尊严， 在高压下只能强忍着泪水，像头牲口般沉默地活着。想不到的是,就这样的日子，也有人不让我们平安过下去……。

1966 年秋天，文革进入高潮，人心更加烦燥、混乱。山西农学院院内驻有一支在太谷山沟里修仓库的工程兵部队，平日他们一早进山，天黑前返回宿舍驻地。因为是部队，所以群众还是很信任的，一般都不会对他们作什么防备。有一天夜晚，正逢我在厂里因加班不能回家，深夜时刻，竟然有人撬开了我家的房门，趁黑一直摸到永淑床边。她在睡梦中猛地惊醒，突然发现有个穿军装的人立在床前，就立即大声呼叫起来。歹徒听见喊声，慌忙转身夺门而逃。此事发生后第二天我们向有关部门报了案，这个部队的领导开始还很重视，很快派人来调查。但是,在调查中，当他们知道我的政治身份是个摘帽右派以后，马上就改变了态度，随即停止对这一恶性事件的追查，不仅如此，他们还放出风，说这是右派家属有意破坏军队的威信，并提高调子,说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大家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受了害还要受冤，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一些了解情况的同事和邻居，很同情我们，也为我们而鸣不平，但在那个真理早已被扭曲的年代，有谁会出来主持公道呢！自发生这件事以后，我就是开会、加班，再晚也要回家。永淑天黑后不敢出门，她每次睡觉前除认真检查门栓以外，还要用椅子把门顶住。当时她正逢第二次怀孕，此事对她的刺激相当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夜里恶梦不断……。随着孩子们逐渐成长，政治的牵连面也无情的延伸到他（她）们头上，大女儿学习成绩年年是班上第一，却怎么也入不了团，她妈不忍心看见她一次又一次向团支部写思想汇报，就对她说：“别写啦，没有用的。”女儿反问：“为什么？”作母亲的只好告诉她：“等高考结束后就告诉你。” 小儿子嗓音不错，童声的音调很高，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晚会上，他的大姐用小提琴为他伴奏，一曲学郭兰英的“春雷一声震天响……”迎来台下上千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轰动了整个农学院。在座的同事纷纷建议应该送他去学声乐或到文工团去培养，没料到儿子下台后问他妈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台上的同学都带了红领巾，为什么我不能带？”眼泪夺眶而出。这让我突然想起了‘株连九族’几个字，真令人不寒而栗！不是吗？我这个摘帽右派，牵连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还不算，远在成都的父母，也被批斗和抄家，就连兄弟及他们的子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了影响…。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封建王朝早就被推翻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在重演帝王统治时代的悲剧，不知道在马、恩的经典著

作中，有没有论及这种令人难解的历史现象。

四、落叶归根

1979 年夏天，我们终于盼来了水落石出的那一天，海军司令部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人来到我家，宣布了给我恢复军籍、作转业处理的决定，并发放了军装、领章和帽徽。对我提出回原部队单位的要求，作了一番解释，最后同意我回成都原籍的要求，并承诺帮助联系工作。从1958年4月到1979年11月，我经历了整整二十一年半、将近九千个日日夜夜的右派生涯。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我庆幸自己：一是还活着，二是我有个好妻子与我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三是子女都勤奋懂事，我有个幸福的家庭。事情也证明了，正是因为有了永淑的陪伴与扶持，我才能活过这段艰难酸辛的日子。

我们在饱受岐视、侮辱和迫害后，终于重见天日，终于可以像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那样，抬起头来做人，挺起腰杆干事了。像是魔法再现，几天之内，女儿入了团，儿子也戴上了红领巾，我们全家像过节一样，不，比任何节日都要隆重几百倍。我们吃美餐，穿新衣，兴奋得几天没睡好觉。白天，我理直气壮地穿上新军装，配戴着久违的领章帽徽去上班，到相馆留影，不断地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夜晚，一家五口围坐电视机前欢言笑语，其乐融融。(这电视机是用部队刚发的500元补助金购置的。）短短几天，我们简直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然而，我们又犯了估计上的错误，因为‘改正’和‘平反’并不等同，有些场合甚至差别很大，据说政府有内控规定，我这类人不只是进不了北京、上海，连成都、重庆也进不去，因而部队同志在成都为我联系工作并不顺利。经过一番努力，也考虑到永淑曾长期在农学院任教的现实情况，最终落实我俩到离成都150公里的雅安市四川农学院工作。我被分在该院农业机械系的电工教研组。当时我已四十五岁，到这样一个新的专业部门，我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这时妻子再次无私的,坚决支持我去奋斗，并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繁重的家务和教育孩子的重担，她自己还要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掌握新知识，以适应新环境的教学需要。在妻子的表率和支持下，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先后拿到了中级和副高职称。1986 年加入共产党。1990年老伴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1992年,为了支持大女儿的事业，我提前办了‘病退’手续，与永淑先后赴美居往。从此开始了平静安闲、与世无争的退休生活。

我俩相认相伴近五十年，事业上没有杰出的成绩，略感遗撼。聊以自慰的是在困难条件下，三个子女得以健康成长，如今都已立业成家，各自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大女儿晓晶在美国获博士学位，现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从事科学研究，不仅在生物化学领

域有突出成就，算得上是高水平的专家；而且对父母关爱有加，扯我们有机会多次赴美国、加拿大居住和旅游，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俩晚年生活的质量。二女小雯在四川宝兴县政府工作，工作积极、敬业，学习努力，通过自学获得了本科文凭。儿子小凯在成都，大专毕业后，在广告印务专业上努力钻研, 艰苦创业，小有成就。现在，我们特别珍惜目前的生活，努力保持身心健康，我们希望有生之年，眼前尚存的那片淡淡的灰雾，能被春风扫尽，以还我们一个明亮、真实的世界。

写这篇短文是为表达我对妻子的敬爱，同时也希望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同龄人，能了解父辈坎坷的过去，并不忘他们自己童年的辛酸，从而更加珍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最后，我想借此机会, 向所有勇于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之路，并给亲人以最大关怀、最大支持的战友家属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人生情愫

吴明祝

作者小传：

浙江温岭人，生于1933年。1951年7月入伍，先在陆军步校学习；1952年至空军航校学习。毕业后，于1955年入空军航校“师资班”进修。1956年9月任空军航校军械系助教；并授少尉军衔。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5月到郭堡水库劳动锻炼。1959年春到平遥继续劳动锻炼。“文革”初期，被戴上“两顶帽”后，被遣送回原籍温岭农村监督劳动。1978年，“文革”冤案平反；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先后在平遥一中、四中任教。1981年从平遥调回原籍中学任教至退休。职称是：中学一级教师。

一、离情篇

雪莲：委身于暴风雨的落花啊……岁月不居，一晃，近半个世纪即已过去！

对这些四、五十年前的陈年旧事，本不该重提。因为讲起那段尘封了如此久长的往事，我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说清楚了，反而错的了；道明了，又觉得茫然和心酸。好在咱们没有成为陌路人，还是朋友。雪莲！你说？都说婚姻是一种缘分。是啊，一个“缘”字，让世人写出多少个悲欢离合的故事！

雪莲啊！这是命运的拨弄，才使咱俩不由己的合合、离离——果真如斯。

让时光倒流到49年前的今天。那是1957年的初夏，我从空军航校返里省亲期间，咱们还是情笃的。随着政治形势的急转直下，我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即给你去信陈明我的遭遇。当时，你并没有立即就此事作出回应。时隔一年多后，你才给我发出这“最后通碟”。雪莲！其实，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是在情理之中。雪莲，我了解你，这不是你的错！

由于你生性懦弱，经不起这高压政治的威逼，所以违心地提出与我了却这一情结。尽管你有很多托辞，但我总认为这不是你的本意，仅是借口而已。我知道这是政治气候在左右你。又因为你本性善良，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才走到这一步的。故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种“移情不专”、“见异思迁”和“游戏情场”的人。你是受过一定的教育和有着良好家庭环境影响的大家闺秀。

雪莲啊！爱情，本来就有许多悲剧：一首《孔雀东南飞》、一曲《钗头凤》，唱碎了多少有情人的心；《梁祝》、《黛宝》，讲的也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今天，在这个

荒唐的年代里，那残酷的政治又何尝不是在依然上演“棒打鸳鸯散”呢！我们就是被击打分散的一对。

雪莲！咱俩的这段情，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是欢乐还是辛酸，在你我的回忆里，也许都是难以忘怀的。因为，我们的这种纯情的关系，可以说是既浪漫又沧桑。浪漫的是，虽不是“指腹为婚”，但纯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的“娃娃亲”——确定关系时你才 5 岁。现在看来，实在荒唐可笑。尽管这都是双方父母的事（因当时我们都年幼不懂事），但等到我们开始慢慢懂事以后，对这种畸形婚姻，大家都觉得并没有错配的意思，也不认为应该有解约的必要。而双方父母、亲戚、朋友，也似乎都已认可，且延续了二十多年。沧桑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以及时代的更迭和长时期的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无法在情感上进行沟通，致使这本不稳固的情感，蒙上了阴影，出现了裂隙。由于得到双方父母的极力扶持、呵护，总算没使这岌岌可危的关系频临崩溃。

雪莲！在此，我得谢谢你给了我生命中最美丽的童话，可你也让我看清了极左政治的可怕和人性的脆弱与沉重……

雪莲啊！你太天真了。过去的这些年，你的日子也是过得挺艰难的。原本以为只要屈从政治，委身政治，就能依附政治来拓展自己的前程。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政治场”是一个是非之地。一个委身于暴政的人——将是一种永久的牺牲。政治，之所以给你烙上了烙印，编入了另一册，打入了“冷宫”，就是因为你曾与右派的我有过一段婚约。本来，你曾考取了名牌学校，结果，政审时通不过而改入最差的了；就业时，同样是设置了种种门门、槛槛，使你怀才不遇、难遂心愿。雪莲啊！我真替你惋惜！

值得庆幸的是，你我都已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另一半，也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幸福，这是令人欣慰的。雪莲啊！聚时的亲情，散时的酸楚，又何尝不是诗呢？！

记得 1958 年深秋，我在郭堡曾给你写了一封长信。信的中心意思是：我们相爱一场，应该好聚好散，并尊重你的选择；而作为不幸的我，绝不能再给你制造不幸。据说，此信你还一直保存着。雪莲！这说明在你的心中，还有位置留着给我。在此，我由衷的感谢你！我们之间，应该说是有感情的。再说，咱们的友谊能延续到今天，又是多么的不容易！

雪莲！这坎坎坷坷，如泣如诉的岁月，真是触物惊心、触景生情！其实，在我们的感情世界里，时间是经、空间是纬。细细密密地织出了一连串的悲欢离合；结出了极有规律的阴差阳错。而在每个转角，每一个绳结之中，又都潜藏着一些脆弱的东西，只

是原来我们都茫然不知。雪莲啊！当我回首之时，蓦然间发现一切脉络历历在目，方才无奈地领悟这痛苦和忧伤的缘由。雪莲啊！人生就像一个方程式，各种系数都有自己的固定值；一旦变化，就不是原来的程式。你说？

虽然，我们也已在庸庸碌碌中跨入暮年了，但愿暮年的我们不在惭愧中衰老。好了！我是不该来牵惹你的情怀的。再见！ 祝

健康、幸福、长寿！

你的朋友　明祝 于丙戌端月

二、伤情篇

上世纪的 1958 年暮春，我们这些时代的“逆子”（也有人称之为“孽子”），被遣送到太谷郭堡来修水库。说白了，实际上乃是一种变相的劳改，但还美其名曰“劳动锻炼”。大家肩扛铁锹，口唱革命歌曲，心里却不是滋味。这种重复、单调的生活持续了几个月后，我们也被大跃进的浪潮卷了进去。上面号召“大炼钢铁”，我有幸被抽调做找铁矿的工作，并委以技术指导的重任。说实在的，我对这一殊荣实感不配；但既已这样定了，也只能绝对服从。那时，如果违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所在的找矿小分队，是祁县任家堡公社的一支民工队伍；我们要找矿的地段，是位于郭堡水库象峪河上游的两座大山。营地就扎在该山麓的一个小村落。这个昔日闭塞且又僻静的小山村，如今，已因采矿大军的到来而变得熙攘、喧闹。

找矿工作，身体是累些，但精神还倒轻松。尽管这差事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指标，可我们还得尽心尽力去寻，去找。 与憨厚、质朴的父老乡亲们相处久了，通过零距离的接触——同吃、同住、同劳动，所充溢的尽是理解、和谐、关爱。我真幸运，作为在狂风恶浪中几乎倾覆的一叶扁舟，能有此宁静的港湾停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福！

一次，我与乡亲们在山上找矿，不慎从一个不太高的山崖跌落，所幸没有造成重伤。是找矿小分队里的任叔，把我从山上背回小山村，也是任叔，用小毛驴将我护送到郭堡，又是任叔，守在病床边对我悉心照料……。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一个政治权力祭坛上的祭品，一个身处逆境中的我，能得到乡亲们的如此关爱，真使我感激涕零。

生活有时很神秘，有些事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冒了出来。那是在我养伤期间的一个傍晚，当大伙儿围坐在一起闲聊时，才知我还是单身未婚。

于是，众人提出要为我这个生于东海之滨，且带有浓重的吴语口音，又不善言辞

的小伙撮合婚事。开始，我还以为是拿我开玩笑，可大伙是认真的。撮合也是有标准的。乡亲们都说："看来只有咱公社老任家的闺女才与小吴般配"。大伙都一致这么认为，而任叔也表示认可，事情似乎就这么定了。但我纳闷，也很尴尬，因我的处境是：头压"咒箍"，身陷"露天囹圄"（没有高墙的牢狱），政治贱民、专政对象、右派分子、黑五类……。这些"桂冠"令人闻之色变。可任叔他们却认为：我们来郭堡劳动锻炼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好样的人"、"受委屈的人"……

对此，我衷心感谢所有关爱我的父老乡亲；也感激任叔对我这般怜爱和信任。说实在的，这种越是真诚的关爱，越是叫人难以直面。当时，我原籍的女友正因为我的政治问题连累了她的升学求职而与我分手！那积聚在我心头的伤痛和反思之苦，依然相当凝重。故像我这样一只伤痕累累、折翅难飞的孤雁，想圆双飞梦，又谈何容易！再说，这位我尚未谋面的女孩子，还只是个祁县中学的在校生。她与我素昧平生，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与之谈婚论嫁，这似乎也不合情理。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不能只是为了自己而去伤害一个纯真少女的心，更不能因我的政治问题而毁了她的前程。尽管人们对这桩婚姻的期望值很高。

任叔，是祁县任家堡公社群众中较有威信的一个农村秀才，其女正是花季少女。对此，我总弄不明白任叔是怎么看上我的，且如此关爱我、信任我、呵护我，甚至将他的爱女相许于我。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破译的感情密码……任叔又是一个实在的人，他基本上不当我面夸他的闺女。倒是任家堡公社的乡亲们在褒奖姑娘的人品：中等个子，天然秀丽、文静聪慧……是当地少有读中学的女子。对此，我并没有当一回事；因为，残酷的现实，不容我去作过多考虑，也不容我去作什么权衡，让其自然发展好了！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

1959 年初春，我被遣送到平遥。当我收到任玉莲发给我的第一封信时（并附有一帧她的近影），我惊呆了！我真佩服她能抛开市俗的偏见，迈出这一步；我更叹服她在那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能冲破人群等级十分森严的樊篱。这在一切都被政治化了的那个年代，她能有此行动，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此举更激起我对她的尊重。故我用理智在竭力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始终与她保持纯正的兄妹情谊。我也信守这样一个信条：人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一个女孩子的事。尊重人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人也是一种美德。

维系我与任玉莲的这种情谊是相互理解，而抑制这种情感的发展，乃是传统观念与残酷的现实。我实在无奈！李商隐曾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这似

乎是一种什么人生定律，我说不准。但是，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这是有道理的。我与她的相识，既不是萍水相逢，也不是邂逅相遇，而是有祁县任家堡那么多好心人在穿针引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偕挚友李道性去祁县城郊一所小学看望玉莲。此时，她已是一个青年教师了。我们相对无言，但各人心中都有难言的酸楚。这就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运动的迅猛，这种情感只能是如此而已！见面后，不由得心头袭上一股苦涩感和给人以更深重的悲苦与冷凄……

有人说：缘分，就是机遇。但机遇总得有人及时去抓，才不致于错过。而作为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又哪有气力去抓这种机遇？所以，只能是望“情”兴叹！这就是时代所给予我的一杯苦酒！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境的不断恶化，这种无奈而伤感的情分，就这样渐趋终结。

文革期间，风云突变，我又在苦难中熬煎。十年浩劫后，我冤案平反，返回平遥时，由于各自都有了家室，故不忍去打扰她这颗已经平静的心。我没有给她去信，也没有去看望她。1981 年，我从平遥东泉中学调回原籍浙江温岭城南中学后，道性告诉我，玉莲已在祁县一农村中学任教。此后，曾一度书信往来，期间，我们谈得最多的都是切磋教学上的事。郭堡的这段情，结果是“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这也许是阴差阳错，也许是形势使然，也许是命运捉弄，也许是无此缘分……

岁月无情，时日不可倒转，往事亦不堪回首。感慨啊，感慨！我不只是在人生道路上历尽艰险，在精神上同样是伤痕累累。在此，我祝愿：好人一生平安！也默默地为所有好心的人祝福，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幸福！也默默地为关心过我、理解过我和爱过我的好心人，点燃一支永远也烧不完的心香！

三、真情篇

人间自有真情在！

我这一生的确生活得很累、很苦、也很惨——这是厄运；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那些伤情、离情、真情又总是接二连三地惠顾于我——真是幸运。

在那悲惨的岁月里，当政治类别的界限壁垒的时候，当令人厌恶的“桂冠”不断给我“加冕”的时候，当我极度痛苦无助的时候，当人不是人的时候，一个被我的孩子们谓之“伟大母亲”的女性，竟不顾政治压力、无视旁人的冷眼，毅然走进我的生活，给了我一个正立的、大写的“人”的尊严——她，就是给我真情的梁恩莲。

我的妻子梁恩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其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商贾，口碑很好，也是当地教会的负责人。她也算是一个大家闺秀。1.6 米的个子，中专毕业，气质不错，给人有一种自然美的感觉。她又是一个自幼从浓重宗教氛围中熏陶出来的，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爱多善也多的有着传统观念的妇女。她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在这个家中，她是一根顶梁柱（没有她这个家早已塌下）；在能理解我的人的心目中，她被誉为了不起的女性；可在一些“红”人看来，她是一个“怪”人，竟下嫁“黑”人！人们啊，她并不怪！而是基督的爱在她身上真实的流露！我真幸运，能有这样的知音相伴终身，这是神的祝福，也是天赐良缘。在她的影响下，我也皈依基督，并在患难中寻求信仰的力量。

由于我俩的父辈是世交，两家都又有同一信仰，也相互都比较了解。所以，当我身处逆境，并在绝望中挣扎的时候，她和她的父母，以基督的爱使我绝处逢生……。

1966 年 7 月，我被遣送回原籍浙江温岭农村监督劳动。初到农村，生产队给我的劳动工分底分仅仅“3”分（一般劳力都是 10 分，就是妇女工也不少于 6 分）。而每工分到年终分红时，折合人民币只有 0.08 元。这就是说，我起早摸黑劳动一整天，也挣不到 3 毛钱。这叫人咋活啊！不久，我的妻子又因我的身份受株连而被迫离开教师队伍（经过交涉，1970 年才返校任教）。这正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打头风。

十年动乱期间，家抄了又抄、人跪了又跪；做不完的无偿劳役、写不尽的有罪自谴……那时，我真的想一死了之。但是，当我看到年幼的孩子，和愿与我共患难、相厮守的妻子，我又不忍抛下他们。终于咬咬牙苟活下来，现在想来，幸好没去死掉。死，也是白搭。

在那残酷的现实面前，为了能活下去， 我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发展所谓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晚上出去以肩挑为生，贩卖点海鲜，赚取一、二元血汗钱来养家糊口。妻子在农村与我同苦同难，也为了能活下去，除了参与生产队的农活以外，她又操起“织袜”“成衣”的生计。为了这个家，她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并得到其父母、弟妹的帮助与支持，总算活了下来。对此，她无怨无悔、坦然面对。她的这种“真”，真的是难能可贵；她的这种“善”，真的是本性的善；她的这种“美”，真的是心灵的美！然而，就是如此苦度，残酷现实也不让我们安生。看来，我只能坐以待毙了！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似乎就是契可夫笔下《柔弱的人》的人。唉！时代无奈，我更无奈！

同是十月怀胎，落地成人，缘何竟不是一样的人？这是因为在这个庄严的“人”字面前，有着不同的政治标识。

我的青春是贴了标签的。

妻子受罪，是因为不愿与我划清界线；孩子遭罪，是因为与我有相同的“DNA”。他们真是不幸者的不幸，也是无辜者的无辜！要知道，可怜的孩子根本无法选择生在哪个家庭、哪个时代？亦不可能选择长在哪个制度、哪个社会？他们在这样的时代里成长，已经够可怜的了。孩子们不但享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融融之情，而且更是少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少了童年的乐趣，少了生活的色彩……每想到此，我就感到心中隐隐灼痛。这种痛，乃是一种永远也抹不去的隐痛，也让人悲悯无比，并有一种使人流泪甚至有被活活憋死的感觉。

孩子渐长，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是啊！一个“黑五类”的子女还想上学？无奈，我只能买些书进行“家教”，而这种家教的效果虽不亚于红五类子女的在校学习。但是，老是这样家教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设法把孩子送往外县亲戚家所在的学校读书。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刻苦。现在看来，子女们还算有出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时，我的大女儿才 8 岁，就去海涂“赶小海”（捡贝类、捉砂蟹）；去农田拾麦穗、拾稻穗；去山上割草、打柴。而年仅 6 岁的儿子，竟一手提着裤管、一手握着竹枝，在放牧一群雏鸭。他的“课外作业”就是捉泥鳅、钓小泥蛙。孩子们早出晚归，为的是要共同活下去，也为的是能分担我这个“黑五类”父亲的生活重负。天哪！这到底是谁在捉弄我的命运？历史啊！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个世界是属于弱者的，因为弱者最懂得适应。适者生存嘛——历史如此说。

“株连九族”，本是封建王朝极权政治专政的模式。然而，在“民主”、“共和”的社会里，这种株连，竟在我的儿女、妻子身上延续，且过犹不及。痛哉！

那些年，虽然苦难和不幸临到孩子们这一代，但也促使他们的思想早熟，发奋努力；并养成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且刚直不阿，从不乞求、逢迎。这是令我欣慰的。

在那云谲波诡的年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了，或者被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心里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宁静。这种“宁静”，只是经历磨难之后的内心短暂的“宁静”，也是人演绎给坎坷命运的一种恬淡而超然的心境。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品尝的苦酒与折磨也与日俱增。于是，那昙花一现的“宁静”即刻消逝了。而凸显的乃是：我叹——无奈，我悲——无助，我怒——无处可宣泄……

由于我承受的各种压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所以，我的性情竟变得越发乖戾。我只能向着亲人发泄——打骂孩子。致使他们幼小的心灵烙下了重重的烙印。期间，受到伤害最大的要数我的大女儿。她的犟脾气和倔强的性格，也助推了我的“激动”（但

她的这种"犟"和"倔强"又铸就了她今天事业的成功)。

如今，当我回过头来，反思此事时，我自责、我内疚；我欠儿女们和妻子的"情债"太多了；我不但无法偿还，而且亦难以用我余生的时间来愈合这一伤口。我只希望孩子们能原谅我，不要记恨我……

按理说贫困是不能磨灭人的良心；苦难也不会把亲情淹没。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能不断地磨损着人的天性；而残酷的政治又将人的亲情扭曲。孩子们哪，这就是你老爸难言的苦衷。

在我一生中，所发生过的各种各样倒霉事，都让我碰到，无一漏掉。你说奇妙不奇妙？！毛泽东去见马克思以后，十年浩劫，基本结束。可是，怀揣遗诏登基的"两个凡是"，竟差点把我整死。看来，我就是这祥林嫂的命、阿 Q 的魂。——尽管，我是不信"宿命论"的。

黎明前的黑暗是可怕的，但也是短暂的。

1977 年暮春，工作组进驻农村。上面得悉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有一个"双料货"，肚里有点墨水，且是"老运动员"，不好对付。于是，经过策划，抽调公检法有办案经验的干警组成专案组，轮番对我进行审讯，并将我无端关押了整整 58 天，无非是：纠缠旧账，清算新账（贩卖鱼货发展资本主义）。我是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任凭他们搞。正当他们要准备将我置于死地的时候，不知何故，一夜之间工作组全都撤走了。这是天意，还不让我早死。我总算躲过了这一劫！

这 58 个日日夜夜哪！简直是一场噩萝。我受的折磨不去说它，但妻子和孩子们所遭的罪却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每当孩子们给我送饭时（不能直接递给我），虽没有说什么，但落寞眼神，催人泪下。那时，妻子是在离家八、九里远的小山村教书。每天要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奔走 4 次（给孩子们做饭再由孩子们给我送饭）。晚上回家还要受工作组的训斥，说她不配合。另外，在召开批斗大会斗争我时，妻子在台下心如刀绞……期间，她所受的身心打击，确是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为得知我在关押中的身体状况，她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饭菜中暗藏"字条"来传递内外信息，互报平安。这就是"共患难"，这就是"长厮守"，这就是"基督之爱"。还有，我也从"字条"中得知：山西平遥已两次来电报催我北上，为我的冤案平反。对此，我绝食抗议，最终就不了了之。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制"，这就是"人权"。

只有真情，才能给婚姻带来幸福。在我气馁的时候妻子鼓励我，骄傲的时候她告诫我，伤心的时候又安慰我；而从来不让我看到她的苦恼、悲伤、哭泣……

她一心循着自己的道路走，让人家随便怎么去说好了！

多艰难的路啊！可她却常说："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走一步，算一步！"一番话，给人以无限感怀和喟叹！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和幸福，就是有了她。她完整了我人生的"一半"。尽管我经历了人间苦难，阅尽了人间温暖，但她的真情却使我明白：我来世上这一趟，太值了！而她给我的，远远超过我所能给她的很多很多。故我每天都从心底里感谢她！

唉！俱往矣！那都是过去了的事情。

我也彻悟了——人生就是这样，当你一明白过来的时候，你就已经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的爱妻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有二女一子，大女儿初中毕业（因家庭重担落在她身上无法继续上学）16 岁就进工厂当童工，我平反后才招工进厂，现自办企业，效益尚可；儿子大学本科毕业，中心中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小女儿大专毕业，小学高级教师；妻子小学高级教师，已退休；我是中学一级教师，已退休十多年。

看来，日后的生活真的很美！亦很幸福！但龙应台女士说得好："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但愿如此！

如今，我已年逾古稀，老伴也已两鬓花白，垂垂老矣！

愿天下有情人都能"举案齐眉、白头偕老"，幸福伴随一生！

老伴，老伴！老来作伴！俩老互相搀扶着走完人生最后路程！

拾鹅卵石 (流放第一课)

张英敏

小小卵石满河床　我来把它捡进筐

当年生成多棱角　如今磨得园园光

山崩石裂洪流急　风吹日晒暴雨狂

辗转万里今到此　填入坝基勿彷徨

苦难历程中的伴侣

余慰明

这里说的是我和我的妻子戴汝泉在反右前后的事。

戴汝泉，江苏泰兴人，1933 年生，比我小六岁。她从小聪明，并受到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时，年方十九岁。

初识与交往

我们是在 1957 年初认识的。当时，我在军委空军工程部任助理员，她在石油工业部财务司当会计。整个春天，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见面。我喜欢她直爽的性格和嘻笑的情绪，愿意跟她谈话。她满意我给她拍的照片，特别喜欢听我给她唱冼星海的“夜半歌声”。我们相约在剧场、影院、饭馆或公园。有时我约她，更多是她约我。夏天，反右的风暴拆散了我和她。半年多，我失去了人身和通讯自由，谈不上和她的联系。运动结束后，黯然离开北京时，我又不愿意以我的身份影响她，没有与她告别。

1958 年我被放逐到郭堡水库“锻炼”，劳动之余，忍不住试着往石油部给她写了一封信。好心人把它转到了她下放劳动的湖北省孝感县农村。她回信了。我们继续通信，在信里只讲生活和劳动，不谈政治与感情，但是我感到，感情是逐步在增进。

在通信中，我的身份她是知道的，她的政治情况我不清楚，又不好直接问。但是从她的性格、言辞和工作变动来看，我断定她也在劫难逃。于是我决定去北京找她。当时，我在建筑工地劳动，要请假十分难，即使准了假还不给你开介绍信。一天，我拿戴汝泉的电报去请假，要求去北京看对象，领导准了三天假。我买了火车票在候车室等车，忽然，单位的保卫干事匆匆跑来找到我，说：“跟我回去，你不能走了。”并不说明理由，叫我失望且茫然。旁边的同事悄悄告诉我，是保卫干事发现我去找的对象名字，不是女人的？！凭这样一个无端的猜测，就随便剥夺一个男人看望配偶的权利，我伤心极了。

我第一次重见她时，她已经从湖北农村回来，派在十三陵石油部农场劳动。十三陵农场离北京站很远，因为既没有身份证明，又没有介绍信，不能住旅馆，只得在车站候车室过夜，一早再赶往十三陵。因疲惫、饥饿，我从她眼神中看到了怜悯，但这不是我需要的。她告诉我她也被打成了右派。说起来也可笑。那时，石油工业部反右运动开始。党支部有一个人来问她：“小戴，帮助党整风，你有什么意见？”一向心里存不住

话的她说："有，1、肃反时，叫我们青年团员批斗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结果都是搞错了，我看有些扩大化。2、匈牙利事件，苏联不应该出兵。"来人说"那你写个材料吧。"她就写了几页稿纸的"思想汇报"。好！内容符合五条标准的两条，又有亲笔的供词作证，不需多考虑，就把"戴汝泉"的名字写进了尚未填满的"一般右派分子"名册。但一次也没有开她的批斗会。为什么？不知道。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也许因为知道这个女孩子任性、爱哭，省得麻烦。只要完成阶级斗争的任务，不惜把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轻易定位于人民敌人，让她遭受几十年苦难折磨而无动于衷，太残酷了。不过她告诉我，她在农场很快活。那时是在饥饿的 60 年代初，我在山西吃玉茭芯、人造淀粉以补充一天四个干馒头的不足。她却在农场养鸡，不但有鸡蛋、小公鸡吃，有时还偷着喝点拌小鸡饲料的鱼肝油，吃得胖胖的。我为她的好运气由衷地高兴。

我第二次看她时，她已经从十三陵调到了石油科学研究院行政处当会计。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她正在院子里给职工分西瓜。人一生中总有几个难忘的形象记忆，这是我最深刻的一个：院子的地上堆着许多西瓜。她穿着凉鞋、半短的蓝裙子，上身是一件褪了色的酱红色布袄，在西瓜边飞来飞去，装模作样地弹着拍着给职工们挑西瓜，许多人说"小戴挑的西瓜甜"。高兴映在她绯红脸颊上的笑容真美！看来，她的人缘还不错。她看见我，擦擦手，带我到了她的办公室。叫我十分吃惊，桌上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张她写的字条："历史将宣布我无罪"。不敢想象，如果在山西，无疑是右派分子翻案，证据确凿。这里怎么就没有人管呢？这要从单位的领导班子说起。行政处是石油科学研究院里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配有三个处长，一正两副，都姓刘。他们都是年岁已长的军队转业干部，没有文化。三个人，互相瞧不起，为小事闹矛盾，常当着众人吵架。研究院的高级知识分子虽多，但行政处只有戴汝泉一个大学生。汝泉有一个优点：尽管在石油工业部财务司时，管理全国石油企业的大数额资金，现在只叫她管行政处柴米油盐、车辆被褥费用的小钱，她也不觉得委屈，照样干得很欢。她管财务，采购员、汽车司机来报销，她执行制度，但不苛刻，能过的就过，因此这些人也对她好。政治上，三个处长对她的看法一致：年轻人不懂事，说错话，不会是成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认为，这实在是她的运气。因为万一有一个人对此意见不同，她就必然会变成相互斗争的祭品。领导的看法如此，下面的人也就对她好。例如收发室的老汉，见了她的信必定收起来，要亲手交给小戴，管招待所的女工王文英，更是像对小妹妹似的护卫着她，怕她受委屈。一天，政工部门贴布告给戴汝泉摘右派帽子，王文英看见就一把撕下，也没有人过问。她思想敏捷，笔头快，又与人为善，处里的计划、总结、发言稿，都叫她写，甚至有的

政治报告也要她动笔。处长处理公事，大些的往往叫人喊小戴来，小些的叫去找小戴办。处长之间闹意见，竟常常找小戴评理。她俨然成了行政处的秘书，有人戏称她“二处长”…。这样的政治氛围，有几个右派遇到过？

结 婚

人家不歧视她，她也处之泰然。因为她年轻、美丽，不少人追求她，其中追得最厉害的是康世恩部长的秘书李 HX,她都没有接受。

我和她之间的爱情成熟了。1962 年春节前腊月二十八，我去北京和她商量结婚的事。她说：“你来了，我们今天就结婚吧。”我吃惊说：“那哪能行，一点准备也没有。”她说：“这你不用管。”…。听说小戴要结婚，三个刘处长都来了，然后分头到各个宿 舍去叫人，王文英很快在招待所布置了一间新房。汝泉掏五十元请人买了一堆糖果、花生。入夜，招待所的小房间内挤满了人，在这里我们举行了一个有来宾没有亲属，有司仪没有主婚人的特殊但热闹的婚礼，还闹了房。晚上，我问她：“这里这么多年轻人喜欢你，你为什么不从中挑一个？”他笑着半开玩笑说：“我非右派不嫁”。

过了春节，我们到五道口派出所领了结婚证，到王府井中国照像馆拍了结婚照，完成了我们的终身大事。我感到十分幸福。几天后，我独自回到了山西。

1965 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男的。不久，我被调到了晋中农机局。

北京－山西

1966 年，政府决定：动员夫妇两地分居，一方在京的要调离北京。北京啊北京，谁舍得离去。等着，拖着，托人求情，千方百计最后留下的例子身边就有。1966 年在山西的摘帽右派的处境怎样呢？政治上的歧视，精神上的压抑，生活上的艰苦，这是每个郭堡难友都知道的。对我的妻子来说，从北京到山西，就像从平地走向深渊，温泉换为冰窟一样，反差太大了。结果会怎样？我不敢细想。不料她迅速、果断地作出决定：“走，到山西我们一起抚养孩子。”见她毫不犹豫为我作这样大的牺牲，我流泪了，心中除了感激和感动外，还能有什么呢？我在机关附近，租了一间土炕占三分之二面积，坐东向西的终年不见阳光的房间，安置她母子。我们前面就像一条没有灯光的泥泞的路，不知哪一脚就会塌下去。

文革初期

她到后几天，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右派分子不论有没有摘帽，一律都是五类分子，被一切横扫的牛鬼蛇神。我首当其冲，被作为“三家村”成员批斗，她

相信我没事，示意我要顶住。农机局有几个从中技校毕业，贫下中农出身，心红根正的革命派，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凶暴残忍。第二个被斗的叫宁喜龙，五十来岁，早年参加 129 师，中途有过变节行为，后来反正，已作历史结论。文革时，又重新翻出来当作叛徒来斗。对叛徒更不能手软，斗到深夜，主持人借故退出会场，革命派一拥而上，背剪老人双手，叫他站在板凳上，弯腰，低头，颈上挂一个八号铁丝圈，命令他招供，不招，就在铁丝圈上加一块拖拉机的生铁配重，不招，再加一块，铁丝深深陷进肉里，豆大的汗珠从老人额上流下，老人倒下，一只一只脚往他身上猛踢…。我们夫妇都是陪斗的专政对象，对此焉能不心惊肉颤。专政对象每天集中学习两个文件, 一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二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学了写心得, 写检讨。她就是不写，还提醒我，不要随意留下笔迹。回忆起她的“思想汇报”和“历史将宣布我无罪”字条，我感到在斗争中，她逐渐成熟了。对她，造反派没有什么材料，就在大字报上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妖冶。这她都不生气。叫她难受的是不给她足够的喂奶时间。成天开会，只在上午十点，下午三点给二十分钟喂奶时间。孩子未满周岁，人奶、牛奶都没有，靠吃奶糕。把奶糕调稀，烧开，再用冷水浸凉，时间就差不多了。只得把奶瓶吊在小床头，奶头塞在嘴里，让孩子自己吃，赶紧回去开会。有一次，我俩开会回来，只见奶嘴被拔出，奶糕流得满脸、满床，孩子一个人在哭。做母亲的心怎能忍受？那年月，人道不人道是不能说的。带“人”字的名词：人道、人性、人权，都是阶级专政的禁忌。

逐渐地，斗牛鬼蛇神转向派性斗争。榆次的许多小的造反组织分散、重合，组成两大派别，一派支持刘格平，叫总站派，一派打倒刘格平，叫总司派。两派愈斗愈烈。要不要介入？我们夫妻商量，认为：只要不让人抓住把柄，介入比不介入好，因为不介入两派都视我们为敌，介入至少可以减轻部分压力。其实我们也是有观点的。于是我们宣称我们是总站观点。果然，总站的人跟我们接近了，常来我家开会，有时还帮点小忙。我们大儿子不够年龄，提前入托儿所，是总站人帮的忙。1968 年，老二早产紧急送医院，也是总站人抬担架。

这次生的又是一个男的。

五七干校

遵照“五七指示”，晋中地区在吕梁山深处的方山羊场办起“五七干校”，专政的与被专政的都去。我们在晋中举目无亲，只得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三岁，一个才几个月）去上干校。在干校，男人与家属分开住，前者住羊圈，女人带孩子住羊工宿舍，

一张炕三家人。有时孩子尿炕，就尿湿了邻家被褥。男人成天下地、开会，不经常和家属见面。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找羊奶、洗尿片、被褥、缝小衣，以及后来把小的寄托在农户家，都是她拖着一个三岁娃娃独自干的，没有跟我诉一声苦。作为孩子的父亲，能不感谢妻子？一天下午，她神色慌张地跑过来说：“小二快不行了。”我急忙跑去看，孩子满脸通红，额头滚烫，浑身抽搐，很是可怖。我赶紧请假，托人照看大孩，雇了一个乡民，他拿来一个撒肥的腰萝，用麻绳在胸前绑紧，汝泉把孩子轻轻抱进腰萝，盖上厚厚的被子。三个人匆匆地赶往离干校十来里的马坊镇医院。沿途几次揭开被子一角，用手探进去试试孩子还有气没有。医生检查后说：是急性肺炎，你们送得及时，给他注射青霉素。我在马坊住了两晚，孩子脱离了生命危险，汝泉留下照看，我先回校归队。队长批评我：“你送到就应该回来，是不是想趁机躲避劳动？”五七干校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在这里，当一个学员的孩子生命垂危，父母手足无措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伸出救援的手，有的竟是对可怜的父亲的指责。接连的阶级斗争，把做人的基本同情心都泯灭了。

大山深处

冬天到来，五七干校解散。所有专政对象全部上山插队。我们分配在柳林县薛村公社高红大队。趁搬家间隙，汝泉抢着生了我们的第三个孩子，还是一个男的。满月后，我们夫妻带着大包小包，领着三个小男孩，坐颠颠簸簸的公共汽车到高红去过农村生活。这是一个土地贫瘠，没有工副业的穷困山村，村里连小卖部都没有，过的还是自然经济的生活，什么都得自己干。插队后不久，我就被借到县里搞水利工程。我把家里的粮食和煤买好，把水缸挑满就走了，剩下她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我家的窑洞在半山腰。水缸空了，她得去挑、山路陡而窄，中间没有歇脚的地方。一担水从山脚不歇地挑回，她在家时那里干过。小时她家人口多，六兄弟姐妹，她在中间，上有哥姐，下有弟妹。父亲是中学教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她不爱干家务，母亲骂她懒，但是她学习成绩好，父亲宠她惯她。现在呢，不干不行了。她爱说话，热心，一起劳动，很快就跟村里的婆姨（媳妇）们搞熟了，但真正令她们注目的是下面一件事：偶然, 我的妻子救了一条人命。村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叫 果儿 , 她和一个年青的筑路工人、有妇之夫在高粱地里发生关系, 怀上了孕。在山村里, 男女关系乱, 又十分迷信。临产前, 她的哥嫂把她赶出了家门, 因为在家养私孩子, 被认为是最不吉利的。半山上有一个敞开的土洞, 洞里放着一口空棺材, 哥嫂叫妹子到那里去生。那时是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几的夜晚, 北风呼啸, 天寒

地冻,在冰冷的山洞里生育,非冻死不可。她妈带着她敲开我家窑洞的门,朝我妻跪下,请求救她女儿。我妻心软,立刻在炕头腾出一块地方,让她生下了一个女孩。不顾我妻反对,她妈把这个小生命卷出去扔到了河里。女孩在我家住了几天,回去的时候,送给我家一块小红布。很快,这事在村里传开了,有两种议论,一是说她傻,揽这种倒霉事,更多的是说她心肠好。不管怎么说，但没有人不真心佩叹她，因为她救了村里的一条人命。从此她与农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1973 年我们下山回城。

1979 年改正。

尾 声

这篇文章我是写给我妻子的，可是她已经不能回忆自己的往事。

1998 年一月，医生确诊她为老年性痴呆。八年多逐渐加重，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记忆能力。她不认识家门，也不认识熟人。走在院子里她还是见人就热情打招呼，可是我知道她一个也不认得。她的亲姐姐指着自己的鼻子问："我是谁"，她愣眼看一会，摇摇头。成天摆弄数字、金额的高级会计师，现在不识钞票，加法也不会做。电视看不懂，她问："这些是什么人，到我们家来干什么？"

不过，她现在还具备感情和情绪，体能不错，还能走路。我带她去没有去过的地方走走，坐一坐没有坐过的交通工具。远处坐飞机，火车坐软卧，轮船坐头等舱，我不吝啬钱，因为欠她的太多了。走过了就忘记也不要紧，只要情绪好、高兴就行。这是我应该做的。

二〇〇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于山西太原

永不后悔的选择

邱永淑（唐正光老伴）

作者小传：

女，1934年生，四川中江县人。北京农业大学58庙毕业。1958年分配到北京中央气象局农业气象研究室工作。由于政治上受牵连，1960年调南京气象学院教书；1963年调山西太谷县山西农学院任教；1980年调四川农学院工作。1989年退休。

‘小皮球’和‘小海軍’

童年,我是一亇性格开朗、聪明伶俐、活泼好动,但并不張扬的女孩。

1954年秋,我荣幸地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来到首都北京上学。大学期间,我不但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个人兴趣爱好也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和发揮。虽然我亇子不高 ,但无论在田径、球类、唱歌、跳舞各方面 ,都不落人后,还被选进了校体操队、系排球队、不少同学还很欣赏我纯真的童音歌嗓。课余时间,人们常常看到的是活蹦爱跳、笑脸常开的我,所以，同学们都喜欢叫我‘小皮球’，而不常称呼我的大名。

1957年春天一个明媚的周末 ，我初次到邻近的海軍大院拜访中学同学刘長松时,认识了刘的同事海军军官唐正光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雅、潇洒英俊、又畧带腼腆。由于是老乡,对事物的看法、观点比较一致，文都喜欢运动,郊游、唱歌和跳舞,所以接触的时间就多一些。每逢周末或节假日 ,我常常约一两位女同学去海军大院跳舞 、打乒乓球,大家相处融洽，十分开心。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同学到老刘宿含去看他新买的小提琴,同室的老唐正在学习,桌上放着几本数理化方面的书箱,笔记本上写得工整而详尽。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准备报考北京航空学院(听说,他们部队当时有代培名额)。这个奋发上进，很有朝气的青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六月,母亲在老家突患急病去世,我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几天不思飲食,躺在床上如同大病一场,连考试都没有参加。不知正光怎么知道的,他特意趕来看望我、安慰我，临走留下一封信,信中要我节哀保重并夾有二十元钱,嘱咐我寄回家料理丧事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困难时刻,得到异性朋友的关怀,精神上是个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悲凉的心灵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种。我在苦嚐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的同时，又感受到了真诚友谊感人心肺的魅力。待他再次采看望我时,我的身心已经恢复正常了。我领他参观

了农大校园,也结识了我的同学,因为他長相年轻,同学们没记住姓名，就背地里称他为‘小海军’。从此后,每当宿舍楼守电话的大爺呼唤我接电话时,就会引来同学们玩笑的起哄:是‘小海军’吧？弄得我脸红到脖子根,慌忙解释是邀我们两个四川老乡过去打球。

风暴来临

1957年秋,反右运动席卷全国,斗爭批判、口诛笔伐、风声鹤唳 ，把校园内外的文体活动一扫光，多日没有正光的消息。一天,正光同科室任党支委的老余带来了坏消息说：‘小唐鸣放的言论有问题,已被停职检查,你要注意划清界线,帮助他认识错误…’。我们原先有个约定,周末通电话。我急忙联系,正好他在办公室,他让我不必担心，有机会再详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因为在肃反问题上为一位同事沈某讲了几句公道话；又在讨论苏联援助时,发表了不同意见,从而惹禍的。这时,我们学校的运动也是表面轰轰烈烈,实则捕風捉影,让人不敢随意表态,但心里自有看法。比如我校畜牧系七位同学联名写出大字报《人命不如牛命》,说他们在农场实习时,杀了一头不能作科研用的淘汰的小公牛来改善伙食。虽经多次检讨,学校仍然给每人记大过两次小过两次。可班里一位党员,在郊区骑自行车撞倒一个在路边拾柴火的大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结果只记小过一次。明显的处理不公,校方不反躬自省,反而把写大字报的事拔高、上纲为攻击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连表示同情的同学也被列入批斗对象。堂堂最高学府,竟然找不到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1958年春天,乌云压顶,寒气袭人,正光要离京去山西劳动了。临行前,他来学校和我告别，我没料到事态会如此严重。我们在校外小河边蓆地而坐,相对无语。是的，我们从认识到分别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却是非常愉悅、激情四溢、难以忘怀的几个月啊！我们彼此对对方心存好感,可迫于形势,又都没有流露和表白。四月的北京,寂静的河畔,夜风习习,他衣着单簿，我用自己的头巾替他围上,希望能够带给他一丝温暖。天色已晚，他不便久留，我送他到海军大院后门，我们久久不愿松开紧握的双手，好像这就是永别！

正光离京后,我的心情再次跌入谷底,食不觉味,寝不安眠,每当夜深人静时,就会遐想连连：远在山西的他,能否习惯那里的艰苦生活？修水库超强的体力劳动，他坚持得住吗？虽然时有音讯,我还是每天都在期盼着在遥远的山西能有鸿雁传书来。

面临选择

1958年秋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央气象局农业气象研究室工作。能够留京,又是到大机关,这在全班四十多人中,是少有的幸运者。大机关人才荟萃,青年知识分子

特多,而且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自然成为众多追求者的目标。局里团支书、翻译 、凿苏生、应届毕业生、及农大讲师；甚至正光原来的同事老余、老沈都试图‘趁机而入’。其中处長祕书郝某让我很为难,他几乎是每次随领导出差回来，都要捎点小礼品送我。我的顶头上司还特意找我谈话,促我表态，我只好找借口搪塞了,说已经有个华侨同学为友。这位处长马上郑重宣告：“气象部门是保密单位,华侨社会关系复杂,不宜交往；小郝是党员、孤儿,工作积极、人又老实,哪点不如你那同学？”可是我偏偏不喜欢这位祕书,整天埋在文件堆里，不进影院、剧场、不参加任何文体活动,在同事间不苟言笑、不交流联系，要同他長期相处,非得把人闷死！不过,我也从这次谈话中悟出了政治斗争的严酷性,更加不敢暴露我和正光的关系了。1959年秋,华侨同学林某从广州来北京出差,他提出要和我确定关系 ,而且要求我立即作出选择,要么登记结婚；要么就此分手。我只好对他说对不起了，并退还林某原放在我处的一只手表。因为我们原本只是朋友,毕业后也少有联系,见面就谈结婚合适吗,可能吗？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男友,目前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离他而去,我也离不开他,他比你更需要我。老林也知道感情的事不可強求,他尊重我的选择,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我之所以在反右运动后，不顾个人安危仍然与正光保持联系，不单是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一致。我认为他在单位发表的意见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没有错，是对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有益的。这种仗义直言的同志应该是越多越好，怎么反而要批斗打倒呢！所以，我不但同情他，支持他，而且非常欣赏和钦佩他。

1959年正光摘帽后，第一时间就来电向我报喜，我兴奋得一夜未眠，回电邀他尽快来京。春节期间，他来到北京并正式向我求婚，经过一夜思考，我愉快地接受了。我很清楚，我们前面的道路仍然崎岖艰险、荆棘丛生，但是我相信两颗坚定、火热的心融为一体，迸发出的強大力量是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于是，当天我俩就在旅店下面的前门相舘照了合影，权作定婚纪念。第二天我向团支书作了汇报，公开了和正光的关系。由于有思想准备，紧接着接二连三发生的冷遇、刁难事件，我就能够坦然对待了。因为我相信历史真象不会長久被掩盖，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961年春节，我们在老家成都結婚。从此开始了我们婚后幸福美好而又含辛茹苦的生活。

情感的升华

事业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婚后，我们太谷南京两地分居，互相牵挂、无限思念。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千里迢迢到太谷去看他，他也是如此。

正光是个上进心很強的人，他每次到北京,总是要带回去一大包书，有时让我买好寄去。他在坚持自学文化及专业知识，几年如一日。

正光对我关爱有加、对家庭尽职负责。1961年冬，我们的大女儿出世了，时逢困难时期，物资匱乏，鸡、鸭、魚、蛋，花高价都难买到。在妇产医院住院三天沒吃到一只鸡蛋，鸡就更不要想了。出院后，正光说产后营养跟不上，大人孩子会出大问题。于是，他背上挎包，到南京郊区农村走村串乡，到天黑才买回一只母鸡，十几乛鸡蛋。他向我解释收获不大的原因：鸡和蛋是统购商品，农民不敢卖给我们，他费尽口舌，为了产妇请他们帮帮忙，这才说动了几个好心的大娘。由于我们分居两地，旅途花销很大，现在又有了孩子，家庭经济颇感拮据。他回山西后，背着我卖掉了心爱的瑞士手表，每月寄五元钱给成都的父母；汇十元让我补充营养。他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但在文革期间，反而被当作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来批判。为了消除麻烦的根源，全家省吃俭用凑齐钱款，经他四处打听，追踪百里，最终从榆次农村把四年前卖掉的手表又以原价200元购回，了却了一桩伤心事。我为丈夫遭受的不公和屈辱深感痛心和不平。不过，在那段被人为扭曲的日子里，也有令人欣慰的时候。正光长期从事农机修理，他积极工作，钻研技术，大胆革新，任劳任怨，态度谦和，受到多数干部、工人、机手和司机们的尊敬与爱戴，年年评为厂模范。当时粮食供应不足，副食供应基本没有，一家五口生活清淡艰苦，有的机手看不过去，就悄悄送点食品、瓜果来。老唐接受了‘手表风波’的教训，婉言谢绝，但对方情深意厚、盛情难却，最后只好按市价付钱。有一次，来远供销社的机手送来一箱鸡蛋，共有一百多乛。钱是付了，可后来一想，鸡蛋是统购商品，可能会带来麻烦甚至灾难，就急忙骑车追赶，全部退回。

正光在工厂上班，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加点。每年夏收、秋收，还要下乡劳动。我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和辅导孩子们的学习，尽量给他多腾出点时间休息，可是他不让，主动见縫插针为我减轻负担。担水、买粮、打煤糕这类粗活从不让我干，连全家大小的冬夏衣装也是由他包干裁制的。在无法无天，血雨腥风的文革中，他更是处处为我和孩子们着想，常常独自默默承受压抑和苦痛，不让我们有任何察觉。比如1970年他们厂内两派严重对立，为了表明自己一派最革命，争相把厂里所谓的走资派，叛徒，黑五类拉到县城游斗，正光也在此列。这事我毫不知情，过了很久，一位老同学才告訴我。

荣幸与骄傲

1963年，我们在山西农学院安家的初期，我的同学同事中，多数人对我选择正光无法理解，有的竟然当面为我惋惜：“多少人梦想留在北京、南京，你干吗要跑到太谷来？”“为一个摘帽右派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值得吗？…”我不愿正面回答，因为人各有志。不过我作为右派家属，深知自己的处境，要生活下去，必须埋头做人，踏实工作，决不争名夺利；生活上团結同志、乐于助人。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事无巨細，我和正光都会主动出力。比如为同事、朋友蓋厨房、挖地窑、找拖拉机拉煤、利用业余时间为农场、校印刷厂修理机器等等，从而增进了别人的了解，改善了群众关系。所以，在农学院，即便在文革中，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也没有受过明显的欺压或歧视。

经过几年的耳闻目睹，同事们的看法逐渐转变了，他[她]们开始在我面前夸正光忠厚、热情、技术精湛、好学上进，是个会顾家会理家的多面手！这里特别要提一下我的大女儿，她比老二大五岁，学习拔尖、聪敏懂事，她不忍心看见爸妈整天忙累操劳，拖着她们姐弟三人艰难度日，就主动学着干家务。七岁会熬稀飯，十岁就能擀面条，做一般的家常饭了；还带着弟妹学唱歌、拉二胡。常言道：‘穷人孩子早当家’。我们这个不幸之家，有着这样一个有孝心、成气候的孩子，在最困难的时候，她帮我承担了一半的家务劳动。

阴霾终于散去，1979年夏天，海军来人给正光落实政策，并协助我们調往四川农学院工作。当我们离开太谷时，学校派车送行李，我们土壤农化系、学校印刷厂的同事好友，以及太谷农修厂正光以前的同事等，近三十人到车站送行，我们依依不舍，相互拥抱，挥泪而别，离开了生活近二十年、充满难忘记忆的第二故乡--太谷。我们到达离成都一百五十公里的雅安四川农学院后，就迅速投入教书育人的工作。激情和信任焕发了我们的第二次青春，尽管困难重重，余时无多，仍然全力以赴，在教学、科研上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时光悄悄流逝，回首往事，感触良多，但不遗憾，更无后悔；相反，我为选择了正直、上进、随和的正光感到十分荣幸，也为自己在四十几年前，在险恶的形势下，敢于接受一个政治另类的爱而倍感骄傲。不是吗？事实已经证明2真理站在我们这边，我们是正确的。

泪　珠　周永熙

这里是一颗颗痛苦的泪珠

我用回忆的丝线将它们穿住

莫让这一切被失落了啊

切莫让我的后人们没有觅处

一个受难母亲的话

沈苏斐（周永熙老伴）

作者小传:

1930 年生，原籍江苏宜兴，是周永熙的老伴。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1949 年 5 月返回大陆，7 月参军，在华东海政文工团任歌唱演员，曾师从著名音乐教育家周小燕先生。1955 年 5 月调北京，任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独唱演员。1954 年入团，1983 年入党。立两次三等功，其中一次是和丈夫一样被打成右派后，1969 年在厦门前线立的战功。

1958 年，军内留用，被派赴十三陵劳动，后任学员队数学教师。1964 年调军乐队演唱组任演员，1969 年转业后到苏州，曾任两年多磨床工，后在市文化局艺校及江苏省苏昆剧团任声乐教师。

1979 年改正后，任苏州市群众艺术舘副馆长、苏州市歌舞团团长、艺术指导。并任过苏州市政协代表。

一、跨海投奔光明

1949年5月2日，我离开了当时正在就读的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冒着极大的风险，搭乘了海峡两岸之间的最后一班海轮，（当时还没有航空班机来往，）在茫茫大海上，经过了数十小时的风浪颠簸，才回到了国民党军警戒备森严的上海。我的目的是回家乡苏州，但苏州已经解放，成了解放区。介于苏州和上海之间的昆山一带，是一片真空地带，要回家就必须穿越这条封锁线，而想穿越它，就要冒很大的危险。我想尽办法，终于打听到上海有几家纺织厂已经倒闭关厂，有一群苏州籍的女工正打算穿越封锁线回家，我和这些女工取得联系后，就将自己打扮得像个小女工，穿件旧布衫混在人群中，一起偷越封锁线。经历了无数的恐惧和惊吓，排除了千难万险，我终于回到了老家苏州。

我，一个19岁的女孩，为什么要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甘冒这么大的危险赶回苏州来呢，当然，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里，想念爸爸妈妈，想和亲人团聚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深藏在我内心里的一个愿望：我想投奔解放区，我想参加革命！因为我在台湾读书时，接受了几位我所敬佩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帮助和影响，参加了他们所领导的学生游行，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外围团体，还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一次又一次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一切都在我的血液中不停地燃烧，使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开明而进步的医生，他的理解，他的鼓励，给我带来了力量。正因为这样，当我在回到久别的苏州，和家人们团聚刚刚两个月，我便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的队伍，穿上了人民海军的水兵服，成为了一名部队文艺战士。

天真而又单纯的我，万万不会想到：曾经在台湾读过大学，冒险回家, 又冒死穿越封锁线的这段经历，会给我带来一辈子的苦难，更没想到后来我的两个孩子也会因此受了那么多的罪！

二、残酷的新婚蜜月

我和周永熙是在1955年的5月里的一天结婚的，在结婚后第二天，就奉命从华东海军文工团上调到海军政治部文工团，也就是从上海调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我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一间七、八个平方米大小的小屋，这已经令人非常满意了，我们没休一天婚假，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刚到一个新的单位，他是个党员，我是一个团员，我们应当严格地要求自己。

就在這新婚蜜月里，意想不到的乌云突然笼罩到我们的头上。反胡风学习开始了，周永熙因为背诵过鲁黎的诗，就被定为反胡风运动的审查对象，他被迫离开自己的新房而被隔离起来了。而我，也因为是从台湾返回大陆的，无端地说我是特务嫌疑，上面派了个女同志住进我的小屋，与我挤住在我家唯一的大床上，并摆出一付监视者的架势，我走哪她跟哪，上厕所也不例外。尽管我和永熙都被隔离了，但仍然是生活在同一座大四合院里，走来走去难免会碰头。但我们都被告知：见了面既不许打招呼，更不许交谈。于是一对新婚夫妇，偶尔在食堂或礼堂见面时，都像两个陌生人，双眼直视前方，互相擦肩而过。而在我们俩人的身后，都跟着一名监视者，如影随身，寸步不离。大概有半年多，一直都是这样。

就在被管制后前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我真不明白老天爷是怎么安排的，为什么偏偏在这勹时候让孩子进入我们的生活？

三、孩子有什么错？

怀上孩子后，由于隔离，我在生活上得不到任何照顾，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痛苦，这种痛苦又只能闷在自己心里，而无法向任何人倾诉，也没有任何人敢来听我诉说。这些倒还罢了，但有些规定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居然正式通知我说，因为我正在受审查，所以不许我按时到医院去作例行的产前检查，由于缺乏检查，以至于胎位不正又不能做到及时采取一些措施，最后竟使我导致了难产。医生告诉我说：如果当初能及时检查的话，本来可以及时矫正胎位，难产是不会发生的。荒唐的事还不止这些，当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正值北京的严寒天气，还要我每晚和大家一样，乘坐军用卡车到各处去演出，而且从团里出发到演出场所，从上台演唱直到演完回家，每分钟都有人跟着我、监视着我。因为频繁的演出奔波，加上胎位不正，后来果然在临产时遇到了麻烦，幸而接生的医生、护士经验丰富，职业素质好, 在她们的关心和帮助下，总算没有出大事，孩子终于在苦难中降生。

有些事会令人很久还难以释怀。孩子他爸在被管制中仍和我们一样住在海政文工团的大院里，因为没有解除隔离，就不许他到医院来探视他的刚当上母亲的妻子，也不能来看望他的初生儿子。那天凌晨正逢下雪，永熙只能托一位好心的同志捎来一句话：如生了女儿，小名就叫雪娘，因为他知道我演唱过俄罗斯歌剧《雪娘》里的插曲。后来生的是个儿子，于是儿子的小名就叫雪儿。雪，意味着地冻天寒却仍然清白纯洁。

四、更严酷的日子在后头

肃反中为了审查我和永熙，化了大半年的时间，据说全国各省都跑到了，结果连稻草都没捞到一根，但又不好就此收场，于是就在结论上大做文章，说我的思想是如何如何的落后，说永熙对胡风是如何如何的崇拜，总之将我们平白无故地软禁了近一年的时间，最后虽然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但仍然动足脑筋为我们编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他们认为那已是无边的宽大，绝对的恩典。当我们为此很诚恳地提了几条意见，希望以后不要再把这类‘恩典’加在无辜者的头上时，又正赶上了反右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于是乎顺理成章，我们就成了夫妻档的右派。

当时海政文工团掌握运动的领导人和一些积极份子们在我们遭受了各种严厉的处分之后，他们又举起大棒，砸向我们原本是非常美满幸福的小家庭。

从1958年5月份起，处分正式下达，永熙被遣送到山西太谷去修建郭堡水库。我则是“军内留用”，这在当时是只有极个别右派才能有幸得到的‘照顾’，似乎含有一点惜才

之意。大概是因为我当时在军内外已小有名气，作为一名少有的花腔女高音演员，还有点利用价值，再说一时又没有别的演员可以代替。当时我才28岁，对一个演员来说，那是个多么美好的花样年华！

虽说是军内留用，但我还是得去十三陵水库劳动，去就去吧，也没什么，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雪儿才两岁啊。团里一位姓赵的管理员，趾高气扬地通知我：右派的孩子不能进入只收留革命军人子弟的托儿所。他们逼着我去远离海军大院的市区去找民办托儿所解决。这对我来说，真比登天还难。一是路太远，我根本无力接送；二是我们俩人都受到降级降薪处分，我降了2级，永熙则降了6级，我们已无力承受地方托儿所费用的负担。无奈中，我只能将孩子交付给我的妈妈，而我妈妈那时也非常艰难，爸爸过世才两年多，妈妈自己身体也很羸弱，更何况她还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弟妹，这时候将这付重担压在她老人家身上，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愧疚在心。

送走孩子以后，我们在海军大院文工团宿舍里分配的住房就被取消，我又被安排到集体宿舍，就这样，作为一个家的最大的象征也不存在了。

刹那间，永熙被流放山西，孩子随外婆去了苏州，我一个人只身在十三陵劳动，原本美好的一个小家庭就这样被无情地、人为地砸得四分五裂。

后来，为了让我年迈的母亲能够缓一口气，也为了思念孩子，我每当能在北京稳定住一段时候，就请假回苏州将雪儿接回北京来住，我已经没有自己的住房了，孩子来了怎么办，我向领导汇报，作领导的果然有办法，他们找来一块一尺来宽的铺板，让我将铺板架在我的单人床边，使我的窄床变得宽了一些，孩子就和我睡在这样的床上。这是个集体宿舍，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上下铺已住了五个女同志，在和平时期，在大城市里，在中央一级的部队机关，还要母親带着已经五岁的男孩一起住在女宿舍里，这种事还是比较罕见的，但却让我给碰上了。

五、幼童独行万里程

1960年，我被摘帽以后按重新入伍处理，又给我授了个比较低的军衔，1963年我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我们为他取了个小名叫佳佳，佳是家的谐音，我们多么盼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啊！1965年，为了减轻我母親的负担，我又将雪儿接到身边，并让他在部队的小学上学。

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海政文工团也和社会上一样，非常热闹，这时我虽已被恢复为军官身份，但在群众眼里，仍然是牛鬼蛇神、仍然是有前科的另类，仍然是台湾来

的特嫌，我好像一只无助的羔羊，随时随地都可能面临被宰割的命运。那时的揪斗之风已经越煽越旺，当我看见一些人被揪上台时，领章、帽徽都被扯掉的狼狈相，我不能不想，也许自己很快会面临这一天的到来。当时满屋满墙的大字报中，轰击我的大字报已经不少，什么“三名三高”演员啦，什么“从台湾返回大陆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啦”，眼看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自己预计，就算不是主要的被批斗时象，至少也要揪上台去陪斗，为此事我每天提心吊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我当时想得最多的就是要保护好孩子，他还小，我决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到伤害。

那一段时日，正是大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揪斗之风，越刮越盛，还好，小儿子佳佳还在苏州，我身边只有一个大儿子雪儿。雪儿那时刚满十一岁，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我决不能让他看见自己的母亲被人强摘去领章帽徽而被揪上讲台，这种恶劣的批斗场景我自己虽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不能让孩子心灵上受此欺辱。最后我下定决心趁我还没有被限制自由的时候，赶快把孩子送回苏州去，送到心疼他、爱护他的外婆身边去。但是怎么走呢？我已被告知不得离开北京，而北京到苏州的路程那么遥远，在火车上要经历二十几个小时，难道让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独自远行吗？我身边没有其他亲人，我又不能和别人商量，即使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行，我还怕惹出是非，连累别人。想了又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和还不懂事的孩子来商量。

我问他：“你想不想到苏州去看姥姥？”

他高兴地回答我：“想，可想了。”

我又说：“可妈妈不能送你去，你一个人敢去吗？”

他犹豫地看着我，沉吟了一下，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我能怎么回答他呢，我只好说：“妈妈最近很忙，不能离开北京，要是让你一个人走，你敢不敢？”

孩子说：“只要能看见姥姥，我一个人也敢。”他把这个‘敢’字说得特别响亮，特别肯定。

我知道他从小在姥姥身边长大，和姥姥特别親，他会喜欢去苏州上学的。于是我去找有关的头头汇报，就说孩子姥姥想念外孙，我打算安排孩子去苏州。得到恩准后，我就赶忙去买火车票，并为孩子准备行装等等。准备行装时有点犯难，因为这次去并不是三五天便回来，而是要雪儿留在苏州读书。他的课本、衣服、都得带走，还得带上旅途中的食品，他一个人怎么背得动呢。于是我为他准备了一根短小而轻巧的小扁担，一头放衣物，一头放书籍，让他在家里担起来练练，还挺合适。孩子觉得很新奇，所以也

很开心。而我，却抑制不住阵阵辛酸。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不料在临走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不愉快的事，有一个造反派小头头，文革以前，孩子管他叫周叔叔的，听说我孩子要回苏州，他赶过来表示，孩子带走的东西必须经过检查，我知道他是怕我让孩子将我的‘黑材料’带出海军大院。孩子傻傻地看着他检查，一言不发，直等这位他平日喊叔叔的人检查完毕，才讲了一句："妈，他把东西都翻乱了，我们又得重新整理了。"见我没答腔，他又问了一声："他干吗要这样啊！"我能说什么呢？我只是想，也许在孩子的一生中都会记住这难忘的场景的。我匆匆忙忙将衣物整理好，没时间也没办法来安慰孩子心中的疑惑和不安，因为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他送到火车上，并按时赶回海军大院。我们上了火车，为孩子找到了座位，当我离开他时，曾想托付给一位解放军或是交给列车员，但孩子却自信他说："我自己会看站台上的大字，看到苏州两个字我便会下车，我不会下错车的" 就这样，我无奈地把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孩子孤单地留在了由北京开往苏州的列车车厢里。我下车后，伫立在站台上，眼睛盯着孩子坐位旁那扇车窗，擦着泪还装着微笑，不停地挥手，目送火车慢慢启动、加速、驶向远方……

就在孩子走后不久，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天，造反派把我带到会场上，要我在斗‘当权派’时作陪斗，我已有思想准备，不等他们来揪，就自己摘下领章、帽徽，大步迈上台去。老天保佑，孩子已经顺利回到了苏州，他没有看到母亲在当陪斗时的场景。

直到今天，回想起孩子的那次独自远行，我还十分后怕。别人很难理解一个作母亲的当时的复杂感情；但我必须保护我的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孩子的聪慧而单纯的心灵受到伤害。

六、困难培育了自强

经历了文革初期的恶浪激荡后，往后的日子相对比较稳定一些。我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一间宿舍，我又将两个孩子都接到北京，从1958年起他们的爸爸被流放到山西接受惩罚性劳动以来，已经十年有余，以前孩子们都只能短期到北京来住一段时期，我担心孩子长期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会影响他们的身心成长，另外也要让我的母亲尽可能减轻一点劳累。当时，我所在的海政文工团军乐队独唱组没有更多的外出演出任务。所以我才下了决心把孩子接到北京来上学。但孩子来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队里下达了任务，要派我到青岛去为独唱组招收声乐演员，对于别人来说，这只是平常的工作安排，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他们没有想到我所特有的困难处境，我不同于他人，我是单

独一个人既要正常上班，又要照料两个孩子的读书和生话，如果有充分的时间让我作好准备，还好一些，可现在是突然下达的任务，我已来不及作任何准备。何况以我的摘帽右派的身份，给我任务就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和考验，我是万万不可以强调自己的特殊困难的。我只能接受命令,立刻准备出发。

这次出差，计划时间要长达半个月以上，我连夜为孩子们安排他们的生活，还要说服他们准备度过一段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而且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这时老大雪儿已经十三岁了，他懂事地应承下来要照料好六岁的弟弟，还大人似地嘱咐我放心出差，不要记挂家里。我忐忑不安地离开了家。到了青岛，当时两派武斗的局面仍没结束，而当地的海军又卷入了两派的斗争，故而我们在外也存在着安全问题，越是这样，越是牵挂家里的孩子，他们是两个无人照看的孩子啊！在给自己单位汇报工作时，我想起单位办公室和我的住房同在五楼，就请领导让孩子们来听电话，我反反复复地交待他们，让他们不要忘了去食堂吃饭，要按时睡觉，按时上学、去幼儿园，关照他们上下五楼时，不要奔跑，不能跌交，不要开窗户……雪儿比较懂事，在电话里安慰我，让我放心，我又想听听小儿子佳佳说话，但说了半天，仍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心里着急，大声呼叫着：佳佳！佳佳！但始终听不到他的回答。最后还是哥哥接过话筒说：妈妈，你的话我们都听到了，都记住了。我问：佳佳呢？大儿子说：他也听见了，他一直在点头，他以为你看得见他呢。哦，一场虚惊，把我逗得笑了起来。孩子们啊，都是妈妈和爸爸的处境给你们带来了另类的生活，让你们过早的承受了太多的负担，这一切，你们知道吗！

七、话外的话

往事如烟，似断还连。

因为我们这夫妻档右派受到的苦难，使得孩子们幼年时遭受了不同于其他孩子的命运，但是孩子们也从困境中顿悟到必须奋斗，必须自强，不然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奋用功，真诚做人。在我们‘改正’十年后，兄弟俩先后都走上了留学之路，他们是全部靠打工来维持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用的。老大在美国取得艺术硕士学位，现在是职业画家；老二在美国取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又取得MBA学位，成为双硕士学位的获得者，现都在勤奋地工作着。最值得我自豪的是两个孩子对父母的一片孝心，我想，这说明了他们对爸爸妈妈经历过的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灾难生活，是非常理解的，是无比痛惜的。

第四章　人性仍在闪亮

团城老乡救我一命

——“文革”中受迫害记实片断

周 运 峰

作者小传：

1931 年生。1948 年 4 月参军，1949 年 3 月入党，来堡前在《解放军报社》任编辑，中尉军衔。离堡后在太谷晋剧团任编剧，后至祁县北堡村中学任教员。改正后任武警总部印刷厂政委，1987 年 7 月离休后，曾任《中国老年报社》经理部副主任。

1957—1978，整整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是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对我们来说，充满了辛酸、屈辱、折磨和苦难。在郭堡水库那些日子，我们承受了超强度的劳动，在离开郭堡水库以后的那些岁月，难友们的遭遇更为悲惨：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也有的不堪虐待走上不归路。我自己就曾有过一段非常危险的经历，若不是学校驻地团城老乡的搭救，我也就没有今天了。

那是 1968 年的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最紧张的阶段，灾难波及我的身上。我所在的团城中学的造反派，集合了公社联区的小学教师，集中力量向我发起攻击。一张“周运峰老实交待参加右派分子翻案黑会的罪行”的大字报，贴在学校最显眼的地方。

我自己清楚，我从来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所谓“翻案黑会”。从 1957 年遭不幸后，自己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不敢再招惹是非。但是，面对着眼前的形势，我真懵头转向不知所措，浑身的血液几乎都凝滞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是不允许你说清楚的，即便是误会，即便是毫无理由，也可将你大斗一番，随便置你于死地，而且没有任何人为你负责。在这不久前，公社开斗争会，不分清红皂白，上去就是一顿乱打，将四个“四类分子”活活打死。当时的许多打手，就有团城中学和联区的中小学教师。我面对的就是这帮人，我不能不为自己的命运、不能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啊！——我死了是小事，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贴大字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下午，他们还未来得及控制我。第二天星期日，我怀着恐慌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县城家中，将学校中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妻子。妻子和孩子是

我只身来山西仅有的亲人，孩子幼小不懂事，有话只能对妻子讲。这时，我们真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我对妻子说："从下周开始，他们不会让我再回家了。最终结果如何很难说，你要做最坏的打算；但有一点你要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肯定是他们害死的。" 那个时候，由于不堪忍受造反派的折磨而自杀的人，比比皆是。

妻子一边默默听着我的话，一边在思索着什么。她的表情很严肃，但从中使我倒感到她的冷静、她的坚强。沉默了片刻后，她说："你不要害怕，过去的问题已过去，新的问题咱没有，他们揭发你的问题肯定是误会，给他们说清楚。有的咱承认，没有的绝对不能乱讲，要正确面对。"停了会儿，她又对我说："你要多保重，家里一切有我，我会照顾好两个孩子，过些日子我们去学校看你。"妻子的理解与支持，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她还特地安排我们全家到照相馆照了合影，还从市民户那里找来肉票（妻子是回乡知青，她和孩子们当时都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是不供应肉吃的），包饺子吃。显然，她这是为我壮行，也是在作着最坏的准备。

这次离别是悲壮的，也是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那天下午，妻子带着两个尚不懂事的孩子，顶着炽热的太阳送我到城外。在路旁我们停了好久，我舍不得离开他们，又不得不离开他们，这次离别后还能不能回来？是不是永别，还能不能再看到他们？……我轻轻将两个孩子搂在怀中，说了声"爸爸回学校，你们要听妈妈的话！"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再也说不出话来，我落泪了！

回到学校，预料中的一切便发生了。首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我袭来。自然，大字报中充满了漫骂、攻击、侮辱，语言之污秽，不堪言及。接着，就是大会小会的斗争，逼我交待问题。从他们的揭发中，我得知是在祁县城的一位难友揭发我参加过他们一次聚会，在聚会时曾有人说过： '右派'是无罪的。这样的聚会，我从没参加过；那样的话，我也从没听说过。我向造反派们一再解释，但他们根本不听，就是往死里斗。开大会批斗还不解气，又采用车轮战的办法，这个班斗过，接着到另一班，二十四小时不让你休息，不让你喘气。开始时是让我站在一张桌子上，后来又让我站在两张摞起来的桌子上。更有坏者，还故意推动桌子晃悠，一直到我头朝下栽下来才肯罢休。我摔得头破血流，他们却哄堂大笑。这些造反派还想出了许多残忍的手段，他们将一块大黑板用二胡上用的细丝弦系牢，挂在我脖子上，细丝弦紧紧贴着肉，然后向左一拉，再向右一按，立即一道血沟就出现了，血顺着丝弦向下流，疼得我撕心裂肺。什么朝代有这样的刑罚？这真是杀人不用刀啊！疼得我实在忍受不住，不得不呻吟一两下，这又惹恼了为首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怒气冲冲地说："你叫！好，换个方式！"立即从院子里将举

重杠铃的铁砧取来挂在我的脖子上，还要我作一百三十五度角的姿势，也就是那时人们常说的“喷气式”。几十公斤重的东西挂在脖子上，还得猫着腰，谁能站得住？我一下子从桌子上栽下来，栽下来再逼我上去。反来复去几次，就摔得我昏过去了。昏过去还不罢休，待我苏醒过来后又接着斗。 他们如此残酷地折磨我，我实在难以支撑了；但我有一条原则，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胡说，不能往自己头上栽脏，更不能胡说别人害别人。最后，那些造反派们用尽了手段，仍然没有捞到一根稻草，这些家伙们恼羞成怒，竟公然喊出口号：“大斗三天三夜，斗死周运峰！”我心里捉摸，这也许是他们真的要对我下毒手了。谁知他们这么一喊，传了出去，却激怒了团城的老乡。一直记挂着我的团城的老乡们，忍无可忍，终于站出来了。

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 1968 年 8 月 9 日，就是“大斗三天三夜”的第一天，我的精神已近崩溃，头磕碰得满脸是血，两腿肿得站都站不起来。天慢慢黑下来时，没有接着开斗争会，他们将我带回隔离室，晚饭也不让我吃。可以说我已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了。这时突然从校门外传来阵阵喊声，声音越来越大。看守我的人紧张起来，不住地向我张望。我也沉不住气，以为要发生什么于我更不利的情况，内心也很紧张。天黑，又没月光，只听到门口喊声一阵高过一阵，学校大门咣当咣当响，咋嚓——门被撞开了。模模糊糊地看到院内拥进来许多人。高喊的声音很激烈，但因离得较远，听不清在喊什么。约摸持续了一个钟头，喊声逐渐平息，人们好像也逐渐散去，估计不会再对我下毒手了，我才算松了口气。

事后，一位从中学毕业回乡劳动的学生告诉我，那天晚上村里人冲到学校来是救我的。他说 8 月 9 日下午，他们在地里干活，听有人说中学里造反派要大斗三天三夜，非斗死周老师不可。乡亲们一听群情激愤。这时就有人说：“咱们今天晚上去救周老师！”大家立即响应说：“对！今天晚上谁不去不是爹生娘养的！”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有气。支部书记刘同志怕事闹大，他安抚大家要冷静。他说：“咱们去救周老师可以，但不要动手打人。你们先去，视情况我再出面。”吃过晚饭，也没等人喊叫，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拥向中学大门。咱们村里的老乡还从来没有这样齐心过，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太太、老大爷，下至七、八岁的小孩子都出动了。人们一边走一边喊，真是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呀！学校的造反派们也许事先得到了些消息，学校的大门早早就关上了。老乡们拥到学校大门前，“嘿唷！嘿唷！”几下就将大门撞开了。待老乡们冲到校院里，那几个造反派头头早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左找右找，找到一个姓吕的、一个姓徐的积极分子，老乡们叫他们跪下，没看清楚是谁，一下子将他们按倒在地上。他们乖乖地跪在老乡们

面前。老乡们向他们要人。这时，中学里被打倒后刚解放的段校长出来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大家又喊了一阵，刘支书出面，这才将两个造反派头头找来进行谈判，达成三点协议：一、要文斗不要武斗；二、保证周老师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三、接受村民的监督。得到他们的口头保证，老乡们才在刘支书的指挥下离去。这位同学讲完了事情经过，我很受感动。这些纯朴、厚道的老乡，与我不沾亲不沾故，竟冒着同造反派发生冲突的危险，来搭救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这种情况虽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能说是仅有，至少说不多见。这真是壮烈的一幕，惊动了全祁县，祁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解放军支左小组的领导，闻讯都急忙赶来团城中学平息这场冲突。后来他们将此次发生的事叫做“八九事件”。从这次事件以后，果然情况有了变化，再没有人敢开大规模的批斗会。许多团城的老乡自动为我站岗，那些不下地干活的老大娘和年轻妇女，经常坐在学校东边的山坡上，俯视着学校大院内的动静，一旦发现有开斗争会的征兆，马上就邀人过来，弄得造反派们大会不能开，小会也开不成。附近西团城和荆林坪的老乡还捎过信来说：“中学再斗争周老师，我们也来支援你们！”

“八九事件”后，团城的老乡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我。不管谁进城，都要到我这里来打招呼，问有什么要给家里捎的东西没有？村里有一老汉开着一个小卖部，他每天晚上都按时给我送一个烧饼过来，隔墙递给我，还说：“周老师你先吃，保重身体，将来你有了钱和粮票就给我，没有我就不要了。”转眼到了秋天，那些放羊的羊倌，他们每天一边放羊，一边从枣树、香槟树上摘些最好的果子，隔墙送给我。他们还说：“你吃不完，捎回祁县城家里给孩子们吃。”学校做饭的老牛师傅更令人感动，他几乎每天做饭时都将倭瓜籽滤出来，用大碗扣在灶台上烤好送给我吃。有的教师问他：“老牛，怎么今年灶上的瓜籽都没有了？”这位老人回答他们很干脆：“我吃了！”一些水果，一把瓜籽，一个烧饼，现在看来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在那个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实在是难能可贵，寄托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啊！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给处在困境中的我以巨大的支持和安慰啊！我怎能不深深感激这些可亲可爱的老乡们呢？遭受磨难是不幸的，但结识这么多善良、厚道的乡亲们又是幸运的！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没齿难忘！我离休后曾专程回到团城去看望他们，叙起往事时， 大家还是那样感情激动，事情如同发生在昨天。

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现在回忆起，依然是苦涩的，但也使我们认识了许多真理。我们不要为我们那一段不幸的遭遇而过分悲伤，善良的人们是理解我们的，同情我们的。他们说我们是能讲真话的人，是好人！有这样的评价足够了。历史已经证明一切。我们

这一代人都已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有许多难友已离开人间；但我们的精神将永在！这就是我们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财富。

我深深感谢团城的老乡，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郭堡精神 调寄清平乐

褚元强

修库造福

郭堡争先富

太谷粮仓堆满足

不尽鲜鱼上府

乱年忍辱别军

誓保红心青春

盛世东风和顺

光荣传统长存

当了十年农民　帮修两个水库

丁 乙

作者小传

1926 年生。1945 年 10 参军，1947 年 2 月入党，参军后在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工作。在军大毕业后分配在二纵司令部，来堡前在海军政治部敌工部任助理员，大尉军衔。离堡后在介休县劳动局、食品公司工作，1964 年调回原籍邢台，在土产公司任业务员。改正后任邢台市企业局企业公司总理，郊区副区长、区长、政协主席，并任邢台市政协委员。

我在解放前就读于河南大学水利系，1948 年参加革命，一直在解放军里从事新闻工作，怎么会下放当了十年农民呢？其中是有一段过程的。生活的轨迹大致这样的——开始是革命者——然后是右派分子——然后是反革命份子——然后是遣送回乡成了农民，——最后又返回本来面目，又回归成了一名革命干部。

当农民这段时间不算长，可也不算短，从 1969 年直到 1979 年，整整十年。下面就讲一讲这段我所亲历的人生道路。

１９５８年春天，那时我还是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是军内第一大报《解放军报》的记者。根据志愿军与国内军人轮换的制度，他们回国五人，国内也去五人，已确定我是赴朝人员，即将调我到朝鲜志愿军报社工作。就在我等待动身的日子里，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解放军报社也展开了大鸣大放，领导上一再动员全报社人员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我是快调走的人了，原来对此并不很热心，但后来看见同志们贴出的一份份大字报多半都是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我觉得这无助于改进整个报社的工作，为了体现自己的责任心，我也写了一份大字报，提出五项建议，内容大的是有关办报方向、人才使用等方面。大字报贴出以后甚获好评，后来，有同志告诉我当我刚去朝鲜时，军报总编辑欧阳文中将还在报社各部领导会上说：“鸣放是中央的号召，不少同志写了大字报，提出房子住得紧张呀，孩子没学上呀，工资呀，军衔呀等一大堆问题，你们看丁乙，没有提任何个人问题，他提的都是干部政策、办报方向等大问题……”可以想像得到，当时不但我自己没有以为会有什么问题，连总编也没有以为我有什么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被调到了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报社。

报到后不几天，报社就派我到东海岸、西海岸和三八线以南的驻军去采访，这是

让我尽快熟悉战地生活。有一天，当我到前线转了一趟，刚刚回到志愿军报社，一眼便看到新从国内发来的《解放军报》，随手一翻，心中一惊，报上赫然全文发表了我在解放军报大鸣大放时给领导提的建议。这时反右运动的声势已经可以说得上是轰轰烈烈了，全国包括军队的右派分子越揭越多，我隐约感到情况不妙，心情非常紧张，便主动向志愿军的领导谈自己的情况。领导告知说：那有什么，办报的人不是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吗。不久，又见解放军报上陆续发表文章，有人支持我的观点，也有人批判我的观点。在军报上热热闹闹搞了三个月，我的心也忐忑不安了三个月，但最后果然是最坏的结果，军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点明了我那篇大字报的性质，说我的建议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于是一槌定音，我知道了我已大难临头。

接着，一件件事就按程序紧跟着来了。先是调我回国，然后写检讨，开批判会。最后的是戴上右派帽子，宣布处分，宣布军法判决。就这样，我从一名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一下子被打成了人所不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随即被送到山西太谷，到郭堡劳动锻炼，修建水库。几个月的超体力劳动，过着像劳改犯一样的生活，这是我一生最痛苦、几乎送了小命的劳动。真令我终生难忘。

修完水库以后，我被分配到孝义县教育局，不久又到县水利局。县水利局有位副局长侯佑诚先生，是位民主人士，很热心为村民办好事。1959 年以后各地大搞水利，县里计划在村西汾水支流上修一座小型水库。候局长知道我在解放前大学里是学水利的，就将我派到水库工地指挥部办公室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当时就预感到又将是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为了减少被冲击的可能，我平时一句话也不说，什么造反组织、革命组织都不参加，只顾埋头在办公室里做我的统计、汇报工作，可是形势和命运都决定了我难逃此一劫。造反大风暴一起来，右派份子无论摘帽或没有摘帽，都沉入深渊。我们同时从北京到太谷来的战友刘智田、刘志强、洪卓民几位都是分配在孝义县的学校里当老师的，他们很快就成为学校中一些造反派师生的革命对象，作为同属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我也被牵带在一起受批。在一次全县性的干部大会上，刘智田、刘志强和我都被弄到台上接受批斗。最后决定：刘智田判刑入狱，我和刘志强则开除公职，回乡劳动。可我和刘志强都是外省人，回自己家乡很难办，最后决定把我们弄到当地农村去当农民。

当农民，当时我就想：处在这种'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时侯，当农民也许还真是件好事，我深信只要能诚心为农民做件实事，为农业发展出一份力，农民是会欢迎的。

我是在孝义县下栅公社上栅村落户当农民，这个公社的土地大部分都在山塬上，

其中上栅村则全部都座落在山塬上。塬，就是被深沟流水切割的广阔平坦的土地。上栅村的土地被两条深沟分成三部份。我住在东北方向的院落里，夏天倒很凉爽，可一到冬天，东北风呼啸着刮起来，冷得刺骨。好在窑洞冬暖夏凉，睡的是火炕，烧的是煤和柴，我早晚都得上山去打柴拾柴，可以说过的完全是一个穷苦农民的生活。房东的大娘大嫂心很善，对我帮助很大，她们教我生火、做饭，还帮助我安排好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使我学会了一套农村的生活技能。直到现在，每当想起同院的乡亲和同村的干部和老乡们，我还是满怀感激之情。我常向家人和朋友们说：就这一点而言，还真得感谢伟大领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天才发挥呢，这就是坏事变好事嘛！

这个村的土地因为全在塬上，所以全是旱地，村民们多年以来就希望能有两亩水地，地里能种上点蔬菜，以便为全村人改善改善生活。当时正处于大跃进中，全国上下到处都在大抓水利，常能听得见村里的支部书记和队干部们凑在一起议论：咱们村能搞点什么呢？我非常能理解这些村干部和村里老乡们的心情和愿望，趁着每天早晚拾柴砍柴的功夫，我对全村周围进行观察了解。我发现，这个村土地虽在塬上，但源下深沟里却有着常年不断的长流水，这就是说：这里有着较丰富的水资源，只是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而已。正是：塬上无水向天求，塬下有水白白流。这时，我在参军前学过的水利专业的知识启发了我，我们可以先建一个小水库——-实际就是大型蓄水池，将沟里的水蓄起来，然后再修一座小型的高灌站，把水提到塬上去，那不就有了水浇地了吗。我把我的想法和村干部们一说，他们喜出望外，表示积极支持。但细细捉摸下来，也有些麻烦。首先是劳力，这问题不算太大，村里自己可以解决;二是设计和安装的技术力量，我自估我可以担当，因为我学过水利，又在太谷修建过郭堡水库，这点工程项目自信还可以对付得了;最后一个难题，那就是经费，购置提水设备的经费。初步估算一下，大约需要 8000 元至 10000 元，在三十多年前农村，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当时农村一个强劳力一天的工分也才值几毛钱，村里是根本出不起这么大的费用的。于是我去跑县水利局，好在我在水利局工作过，人头熟，我将上栅村的情况和打算一一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一听，觉着这老丁说的有板有眼，不像是在那里唱高调、说大话，于是派了干部下去作实地考查，最后认定在上栅村建高灌站的计划是可行的，并决定由县里先拿出三千元人民币，用来购置设备。有劳力有设计又有人民币，这件事自然就做成了。为了办成这件事，从村到县二十多里路，我都是步行，跑来跑去，跑了许多趟，真是很累人。

那段时候，正好我母亲因记挂我而住在我这里，她来后不久，我弟弟妹妹也赶到

我这里来看望她，他们来后体会到我的处境很艰难，妹妹临走时给母亲留下 40 元生活费，母亲心疼我，让我用这 40 元去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才解决了我来回跑路的问题。

接着全村都投入了高灌站的工程建设，修水坝，修蓄水池，装机器，接电源，接水管……整整忙了一个多月。我作为工程负责人，每天起早搭黑，比别人更劳累，我也顾不得，一心想的是要园满完成这项工程，为村里老乡们做点实在的事。

最后，一切都完成了，高灌站试上水的那天，村里就像过节一般，全村所有能走动的老乡都来了，县政府和水利局也来了人，我仔细把抽水机和管道全部检查了一遍，一切准备工作都正常，我静待塬上一位公社干部下令。只听得一声高喊："上水！"我立即打开阀门，拉上电开关，机器轰然转动起来，可是我远没来得及高兴，突然发现异常，原来机器是空转，并没有打出水来。这时我紧张得几乎晕倒，觉得自已是干了一件大错事，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旁边的同志倒一直安慰我："不要慌，不要慌，再检查一遍，看看是哪里出的毛病。"有位水利局的同志补充了一句："水泵里灌水了没有？"哟！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一看，果然，水泵里没有灌水，我东忙西忙，竟糊里糊涂忘了这一步骤，这道理我原本我是明白的：水泵要先灌上水，把空气都排尽。然后转动机器，水才能压上去，可不料临时一慌乱，竟将这简单而重要的程序给忽略了。找到原因，心气大定，后来按程序再重新启动，机器一转，一股清泉哗哗地喷了上来，水头喷出足足一两米远。不到一个小时，塬上的两亩地全成了一片小水田，这时来参观的人群中，不少人高跳着欢呼：有水了！有水了！我们有了水地啦！从此以后，只要蓄水池中水不干，塬上近 300 亩水田便可确保丰收。县里对这项工程也很满意，除了又给上栅村拨了一笔经费外，还在全县的通报大会上表扬了这件事。从此以后，在全村甚至于在全公社人们的眼里，我老丁还是老丁，但已不是什么摘帽右派了，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是村里人们所欣赏而欢迎的有用的人。

过了不久，同一公社的高仁村的党支部书记，私下里找我谈事，他告诉我说：高仁村也要学上栅村的样，要修个小水库，要建个高灌站，他说他到县里去提了，要请我到高仁村去蹲点，并说县里已基本同意，就是还要听一听我本人的意见。我想，既然高仁村的确需要，县里又已经批准，我这时已恢复为下乡蹲点干部的身份，当然责无旁贷，说去就去立即前往。在这村待了半年，又修了一个小水库和一座高灌站。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干来更加顺手，效果也更显著，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对我真是特别亲、特别好。就拿吃饭这件事来说吧，一般下乡蹲点干部在村里都是轮流到各家吃派饭，而

我呢，却是指定一家老夫妻俩口子专门为我做饭。当时农村里都是以粗粮为主食，而我在高仁村几个月下来，却从未吃过一顿粗粮。天天有鸡蛋有肉，有时甚至还有酒喝。我吃着吃着，心中有些不安，就找村干部，请求他们不要这样了。村干部说：“怕什么，我们村管得起你！你帮我们修了水库又建了高灌站，现在我们村有了几百亩水地，这是化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他见我还有些过意不去，就安慰我说：“不要怕，老丁，你吃了这么一点点，算个啥呀，比起你当年丢下的，差远了。”他提说到当年，我无言以对不敢再争了。我担心他再发挥下去，对他不利，也担心他再讲下去，会触动我一年又一年深藏在内心的痛苦……。

当年，就是那个当年，全国有近 60 万人受到无辜的迫害，有的妻离子散，有的甚至于家破人亡。我所在的这个小小的山村，前后左右，归总起来不过百来户人家，被遣送来的右派竟有五名之多。国家遭此大劫，真令人心寒。但是，我当了十年农民，也使我深深感受到：在一切善良的老百姓心目中，他们还是另有一杆秤的。他们以最最朴素的目光，以事实来判断善与恶，真与假，美和丑，判断正确和谬误、忠贞与无耻！这就是直到今天，我还难忘这十年农民生活的原因。

关牛棚，却当了救命恩人

聂荣廷

作者小传：

1926年生。1945年10参军，1947年2月入党，参军后在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工作。在军大毕业后分配在二纵司令部，来堡前在海军政治部敌工部任助理员，大尉军衔。离堡后在介休县劳动局、食品公司工作，1964年调回原籍邢台，在土产公司任业务员。改正后任邢台市企业局企业公司总理，郊区副区长、区长、政协主席，并任邢台市政协委员。

十年浩劫开始，我在河北省内邱县土产公司担任业务会计，主管商品帐。按运动矛头应指向‘走资派’，当时的经理王世祥，老奸巨滑，又是本地人，公司多是他的乡亲，他平时又善于用小恩小惠拉拢人。造反派没把他当重点，却拿我们三个人开刀：张恒昌、我和伊文彪。

张恒昌是财务会计，出身富农，平时工作严谨，认真坚持财务制度，对于经理批白条子，不符合财务制度的硬是给顶回去不予报销。这样就得罪了一些人，运动起来，正是小人得志的机会，第一个揪出来的就是他，说他出身富农，对家乡的乡亲刻薄，又说他有经济问题，查帐班子查了几个月，…什么问题也没查出来。造反派说他不老买，刑讯逼供捆绑吊打，气得他得了肝癌，痛时在床上打滚，也没人给医治，不久就被折磨而死。

我是那位“哲人”说的黑五类之一，1957年旧帐重提，脖子上挂上二十多斤重的铁牌游街示众，批斗会几乎是天天开。造反派为了显示积极性，批斗会上、下午开了，晚上还加班开。我身高一米七八，弯腰时造反派总嫌我弯得不够标准，把我的头用狂劲往下硬摁，将人弯成大虾形，腿还不许打弯。批斗会开几个钟头，腰就要弯上几个钟头，有时实在支撑不住就摔倒在地，起来后他们还要拳脚相加，说是不老实。几个月折腾下来，腰椎疼痛难忍，至今留下后遗症无法治愈，带着病体，还要参加无休止的体力劳动，装车卸车原来是雇民工或搬运队，运动中造反派以此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施加于我们。半夜来车，半夜起来装卸。超负荷的劳动，真是不堪忍受，真想一死算了，但又一想：我们有何错呀？一定要咬牙坚持，等到平反那一天，绝不让这些人的阴谋得逞。

伊文彪是山东汶上县人，部队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为人正直。为什么把他当叛徒揪出来？令人费解。他出身贫农，十几岁就参加了解放军，后因病不能随部队行军，

领导把他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养病。这位老乡家里很穷，吃了上顿无下顿，买在没法了，就让他顶上村里一个有钱人家去当了壮丁，成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士兵。不久这个部队与解放军作战，伊文彪被解放过来，又当上了解放军，后来赴朝鲜作战，他英勇战斗，不久就入了党，而且又在战斗中负了伤，一条腿落下残疾，这才转业到地方。把他当叛徒揪出来批斗，他思想上实在难以接受。这位同志性情刚烈，有一天批斗后回到我们牛棚时，我见他眼睛直勾勾地往房梁上瞅。我的直觉告诉我，他的内心准是非常痛苦但又不便交谈。第二天的傍晚，火车站通知：车站东站台有两车苇箔，要我们去看管。过去原本都是雇民工看管，这下可以节约开支，又惩罚了我们，这项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身上。晚上看货不能睡觉，但又是开导他的机会。我开门见山地说："伊文彪你这几天情绪不对，准是有心事，你可不能瞒着我，要说实话。"他没开口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真不想活了，真想弄根绳子栓在梁上结束自己算了。"我郑重地对他说："你想错了，你那样做，正合那些人的意，你本来定不成叛徒，如果你真的自缢身亡，不就成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了吗？你的老婆宝娥成了寡妇，你儿子长根也没了爸爸，那不是家破人亡吗？"他哎呀一声说："不是你的一席话，差点办了一桩最傻的事，多玄啊！"后来他爱人和儿子来看他，他跟儿子说："我能活下来，多亏你老聂大伯开导，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能想得到吗？那一年我虽然被关了牛棚，却当了一回救命恩人。

雾途望远 1958年

刘智田

三年锤炼评优秀　四载积功誉军营

因忠得咎入另册　发配山西气难平

阴谋诡计多诬陷　引蛇出洞乱弹琴

韬光养晦公正待　迷雾重重罩征程

你好，我的介休乡亲

陈 玮

作者小传：

1929年生。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49年7月参军，1950年4月入团，在华东军大、华东炮兵学校、中央炮兵学校、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了四年半左右。后化炮兵学院教师，曾获奖。少尉军衔。离郭堡后在介休当煤矿工人，摘帽后恢复干部身份调任会计，因看透形势仍当工人，改正后恢复干部级别。离休前在原籍浙江温岭任市建办主任、工办付主任。

难忘介休，最难忘介休的乡亲，如果你没在介休待过，你就会很难理解我这时的心情。

一、老郭道歉

自从修完郭堡水库以后，我就被分配在介休的义掌煤矿，直到1974年，我调回原籍浙江温岭微型电机厂时为止，我在义掌煤矿已劳动了十六年多。

就在我离开义掌的前一天的晚上，矿上的一位工程师郭玉山同志和夫人一起特他到我家来为我送行。我们在一起热情地聊起了天。

忽然，郭工程师他很庄重地对我说："老陈，咱们今天一别，以后很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法再见面了，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和你告别。"

我说："是啊，是啊，要走了，以后见面不容易了……"

老郭打断我的话头，说："我，既是来向你道别，同时，也是来向你道歉的。"

"道歉？道什么歉啊，这是哪儿说起啊。"我本以为他是随口说句客套话，但一看他的表情，却是一脸的认真，我解释说："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一样相处啊 。"真的，我和老郭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不，你不知道，你听我讲你就明白了"接着老郭一口气讲了一番话，看样子，这些话在他心里已经憋了很久很久了。"你来的时候，矿上向我们宣布过你的身份，按上级要求，还要大家注意你的言行和表现，我和别人一样，原以为像你这类人一定是坏透坏透的，所以心里就和你拉开距离，可是时间一长，我就有些困惑，看你的劳动，看你的待人处事怎么看也不像是坏人，到后来，我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对你的看法有了改变，实际上矿上的群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打心眼里都很待见你，喜欢和你一起相处，

所以你的群众关系特别好，再后来，我看你劳动很努力，矿上各个和你有关的单位的领导也很信任你，很尊重你，这一切都看在我眼里，才使我改变了态度，逐渐接近你，越接近才越觉得你为人很正直，是一位值得交往的朋友，自那以后，我们之间才建立了直正的互相信任、互相理解的友谊。我曾经那么长的时间里，莫明其妙地把你当作坏人，你说，我应当不应当向你道歉？”

我听了老郭的这一番话以后，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今天不讲，等我明天一走，他就再也没机会向我当面表明他的心境了，那他会非常遗憾的。听了他的话我也非常感动，因为我当时还够不上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也够不上是一个正常的劳动者，我是什么？是摘帽右派，是政治贱民，他能这样推心置服地、坦诚地对我谈起自已心路历程，这是多么值得珍惜的友情！

二、当乌云笼盖的时候

文革以后，全国的天空，笼罩着一片乌云，介休当然也不例外，像我这样的人，在各地各处几几乎都难逃此难，我当然也是某些运动领导人和运动积极份子们瞄准的对象。

在运动初期，全国一片扫荡牛鬼蛇神的呐喊声中，义棠矿的矿长兼矿党委书记张某，也曾经想把我推出来当斗争目标，以转移群众们对“走资派”斗争。他组识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开会，要讨论斗争我的具体部署，说实话，那时的我已处在极其软弱的地位，任何人想怎么处置我都是合理合法，合乎斗争大方向的。正当就要做出决策时，一位造反派头头雷中青起来发言了。他说：这个问题还要考虑考虑，这个陈玮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既没有站错队，又没有参加任何活动，他一直在勤勤恳恳地劳动，而且不管哪一派的人组织生产，他都积极参加，这样的人要斗争他，我倒要问问：你斗他什么？他有什么可斗的？几句话一顶，顶得这个张某哑口无言，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位雷中青曾和我同一室住过，对我平日的为人处事和劳动态度都有所了解，所以才会理直气壮地为我说上几句话，我才逃过了这一劫。

矿上还有个副支书也曾想对我下手，目的也是想为自己捞点政治资本，他发动了几个头脑简单而又发热的小青年，准备拿我开刀，不料我们的支部书记郭家琦同志却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干部，在那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勇敢地挺身而出，保我过关。那个喜欢整人的副支书因品德不好，口碑极差，常遭全队工人的白眼，又因乱搞男女关系受到矿党委的记过处分，在众人的冷嘲热讽下，他灰溜溜地调到别处去了。

三、乡亲情长

十六年的相处，使我对介休的乡亲们怀着深厚的绵绵情意。当年我被打成右派以后，由于我不服罪，故而受到的处分也比同批的难友重，行政上降了我三级。在郭堡劳动锻炼时，也因我拒不服罪而受过长达数小时的批判，我本来还以为会给我判刑呢。为了要杀鸡吓猴，水库领导又组织批判大会，批了我四个小时，重点也是批我拒不服罪。我甚至于还以为会判我入狱呢。而到了介休，我本想我的命运也不会好多少，可是在介休劳动还不到三个月，介休县委就批准我摘掉右派帽子，虽说后来摘了帽子仍被人称为摘帽右派，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可在当时，早日摘帽对一个右派來说，那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而对一个领导人来说，如不是正直无私，谁会为你一个右派分子的摘帽问题来承担责任呢。这说明了介休当时的几位领导人是值得我钦佩和尊敬的。

我还感到介休的群众也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他们正义感强，待人诚恳，不欺负外来人，当然，更不欺负“右派”，当年我离开介休时，除了矿上的职工都对我很关心以外，矿区附近的村民也很记挂我，很尊重我，在言谈中，常为我鸣不平，他们不止一次地问我：真弄不明白，对你这样一个正派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整你呢？干吗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呢。我心中苦笑，无言以答。

至今还记得离开介休时，邻居村民们的盛情，有近十家乡亲都要为我设宴饯行，我因怕误了到温岭的报到时间，只去了两家，就揹上行李匆匆而行，直到回到老家以后，才逐一向他们致谢。他们的情意，至今我仍然深记在心。

啊，介休的乡亲们，我没忘了你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的深情厚谊，鼓舞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我们会再见的，我要在近年内再赴介休，探望我几千里外的亲人们。

第五章　安魂曲轻奏

这是家父生前的一篇回忆文字。可惜历经大难的老父，一生遭受磨难过度，终究未享天年、未尽其才，也终究没能安享到世俗常人的天伦之福……

愿老父在天堂里健朗自在，幸福平安！

—公刘之女　刘粹

大难不死　尚待后福

公刘

有生必有死。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生一次，也只能死一次，传播媒体经常告诉你这样那样的趣闻轶事，先教你汗毛凛凛，随后又教你喜笑颜开。这类故事，照例是有鼻子有眼地报道，某国某地某男某女，怎么怎么"死"了过去又如何如何"活"了转来；我很不知趣，每读到这种花边新闻，总不禁兀自断言：分明是假死嘛，倘若真死了，肯定就还不了阳了。

然而，死亡的阴影，却可以霹雳闪电般，在艳阳高照的日子，倏然猛拍你的头顶；当然，一旦乌云移位，你便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了——这个过程，有时简直像一场恶作剧，不，一场闹剧，虽然它确也无伤大雅。

我把这种样式的死亡，即，濒临死亡甚至接触死亡而终于不曾死亡，统通名之曰：打死亡擦边球。

粗略计算下来，仅在劳动改造期间，这种擦边球，我本人就先后打过若干次，其中最悬的有两次。

容我慢慢道来。

看官须知，从这些个有惊无险、有险无惊、有惊有险的不同遭遇中，似乎不仅仅能看出我这个人活得"皮实"，命大，可恶得连阎王爷都不愿收留；抑且多多少少还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风云变幻的大气候，倒也可资谈助。

在正式进入本文之前，得先来一段引子，一阕有关劫难的前奏曲，仿佛服中药的人，在喝下医生下的猛药之前，必须先灌一碗略带土腥味儿的芦根汁一般。

死亡也有引子。

我们在被总政、总参、总后、海政、空政五大单位遣送山西“劳动锻炼”（据说，这是复杂得近乎繁琐的右派分子劳改政策中的第二等待遇。第一等待遇是，交由原单位群众监督，个别人可以照旧从事本职工作，不降级减薪，但提升无望，也有一些人降级减薪的；每日早出晚归，抹桌椅，倒痰盂，扫厕所，乃是天经地义，赶上植树节什么的义务劳动，人家挖五个坑，你就得挖十个。否则，无从证明你对自己的身份有起码的“认识”。） 前夕，一般都降了级，根据各人“问题”的严重程度，幅度大小不一，有的降一级，有的降两级，我降了四级，再降就是战士了。“罪行”更严重的，则受到“劳动教养”的惩处，只发生活费了。部队中凡受到这等处置的，一般都发配到北大荒，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提到过，至于不幸被划入“不可救药”一类的，就干脆判刑若干年，由劳改营（即所谓特种农场、特种矿山）管教去了。上述四类，共同之处有下列三点：一，都经由军法审判，都发给一纸正式的判决书塞入档案；二，都被开除军籍；三，都被剥夺公民权。其实，劳动犯还有一个服刑期，也就是说，还有明确的指望；而前面三种人，似乎受到了“优待”，却完全没有底——几年？天知道！因此，1979 年全面“改正”时，才发现有右派帽子一直戴了二十几年而始终摘不下来的。再说，劳动就是劳动，除了第一类，可以勉强算得上实行了所谓的革命人道主义外，其余的，谁又不是被强制劳动呢？反正，据我所知，所谓劳动“好”，绝对是“表现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劳动“不好”，自然证明你抗拒改造，轻则斥为资产阶级好逸恶劳思想劣根未除，频频进行“帮助”，重则罚你去从事更脏更苦更危险也更无休止的劳役。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不过是“赎罪”和争取摘帽子的手段，实在是丝毫沾不上主人翁态度、自豪、积极等等的边儿的。

言归正传，前面说过，我们这几百名钦犯，是 1958 年的五一劳动节在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工地正式上工的。这个日子，对我们实在是一大讽刺。上边不知是怎么搞的，竟仿效起“修正主义分子”铁托实行的“工人自治”来， 表面上是“右派自治”，实则严格控制，仅举组织方式一例，就非常能说明问题。我们完全是军队编制，大队相当于营，以下则分别称作连、排、班了。起初，设正、副大队长各一名，任命原总政保卫部的校级军官充当，正的叫陈挺，副的 叫周宏达， 陈是山东人，周是河北人。他们的主要罪名与“恶毒攻击”肃反运动有关——因为他们了解内情，而偏偏又“知无不言”。

不到半个月，水库的坝址清基工程（先搬石头后钻探）便结束了，为了赶在汛期山洪爆发之前，教大坝达到七十米高程，真个是“每日挖山不止”；人们心急如焚，县

上的水库工程指挥部到处栽上电线杆，安上高音喇叭，一个妇女，用本地土话整日价不断高喊："大干快干拼命干！"取土场挪了又挪，愈挪愈高，土方量愈来愈大，因而取土点也一会一个样儿。

这种时候，十分突出的问题自然是安全施工问题；大队长们都愁得瘦了一圈。不穿囚衣的大伙儿，（因为还有真正的劳改队，身着一半儿蓝一半儿白的号衣，头戴同样的用蓝布白布小三角块拼起来的"西瓜皮"帽子，据说，这都是象征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没有一个不瘦得像皮猴儿似的。这一天，我们排被分配到一处陡崖之下干活，有的挖土，有的装筐，有的推小车，也就是四川人管它叫做鸡公车的独轮车。我恰好被分在推车组。

山西地属黄土高原，土质一般很好，黄澄澄的，当中往往还夹着许多寸把长的白丝丝，连当地人都叫不上名字。说 它是小虫子吧 ，它又不会动 ，说它是植物吧 ，又从不出芽，我猜，大概是真菌之类的玩意儿吧。这样的白丝丝，愈多愈好 ，老乡管这种土叫立土 。打胡基 （砌墙用的土坯），打煤羔 ，都离不了它 。它还有一宗特殊的优点，即，凡是这种土层厚实的地方，券窑洞，掏深井，一般都比较保险。等到又过了十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受到惩罚，去忻州北部地面务农，对立土性质的了解就更深一层了。这是后话。且说这一天， 我们的取土场情况不大对劲，并没有白丝丝，反倒有大量的砬礓石。粗心的人会把砬礓石错认作中药里常见的龙骨，也有点像日常吃的生姜，只是非常硬，一颗一颗的，忒闹独立性，破坏性也忒大。

挖土的人只图省事，刨下多大块，就往筐里装多大块。殊不料，镐头咚咚地震动了崖头，也闹不清谁的一记猛砍，使劲太大，大概正好落在了要害部位上，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塌地陷一般，一丈多高的崖头迎面栽了下来，一时黄尘滚滚，眼都睁不开——我可不是睁眼的问题！此刻，不迟不早，我正在崖下等着装筐。一般情况是，小车两边一边一人，同时挥舞大锹，节奏整齐，待觉得差不离了，不偏沉，推车人就抓牢两只车把，先退几步，抖抖，再折转身，直奔大坝而去。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刹那间我被劈头盖脑地打得天晕地转，车子倒向了右侧，把一条右腿别成了直棍。我右首的填筐难友，已经被埋在无数块斗大的土坷垃中，出气不得。左首那位却弹地一跳，逃脱了灾难。

不幸被埋在土里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段炼，事后，众人跟他开玩笑："都怨你名字取得不吉利，命中注定要锻炼锻炼！"还有一位难友，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姓名了。而我呢，只能算作入了四分之一股。同在一个班，又头挨头睡觉的好友刘玉璋，慌忙将手中的小车掀翻，转身跑回来招呼一时吓懵了的同志们（也许应该说是"右派们"），先

把堆在浮头上的碎土扒拉开，然后使劲儿用手挪开那压在我右膝盖关节上的大土块，一面还给我鼓劲："别紧张！别紧张！咬咬牙！"不大工夫，那土块便滚到一边去了，因为太大，没滚多远就停住不动了。后来，刘玉璋估摸，起码有三百斤。我一瘸一拐地踅往一边就地坐下，察看伤势；这时间，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闻讯赶来，两人都脸色煞白，呼吸迫促，汗水淋漓，神情十分紧张。正副班长陈振华、吴占一忙着向上级汇报。许多人用锹和镐一点儿一点儿刨土，不敢大铲大抡，唯恐伤着闷在土里的自家人。我不用说，只有干着急的份儿，屡次三番试着站起来而终于失败了。这会儿，麻木感消失了，渐渐疼痛起来，出现了肿块，肿块的周围火烫火烫。

人多心齐，不一会儿，段炼同另一位先后获救，见了这活脱脱一对泥菩萨，大家长出了一口气。他们的眼睫毛都是黄的。人们一面慰问压惊，一面忘不了开玩笑："感觉如何？" 但无论你扯多大嗓子，他们一概听不见。我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免悲从中来；忽而又寻思，咱们有句成语："充耳不闻"，这回倒真的应验了，试想，耳朵眼里塞满了土，哪能放声音进去？

这就是我喝的头一碗芦根汁。

很快就轮到我喝第二碗了。想来这人世间，还真有命运这东西，因为这第二碗，又是命运按住头捏住鼻子硬灌下去的，并且剂量远比第一碗大。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各地都闹开了"滚珠轴承化"，水库指挥部当然不甘落后，便把小小的手推车一律改作小平车，一平车可拉土六百斤至八百斤，最高纪录曾达到过一千斤，拍得实实的，垛得尖尖的，远远望去，一座山似的。人人都得掌握这门本领，至于拉多少，根据主观条件而定，可是怎么也不能少于六百斤。一时间，工效提高了三倍！然而，高音喇叭还在一个劲儿地嚎叫："大干快干拼命干！"

人们真是豁出小命不要命了。

一天绝早，我们刚刚结束挑灯夜战才不过四个钟头，又赶到工地，各班急匆匆领回自己的车子和工具；每挂平车，一律配备有用荆条编成的前后挡板，箍挡板用的粗麻绳，还有一柄圆头锹，它是供架车人装土拍土用的。待到车已装妥，这锹就插在"山尖"上，像一根旗杆，就差一面令旗了，颇逞威风的。

这天，该着我拉车，别人装车。

由于连续作战，我的手腕"努"着了，又青又红的肿了起来，还呈现斑斑点点的瘀血紫瘢，按理说是完全不应承担这项活计的。可是，我能向谁诉说呢？谁又会听我诉说呢？大家都彼此彼此，还有绑着绷带上阵的，真跟他妈的打仗一样。

我一连跑了七八趟，单程距离一千五百米，最高处的坡度为仰角三十度；而且由于车多，运输量大，取土场愈来愈远，全程愈来愈长。临近傍午时分，腹中擂起了小鼓，是饿了，有点虚脱，热汗开始变冷汗，眼镜片上水雾蒙蒙，还不时得腾出手来扶正眼镜架。沿路都是撒下的土，大坝上的秩序出现了零乱无章的状态，人们争着抄近路， 以致险象环生。当我正架着一挂压得死沉的重车顺坡往下溜，不好！只见迎面一辆空车猛奔而来，想必对方也是乱了方寸，刹不住车，显然，是他违反了轻车让重车的规矩，可事到临头，谁也躲闪不及了，眼看就要相撞，我担心我这连人带车上千斤碾过去，肯定要伤着对方，我自己也好不了；与其伤两个，哪如伤一个！心一横，便立即使出吃奶的力气，扭转车辕，直朝大坝边上栽着的一根电线杆子冲去。我当然也心存侥幸，指望沾电线杆的光，能把车子和车子上的土保住。然而，岂料……一霎时天旋地转，平车根本不听指挥，在电线杆上猛弹了一下，车子一颠，轮子一滑，至今我也不曾闹明白，怎么会角度那么大，竟然掉过头来，不是人拉车，而是车拉人，一家伙栽到大坝半腰间了；当时我神智还算清醒，心上闪过一个数字：一半就是 30 米！

六百斤的黄土，一百五十斤的平车，拖上我不足百斤的身子骨 ，不知受了什么阻碍不再移动了，反正等我睁开眼，已是抬头望见蓝天白云，低头望见大坝底座了，原来是一堆洋灰包救了我一命。

我却结记平车。车子摔坏了没有？要是摔坏了，那就意味着又一场斗争会啊！如今，我可以坦然承认，哪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什么首先想到的是国家财产，不是的，我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上斗争会。

上帝保佑！平车基本完好，这主要靠了前后左右里里外外全是土的缘故。

事后，班务会上免不了主动检讨、接受批评；会下刘玉璋笑嘻嘻对我耳语：“到底是书生一个！是他坏了规矩，换上我，准朝那小子撞过去，大不了拼它个鱼死网破，两败俱伤!”我明白，他这是在指拨我，往后再遇上这类事，可千万别犯傻 ！想想也对 ，像我这样不明不白地一头栽到坝下，让那些不知底细的人奚落一通：再想老婆也犯不上啃电线杆子呀！简值出洋相!

得亏不曾大伤着，将撞上电线杆时，我闪开了头脸，教左胳膊遭了罪，大面积瘀血；至于内里有没有暗伤，就只有天晓得了，这下场，似乎也可以暗自庆幸了吧。

以上两次，还只能算作小小不言的事故，大戏开台之前的一个序幕。较我抢先出场的是一位名叫秋静鹏的难友，他来自空政；他显然是按刘玉璋提示的方式行事，架着重车和别人的轻车迎头相撞，虽不曾滚下坝去，却比我更惨，对面的车辕不偏不斜地捅

进了嘴巴，毁了满口的牙，险些送命。真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一日无事故，大小不同而已。

小平车运土，固然胜似独轮车，但土方量还是供不应求，怎么办？“右派”们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提出了铺设轻型钢轨，利用废弃的煤矿斗车，再在高处山上新辟取土场，借自然坡度，重车滑行向下，空车则由人力往上推的合理化建议，很快被采纳了。于是，先忙了一气拉钢轨、抬钢轨、铺铁路、修挂钩之类的准备工作，四个斗车一组，试运行的结果，居然比小平车翻了四番。

我被编在推车组。大组下面设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成员有副班长吴占一，还有战友段星灿，一共三人。吴占一本是老熟人，他当过文化部陈沂部长的秘书，后调创作室，还是担任秘书，不久便调走了。反右开始，算他倒霉，碰上了好领导，硬是将他从别的单位揪回来“批斗”。据说，由于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某大将和陈沂部长有矛盾。某大将趁机坚决要拉陈沂下马，硬把陈划作“右派”。创作室主任虞棘原本是陈的左右膀，可到了这会儿，“大难临头各自飞”，但是，“飞”也不容易，首先必须反戈一击；于是，虞棘一方面声嘶力竭，大揭大批，一方面就是在吴占一身上做文章，一心想打开突破口，整出什么致命的“材料”来，充当“炮弹”，拿去轰炸昨天的顶头上司。就这样，吴占一在劫难逃。批斗会上，虞棘给了吴占一一个封号：陈氏家丁。另一位积极分子干脆接着喊“家奴”。我在批斗会上敬陪末座，听着，想着如果吴占一是家丁、家奴，你岂不是同一类货色么？要说有区别，也不过是你正得意，你可以笑，可以污辱人，有有恃无恐而已！其实，吴是个正派人，我是同情他的，但也仅止于同情罢了。我已铁定是“右派”，哪有勇气“仗义”？又哪有资格“执言”？这一场所谓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有如地震海啸，一阵紧似一阵，诚如党报每日严厉警告的：谁想“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自己无辜被杀死就算了，何苦再惹人鞭尸！

回头再说推车。这天天气不好，下开了牛毛细雨，光景有点像江南黄梅季节，雨似油，粘粘乎乎的，不声不响湿衣衫。我们三条汉子，却热气腾腾，都脱得只剩下一条裤衩儿。我们实在太忙太累太乏了，一趟接一趟，总也捞不着喘口气的机会。远远望见取土场上的伙计们，也同样几乎是赤裸裸的，平日间晒得漆黑的身体，这会儿更涂了一层黑釉，闪闪发光。我们推车组是固定组合，空车推上去后，必须立即从另一头跑步下来；等实车下来了，一辆一辆倒空斗子，并且敲打干净，又用扫帚胡撸一遍，务必不让把剩土带了回去，这叫充分利用。当然，这一系列动作，都得争分夺秒，干净利索，一环扣一环，容不得思想开小差。在这种场合，人就是机器。无奈钢轨不够，没法铺复线，

否则还不知道要怎么使唤我们。有人私下嘀咕。但一想到不久山洪可能下来，万一前功尽弃，非但大坝不能完工，肯定大家都得吃家伙，这又是正面的、经得起显微镜观察的活思想了。说到底，还只有靠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弥补。跑！跑！跑！一直跑到将四挂空空的斗车推上斜坡，进了取土场，赶紧往最后面的两个轱辘下边，楔入“眼石”，这当中，倒能找到稍事休整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反正斗车再不饶人，也是死家伙，它得一圈一圈靠人推着往上爬。

我们的“眼石”是完全不合规格的。平日间，看见村里的车把式们赶大车，一般都挑质地很硬、有楞有角的石头，我们却用的是随手捡来的几截树蔸瞎凑合。最理想的眼石，一只角必须近似直角（但只能小于九十度，不能大于九十度），底子要平，才能放得稳当，不致轻易翻转。我也搬过那树蔸 ，我根本没在意它早已把树皮磨烂了，光溜溜的了；平素裹上去的一层干土，现在让雨水一泡，简直变成了润滑剂，把根本不产生多少阻力的它变成了一只小轮子！这就埋下了祸殃……

据事后听说，几是四节一溜的斗车，一旦被装得结结实实，照例有人七手八脚要用大锹使劲拍打一阵，然后才会由值日者吹响哨子，示意下边的人们注意：发车了！

谁能料到，这一回完全乱了套。我们三个正埋头推车，离取土场大约只剩三百米，没听见那尖锐的长长的哨音，重车却“自动化”了。到处是一片惊呼声。当然，对于我们三个，再大的吼叫也绝对不存在，这些都是事后听别人描述的；在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空车艰难上行、金属磨擦复撞击的噪音，以及斗车与斗车衔接处钢缆被扭曲时的痛苦呻吟。这类声音，无疑是有害于人的生理机制的，如今习惯了，也就麻木了，感受不到刺激了，不在乎了。

那上面的重车以惊人的加速度冲下斜坡，一米，两米，五米，十米……死神来也！

段星灿在我右手边，吴占一在我左手边，我夹在当中，即便抬头，也给车挡得严严实实的，什么也看不见。

纯属偶然，我们三个得救了。由于钢轨必须经过一段硬从高粱地里填筑起来的路基，整个路线是弧形的，就在这个拐弯处，段星灿大概是意外地和死神打了个照面，吓得土遁了去 ；车子突然间少了三分之一的推动力，不得不偏向一边，几乎停了下来，我还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道段星灿哪儿去了。幸亏吴占一眼尖，只听他大喊一声：“不好！公刘快跳！” 立刻，吴占一也不见了；我跟着也纵身一跃，尾随他之后，掉进了十几米深的高粱地，简直像“飞”一般，这当然并非绝技，仅止本能罢了！

这当口，但听得哐当哐当轰隆轰隆卡嚓卡擦一连串骇人巨响，空车重车都颠覆了。

它们一共八节，全扣倒在路的另一侧，反而距最早弃车而去的段星灿不远。

我该怎样描绘我的这个“着陆点”呢？

一大片高粱地，差不多要成为我的葬身之所……

山西人爱种茭子，也就是红高粱；未成熟时，青纱帐起，绿茵茵一片，海水一般 ，一旦成熟，看吧，红旺旺的，如同同时举起了万千亮火把，十分壮观。然而，要说红面比白面好吃，那是哄鬼。山西老乡再待见红面，也不会嫌白面多了。那年月以红面为主食，是没有办法。因为比较下来，高粱较之麦子、谷子、糜子等，产量高出许多。后来，我到农村长期劳动，又常听干部们大会小会上念叨，“要过江，种高粱”（当时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长江以南亩产八百斤），仿佛歌谣，琅琅上口。由于红面性涩，捏不成团，人们变着花样吃它，什么搓鱼鱼，剔尖尖，格坨儿，拨鱼儿，压饸饹，撅猫耳朵，然而不管你怎么吃，首先都离不了掺榆皮面。可榆皮面实在难吃又难看还难消化，即使是选的上等榆树皮，晾干了，碾成面，兑上水，调出来还是青灰寡白，粘粘乎乎，跟鼻涕一样。但又全靠了这“鼻涕”，众多的农家妇女，方能将自己的创造才能和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因此，“鼻涕”是有功的，得感谢“鼻涕”，尽管难以吸收，无法给我们带来多少营养。

说到底，高粱面即便一无可取，高粱这种作物却浑身是宝，香醇甘美的高粱饴， 是利用高粱熬的糖分做的 。固然，高粱酒是人所共知的传统名产，而高粱醋却未必为外省人普遍了解。走进山西农家，每每一眼就能看见当院或者正窑里，摆着一溜数个八石（读作担）瓮，这种瓮深得能容下一个半大小孩儿。凡是有八石瓮的人家，空气中往往泛着一股酸味，那就是盛了自制的高粱醋了。山西人嗜醋，除了据说水里碱大，需要中和外，盛产高粱，不能不说是老天帮忙。还不能忽略了高粱秆，它的靠近根部的一截，最受乡村娃娃们的欢迎，尤其那不秀穗儿的棵棵，干脆被叫作土甘蔗 ，鲜甜沁凉，且多汁。整根的高粱秆 ，本地人唤作秫秸，含有丰富的纤维素，是造纸的上等原料。深秋季节翻地时，田头地角，处处活跃着妇女小孩，紧跟在犁耙的后面拾高粱茬，土话叫茭茬，是最理想的烧坑燃料。而高粱秆的尖端，群众称之为“箭秆”，是大有用途的编制材料，男女老幼，人见人爱；可以经过麻线的穿孔，编成各色各样的器皿：缸盖、锅盖、托盘、笼屉隔层、针线簸箕、碗柜、筷子筒，手巧的甚至能编出鸟笼来。大概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当然更是为了抢收粮食，这片接纳了我和吴占一的高粱地，一律被扦去了梢头和有七八成熟的穗子，那颗粒至少可以作饲料吧。不过，这么一来，我的受苦人兄弟于无意中却坑苦了我和吴占一了，就像越南游击队为了对付美国空降兵，遍地插满

削得溜尖的竹签，高粱秆刺得我们遍体鳞伤，鲜血淋漓；特别是我，近视眼，眼镜也不知道摔到哪儿去了，只得边爬边摸，好不容易才从烂泥浆里挖到了它，马上便发现裤衩也被撕破，几乎无法遮羞。此情此景，真是狼狈已极。

吴占一和我隔得不远，二人相视苦笑，此时，我虽然浑身到处火辣辣的疼痛，但毕竟意识到自己有幸生还的事实，不免咧嘴大笑（也许实质上是哭吧？），模样肯定又傻又丑；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否则，将这个镜头保存下来，倒真值得纪念。停了一会儿，缓过气来了，我俩才都一瘸一拐地站了起来，相互搀扶着，绕了小半里路，才寻见一处可以攀登的缓坡，忍痛攀援而上。当我们出现在奔来救援的人们视线之内时，欢声雷动，大伙儿都替我们庆幸；狗日的！我们还准备开追悼会呢！可你们又不愿带这个头！

开追悼会？怎么开？悼词就没法写！同志？先生？反革命？该犯？或者摹仿判决书上的那个不明不白的“该”？玩笑而已 ！那年头，人命本来就不值钱，何况还是“右派”呢！又何需追悼！谁敢追悼？

这一回，轮到大队部出面作检讨了——检讨急于追求进度，关心安全不够；“关心”又能怎么样？大队长们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谁急于追求进度？大家心中有数；不过是敷衍坐镇水库的县委组织部部长的“面子”，人家作“关心”状嘛。

这才脱险不久，竟再次遇险。我不敢学阿 Q 吹牛，说这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有千磨百难。这一次，虽然吴占一不在场，但我要说，仍然是他救了我。

按常理，水库正在紧张施工，雨季愈来愈近，工程必须与洪水赛跑，将大坝抢修到七十米的计划高程，并且砌上护面石坡，还得同时修好溢洪闸；作为水库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六百名“右派”，玩命都怕完不成任务，可就在这紧要三关，忽而上级又下达紧急动员令，宣布“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并且斩钉截铁地说：“炼钢是政治中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因此，除了少数必不可缺的技术人员外，统通上阵。队伍从水库上撤下来，我望着大坝，心中不禁捏把冷汗，其实，人人何尝不心同此情，心同此理？真是疯狂的年代啊！不可理喻！从这时开始，我们整天忙于探矿、采矿、担矿、运砖、建土高炉、磨缸瓦面、配坩子土、拉电线、装鼓风机、砍树、备料，等等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的严肃而又荒诞的游戏。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这种游戏，居然包裹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美丽装潢，从此，四十八小时，七十二小时的连轴转，不合眼，就只当家常便饭了。

“右派”的命不值钱；平心而论，全国老百姓的命就值钱了么？

下面，为了叙述第二次遇险的经历，我不得不展示若干可怕的场面，凄凉的场面，

悲惨的场面，欲哭无泪的场面。

我和吴占一，仿佛注定了是老搭档，这回又一齐被分配到采矿小分队，分工专管探矿，然而是单兵作战，每人名下配属两位青年民工。我手下的两个，一个叫王招财，另一个名字我已经毫无印象了。他们都是太谷本地人，哪个公社的，也记不清楚了。水库建设初期，征集民工还讲个原则：凡灌溉受益的单位出人，自带口粮、工具、被褥之类；但不久便被破坏了，不管你是哪个村的，只要是太谷人，一旦得到通知，立马出发，限时上工，无轮换期，也无报酬。日后批判的所谓 “共产风”、“平调风”，这大概也算是典型。跟随我的这两个后生，都不过二十出头，虎背熊腰，一表人才。这时倒不曾听过他们有什么怨言，因为他们饭量大，既然管饱吃，苦又不重，也就乐得三饱一倒了。

我们三个结伴一直往西南方向走，整整一个白天，走的尽是盘山路，都靠近榆社县地界了。天愈来愈黑，山愈来愈大，当晚赶到了一个名叫古香林的小村子，这名字很美，我一听就觉得肯定会产生诗，不久，我果然哼出来一首。野地里月亮特别大，从破墙烂屋顶朝上望去，非常晃眼，一宿无眠；自然，失眠非关月色，端的是一半由于兴奋，一半由于惶恐。

下面，先来上一段抒情的，再说那不怎么有情可抒的骇人故事。这所谓抒情的东西，就是诗，一首八行体的小诗：

多谢啦，夜的古香林，

乍相识，就赠我半床明月，满枕涛声；

三五青山，好似一群淘气的邻家少年，

倚着窗儿，对我直挤眼睛……

仿佛说：“打一个哑谜，你可要猜准，

铁，究竟藏在哪一只手心？”

青山呀，休怪我所答非所问，

告诉你们，祖国，需要一张坚固的盾。

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夜宿古香林》，还安了一个副标题：探矿日记之一，它从一个侧面纪录了我的思想状况，既天真，又痴呆，依然在具体地爱那个抽象的“国”！我完全没有份的“国”!

我只带了一条线毯、几件换洗衣服、一只军用挎包，里面塞了洗漱用具以及纸和

笔、还有对我说来非常重要的手电。实际上比当年行军都要简单，省了背米袋、搪瓷碗，当然，更主要的是省了背枪。吃的是派饭，但并非像下乡干部那样，一家一户轮着供应，如今情况大变了，男女分灶，所以只能扎在男人堆里好赖每日三餐，有啥吃啥；这种形式的集体生活，新鲜得古怪，留到下面再详细讲。

头一夜对付过去，发觉自己到底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山里夜寒，一条线毯招架不住，没带棉被是大失策。第二天只好钻王招财的被窝筒。招财说："不怕有虱子？"我说："怕甚哩！又不是没生过！"但有一样倒教人作难，山西农民习惯于光着身子睡，我不行，只好调过头，仍旧穿着裤衩儿，心想，大不了带上一群小动物出工，当个不下班的动物园主任，也挺风光。

古香林没有古香林人，全拉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今住在本村的，竟都是外村人。男的归堆，女的另归一堆；各立各的灶，各开各的伙。要说女人当中有男的，那也尽是些吃奶娃娃和离不了娘的小小子。这无疑是开天辟地以来闻所未闻的奇事。这些人中间，大多数是彼此不相识的。那阵子作兴搞"大兵团作战"，往往一个公社组织一个"兵团"，便于统一号令，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其所以移民迁居，男女隔离，据说正是出于这种战略需要。我想打听古香林的受苦人都去了哪里，答案是，男人们下落不明，女人们不明下落。像这样，男的和女的"各住各的营房"（也用开军事术语了），岂不把家都拆了？还怎么过日子呢？问起这一点，看来普遍有情绪，说话都没好气："骗了去球！""男人不是男人，婆姨不是婆姨的，就是叫咱们回去也没半颗粮食，锅也砸了烂铁，献给国家了，吃甚呢！"我听了，虽然十分的同情他们，却不敢吱声。

住进古香林的外村人，都干些什么营生呢？男的担矿，女的砸铁，一无例外；最可怜的要数拉扯着孩子的妇女了，她们整日盘腿坐在野外，风吹日晒，必须完成上峰规定的方数，将乱七八糟，来路不一，品位极低的所谓铁矿，由大块改小，小到同拌洋灰铺路用的石子儿一般规格。她们的衣衫全磨破了，膝盖、胳膊肘乃至臂部都露着肉，没有一个人的虎口不是在敲打中震裂口子，血里糊拉的。

据我的观察，人们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时刻，就是开饭那大半个钟头；如今不像居家过日子，好赖可以歇晌，来当"兵团"战士，抹抹嘴就又该进入"阵地"了。饭食的确是"敞开肚皮吃"，大海碗的高粱面条，半截砖似的玉米面窝窝，还有菜汤，几片白菜加几片土豆，偶尔漂三两点油花花。一般说来，大伙儿是相当满足的。妇女们叨叨说比家里吃得舒坦，不用吃了上顿愁下顿，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才会悄悄摇头叹息：这哪像过日子？诚心败家呢！长不了，保险长不了……这种"落后"话，是决不可让干部们

听见的，干部们听见了，倘对方是贫下中农，就会日一通你祖宗，遇上成份高的，那活该批判“反动思想”。要知道，党报上正在讨论 “粮食多得吃不了该怎么办？”这样唱反调，不是对着干，搞破坏，又是什么？

我对这一群外村人介绍的情况，总有点将信将疑，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可村儿跑了一圈，果不其然，没有一户烟囱是在冒烟的，除去“兵团”占着的房子。所有的门窗几乎都没有上锁，有的用绳子拴住，有的别了根葵花秆，最细心的人家，也不过码了一摞胡基。锁呢？哦，我差一点忘了，锁也是铁呀！怕是动员捐献了。从破烂不堪的窗棂格子朝里看，真可谓十室九空。偶尔发现所谓的殷实人家，居然还保存了一半个躺柜，但也是撬了锁的；我知道，这种躺柜上的锁，连同金属护心镶板都是黄铜的。铜也是好东西，也在捐献之列。我暗自寻思，真是罗掘俱穷，搜刮一空啊！

还是在第二天，睡觉的时候拉呱，几位老贫农误会了，以为我是“公家人”，下乡干部，同时又判定我这人“当官没官气”，根据是：不嫌弃庄户人，居然和招财挤着睡。我本来想交代自己的“身份”，却忍住了，怕给日后带来不便，唔唔了两声，含糊过去。其中一个挑头问我：“一路上可留神看庄稼了！”我说：“咋不看！这么喜人的年景！”“年景是好年景，可收不回来，这可咋呀！”另外有人插了嘴，“五谷丰登，登不上场，齐登到地里了！”此言一出，炕上就热闹了。七嘴八舌的，有人便念起了顺口溜来，什么“茭子丢了红帽帽，谷子断了黄腰腰，豆荚儿放了炮，玉茭子上了吊，棉花戴了孝。”回顾昨天亲眼所见，高粱颗颗教鸟儿糟践得差不多了，谷子倒在地上快要生芽了，豆子也炸飞一多半了，玉米棒棒脑袋全耷拉着了，棉桃吐絮也快挂不住了。创造这段顺口溜的农民绝对是天才！太形象了！如今不兴采风，这才是杰出的讽刺文学呢。

联系到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什么究竟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群众心里都有一本帐，难道谁还不明白！

古香林座落在深山腹地，野兽出没，是意料中事。村里村外所有的土墙上，甚至大门上都用石灰画满了老大老大的白圈，旧的剥落褪色了，再描上新的，很是醒目。换了对中国北方农民一无所知的外国人来看，或许会把这误解成当地的图腾、禁忌，以及某种东方式的神秘符号。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我懂得，这说明附近有狼；狼多疑，望见白圈，它就不敢随便进家伤人了。这当然是人凭经验分析出来的结论，狼不会说话，不能够告诉我们它的思维活动，一个大白圈，对它意味着什么。但，狼疑心忒重，我少年时代的一段亲身经历，倒能提供一个旁证。

记得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江西吉安青原山国立第十三中学念初中二年级。

有一次，我因事进城，耽误了一些时间，天擦黑了才返校；寒冬腊月，还下着毛毛细雨，浑身凉飕飕的些。这背景本身，些就颇为肃杀。我的胆子本不算大，此刻自然愈发心急，脚步匆匆往前赶路。待我走近离大礼堂不到一里路处，公路小桥上，赫然蹲着一头狼！我凭什么断定那是一头狼而不是一条狗呢？凭它的眼睛！惨绿的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的眼睛！糟糕的是，我孤身一人，没有可商量的同伴；些我只好停住，可又不敢掉头逃跑，唯恐它扑过来。此时此刻，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汗都急出来了。猛然间，我记起了不知听谁讲过，狼怕伞，怕一张一合的伞。于是，多半是年幼无知，愣头愣脑，同时也是走投无路，便冒险一试，以图一逞，不承想，奇迹发生了，伴随着我的一声断喝，说来不可思议，那狼竟然掉头跑了。我长大以后，还不免老是回忆当年那些细节，着实奇怪，那头原本轻而易举就可以大嚼一通的狼，究竟被什么吓住了呢？我的结论是，除了我的不断舞动、忽张忽合的伞之外，估计还有我那正值发育时期，变音且又颤抖的嗓子，我想，这狼大概还从来不曾见识过如此怪异的嚎叫吧？！

暮色苍茫中，只见那狼跑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看，我不敢大意，便坚持着将伞撑开、收拢、再撑开、再收拢，侧着身子横着走，直到头皮发麻，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才终于盼到了一耸一颠的影子和那阴森森的两点绿光最后消失。只是到了这会儿，我才决定撒腿狂奔，一口气跑进已然灯火阑珊的山前小街，栽进街口上的一家小饭铺，连话都不会说了。店老板也吃了一惊，盯住这个从头到脚淋得精湿，却又分明拿着一把伞的学生。他大概以为我是一个小疯子吧？等他回过神来，我也回过神来了；我将大致经过告诉了他，他马上给我提了个火笼来，边说我福大命大，日后一定当大官，边忙着给我下汤年糕些，加了许多许多胡椒，并且宣布：不要钱，专门为你压惊的。我，一个穷学生，没被狼咬死，还白吃一碗年糕，真是交了鸿运！当然，这位老板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听说这段独家新闻的人。由于他的热心转播，我成了山前小街尽人皆知的明星。

我万万没有料到，些事隔十八载些，那狼竟会追到山西来，旧戏重演！

这一天，因为盘算到路比较难走，也比较远，我和王招财他们三个，些约好起了个绝早，草草扒了小半碗干焖小米饭，又灌了一海碗玉茭子面糊糊，很饱了，可还得等他们吃好，他们比我能吃些，餐餐都要多一倍些。撂下碗，二话没说，爬起就上路。

一连好几天，我们尽钻了深山凹谷，半天不见一个人影，真是“大跃进”，连赶山打猎的猎户，也全都“跃进”去了。偶尔天上飞过一只老鹰，一直望着它落下，钻进筑在悬崖峭壁上的鸟巢里了，心上也觉着温暖起来。它有自己的家，有家就有着落。有时，草棵里飕地窜过去三两只蛇母舅（即蜥蜴），虽然也会吓人一跳，但总比什么都碰不上

强。人，终归是群体动物，怕寂寞，何况是如此异样的寂寞。恰好这天我们踏勘的又是一条从未走过的生路，大山沟，南北走向，倘若一直走下去，能走进榆社县城。这一带山里树木稀少，半人高的芭茅倒是成片成片的。奇怪的是，有一条山涧老是曲曲折折在前面等着我们。那时候，我正当盛年，想不到七老八十的事儿；贪凉快，每蹚一次，总喜欢把水撩到大腿上，还总巴不得多浸一会儿，压根儿就没考虑会种下关节炎、静脉曲张以及寒腿病等等祸害。如今上了年纪了，懂了也迟了。

我们来到一处硕大无朋的山崖跟前，岩石完全裸露，像一堵长长的城墙，些铁灰色的岩体当中，夹着黑红黑红的断层，厚度约十二至十八公分不等，普遍显示锈斑，我使锤子敲下一小块，内部呈砂状结构，且有闪光物质，掂一掂，挺沉，哈！是铁！应该说，这是此番深山探宝之行的重大收获。

我从未正经八百地学过地质采矿，仅仅在中学读过为时一年的矿物课，临进山之前，借了一本有关铁矿普查的宣传小册子，匆匆溜了一遍，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现买现卖，这也算得上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吧，虽然那时候还不曾听林彪鼓吹这两个词儿 。所幸领导吩咐过，不管品位高低 ，只要含铁就要；而眼前这一条露头的矿脉，应该说是“优质”的了。本着不添斤也添两的精神，我认定了这可以上报。

我的兴奋情绪，感染了两位民工，他们对此当然更是一窍不通，不过，为了分享我的喜悦，憨厚的王招财居然捏上一小颗抛进嘴里咀嚼起来，也不怕崩了大牙。抓住时机，我想扩大战果，决定分层深入寻找，招财居中，另一个去崖头上。他们很快就各自爬到了指定的水平位置，底下光留我一个人了。也许是激动所致，我身上淌汗淌得更厉害了，我见过民工们动不动就脱了个一丝不挂，本来嘛 ，天高皇帝远，怕什么呀！我于是也想彻底重返自然，索性连裤衩儿也扒掉，但到底不好意思这样放肆。我戴着眼镜子，鼻梁两边屯了汗，颇为瘙痒，得经常摘下它来挠呀擦呀的，因此走走停停，民工们已经和我不在一条垂直线上了。

我哪能料到，过不了五分钟，我全身散发的汗臭，竟会变成引诱吃人野兽的扑鼻异香！

突然间，空空的山谷里，爆炸似的响起了一阵猛烈的喧哗，打哪儿来的如此嘈杂而又如此整齐的人声？抬眼望去，只见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有四五个农民模样的人，正赶着三匹毛驴 ，驴背上搭着鼓鼓囊囊的白色的口袋，不待问，是送公粮的。可他们为啥这么高声喊叫？是和我打招呼么？似乎又犯不着如此大声武气；虽说在山里一点响动都回音大十几倍，似乎又在情理之中。我有点茫然，便也朝他们回应了一声。然而，他

们仍旧一个劲儿的大喊大叫，并且带有焦急的味道（当时我只是模模糊糊有一点不解和纳闷儿），我又傻乎乎的再回应了一次。我甚至还暗自嗔怪，有什么希罕事，值得这样欢势？我完全闹误会了，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不知死到临头呢。

我收住脚步，不再往前走，两只眼睛直楞楞地盯着远处山道上的那几个汉子，想瞧出个究竟来。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身后草棵里一阵窸窣乱响，还没等我做出有野物跟踪的判断，已经有什么东西拍我的肩膀了，啊，不对！不是一只“手”拍，是两只“手”同时搭上来了。哎呀糟了！狼！狼搭我的肩了！怎么办？我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勇气，站得牢牢的，不曾趴下，只是感到后脖子窝被一个冰凉冰凉的什么家伙顶住了，开始闻到了一股恶臭，怎么办？一眨眼工夫，数不清的念头闪过脑际，也有骇怖和绝望之感袭来，但求生的愿望又非常非常之强烈；这时，我想起了民间流传的种种关于人和狼斗的故事，其中十分激动人心的一个，便是当狼搭了肩时，那被搭肩者既机智又勇敢，飞快地抓住了两只狼前爪，将狼一直背进村，终于把狼打死。

多亏自己还比较冷静，没有逞强，也仿效那位大力士；我很快就会筋疲力尽的，到时候还要负责供应它一顿丰盛的午餐。我下意识的斜着眼睛瞟了一下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是多么的不争气！可是，且慢！我不是握着探矿锤么？难道它是吃素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是左撇子，左手力气比右手大，我抡起左手，一个倒挂金钩，狠狠给了它一锤子；只听得“嗷”的一声哀嚎，顶着我后脖子窝的那个冰凉冰凉的臭家伙蹭了我一下，便连同两只爪子脱离了我的肩背，沉重地落到地上了。但它似乎并未死心，还从我的左侧方往前窜了一窜，该死的畜生！你还打算干什么？我又挥舞起探矿锤，准备迎击，然而它却无心恋战，掉转头跑了。我不禁长吁了一口气，目送它一颠一颠地逃去。为什么它要取那样一种古怪的步态？我这才仔细检查起铁锤来，原来是不偏不斜的正好砸着了它的左眼 ！探矿锤的尖端，粘着狼的血、带有眵目糊的睫毛，以及一些好像是胶状物质的东西——破碎了的眼珠子！哈哈！我，一个名叫公刘的昨天的作家，今日的“右派”，竟然教它变成独眼龙了！我还思忖，这个坏蛋，它肯定想报仇，要不，为什么临走前还要专门瞅我一眼？我又是个什么德行呢？晒得黑黝黝的身子，剃得发青的大光脑袋，架着一副太阳地里闪闪反光的黑框近视眼镜，大概还呲牙咧嘴的……这在狼看来，也许是够丑陋可怕的形象了吧？！

真有意思！

这时，远山道上的好人们又大喊大叫起来了：

啊——啊——喔啊——

啊——啊——喔啊——

揍狗日的啊——好啊——

揍得好啊——好啊——

狗日的——揍得好啊——

这一回的呐喊，显然同上一回不是一回事，这回是助威，嘲笑狼，撵狼了；只是我没闹明白，到底我是“狗日的”，还是狼是狗日的？实在有趣得很！在北方农民的口语中，“狗日的”这个词儿，和鲁迅先生论述过的那个“他妈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个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表达各种不同情感的万能词儿。我想，只要保住了小命，当一回“狗日的”也无可无不可吧。

山上的几条汉子，还在一个劲的跺脚，表示他们的由衷高兴。这完全是一种胜利的喜悦。多么可爱多么善良的人们啊！太感谢你们啦！

宏亮的回声久久地在天地间回旋……

两位青年民工相继出现在我的身旁。招财摸了摸我的肩膀，嘻嘻一笑：“吓杀我了，我都扳下好几圪瘩石头，真想砸那狗日的，可又怕砸着了你；我就怕你回头，一回头教那狗日的咬住喉咙就没救咧。哎呀真个吓杀我了！”

为了安定“军心”，我强作镇静，跟他开了个玩笑：“好我的招财哩，都怨你的名字赖，你看，你招财（豺），我就只好招狼了。“他们两个听了都乐得哈哈大笑。

但到底伤了元气，我们三个怀里全揣着个小兔儿；这地方不能久待，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不过，打这以后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来也不敢忘了那几位救命恩人。（尽管由于我的麻痹与缺乏经验，这一恩典未曾化为实效。）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不知道他们都是哪个村儿的人，甚至于没能看清楚他们的长相身材，我该上哪儿去找他们哪？我只有一个虔诚的心愿：人人都活得硬朗，活得幸福，不愁吃穿，不愁钱花，有儿有孙，无病无灾！

当然 ，要是有朝一日，我竟能专程去山西太谷寻见你们，我会向你们挨个儿行大礼的 ！就怕我这是在说梦话了吧！

我必须承认，这一回趁地狱之门尚未严丝合缝地关上以前，死里逃生，的确一是为了找到铁矿，比较理想的完成任务 ，二是想立上哪怕一小功 ，也会有助于早一点“摘帽子”，而说穿了，一而二，二而一，归根到底是“帽子”问题。这是毋需掩饰了。

写到这里，应该回过头去，交代一下遇狼脱险之事与副班长吴占一的重大干系了。

前边我已经说过，吴和我各自负责一片幅员辽阔的地区，各探各的矿，彼此不通消息；但在分手之际，承他的好意，替我也打了一柄探矿锤；送铁锤时，附带还给了我一本四号字排印，错误百出的小册子：《怎样寻找铁矿？》，大概不满五百字。这就是我们的速成必读课本。探矿锤是请王公村的铁匠师傅打的，也不清楚吴占一从哪儿弄来了“样板”，尽管做工很粗糙，而且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杂木把，便凑合着安了一段柳木的；不过，柳木也有柳木的长处，那就是轻，并且有一定的弹性，不容易折。这种探矿专用锤造型特异，把长得吓人且不论，铁锤本身也蛮古怪，上端尖，像一枚敲秃了的大号钉子，也不妨拿如今新潮女郎穿的高跟鞋来打比方。大头倒和普通家用榔头差不多，一寸见方。吴占一说：“这是连夜锻造的，将就使唤吧。”什么将就使唤？我正求之不得！古话说，虽不中，亦不远矣；这总比随便一把什么榔头要强十倍！我非常感激这位好心的老战友。只是那一刻绝不会想到它除了探矿之外，居然还会变作我的自卫武器，并且致狼以重创！

这把探矿锤，对我个人而言，诚然是一件万分珍贵的纪念品；无限遗憾的是，在后来回到劳动锻炼的郭堡水库，参加“炼铁又炼人”大会战时（据大队长们传达，县上有关方面专门就此作过指示，对“右派”来说，炼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炼人”，云云 。）每出一炉铁，都要搞一次所谓的报喜，这种时候，分量够不够，至关重要，我就是在一次希望创纪录的本位主义高潮中，冲动之下，将铁锤献出去的。等它化为红红的铁水之后，已是悔之晚矣。剩下那个柳木把，早由白里发青变为黑里带红了，用熟了，但光秃秃一截木头，留下它又有什么意思呢？也索性“轻装”了吧。

最近，我给已经从司法部离休的老吴写信，还郑重地再一次旧事重提，再一次向他鞠躬致敬。我以为，人，就应该这样 ，自己给了人家好处，不要记住，人家给了自己的好处，可千万不能忘了。否则，岂不也成了狼了！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将三十多年来的桩桩往事，包括劳动改造的往事，整个儿捋了一遍，不能不感到由衷的遗憾；这句多少代人的人生智慧总结和经验之谈，对我完全不适用。就说重操旧业，煮字为生的这十来年吧，先是胃大出血，血压降到临界点；后是突发脑血栓，亮红牌二十天；1984 年，右眼又基本失明。难道这再三再四，没完没了的劫磨就是我的齐天鸿福？！显然，所谓的后福，至少目前于我纯属画饼，那么，寄希望于未来的岁月吧，等吧，等吧 ，“面包会有的 ，牛奶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精神，我把这句俗话改作：大难不死，尚待后福。

1993.2.20-4.12　合肥

赠　人

----给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幸存者　　公刘

由于寥廓，由于萋萋芳香满天涯，

青海，你教我想起了西伯利亚；

由于岑寂，由于无数宝藏埋地下，

青海，你教我想起了西伯利亚；

由于冰风，由于不挂牧铃的牛和桀骜难驯的马

青海，你教我想起了西伯利亚；

由于十二月党人，由于他们竟和恶棍一道流放关押

青海，你教我想起了西伯利亚；

由于心底的爱情，由于灰烬中爆发了新的火花，

青海，我愿意忘掉那西伯利亚……

1981、7、23　　西宁

昨夜惊魂

公刘

从 1958 年到 1978 年，我在山西整整待了二十一年。对我而言，这二十一年既切切近近宛如昨天，又深深沉沉等同长夜。那时的我，仿佛一缕惊魂，反复游移于汾河支流的河谷地带和雁门关下的黄土丘壑，茕茕然，惶惶然，竟无一枝可栖。

好容易盼到了 1979 年，挣脱网罗，身心立地轻松。

然而不！一时的错觉欺骗了我。实际上，人是世间最怪异的生物，有时候，冷淡的辞别恰恰是为了迎接热烈的把晤，有过多少怨望，便会伴生出多少怀恋；于是，我乃绾了一个解不开、剪不断的“山西情结”……夜半梦回，尤见其压迫如磐，纠缠似蛇。

并且，我也切切实实地明白了，这一辈子，是不能不把自己的心一剖两半了：一半随身云游四方，一半长埋三晋大地；为此，1984 年，我曾高举这剩下的半爿，回到过第二故乡，试图与那半爿对接，在王摩诘的祁县对接，在元好问的忻州对接。

1992 年，曾安排过新的山西之行，然而未能成为事实；1993 年，曾再次谋划归去来兮，竟又同样一场泡影。时不待人，今年已是 1994 年了，我更衰老了，也更多病了，自忖，倘或就这样一任蹉跎，此生此世，难道真的会从天上掉下馅儿饼来么？因而转念，成事固然在天，谋事到底在人，只要心诚，理当没有遂不了的大愿。经过努力，也经过等待，终于，在民间文学家兼企业家刘琦的鼎力协助下，由女儿陪同，冒暑蹈火赴汤，于 7 月 1 日毅然带病启程。

出于可以理解的紧迫心情，我以最快的速度，取道济南和太原，直插榆次；当年一道劳改受罪的难友刘玉璋和郑开宸二位，早已如约伫候。阔别多年，彼此见面，竟至于没顾上细诉离情，互报平安，便驱车径往太谷县辖的郭堡水库了。这一天是 7 月 7 日。事后回想，令人诧异的是，本应该话胜流水的一路，竟相对无言，只是偶尔有谁打破沉默，报道窗外闪过的是什么所在罢了。其实，这也纯属多余。车过北白，便出了榆次地界，相继穿行在任村、范村、西曲、东曲、南窑和王公的田畴之上，而这些个地名，通过血与火的镌刻，原本已像自家的名字一般，成为与生俱来难以分割的生命符号了，又何须乎提醒！

汽车笔直开到了拦河大坝的尽头。下得车来，突然狂风大作，刮得腿摇身晃；我想，端的是天公有情，他在告诫我辈：莫忘了灾难岁月，莫丢了脚下功夫；马齿有尽，

路途还长，仍旧得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跋涉——最要紧的是，千万别自己糟践了那“右派”的荆冠！

女儿第一个跳下车，她立刻扬了扬手中握着的袋子，示意我抓紧时间，祭奠被迫在此自沉的佟惠林烈士。佟惠林，山东老区的红小鬼出身，任总政保卫部的保卫干事多年。祭奠他的亡灵，正是我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于是，刘、郑二位搀扶着我，小心选择宜于落脚的护坡石，走着S形的路线，直下到水库边沿；不待商量，众人立刻一起动手，捡了些石块，傍着四溅的浪花，垒起一个藏式的“玛尼堆”，为的是将香枝插牢。香，是我昨天在市内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家花圈店才买到的；酒，则是女儿听我介绍罢佟伯伯的生平后，冒雨跑去食品大楼，从本省产的众多高梁酒中特意选定的祁县出品，在那商标上，还印的有大诗人李太白的画像。这可是令人揪心的偶合！李太白，不也是以自沉的方式告别人世的吗？我不由得动了感情，说，孩子，单凭这一点，佟伯伯也会喜欢你的。

我提着酒瓶，先往水库中来回浇了一半，同时默念：老佟，我们来看你了；还有你，苑青，你虽然并非和老佟一路，你的冤魂却也无疑是厮守在这儿的。接着，我又绕“玛尼堆”洒了几圈，算是遵从古礼，酹祭完毕。这时，刘玉璋才掏出打火机，避着风，艰难地点着了那捆线香；三个人，加上我的女儿和刘玉璋的小女儿，围成一圈，一齐为枉死者祝祷，超度他们的灵魂不遇红灯，顺顺利利地进入天国。

然而，真的有天国么？天国又在哪里？

仿佛是为了赶快摆脱这恼人思绪，我们仨相继站起身来，并且贪婪地吸纳着这儿的空气。真好！这儿的空气既清新，又凛冽。而大风还在不依不饶地吹着，它是在奋力帮助我们排除积郁胸中的污浊吧？

举目四望，水库依旧，护坡依旧，灯塔依旧，甚至连周围的荒山也依旧，我想，那儿还保留着我们当年取土的锹痕么？春夏秋冬转了三十七轮，除了沿象峪河两岸生长起来的一排排钻天杨外，变化似乎不大。但，也不尽然。我们发现，在距溢洪闸不远的小山包上，矗立着一个新建的亭子，当中仿佛还竖着一块大石碑——看看去！看它都写了些什么？于是，一行人便拉扯着蜿蜒而上了。

果然有块1990年立的石碑。碑上镌刻着的文字，极粗疏地叙述了水库的修建经过；它全然忘记了为死难的民工和公安战士志哀，而对一贯被当作技术骨干和攻坚主力使用的、从北京中央军委三总部以及海司、海政、空司、空政“发配”来的数百名“右派”，更是未著一字。相反，那整整一面的光荣榜，尽排列着指挥部首长们的令名和官衔。火

气不减当年的小郑，对之一通评论；刘玉璋和我，年龄毕竟虚长几岁，则付之淡然一笑——难道，我们两个果真修炼到家了么？非也，深知徒然伤肝而已，哪如多保存一口自家的元精！

何况，石碑上还玩了些别的花样。我指的是图案设计。那周边围着的由连环画组成的大方框，除了个别几幅，能依稀辨别是工棚之类外，其余的竟是全本的“八仙过海”！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此“海”想必是宦海吧。我无意戏谑当官的，实在是图案的左下方，不伦不类地刻着一架老式飞机，硬在那儿力争；当事人萦怀至今的，还是那上过《山西日报》头版头条的大跃进新闻：“太谷号”飞机上天！的确，全国两千多个县，唯独太谷造出了飞机，何等荣耀！何等风光！在争相“放卫星”的时代，这不是“奇迹”是什么！然而，“太谷号”到底是谁造的呢？他们是怎么造的呢？在冒死试飞两圈之后，飞机被打发到哪儿去了呢？那些造飞机者的下场又如何呢？诸如此类，唯有我们这批劳改犯一清二楚，至于那帮邀功领赏者，对此当然只好讳莫如深了。

归途上，我一直摆脱不了石碑的幢幢暗影。我想，这块碑的确是很值得一读的。它再一次雄辩地告诉我们：小小郭堡水库如此，大大中华古国也如此；所谓历史，原本就是这样书写的，毋须烦恼，不必喟叹，更严禁抗议。

这，当是此行的额外收获。

接下来，在太原盘桓数日，待一切联系停当，7 月 13 日便折身北上，前往忻州了。

同样是急如星火，同样是马不停蹄，当天就直奔前庄磨公社下属的冯村大队——我个人的实质上的第二次流放地。如今，这个典型的北中国村落，已然恢复了下冯的原名；地名复原，是否意味着万千农民的命运又有一个大轮回？我不知道，天公怕也未必心中有数。

领路者是我熟悉的山西作家田昌安。经过对不同路况的反复比较，我们决定，绕道野峪、南张、庄磨一线，从背后抄进下冯。虽说对路况已有所了解，但，这条路仍旧非常难走，尤其是南张附近一段。好端端的路面，被挖得疮痍满目。原因呢，不过是浇地图个方便。单从这方面看，这儿的农民，似乎浑然如昔，甚至犹有过之；如今种的全是个人承包地，户户都有引水的理由，所以，开的豁口也自然远比从前多得多了。这可整苦了我们。大卡车颠几下不打紧，我们坐的是小车，底盘低，碰不得也刮不得，于是，一路上只好不断下来抬石垫路，借锹填土，甚而至于动手推车。不过，转念一想，为了和那些信任过我、保护过我的乡亲们重逢，再辛苦也值得。就这样，走走停停，用本地庄户人的话说，后晌过了近一半，阳婆也萎势了，车子才接近庄磨镇。庄磨，原是极熟

悉的地方，过去，我经常来这儿向公社监管干部汇报思想改造情况。看来此地倒是有点变化，老街已被推向背旮旯，沿路新建了两排店面，令人为之高兴……突然，迎面出现了一道栅栏，当中标牌高悬：前方修路，禁止通行。苦也！田昌安被迫下去打探，从一个小窝棚里，喊醒了一位打瞌睡的老汉。我瞅准一看，有救！原来此人竟是十分惯熟的羊倌王玉忠，我乃大叫一声：玉忠子！你可还记得我老刘？我知道，他是庄磨人，为了揽工，才落户冯村的。和全体冯村人一样，玉忠子见面也管我叫老刘。

我交过好几位羊倌朋友。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憨厚，另一类则比较狡黠，这个王玉忠属于后者。他绝对是一个戏剧人物。关于他的行状业绩，关于这次路遇对话，实在都极其精彩，限于篇幅，只能留待日后专门写上一章。

“放你走吧，这回不收你老刘的买路钱！”感谢玉忠念旧，网开一面，让我们通过。一会儿工夫，小车就停在了冯村旧日厉行“天天读”的大照壁跟前。有两个正在一搭聊天的小伙子同时迎上来，并且立即认出了来人：“老刘哇？看看，真是老刘回来咧！”我实在叫不出来小伙子们的名字；我离开的日子，他们不过是些拖鼻涕的娃娃。然而，为什么如今我都蓄须了，他们竟也不认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直觉吧。女儿也一样，尽管她觉得，面孔怪熟的，肯定是小时候的低年级同学，可就是叫不上来。我大致说了路上的耽搁情由，便向他们打听房东家的近况。没料到，他们劈头通报了一个坏消息：“根龙殁了！”根龙，是房东陈宝玉的长子，才不过四十出头吧，怎么抢先比老人早走哇？听罢，我更急着去探望房东一家了，因此，也就顾不上和那些坐在巷口闲坐拉呱的妇女们一一打招呼了。女儿瞅定那高高低低的大鹅卵石路面，小声说：“爸爸当心！这路还是老样子！”她离村比我早，又一直不曾回来过，掐指算来，已有二十二年了。

进了我们住过的院子，不等父女二人扑进房去，主人便闻声而出，并且立即嗓音哆嗦地朝屋里喊：“你看看是谁们来了！”这是在招呼他老伴儿。田昌安跟我们一道进了家。只见她大婶子正在炕上艰难地挣扎往起爬，同时听得宝玉子解释，由于殇子之恸，她长期失眠，终于落下个偏瘫的毛病。接着便是双双哀泣。此时此刻，我感到，这世上，最无用的便数语言了。做父亲的，到底坚强些，还能叙述求医的遭遇，说，根龙患的是食道癌，曾送去太原诊治，递给医生三千元的红包，人家直嫌少……

迈着沉重的脚步，我们又去到另一家，探望本村解放后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我最要好的乡下老哥陈双科。岂料，迎接我们的，又是他唯一的养子的噩耗！据告，也是癌症。今天这是怎么啦？到处都赶上不吉利！说话间，天已傍黑，双科子宝玉子都叫我们住下，哪儿成呢？我们已经买下了明天去北京的票，废了可就难买了。无论如何，今晚

必须赶回太原。一通好说歹说，他们最后总算同意了，这才让我们出村。趁他们送行的工夫，我又抓紧时间了解，这些年，村里都有谁们盖了新房？我明白，对中国农民来说，你直接问谁先富起来了，还是招忌讳的。怕露富，这是农民固有的传统心态，何况几十年的折腾，更是余悸犹在，谁愿意承认自己已跻身于大户之列呢。然而有两件事，一般农民是很难战胜其诱惑的，那就是，为活人盖房子，为死人修祖坟。因此，我便从侧面入手，只问盖房的事。双科子和宝玉子同时回答：不多，东头就先怀子家，北面还有一家。先怀子家的一抹到底新院墙，五开间青瓦房，我在进村的路上已经注意到了，挺气派的。提起这个先怀子，我立即想起了他那眼眨眉毛动的神气，是个大能人；我在村里那阵，他就曾由于断不了鼓捣个这，鼓捣个那，五次三番地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如今，这“尾巴”肯定是长得又粗又长了。至于说村子北面还有一家，那会是谁呢？他俩不曾细说，我也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法子去实地察看。不过，我知道，原先的大队部场面就在北面，大队不存在了，那个大场面就成了一马平川了，是不是也已分掉，变作宅基啦？忽然间回忆起自己无数次在场面上的劳动来，碾场，扬场，选种，交公粮过磅，割蒿子积肥，饲养院切草，还有秋收季节的半夜看场，以及招呼户家们分粮搂柴禾……世道巨变，到底应该感到惆怅，还是激奋。我还发现，村路上时不时有水管子露出地表，

估计是安了自来水——难怪刚才在宝玉子家大门外，瞥见那口紧挨着我住过的披厦旁的水井，加了盖、上了锁呢。在农村，喝上了自来水，算得上是桩大事，但联系到两家的不幸，又不敢挑明来问，只怕死神的羽翼覆盖和水质污染有关呢，万一不慎再次触动了他们的伤心事，那就不太好了。

在穿行于整个西胡同的途中，憨厚的陈双科一个劲儿的叨叨：“这可咋呀，叫你父子们空着手回，甚也没能带上！”陈宝玉也说：“就是。迟些天每，收罢秋就好了。”这话，可说到我们心上了，不过是正说了个相反。礼行不周，两手空空而来的是我们；千里迢迢，东绕西转的，的确也难以携带。为此，女儿也叹息再三。她决定，赶一回安徽，马上就去买些北路农民爱见的厚实花布之类，打上包裹邮来，“我们家再不宽裕，也比他们强。”当然这是后话，休提。

总而言之，此行给我的印象是，将近二十年过去，黄土高原的变化并不大，远不像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喜人。这当然很令人失望。至少，眼前的这个下冯村，比起我到过的南方沿海农村、渔村来，我认为，实在是不仅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而是存在着质的不同。下冯啊我的下冯，你离完全走出昨天的阴影，还有老大一截路程哩。

我不敢说，这是不是也象征着，昨夜惊魂的某些碎片，还有些许回光返照！？

而最令人伤心的是，七月底回家，八月中旬就收到刘玉璋小女儿的信，说是她爸爸检查出了食道癌。接着，郑开宸复来信提供了更多的有关细节。癌！癌！又是该死的癌！才不久，还是挺硬朗的身子骨，显得远比我精神，怎么竟至于这样！于是，乱纷纷无数个念头同时向我袭来：一惊人生无常，祸福难卜，一切皆无定数；二惊天道不公，好人没好报，命运的玩笑委实开得太残酷；三惊我俩相约，善自珍摄，争取再活个二十年，事实却证明，我们彼此都早已失去了对别人作出任何承诺的资格；四惊曾有私愿，待到 1998 年，在郭堡水库建成四十周年的日子重逢，然而，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难说了……四惊频频，虽睡犹醒，四惊连连，予欲无言！不过，好在事情毕竟仅仅涉及到个别“右派分子”的肉体安危，与当前社会的沉疴无关，发点感慨，谅必还是被允许的吧。因此，我忍不住要补充的一句话是：那活跃在刘玉璋身上的癌细胞，绝非自今日始。于是乎，我的这一缕惊魂，恐怕也只好继续游移下去，并任其飘荡范围“扩大化”——从太行一直弥散到江淮了……不妨这么说，昨夜固不复再临，惊魂却永难酣憩。

1994．9．25 — 10．4　合肥

诗在你在

---纪念父亲

刘 粹（公刘女儿）

我相依为命的父亲走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走了。那山脉一般绵延厚重的父爱，谁也无法替代。

我坎坷一生、历经磨难的父亲走了。前 20 多年的另类生涯，后 20 余年的病痛折磨（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病人”!），终致父亲未享天年，未尽其才。他带走了已然腹稿于心的系列小说《昨天的土地》，（当年《收 获》连载时，老诗人张志民先生称赞它们是“干馍馍，有嚼头”）；带走了上百篇有关诗歌创作的溯源思考：《诗本事》——那该是一部由文章构筑的公刘诗史；带走了他血泪一生，歌哭一生，执著追求与不屈抗争一生的回忆录——那无疑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独特见证！……一切的一切，已不复存。这是诗的损失，史的缺失。这损失和缺失，同样无人能够替代。

40 多天过去，我依旧感到笔重千钧。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堵在胸口，凝成一句：诗在你在，回家罢，父亲！

父亲的生命力曾经是那么顽强。1980 年突然病倒在社科院文研所召集的当代诗歌研讨会上（中风、偏瘫、失语于广西），一两个月后，父亲重新发声学语，跌跌撞撞重新蹒跚学步，然后重新握笔写字。不仅打破了医生起初的断言，没有落下手僵脚痹的毛病，三个月后，便在我的搀扶下，奇迹般的出了院。1984 年，右眼失明。1995 年岁尾，1999 年年初，2000 年盛夏，一次次被病魔突袭，瘫痪卧床，急诊抢救，又一次次化险为夷，都是一两个月后就能下床学步……。就在 1980 年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父亲以极坚强的意志力和极旺盛的创作力，喷发出他创作生命的第二个高峰，留下了融铸着人格与血性的数百万字诗文。直到 2001 年 11 月，住院中的父亲，仍在点滴、针灸的间隙笔耕不辍，写下了《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答曾卓》一诗。

2001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在病房里刚刚向第六次作代会递交了正式请假条的父亲，针灸后独自上楼回病房，眩晕突袭，差点儿跌伤。闻讯，我从办公室匆匆赶到父亲身边，是夜始，我便坚持留在病床旁陪护父亲。第二天，父亲自觉病况有所缓解，便要我搀扶着他在病区的走廊上一趟趟缓缓地散步。我们父女俩的话题，从文学到家事，从家事到民情，散漫而温馨。犹记得，8 日晚间的话题，我劝父亲静心治病，千万小心，保护自己平安渡过冬天，年前（春节前）我当会力争独自把家搬好，待来年春暖花开时

节，接爸爸回家。新居的条件对于一生清苦、朴素的父亲来说，可谓“鸟枪换炮”了。父亲也听从了我的劝告，说出院回家后，将恳辞各方稿约，抓紧时间，专心致志地写他苦难深重荣辱倍尝的回忆录，为同侪，为后人，留下史的见证。我担心父亲写回忆录会伤及身体。我深知父亲的一生辱重荣薄，辛酸远多于欢乐。父亲说，他会尽量跳出个人情感的漩涡，作一份平静清晰旁白式的回顾。同时，穿插着，他还将齐头并进地去写一一独立成篇的《诗本事》和完成腹稿多年的系列小说《昨天的土地》。父亲说，为了黄土高原上患难与共的淳朴的乡亲，为了当年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受苦人”，他必须写完十几年前不幸中断了的那个《昨天》系列。父亲说，他希望天假以年，“何况爸爸还有你呢！”哦，我生于忧患的父亲！

父亲的心胸又是那样地豁达泰然。他这一生淡泊、低调，对人事，对世人，都没有任何要求。早在九年前，父亲就以文章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了他由来已久的遗愿：丧事从简。作品在，说好说坏由人去。回海如回家。(《并非多此一举》1994.03.29.）及至 2000 年 11 月，病痛中的父亲又请了三位见证人，立下了正式遗言，“唯愿平平常常地来，安安静静地去”，至亲好友相送即可，不要多惊扰众人。

记得 1995 年的 9 月 7 日，那是得知冯牧伯伯去世噩耗的当晚，在原本逼仄灰暗的小厅里，我们父女相对而坐，良久无言。尔后，父亲以清晰而低沉的语调，缓缓地说出了他对我，也是对人世的最后希求：“爸爸走时，只希望女儿你能握着我的手。”我当时就眼含热泪，郑重点头，答应了父亲，并再一次坦言：“爸爸，我一定要保你活过九十岁！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往事历历，父亲已远。哦，我死于忧患的父亲！

元月 7 日那天中午，ICU 的医生没有及时通知我。父亲！我知道你在急切地等我，等我，头向我每天进门的方向斜侧着，每天与我相握的左手失力地搭拉在床沿下，未闭的双眼依旧流露着失望的空茫……我赶到是 14 时 10 分，我没能做到在你最后的时刻握着你的手送你，我至亲至爱的父亲！谁能理解，这将是我永生的痛！

人说“爱能创造奇迹”。我一直坚信爱的力量，渴盼奇迹的出现。去岁圣诞节前，在给海外友人的信中，我还在重复着这句话：我要用自己的爱去拉回父亲的生命！圣诞节后的那两天，父亲的情形曾大见起色，老人神清气爽，大大的眼睛，又恢复了往日鹰眼般的犀利明亮。那双明亮的眸子，给了我多大的鼓舞啊！我不禁俯在父亲的耳边，为老人鼓劲：“爸爸，你一定能抗过严冬。等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时，爸爸的生命力就一定会强劲起来。”然而，新年刚过，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春天的脚步声，父亲却匆匆远行……。日日夜夜，我切切祈盼的奇迹没有出现，是女儿的爱不够深切吗？我总在问自

己，问苍天……

父亲，我为你换上了那套访德时定做的黑色条纹西服，当年你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睿智、幽默和血不缺铁、骨不缺钙的泱泱大家风采。我为你穿上了一双皮质的新旅游鞋，祈望迢迢路途不再坎坷，从此，你能步履稳健，跨时空逐日月，继续上下求索。

父亲，我放大了你 2001 年元旦摄于病房的照片，虽在病中，你的脸上却依旧是矍铄而粲然的笑容。我以 76 朵怒放的红玫瑰敬你，送你，接你，我亲爱的父亲！——她们本该是 90 多朵的啊。

明求赶了回来。德平赶了回来。柯平和范泓也分别从湖州和南京赶来。年近古稀的沈泽宜老师，不顾劝阻，也执意赶来。元月 11 日下午，我们肃立在松鹤厅，肃立在你的身旁。鲜花簇拥着你，我们陪伴着你，父亲！你身上轻覆着 1984 年山西的乡亲们赠你的那面朴素的锦旗。我分明看见，满头乱发的贝多芬用《英雄交响乐》将你挽起，一同向天国走去，而伴随着德彪西《大海》的涛声，你的胸腔正与人民的旗一道起伏呼吸："战斗六载　情谊永存"!

诗在你在，我的父亲，你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父亲，在你西服胸前的口袋里，带去了 2001 年 9 月 4 日我们父女俩最后的一帧合影，女儿的心永远守护着你。11 日上午，我特地为你赶制了一只茉莉花茶的枕头，套入一只我头天晚上还在用的枕套中带给你，让茶的清新，花的清香，还有女儿温暖的气息，一起永远陪伴着你，愿你永葆诗的灵韵，思的深邃。

父亲，我们还为你带去了六件特别的纪念物——两件你我共同珍爱的礼品，四本意蕴深远的书。

翠绿色塑料的自由女神像。那是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迈克尔·麦克劳尔先生（Mr. MICHAEL MCCLURE）于 1988 年 11 月 16 日晚，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现代艺术博物馆大礼堂举行的首届中国诗歌节朗诵会现场赠送给你的礼物。当年，中美诗人的友谊，曾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如今，你带了它去，自由与友谊永存!"有罪的肉体在地下/自由的灵魂在天上"!（公刘《三月》）

木雕的仙鹤。1982 年 10——11 月访南时，前南斯拉夫诗人所赠。鹤，在我们国家自古就象征着长寿和吉祥，我想，在前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等在内的各民族间，鹤，也一定意味着幸福和吉祥。带上它，愿你身无羁绊，心无压抑，清吉自在。

德平送你的宣纸精装本《西湖诗画揽胜》。你一直偏爱西泠，对西子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2001 年的 9 月，我到杭州接你，曾与德平兄一道，陪你踏上白堤，到平湖秋月处，访罗苑旧地，寻觅当年杭州艺专的遗迹。仁慧姑妈当年是杭州艺专的高才生啊。我知道，你和姑妈姐弟情深。你一直都在寻觅那不幸早逝的姐姐的芳踪。西子湖畔，寄托着你一生的默默温情。父亲，我亲爱的父亲，带上我们的一片心意，相信你和奶奶，和姑妈，定会在天堂相聚。

花城社流亡者译丛中的一本：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见证》。这是你 2001 年 12 月病情逆转被延误至瘫痪前，堆放在病房抽屉里的多部书籍之一。这部《见证》，头一年你已读过，是年 9 月末住院后，又被你细细地重读了一遍。书中，有你用黑色签字笔批画的痕迹，书中，还有许多小小的折页。肖氏的《见证》，一定是引起了你的许多思考，但你还没有来得及同我细说。不必妄加猜测你的联想和思考，你的愤怒与慨叹，既然，你已经不得不带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份独特的见证，（那见证肯定会招致某些人的不快！）那么，还是让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随你一道上路罢。中俄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命运，原本就何其相似相通。

四川人民出版社，邹绛、蔡其矫等先生译的《聂鲁达诗选》。你自青年时代起，一直就非常喜欢这位智利的大诗人。对政治的高度敏感，对祖国对人民的一腔赤诚，对和平的祈盼对世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未来的屏息聆听…，诗人的心是相通的。更由于 1957 年罹难时，曾遭遇对此莫名的批判，倒教你对聂鲁达的诗愈发的喜爱有加。女儿知道父亲是手不释卷，心不离诗的，带了它去，好在天国与聂翁会面。诗人相逢早相识。

1995 年人文版《公刘短诗精读》。那是女儿完全独自担纲，为你编选的第一部诗选集。父亲，是你给了女儿生命，给了女儿正直的品性，也培育了女儿的眼界、视野和独立思考的个性。《精读》只是女儿献给父亲的一枚“青杏”，拒绝红尘，拒绝陷阱，“永远青青白白”（公刘《致青杏》）。为此，我感谢宽容，感谢父亲！父亲，我知道你对自己一直非常低调，从不自恋，从不张扬。你几乎不能完整地背诵自己的任何一首诗。带上它，就带上了女儿对你永远的感激。除此而外，更深一层的意蕴，父亲你当然明白：你这一生吃的苦太多，受的罪太多，你太累了。匆匆而去，于你，也终算是一种解脱。“这一具黄皮肤黑眼睛，/是您倦游中国后回归的灵魂。”（公刘《莱辛憩园》）是的，倦游之后，请稍事休息。尔后，父亲，我坚信你那不灭的灵魂依旧会孜孜以求，去遨游大海，去搏击长空。疲惫了，劳顿了，就请归来将息，女儿的心田，永远是你小憩的港湾。

轻轻袅袅一缕青烟，

轻轻袅袅飘去且轻轻袅袅与无限的空融在了一起。

惟一万页诗稿沉重。

沉重地砌在一双异常艰难的脚迹的最后一记脚印边。

不是坟墓，

不是塔，

也不是碑。

是一个中国诗人的智慧、良心及独在的个性与独有的诗的构思。

闪光的，

是灵魂。

这首诗，是今年元月十一日，父亲的遗体在合肥火化的那天，老诗人李耕先生于南昌瓢斋扶病而作。诗题为《公刘永在》。

诗在你在。父亲，我为你骄傲！

2003 02 24　泪流满面写于合肥

无奈与遗憾

胡天健遗作

作者小传：

安徽人，生于1920年1月。1949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社会系，临毕业前，迎来了北京解放，随即于在1949年3月参加人民解放军，先在南下工作团，后调海军，一直在海军报社任编辑工作。副连级，中尉军衔。1958年来水库，1959年在山西省孝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后在孝叉兑镇中学任教师，于1981年在兑镇中学离休。离休后返回安徽合肥定居，2005年因病去世。

1948年12月15日，在清华园听到从北面传来的枪炮声，我们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将开始了。在这之前一两年，清华园就有[一二、一]图书馆，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进步书刊，从一些同学的口中也传来一些解放区的信息。那时，我们曾想到解放区去看看。现在，北平即将解放，绝大部清华人当然是欢天喜地，热烈期盼着北平的解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准备，迎接解放。1949年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随清华进城工作队进城参加庆祝游行和宣传工作。3月11日，为了参加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洪流，清华有几名教授及数百名学生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当到达东四头条华文学校(工作团所在地)时，一位服装极其普通的老同志为我们搬运行李，后来了解到他就是我们的大队长李唯一(后任志愿军宣传部长)。从团的实际负责人陶铸到团的所有干部，对我们这些新人都是热情、平易近人。特别是陶铸同志，他的作风令人可亲可敬。在开学典礼那一天，我们举行会餐，每桌有四大盘荤菜，我们这些年青人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佳肴了，四大盘很快就见了底。当时陶铸同志也同我们一起会餐，他看到这情况，马上叫服务员：“再给他们来一盘!” 他说这句话时，那亲切的语气和热情的风采，几十年了，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经过一个月的革命教育，我们完全融人革命队伍之中。4月下旬，由于当时形势需要，部分团员被调到新闻工作队，由刘白羽率领提前南下。武汉于5月中旬解放，我们第二天就进入武汉。长沙和平解放，我们就在新华社湖南分社开始工作。当时分社社长是方诗同志，社内除电台、摄影组是老同志外，其余都是北平来的参军学生。领导大胆放手，我们这些新人也豪情满怀，在新的岗位上尽力而为。11月我被抽出当随军见习记者，在祁阳随四野部队进军广西。到柳州后，社里来电话，要我回长沙。可是在阳朔附近出了车祸，在桂林疗养一个月才回长沙。这段时间，有时一天步行一百里，有时途中买不到菜，能吃到大米饭和大蒜便算是美味佳肴。晚上我睡

在灶头稻草堆上，能睡在门板上就算是享受了。生活虽说比较艰苦，但心情是愉快的，有如鱼在海中游，鸟在大空飞。

1950 年 4 月，海军成立，我被凋到北京海军政治部，后分配在海军报社。从 1950 年到 1955 年，从每月十几元津贴到评定中尉军衔月薪八十八元，生活待遇有如爬楼梯一般在一级一级上升。在这阶段，从不考虑工资待遇，只想如何做好组织分配的工作，感到心满意足，前程似锦。

1957 年上半年整风，报社由于工作紧，报纸要及时出版，编辑们轮流拿了纸烟及一杯茶去社长室给党提意见。我由于不是党员，在报社期间，有些会议不能参加，有些文件看不到，就时常不能清楚地掌握每个时期上级的意图。另外对于海军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从未下过部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些就使我在编辑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内心对当时罗隆基提出的‘党天。下’的言论是同意的，但我发表意见时，只是说党员有特权，我虽非党员，但士为知己者死，希望党能把自己当作知己，而不是外人。我还谈到，在肃反时，海军大院曾有人剖腹自杀，还有人爬上二十米高的烟囱，企图自杀，以后还听到一些在过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处理不当的案件，于是认为一政党掌握了政权以后，是可以为所欲为，但希望起好的作用，不要起坏的作用。在与同事的闲谈中，我还说过，这些现象，是苛政猛于虎。在整风期间，我正负责人民海军报的第四版，当时，我曾组织并刊登了一幅漫画，名曰‘帽子公司’，以表示反对乱扣帽子……这一些，就组成了我的所谓右派言论。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顺便提一提。1957 年 4 月 1 日，我们清华大学社会系以前的教授费孝通说是得到中央领导同意，可以恢复社会学的研究，要我们这些清华社会系毕业的同学归队。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买了酒和菜去他家里会餐，顺便了解情况。我们会餐时，正好储安平也来了。他是当天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来向费孝通约稿的。碰巧在一起吃了顿饭，这本是桩小事，可在当时，却是说小可小、说大可大的一件事，可能也是我最终被定为右派一个因素。

1958 年 4 月下旬，报社四位难友，一人发配到北大荒，其余三人发配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在郭堡水库期间，这支由三军总部各单位来的劳动大军，大部分从事体力劳动。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严寒天气，难友们都是自觉地推平车，挖泥土，为筑水库大坝而辛勤劳动。感到内疚的是，. 我却是当了木工部门的保管。每逢星期日，总是去小馆，吃他一碗蹄膀，一碗饺子，聊以自慰。年底，水库大坝竣工，回到县里总结，生活大为改善。住的招待所，睡的暖炕，伙食也不错。总结后，我被分配到介休水利局，继而调

到孝义水利局。在介休时，记得我将介休水利工作的材料交给县委书记李惠春时，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我犯了严重错误，我是右派。" 他说："你现在不是回来了吗?"这句话我铭记在心，难以忘怀。在孝义水利局，搞了几个月铁路征用土地复查工作，同铁路上的同志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查下去，大队干部只知道我是县里派来的干部，对我们盛情款待，早餐是小米粥加馒头，外加一两个小菜，中午面条，晚上烙饼。以后又调到县人委办公室，经常听公社干部汇报，有时也陪县委书记郭荣卿下乡调查。郭书记是知识分子，不摆架子，也不把我当下属看待。有一次到兑镇公社，住在公社同一房间，他问我："你晚上小便吗?叫他们拿个尿壶来。"每逢年底开农业劳模大会，当我写完县里各项工作总结，他总是告诉我："叫秘书给你两斤核桃，回北京去过春节吧。" 1965 年，由于不懂农业，在县里工作有些困难，我要求到学校教英语，结果就开始了在兑镇中学十五年的教师生涯。在这期间也曾当过事务长，管理学生伙食，还当过采购，去太原、北京、天津采购物资。

1979 年初，阴霾的天空终于射出了阳光，我们的问题终于得到改正。右派的帽子彻底摘掉了，军籍恢复了，原来的级别恢复了。我们又是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了。周围的人对我们也另眼相看了。报社的几位难友回到海军大院，领到了转业证书，每人还领到了四百元慰问金，我们就拿了慰问金，每天都到西单的有名饭店如四川饭店、曲园等处会餐，用美酒佳肴来洗刷心头的遗憾与无奈。1981 年 8 月，我办了离休手续，告别了虚度年华二十年的山西，回到故乡——安徽。

遗信五篇

第一篇遗信：

何健生战友致王书锵函　　1983.10.1

书锵同志：

您好！并向你全家致以亲切的问候。见到陈贤楣同志请代问安好。蒙你沁人肺腑的关怀，我从感激中又想起在太谷劳改的岁月，我们都是无辜的蒙难者。我们能为党和人民创造最高财富的可贵年华，就那样被糟踏到毫无人类的尊严，实在痛心。

我是参与策划第一架起义飞机的组织者之一，组织者一共五人，实际上是六人(因秦传家当时找不到他在南京珠江饭店开秘密会)动员和随机过来的人总共有二十九人(包括家属)。我们六人中：吉翔、蔡云翔在46年6月带飞机执行其它任务，先后壮烈牺牲了，追念为中共党员，人民空军的先驱。我和白起、秦传家被错划为丧尽天良的右派，白起在59年反彭德怀同志时同意彭总观点被打成“现行”死于监狱，秦传家不服，翻案有罪，死于监狱(他们二位已平反改正，但死者不可复生了)。我，你是清楚的，从太谷的牛棚搬到北京的工棚到现在。我今年74岁了，太谷还不错，发给我一本“老干部离休荣誉证”，空军受理我的冤屈申诉两年了，这次告诉我很快会为我落实起义人员政策和干部政策。但愿如此。能否取信于人，要看实质性问题怎样，才能有效地公诸于世，于飞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提了三级，现行政１２级。刘善本那架起义飞机也有错划右派的，其它起义飞机也有，不过不像第一架起义飞机错划三个那么多。也许第一架起义飞机，在党领导下，规模大、人员多，因而右派也就多的缘故吧。

今天寄出一本《文物天地》83年2期给你留念。因为它从历史档案中查出不少材料，认为有必要发表于“革命留踪”一栏和人民见面的。其中概略地也谈到我，请你过目，作为相处二十年的‘政治大学’同学留作纪念品。《南京日报》85．4．25已转载这篇文章，《成都日报》、《沈阳日报》也相继转载。原因在这之前，《解放军党史》82年8期、《空军党史》82年33期、43期、46期、51期和57期，已经陆续刊登《第一架起义飞机史实》，空军党史对此事作了很高评价：“开创起义的先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中国人民的航空史上将永远记载这一业绩”。随后发表于《星火燎原》83年1期。其实，在《航空知识》1981年7月纪念党六十周年专刊上，就在“一个老飞行员自述” 回忆

录中提出“第一架起义飞机”。《航空知识》1982 年 2 期、11 期、12 期和今年 1、2、3 期都刊登了这些史实。党内外、国内外舆论如此宣扬，来信来访我的朋友自然就像潮水般不断涌进臭水河边的工棚，使我啼笑皆非难以应付。梅岭、周运峰、傅飞和许贻士同志都知道此事，为我晚年能恢复如此名声而高兴。可是我实在有苦难言，四十九年前在保卫大武汉被日寇击落的同学儿子唐忠杰(现成都通讯工程学院六系主任)、女婿纪光先(现空八军师级纪委主任)先后专程从成都来京找到我，一为我祝贺，二要我证明他父亲是爱国的。1929 年我和他父亲在香港英国皇家空军启德航校同学，并被英国骗去二百元学费未放单飞，后来又被陈济棠办民航学校骗去学费一百元未放单飞，最后被送到广东空军航校六期，抗战开始保卫祖国作战多次，在保卫大武汉壮烈牺牲被国民党追念为空军烈士。我说武汉国民党空军烈士墓都给红卫兵毁掉了，我在烈士墓前照的像也被红卫兵搜去了，白纸黑字没有其它物证，旧社会就是那样，中国如此，英国也一样，写出来未必有价值。老梅也要我写，我说再写又该来审查我了，你看本来可以身居陋室非常平静，这样一来就不得安宁了。

朱文明去年春节见面后，已经一年多没有碰过头，张守正也是如此。陆宏章快两年未见面，据说他提了二级又住进新单元，不在解放军报社。周运峰在武装警察最高机关当科长(1 5 级正团军人)，冯中骥是军人(正团)，也在武装警察当科长。太谷：傅飞在山西中药厂当总工程师(行政 1 5 级)。缴如洲在铁工厂当厂长(正营)：许贻士在汽车修理厂当厂长，黄元雄据说是工程师，级别不清。我们这些难友，自从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后是受到党和国家重视的。但我们在狂风暴雨袭击的灾难中，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有些同志致残致死。那些专会整人不会治国的人还在，可能心还不死，给这些坏家伙长期造成的社会意识，一朝一夕是难以肃清的。耀邦同志今年春节在海南岛干部会上说 ：“一提到拨乱反正，有些人就心神不定”。可见不学无术的笨蛋还想东山再起，否则感到失业心神不定。最近中央办公厅“1983”61 号文件，是中央统战部关于落实政策的报告和意见。总的说：“七年来落实知识分子、归国侨胞和起义人员政策。有 53％是落实了，还有 47％未落实，限期今年要全落实。顶着不办的，党委领导要干预，限期落实。如不落实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大意如上。像这样的文件下了许多次，上面有心，下面无意，使人只好等着瞧。反右，据了解是罗隆基还未改正，其它全改正了。如果个别人还未改正，绝大多数人改正了。我认为不能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反右和臭名昭著的文革一样同是一场人间的大浩劫，是祖国的灾难。不承认这一点是难以取信于民的。文革受难者补发工资，反右受难者不补发是不公平的。无缘无故给人戴上右

派帽子二十年的灾难，改正不补发工资，又不做说明是欠妥的。国家穷是另外一回事，不补发又是另外一同事。改正的文件 55 号是“两个凡是”华国锋在台上时发的。按照“两个凡是”不但右派不能平反，连邓小平同志也不能平反。错划右派为什么不说平反说改正，实际上还是两个凡是的政治术语。我想这是谁都能理解的事。

上半年听到马路消息：“要为错划右派补工资”。我找梅岭去打听，说有这个愿望，现在拿不出钱。这不是真话，拿不出钱也许是真的，但要向人民交代清楚：愿不愿意给受难者补发工资。文革是百分之百的错，反右是扩大化的错，两种错不一样，一种要补发：一种不补发。我觉得这样的辩证法是交代不清楚的。或者说错划右派这些人是有罪的，应该剥夺他们的工资不补发，用补发工资赎罪。这样就说得清楚了，你认为然否?

我从老梅那里知道两航起义的吴亦寿同志已离开了人间，在这之前约一年他还给我来信。想不到，太谷一别再也见不到他了，心里十分难受。

这封信看后希你立即付之一炬，因为牢骚太多不利于进步。有空希常通音讯。

何健生　1983．1０．1

王书锵注:

何健生同志是策划第一架飞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1909 年生， 1958 年被错划为右派，同年四月随我军三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及其下属各机关被错划的右派共计 320 名，应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需要，被送到山西省太谷县郭堡水库劳动锻炼。当时他已 49 周岁，数他年纪最大，1959 年底水库建成后，这些难友都被分配到全省各市、县所属机关、团体及农村工作。何健生过去虽曾在 B 一 29 飞机上担任空中摄影师，起义后曾在新疆筹建航校，去劳动锻炼前在北京空司作战部工作，空中作战的知识精通，但在地方上用不着，所以只能分配在太谷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照相馆从事摄影工作，几年后因眼睛老花不能胜任摄影，服务公司就调他去东街澡塘任服务员直至右派错划被改正。改正后调回北京，住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一区十四号，进一步等待落实党的政策。九十年代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已落实政策调回空军，并改在空军离休)。

第二篇遗信：

谢宝山战友致周永熙函 2004、6、19

永熙同志：您好。

接到来信，知你想把大家受难的事，总结下来以告后人。您辛苦了!我理应早日给您回信，实因身体欠佳，迟到今日，请谅解是所至盼。

我叫谢宝山，今年 88 岁，是 48 年 8 月在长春起义的，我原任国民党军 52 师军乐队少校队长。1950 年被中国人民空军政治部文艺工作团任用为文工团教员，教军乐，并培训解放军五大军区军乐队，空军乐队编成后，我担任乐队教员兼指挥仪仗工作。还曾奉命到海军文工团军乐队协助教学，在业余时间，我还到大专院校(航空学院等)去辅导乐队，又派我到北京第二师范去教老师们学吹奏乐等等。

我的苦没法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的都对，我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却被划了右派，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莆了我，也苦了家中老小。

我是在山西祁县轴承厂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的。祁县人民政府又将我下放回原籍吉林市去支援农业。我更苦的是赶上文化大革命，又被下放农村劳动，并将我斗得死去活来。要不是中央 55 号文件的发布，那我的命活不到今天了。老周同志，你们让大家将反右的经历写出来，让世人知道我们都受了什么苦，这都是为了祖国的未来。如果不写，后人谁知道呀。

希你多保重，愿你身心健康和家人平安。我实因年老，说的很不周到，还写了别字，请原凉吧。

今寄去一百元，作为编集费用吧，太少了，实因我每月只能领到伍百伍拾元，如果祁县轴承厂效益不好，那就更难说了。您为大家劳苦，我是很感谢的如果我经济有好转，我会再支援的，请保重。

另外，我知道的难友，郑海他是在轴承厂劳动的好战士，是华侨。他的地址是华侨事务处，可与他联络吧。

我说的太不周到，请谅解。

祝您和您家人健康长寿，岁岁平安。

夏安

战友谢宝山　　　2004 年 6 月 19 日

周永熙注:

这是当时我所知道的在世郭堡战友中年纪最大的谢宝山同志在 2004 年给我寄来的信，他理解写回忆录的意义，故而热情地支持写回忆录，他本来就收入有限，但他还为这本回忆录资助了钱，考虑到宝山战友年事已高，不想让他过于劳神，原来就打算将他此信作为文稿收入回忆录中，而现在只能以珍贵的遗信展现在同志们面前了。安息吧，老谢战友!

第三篇遗信:

徐永涛战友致老郑战友函

老郑同志:

出院(注：老徐当时刚病愈出院)时因车来晚，未及告别，请原谅战。我在想你们的倡议(注：当时有战友建议，拟同去郭堡)，我没有拖累你们吧!不知道你们去了郭堡没有? 我明知道我不可能那么短时间内恢复到参加，可我确有心要想去去。

十来年前，周运峰曾有过一个设想，他想由咱们这些‘校友’筹点钱在郭堡建一所别墅，咱们这些‘渣子’每年可以到那里凭吊，并让咱们的后代也知道咱们有过这一段壮烈的闹剧，以资激励。我的孩子年龄太小，很难理解咱们那一代的情况，连我的老婆也是这样。但我认为很有必要。要在前些年代，这一想法也可能会实现，现在困难就大了，因为咱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这是残酷的现实。北京大慧寺、北洼路(包括军艺)附近有咱们的郭堡‘校友’五名，留在山西的还是多数，现在咱们这些幸存者不知还有多少，就在平遥大概还有三四名。这几年我忙于搞工作，很少与他们联系，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真要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单凭他们的经历就可写几十万字的书，这当然包括每人的四个时期：即 1、反右前，2、反右，3、戴帽与摘帽，4、所谓‘改正’后。要写下这各个时期的事迹。我知道周运峰是一笔杆子，不知道还有哪些同志是秀才，若有五六杆，有个半年左右就可成书，当然得大家全体一起执笔写资料，这一次写可不同于过去那种憋憋扭扭写检查，可以敞开来写真实的东西。我建议，咱们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暴露事实，也不是树碑立传，而是要立此存照，供后人借鉴，供比咱们聪明的后一代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们参考。冯 xx 在美国写文，我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写这一类文的人很多，其客观作用，无非是为人权问题，想借外国力量来达到目的。当然，也有人仅仅是为了几个钱而写的。外国势力的影响只能触及皮毛，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

是内因，不是吗?现在悄悄地放了几个人，一时能骗过了山姆大叔，但国内的情况仍然是在照旧，只要看看每天报纸，不少是不打自招，农村的计划生育更是如此。人家仅仅说的是不同政见方面，右派又算(得了)什么呢，明明说的是错了，要改，改了多少?到头来还不是犹掩琵琶半遮面!

徐永涛　九八年六月十四日于平遥卜宜厂

周永熙注:

这是徐永涛战友的一封具有远见卓识的信。在2003年底，我去一趟山西旧地重游后，萌发了要编印通信录及回忆录想法，经与山西的战友们商量并获得支持后，我方知道早在一年多以前，北京的唐其竞战友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但不幸在酝酿过程中，其竟战友就因病去世，这事没有办成。当时我便后悔不已，要是早一年和老唐联系上该有多好。自从读了徐永涛在1998年给老郑的这封信以后，才知道徐永涛战友早在1998年就已有这样的打算了，而且他立意很高:“不是简单的暴露事实，也不是树碑立传，而是要立此存照，供后人借鉴，供比咱们聪明的后一代政冶家和社会学家们参考。”

我在历次给战友们的冗长的书信中，想说而没有说清楚的主旨，老徐用这样简单的两句话就全概括了。若没有对历史与社会具有深刻的理解，没有对革命事业的负责任的使命感，是不可能在七、八年前就想到这一点的。原来我只以为老徐是位沉溺于
技术革新的专识到他的思想高度远远高过于自己，可惜可惜! 遗憾遗憾!我没有早几年想到向他求教，如今晚了七、八年。

第四篇遗信：

周道战友致周永熙函　　2004、7、1 5

永熙先生：

来信收到，得知阁下拟收集当年在郭堡劳改的战友名单，时隔多年，你能收集到这个样子，也实属不易，但要作。现将我所知道的人简告如下：章才全、朱幼龙、方虹、刘自强、袁愈胡、孙以芗、张尔参(熙注：通讯地址略)以上地址都是过去留下的，多年没有联系，是否有变动不得而知，只能试试了。阁下和当年的战友们拟出一个集子，要大家写点回忆文章，以便给后人留个纪念，我没什么意见。我现在刚出院，还须恢复一段时间，暂时无法提笔，等精力好一点时再说吧。现寄上500元，资助这项义举。

此致

大安

周道　　2004、7、1

周永熙注:

两年前还和周道战友通信，因他身体欠安，所以没再写信去约稿，今年发去打印长信，未见回音，我已略感不安，但也只想到可能生病未愈，不料后来有战友信函中告知，周道战友已遽归道山。我至今仍希望这只是个误传，仍期待着在回忆录上能见到他的文章。不管怎几样，有一点我认定了，书要赶紧印出来，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第五篇遗信:

王亦英夫妇致刘智田夫妇函

智田、林香:

倏忽间，别来已有五日，眼看新年又到，先向你们拜年!祝福你们平安顺遂，合家幸福，多福多寿!

山西之旅，给了我许多启迪和鼓舞，这种精神上的慰籍，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非常感谢你那兄弟般的关怀和照顾，这种情意难以关怀。整个过程劳累了你很多，于心不安，但这次最令我欣慰的正是与你重逢而且相伴始终，得以从容谈心，成了我晚年的一大快事!想想当年，自从介休相遇，而后一卷铺盖一起走进孝(义)中(学)，在狂风暴雨、雷霆万钧中并肩苦斗二十多年，多么不容易，又多么有趣味!所以这次回去与学生们相见时，许多话不知从哪儿说起，也说不出来。当时，我们虽然常常盼望翻身机会，盼望了，又失望了，反反复复，在不断变幻的形势下，说不明是何种滋味。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我们才算顺畅了，也应算是幸运了。我总想到胡耀邦，拯救解放了那么多人，为人民立了那么大的功勋，但自己却遭到了什么?……

亦英、清珍　　1999、1、20

刘智田注:

王亦英，1935 年生于江苏无锡市。解放初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大连俄语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部队给苏联专家当翻译。1957 年反右时，他是总参炮兵学院翻译组的组长。当了右派以后发配到郭堡来修水库，1959 年，我们一同分配到介休孝义中学教书，他教俄语、英语，我教化学，共事十多年。我们又共同经历了文革的劫难，一同劳改，一同挨斗，患难之交，情同手足。他的夫人温清珍是归国华侨，善良贤淑，在孝中教语文。-我们俩家人之间，关系都很好。1979 年右派改正后，他调回家乡无锡，仍在学校当领导，直到退休。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教育，无愧是受人尊敬的优秀人民教师。2002 年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而离开人世。上面这封信便是他在 1999 年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也许这是我亲爱的难友的“天鹅绝唱”吧。

心祭

——怀念亡妻李淑琴　朱天浩

我和李淑琴是新老北大的校友，错划右派的难友和历尽劫波的夫妻。我们之间，存在着纯洁无瑕的友谊，同甘共苦的心愿和魂牵梦萦的感情。然而天道不公，她在精神病和乳腺癌的折磨下，于1999年10月8日，溘然长逝，不再留恋那曾经折磨她三十多年的这个无情的尘世，但却给我留下了永不消逝的悲伤和怀念。

我们诀别已近七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学识人品，仍历历在目，轩昂磊落。我总想写点文字来纪念，然而每当我铺开稿纸，拿起笔来，禁不住潸然一片，无法落笔，只好一而再，再而二地作罢，无言独坐窗前。

一、　同难结同心　丹心育英才

李淑琴世居南京，邮电职工家庭出生。1951年，她刚17岁便高中毕业了。她响应祖国号召抗美援朝参军，在中央军委直属化学兵学校(后改为防化学院)学习和工作。1953年化校选送她到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57年7月北大毕业后回到防化学院任助教，校方又决定送她到南开大学读研究生，继续深造。

1958年4月风云突变，化学兵学校将她划为右派!原因是1957年北大反右期间，她身为北大化学系团组织委员，在组织同学反右斗争中不积极，领导不力，被认为有“右倾”情绪。谁知一年之后，化学兵学校为了满足划右指标要求，将那所谓的的“右倾”情绪，直接升格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山西太谷郭堡水库进行劳动锻炼。

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李淑琴，她是当时来水库参加劳动锻炼的三名女同志之一。劳动中她积极肯干，在水库一期工程完成后，被分配到太谷县农建局工作。白手起家，建立起了太谷县农业化验室，并为山西农大做了许多成果卓著的化验和研究工作，被评为劳动模范。她清新的气质和积极肯干的精神吸引了我，我们相识并相恋了。

1959年春，祁县中学没有合格的高中化学教师，高二、高三两个年级的化学课基本处于停课状态，尤其是高三毕业班，眼看就要高考了，还有一个多学年的化学课没学，情况十分紧急。当时祁中校长为徐子才，他打听到有位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太谷工作，立刻前去访问，想聘请她到祁中任教。由于李淑琴当时对太谷工作有成就感，比较满意，不想调动，没有答应徐的要求。徐校长又找太谷农建局领导商调仍未得到同意。

此后，徐校长仍坚持不懈跑了多次，反复说明祁中迫在眉睫的困难，对农建局领导和李淑琴本人做争取工作。几经周折，最后达成“借调”协议。虽说是“借调”，实际是李淑琴一身二任，做两份工作，星期．一至星期五她在祁中讲课，星期六和星期日回太谷上班。由于两地跑，没有空闲时间，以至于在乘坐火车时都要抓紧时间备课。

李淑琴之来祁中，可谓是“奉命于危难之间”，时间紧，任务重，她不仅要为四个高三班赶课，还要为两个高二班补课(每周要用去八个新教案，上二十多节课)；不仅要分班上课，还要合班上课；不仅白天正常讲课，夜间也在大礼堂加班讲课。可谓倾心竭力，鞠躬尽瘁!

她讲起课来，精神抖擞，声音宏亮。经常一上午连上四节课，内衣被汗水湿透了，嗓子也有点嘶哑了，累得够呛!幸亏她当时年轻体壮，等到下午或晚上上课时，照样是精神饱满，挥洒自如，因为她内心感到一种莫大的满足与愉悦。

她讲课的板书清晰明丽，一目了然。她特别重视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知识的难点和要点上来，留给学生独立思考空间。学生们反映听李老师的课就是享受。

当初学生的作业令她忧心，写得乱七八糟者有之；抄来抄去者有之……她想怎样纠正昵?觉得最好的说服是示范的影响，最好的教育是榜样的力量。于是，她让学生观看她在北大学习时的各科笔记本和作业本，开始学生们只是好奇：不大在意，但看到一本本字迹有点退色，纸张少许发黄，保存了多年的本本象印刷品一样工整秀丽，图文并茂，不少学生从内心发出由衷的赞叹。他们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化学该这样学，作业该这样做。

“梅花香自苦寒来”，不到半年，居然奇迹般地完成了高三、高二全部化学教学任务!高三毕业班还取得了当年高考全省化学单科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在这些毕业生中出现了很多国家栋梁、社会中坚和专家教授。

1959 年底李淑琴正式调到祁中任教。从此教书育人成了淑琴工作和生活的全部。1960 年，我们结婚了，那时我在太谷收割机厂工作，她带四个高中毕业班的化学课，两地奔波，超负荷地工作，再加上大饥荒年月，吃不饱饭，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我劝她请假回家休养，但她责任心太强，就是不肯。结果她一节课也没少讲，像没事人一样，坚持到放假回家，终于得了妇女病，住进了康复医院。

逢高考时，每到考化学的前夕，李淑琴要对考生进行辅导，因为她对教材理解得特别精透，所以她在辅导中所讲解的题目，往往和高考中化学试卷的题目扣得非常紧密，学生们一个个心花怒放，又快又好地答好题。在所有化学考场中交头卷的，往往都是祁

中的考生。一时间，人们都传说李淑琴有“猜题”的绝招，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些返校的老学生还念念不忘，传为佳话。

二、身陷苦难地偏遭毒蛇咬

1962 年初，淑琴在家养病，我再次向她建议调回太谷工作，以免两地分居，疲于奔命，而且太谷中学和山西农大都要她；但她就是不同意。因为她太善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觉得祁中离不开她，不能有负学校领导重托，“士为知己者死”嘛!

这时，已换了个新校长，名叫田野。春节刚过，就派人以探视淑琴病情为由，动员我到祁中任教，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在淑琴不能调回太谷的情况下，这个提议对我有一定的吸引力，淑琴对此也未表示反对。经过考虑我终于接受了邀请，通过太谷和祁县的人事局办理了调干手续来到祁中，这样我们夫妻二人都在祁中工作了。

我们把家按在祁中以后，田野此人的本色渐渐显露，他知道我们俩已全然被他捏在掌心，故时常借故发威。有一阶段，淑琴病体初愈，体质下降、仍坚持继续上课，后又怀上孕，就有点力不从心，严重时，曾几次晕倒在讲台上。虽然这样，但她仍咬牙坚持，总要讲完全部课程才下课休息。因身体疲惫，下课以后无力再去教室辅导，她仍关照学生，有问题就可到离教室咫尺之近的家里来进行辅导。这样的表现，放在任何一所学校都是应当受到表扬的，然而田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淑琴违反了他所制定的规定，而对她严厉指责，淑琴申辩无效，径自甩门而出。于是田野火上冒烟，大发雷霆之怒，最后竟然以“右派猖狂进攻”、“反党”、“反田校长”的罪名，立即将淑琴撤职停教，还要将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李淑琴悲愤失望，分别向祁县县委、晋中地委、山西省委和李淑琴的原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投诉。不久便得到了山西省各级党委的批示，制止了田野的报复行为，并要李淑琴在祁中继续工作。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留下了祸根。这个田野之坏，简直不可思议，他一棍子没有打倒李淑琴，就再用手中的权利，继续无理迫害我们：他先是借故不让淑琴执教高三，而贬她去教初中，以打击淑琴在学校中的威望；然后又坚持不让淑琴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最后是针对我来的，他趁国家实行精简机构之际，违反政策规定，迫我退职，而对外却声称我是自动辞职的。在恶人恶势面前，我们只得一次次咽下苦果。

三、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狂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最高指示的鼓动下，无知而狂暴的红卫兵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横冲直闯，无法无天，使广大无辜的群众(包括教师及干部)都遭受了残酷的

迫害和凌辱。祁县当然也不例外，善良的人们一看到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小将’，都有些心惊胆颤，就像老鼠见了猫，避之犹恐不及。祁中的红卫兵首先掀起了一股抄家恐怖风，淑琴和我在劫难逃。

一天傍晚，一群红卫兵闯进我们宿舍，声称要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他们一边翻箱拆包，搜刮财物：一边则高唱“造反有理”之类的歌，什么：“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我们虽严正申明：我们以前是革命军人，现在是人民教师，根本就没什么四旧。但他们一点不听，一边嘴里嚷：“你们是精神贵族、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边继续乱翻，把我们的结婚戒指、哔叽中山服等（这是 1 955 年军官授衔后，周末外出要穿的便服)作为战利品查收，不可思议的是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给我的华北解放和抗美援朝的两枚奖章也属查抄除旧之列!

不久，我们的衣物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罪证”进行展览后退还了，但结婚戒指和奖章却被侵吞，没有了下落。与此同时，红卫兵还强占了我们的宿舍，我们被迫迁居校外。

1967 年是造反派武斗猖狂的一年。祁中一些被称为 “牛鬼蛇神”的教师，不是被这派批斗，就是被那派批斗。在开批斗会时，都要戴上高纸帽，胸前挂上大木牌，牌上写着污辱性的称号，低头弯腰喷气式，批斗中辱骂和殴打此起彼伏，批斗分为主斗和陪斗两种，淑琴多半是当陪斗，游街也有主陪之分，淑琴就曾陪原县委书记(藉希俭)和县长（魏润堂)乘汽车游街。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讲尊师重道，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在文革中，传统的道德规范荡然无存。

一次以胡衙内(胡良奇之子)为首的红卫兵斗争淑琴，把她弄到大礼堂台子上去斗，强令她交代反党罪行。’

淑琴说：“我出身邮电职工家庭，17 岁高中毕业时响应党的号召，抗美援朝参军，一直在解放军军事院校学习和工作，党还送我到北京大学深造，我对党感激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反党呢?”

她的申辩遭来了恶毒的打骂，把她从台上打倒在台下，然后再从台下拉到台上，再打倒在台下，红卫兵们像做游戏似的乐此不疲，把他们的野兽之欢建立在师长的痛苦之中。

最后为了强迫她低头认罪，竟然扭断了她的左臂，被学校校医送往太谷医院急救!

与此同时，年方四岁的大女儿就在礼堂墙外，清楚地听到了墙内母亲被斗的打骂声，非常惊恐和难过，. 嚎啕大哭起来，她太小，根本不懂眼前发生的事，更无力救助母亲，只有哭呀，哭呀，但哭泣又有何用?无奈，她哭着往回跑，把她的所见所闻告诉了我。

闻此凶讯，我托邻居照看两个幼女，自己赶往太谷探视，只见她左臂红肿粗胀，疼痛难忍!再看 x 光照相片，更是惊人，她左上臂骨折开来像个喇叭口!

好在及时去了医院，经过消毒，消炎处理，上了夹板。医院当时迫于斗争形势，对被斗致伤的病人也不敢收留住院，我只好让她独自住在旅店跑医院看医生，我则在太谷和祁县之间奔走，既要看护妻子，又要照看孩子。 除医院治疗外，我还请太谷民间“捏骨头”高手给她捏合。老天爷保佑，几个月下来，总算慢慢长好了，只不过她的左手再也不能拿重物了。

淑琴从太谷归来不久，一批红卫兵恶少，几次到我家，要将淑琴揪回学校批斗，我以淑琴重伤(向他们展示骨折相片和医院诊断书)不能出门为由加以劝阻。

他们几次图煤未遂，便撒野施暴企图冲进我家，强行抓人，我则把住大门，拼命抗拒，但是相持不久，我便被众人推开，他们冲进我家，将淑琴抓走(后来才知道，她被送往一个农场去监督劳动)，同时将我掳架到学校，那时大色已晚，他们把我拉到一间教室里，拉熄灯后，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之后将我使劲向门外一推，门口有人故意使绊子，将我猛地摔倒在地上。

四、虾戏恶犬欺深山苦熬煎

社会上经过了一段七斗八斗的混乱局面以后，大家都指望能稳定下来过几天安稳日子，有些地方停止了武斗，实现了所谓“大联合”，有些地方解放了“走资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实际情况远不如人们的愿望，仍然是一片乱糟糟，而祁县也不例外。

1968 年 5 月，原校长田野由“走资派”摇身一变成为 “革命领导干部”，他为了稳住自已的地位，以避免再次被夺权，就处心积虑要把斗争矛头对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他懂得，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校长当下去。所以他被结合进领导班子以后，立即对我们狠下毒手，而我当时尚未复职，只靠在居民建筑队打工挣钱糊口。在田野的主持下，将淑琴开除了公职，从而取消了她每月极微薄的工资，尤为严重的是：对淑琴除了经济剥夺外，加大了政治迫害的力度。将她强制遣送到祁县最落后的崇山峻岭之巅的遥头足村“监督劳动”，该村号称“离天三尺三?，全村只有五户人家，无知无理。可以说，

这是个没有人类道德规范、没有世间法律管辖的人鬼交界之处。

在祁县革委会所派的工作组里，有两个恶人，一个姓李，一个姓马，他们无人性地不断组织村民对李淑琴进行残酷的批斗，甚至让无赖村民刘爱全、贾牛儿带着她在遥头足、南举圈、瓦房间等高山野村去游斗。极左的毒气，一时在山谷中大为弥漫。

1969 年秋，梁坪寨大队、祁中革委会和县革委会串通一气，命令居委会不让我在城内打工，断我生路，县革委会的人还多次登门动员我下乡，软硬兼施、千方百计，终于迫使我们全家被梁坪寨大队的大车拉去“安家落户”了!穷山沟里也有刁民，“有人山前过，留下买路财”，雁过也要拔毛的。我们被弄到这种地方，真个是龙游浅水，虎落平川，自然不免要遭虾戏，被犬欺了!

与此同时，大队硬指派我去 3202 工地修铁路，迫我撇下妻儿在村受苦。那时大女儿才 6 岁，小女儿仅 3 岁，住在一孔刚能转身极为狭小的黑窑洞里，与牛圈为伍。此窑建在后山上，而且没有大门，只有一个自编的栅栏挡在门口，实际上日夜都是门户洞开，任人出入的又一个猪圈、羊圈而已。住在那里夜间能听到山鸣兽叫，豺奔狼嚎，令人毛骨怵然，坐卧不宁。

白天淑琴下地劳动，大女儿带着小女儿到村里“小学”去了。留在村里的农妇少女们就乘机到我家去偷去抢，衣服鞋袜，床单被套，生活用品，什么都拿。一次，一个半大的哑女正在行窃，被我大女儿撞见，她夺路而走，然后转到窑顶上领着一群孩子向下扔石头以示报复。大大小小的石头象经过几次掠夺，原来带去的东西被洗劫一空，全家只剩下一条棉被，几件破衣!

那时我们全家都成了农户，可是领不到应有的口粮，因为是青黄不接，大队只分给我们一些喂牲口的玉米渣子，又不给安排牲口磨面加工，母女三人就囫囵着煮了吃，结果三人都消化不良，尤其是小女儿大便不通，每次解手都要人用赶了回来，带着淑琴母女三人到来远公社诊所洗肠通便，吃药打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休养才解除了三人的痛苦，也挽救了小女儿的性命。

村民下地干活，出工不出力，工分评得很高，淑琴出工又出力，工分评得很低很低。还说她是个“死不悔改的老右，轻则受体罚，重则有干农活的人都坐在地里休息，唯独她妈妈被罚站，背上压着一块大石头，石头上还放着一盆水呢!还有一次，村干部让淑琴掏大粪往山下地里送，一失足跌倒，大粪扣得满身，她不但得不到任何救助，还遭来村里几个放羊的，用放羊鞭子抽，用铲子打，另一群人蜂拥而上，大打出手。李淑琴也不含糊，自卫反击，但毕竟寡不敌众，只好冲出重围，跑回家中。女儿们一看，妈

妈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头上满是污泥粪屎，头发也被揪下了许多，惨不忍睹!

淑琴气极败坏，感到奇耻大辱，精神亢奋，彻夜不眠!一人坐在门口石头上，沉默无语，一会儿茫然苦思，一会儿轻声哼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女儿们不敢问，也不敢劝，在惨白的月光笼罩下，妈妈的身影象一尊雕塑一动不动，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她们。妈妈就这样一直呆坐在那里，突然大女儿听到了磨刀的声音，她害怕地把妹妹紧紧抱在怀里!一会儿，她竟拿刀进房，走到床前，举起刀来，掀开被子，当她看到两个女儿颤巍巍缩成一团，突然“铛”的一声，扔下刀子，倒在床上，昏了过去!!!

我不在家，这些情形都不知道，返城很久以后女儿们才悄悄告诉了我，可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根据心理分析，一个人在受到强烈刺激而无法排解，将导致高度抑郁，导致杀人或自杀。看来她当时是要杀了女儿后自杀的，这是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万劫不复才会出现的一种心灵狂飙。如果不是看到女儿们可怜巴巴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骨肉之情，一场母女三人同归于尽的人间惨剧必将发生!!!真令人后怕惊魂!!!

淑琴受罪太大了!可是她从不向我吐露半点，问她在家的情况，总是默默无言，漠然以对，我也不曾见她流过一滴眼泪，保持着往日的尊严，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但是，日子一长，便憋出了毛病。我发现她有时精神恍惚，有时痴呆木讷，有时从早到晚不吃不喝，大唱革命歌曲，突显出精神分裂症状，于是我才拒不到铁路工地去了，并坚决顶住压力，也再不让她出去受人折磨了。为此我和这些愚蠢又野蛮的家伙们少不了发生些争斗，但他们总算收敛多了。

1975 年，邓小平复出后，政治气氛有所好转，新任祁县县委书记杨运海(李淑琴的学生)、原祁中党委书记常向先，还有县长牛晋山一同去梁坪寨视察，听说李老师卧病在床，赶忙去窑溯看望。准知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瞠目结舌，只见李老师面目全非，披头散发，形容枯槁，痴痴呆呆，认不得人，答不上话!……他们退了出来，在门口交换意见。常书记认为李淑琴在祁中有大功而无小过，只因心直口快，脊梁骨硬，顶撞了田野校长，田心存报复，必欲置

之死地而后快。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必须抢救，召回祁中，牛县长则表示反对，怕担政治风险，最后杨书记拍板:“现在顾不了许多，救人要紧!”于是他命令祁县教育局送李老师去晋中精神病医院治疗，同时把我们全家接回祁县城，这才使我们绝处逢生，活了下来。遗憾的是，几年之后，杨书记黯然下台，牛县长投井自杀，每念及此，痛心疾首。社会就是这样不公，坏人得不到惩戒，好人得不到保全。

五、怀念师长情伊人美名传

李淑琴不幸于 1 999 年病逝，祁县中学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学校领导在悼词中说：　　，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百废待兴，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李淑琴老师为了弥补十年动乱造成的损失，疾病稍愈，便积极要求重上讲台，在缺乏教材和相应复习资料的情况下，自编讲义及复习资料，夜以继日的工作，战斗在教学第一线，所教学生高考成绩依然优秀。1988 年退休，被评为高级教师。李淑琴老师专业基础深厚，化学实验技能精湛，治学严谨，工作勤奋，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既能发挥学生的智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又能促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李淑琴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进取，奋发向上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一生：也是历经坎坷，备受‘左祸‘和病魔纠缠的一生。她为人胸怀坦荡，待人真诚，一贯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她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热爱党和毛主席之心始终不渝，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善待学生胜于亲人。李淑琴老师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归于自然者乃暂聚之形也，留于身后者乃不朽之名也！”

祁中敬献的挽联上写道：　“半世坎坷铸赤胆，万山泣血慰忠魂”

我率子女哭祭曰：　　　“金陵女中高材生，援朝卫国防化兵。

风华正茂读北大，勤奋磨砺建军功。

风云突变蒙不白，深造梦断哭长城。

廿载含冤志未酬，亲朋挥泪放悲声。

燕京校园女军官，学成未用非情愿。

忍辱负重来晋祁，教师讲台美名传。

史无前例遭浩劫，荒山野岭苦熬煎。

卅载执教桃李艳，晚辈景仰身后年。

时至今日，我们全家和亲友对伊人的无限哀思绵绵不绝，而且常念常新，感慨良多：反右和文革已是过去的历史，但灾难的后果，至今犹存，而现在的历史也未能真正通过冷静的反省与清楚的思辨，把灾难化为良药，去廓清迷雾，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怎不令人揪心啊！！！

被遗忘了的青春

——悼郑淑芹

周水熙

有些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因为它是历史，是真实存在着的历史；有些战友难以忘怀，因为她与你有着同样辛酸的遭遇，她过早地去了，没有来得及写出她的感受，如果你也不写，你就会在已故的战友灵魂前感到内疚。为此，我要写写郑淑芹。

从 1 949 年我参军之日起，就认识了小郑，那是因为看了三十五军文工团新歌剧《三世仇》的演出，她在戏中女扮男装演一个农村青年虎子，那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一直记住小郑在舞台上悲愤的哭号，我相信所有在南京参军的同志都不会忘了小郑的演出，当时参军的许多人就是看了《白毛女》和《三世仇》，才下定决心，为了要拯救苦难巾的群众，而涌入革命队伍的。后米，我才知道小郑是个女孩子，而且年龄不大，最多十四岁吧，生活中她有些方面还是像个男孩，说起话来声音挺响，而且还有点冲人。后来她很少演戏了，因为她拉小提琴，编制在乐队，我们没有多少交往。再后来我们都调到了北京，都在海政文工团，我在戏剧队搞创作，她仍在乐队拉小提琴，虽然天天都能见面，但各干一行，故而也没有更多的来往，真正比较熟悉是从反右以后开始的。

反右开始后，第一次看到关于小郑的所谓‘反党言论’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墙上时，真感到吃惊，心想：怎么能将毒矛的矛头坳着这位十二岁就参军的女孩呢?邯几年连接着几次政治运动，基本划‘象都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而小郑从十二岁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中，在当时的战斗环境下，全靠一些老领导关怀和老大哥老大姐战友的帮助，加上她很好学、很努力，才使她在文化上、表演上、演奏小提琴上都取得很好的成绩，最终成长为一位名符其实的文艺战士。有些老同志告诉我，当年郑淑芹刚参军那会儿，遇到长途行军，文工团炊事班长刘茂堂挑着扁担，一头担的是锅碗瓢盆炊事用具，另一头担的就是这位十二岁的小女兵郑淑芹。而如今居然贴出了她的所谓‘反党言论’来让大家批判，的确令人难以理解。当时我看到在一些积极分子们的脸上，都扮出了一付极其严肃、极其恼怒、极其愤恨、极其痛心的表情，稍有一点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经验的人，一眼便可看出这种表情是战斗动员后的反射效应。我因早已被圈定为斗争重点，没有资格参加战斗动员，但根据我的敏感神经，我可做出判断：‘小郑即将大难临头。果不其然，她在我和苏斐夫妻俩戴帽以前，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看到批判小郑的这张大字报，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小郑调到北京海政文

工团乐队以后，她对乐队党小组中有那么一两位党员的自私表现很看不惯，认为这些人不配作党员。她是在部队长大的，所以一直将领导同志看成是自己的长辈和家长，遇到高兴和不高兴的事，她都要找领导谈谈自己的心里话，在 1957 年整风以前，一直是这样。遇上领导没空，一她就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一次，她在整风前后，给当时海政文化部的姓柳的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有少数党员表现很不好，简直象个三 K 党，就小郑而言，她只是孩子般地发了几句牢骚，用了一个她自己认为很解气但自己并不懂的名词，来形容周围一些心地不光明者的行为，（不要忘了她是十二岁参军的，参军后她再也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尽管这种比喻很不恰当，作为收信者，可以对她进行教育，提高她的认识，或者将信退还给她也就很够了。但收信者不然，却在运动高潮时，将这封信转给了海政文工团，于是小郑从此就被所有的人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另类，这些人硬把一张凶狠而丑恶的狼皮覆在一只无助的小羔羊身上，这就是1957 年的现实)。

作为一名军队的重要政治的部门负责人，当自己的下级或晚辈、特别是尊敬自己的下级或晚辈，给自己写了一封说说心里话的私信，一到政治运动来临，竟然就残忍地拿出杀手锏，以致人于死地，这种现象，现在叫做昧良心，而在当时却是一种积极革命的表现，但堂堂一位部长又何需到一个小小的下属单位去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呢?而下属单位的运动负责人又为何不看小郑的整体表现，却只为三个字，就将一个青春年华的革命少女打人无底深渊呢?我问天，天不答；我问地，地无声。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捉摸到一点来龙去脉：当时在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估计可能会有点麻烦，虽然在今天来看，他们自己的那些问题也不一定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但为了转移视线，就推出弱者来垫背，小郑很可能就是这样受害的。再说，当年划右派是按比例凑数的，小郑占了一个名额，就保了另外某一个人的平安，如果海政文工团的搞政治运动的那个头头放过了小郑，说不定这帽子就让他自个儿戴上，因为他自己的‘言论’远比小郑多得海啦，一百个小郑加起来也够不上他。后来听说，在运动高潮中，比较了解小郑的旧日领导辛可久同志和赵忠同志都曾仗义执言，向有关领导提出，希望看在她从小参军的份上，放她一码。可惜那时的辛政委和赵团长都不是海政文工团的主管，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他们的意见并未发挥作用。总之，小郑是很顺理成章地戴上了右派帽子。

小郑自幼就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用一句当年通用的抒情语言：她是沐浴着党的阳光而成长的。她对党的热爱，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信仰，更多的是一种孩子对母亲般的

真挚之情。她打心眼里热爱党，她的爱党之心，绝对比当时那些趾高气扬的假积极者更深、更浓，但遗憾的是政治运动并不讲究这些。

小郑和我们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海政文工团的上上下下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于是在长达五个来月的‘监斩候’．时期，我们七位右类都去做一些杂事：．到厕所洗便盆、到食堂洗菜盆、墙角落里拍蚊虫，臭粪坑里挖蛆虫等等等等。对未来的命运，有时抱点幻想，有时又感到无望，我和苏斐私下里还作些猜测和打算，总愿作最坏的估计，因为我们有个刚两岁半的孩子，总得商量一下各种情况下的应对方案。而小郑则只顾起劲地干活，看起来她并没有丧失自信，也许她对未来的估计比我乐观，也许她对政治运动的判断不像我想得那么可怕，只是她的话显然少了许多，性格上也起了变化，说真的，她再不是以前那快人快语的小郑了。

到了 1958 年的 4 月份，终于宣布了处理决定：黄源洛教授和我妻沈苏斐军内开除留用，就是说还留在海政文工团;、杨传林到东北监督劳动；邢洁、王希仁、郑淑芹和我都被发配到娘子关外的山西太谷去劳动锻炼。大家都服从决定，实际上也无可选择，于是离京的人很快就动身出发。没几天，去山西的要上路了，我们都集中在海军大院里的一个路边，有一二位海政机关的中层领导人在照应，还有一两名护送(押送?陪送?)我们人晋的带队者，带着我们这些机关和文工团的右派共十来人上卡车。那一天，苏斐站在文工团宿舍的窗口，默默地目送我背着背包走向卡车，记得小郑并无人相送，我捉摸：也许她未来的另一半张云星正站在远处看着她，但我没看见张云星，也没见小郑回头顾盼，她没有流泪，甚至没有愁容，脸上可以说没有任何表情，就像出发演出似的上了车。我们都不打招呼，大家木木然无言地坐在卡车上，就这样离开了海军大院。那是无声的世界，那是死寂的时空，没人道一声再见，说一句珍重，更没有人在路旁挥挥手，祝远行人一路平安。至今想来，当时的空气显得那么阴冷，那么沉重，那情景是很凄切的。

夜行火车直奔太原，在火车上大家仍然无语，随送的军官倒有点按捺不住，尽量找话题想聊聊天，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到太原后，部队同志将我们这一干人等转交给地方干部，地方干部随即就将我们转送到太谷县，很快再转送到郭堡村，这才到达目的地。到了郭堡，才弄明白，太谷县委在大跃进中立下了宏伟计划，在一年内要在郭堡修一个中型水库，那就是郭堡水库，所有解放军军直单位的右派，除了被劳动教养的以外，基本上全都到郭堡来修水库。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劳动直属营(即右派劳动锻炼队)，共有三百二十人下分三个大队，（后来山西省高级党校又打出了几十名右派，再增编一个大队，是为四大队，于是全营增至四百余人，）我们海军的右派编在一大队的一中队，

共有三十多人，大队副兼中队长是原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戴沂蒙，我和小郑等文工团员都编在三小队，从此，就开始了我们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戴罪生涯。

在部队来的这批右派中，女的很少，只有三位，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姓方，我们称她方大姐，还有一位姓李，叫李淑琴，是化工专业的研究人员，第三位就是郑淑芹。小郑有个特点，一向不喜欢别人因她是女同志而照顾她，在工地上，她一直是混在男同志中干活的，男同志使镐她使镐，男同志推车她推车，天天是抬头一脸泥、低头一身土。在指标上，除了几位棒小伙子和劳动能手她比不上以外，和一般的男劳力她都能平起平坐，她身体并不好，这就意味着如要取得同样的劳动成果，她必须付出得更多更多，她毕竟是个体弱的女孩子啊!这一年，是小郑参加革命工作的第十一年，她二十三岁，正当花样年华。

在郭堡水库劳动的头几个月，为了赶工程进度，劳动强度是极大的，可以说已达到我们体力的极限。那时的锻炼队成员中，除了一些原来便是搞技术工作的右派留在技术组搞施工管理以外，其余的人员便是整个工程的突击队，哪里有困难啃不下来，便让锻炼队往哪里上。和我们在一起劳动的他们的劳动指标没有我们高，他们的劳动时间没有我们长，因为别人是该干多少干多少，自己决不追加任务；而且是该干几小时就是几小时，该收工就收工，自己决不延长时间。锻炼队则不然，总要给自己加码，因为我们都带有赎罪诚心，这种集体潜意识的膨胀，再加上都想通过劳动早日摘

掉那顶无形的帽子，使得在干活时近乎疯狂。这种情形下，人是非常疲累的，男同志都常有身心皆垮的感觉，可是小郑一直咬牙坚持了下来，反正我是从来没见她为此诉过苦、流过泪。

年底，整个锻炼队举行了一次评功活动．在小队评选时，我作为副小队长担任记录，这段记录摘要四十年来居然被我留存下来了，现将有关小郑的发言照抄如下：

王：我提小郑，她自己的思想问题能很快解决，情绪能很快巩固，劳动中有毅力，主动，和男同志一样干。联系群众比较好。……

萧：我也同意小郑，她工作主动，作为一个女同志是尽力而为了。如装车卸车这些重活，她都能主动配合……

杨：同意小郑。看得出她真是愿意通过劳动来锻炼自己，劳动中能主动支持别的小队。在会上对别人提意见时能正确理解别人，提的意见有分寸，使人感到可以接受。(熙注：那时右派们会上互相提意见也时常无限上纲)

胡：同意小郑，她主动干重活，如推独轮车运土。……

刘：几个劳动锻炼大队的女同志中，其他几位都干的是体力劳动较轻的活，有的搞技术工作，有的在后勤打杂，但小郑大多数时间都和男同志一样在第一线劳动，加班、抢险，每次都拉不下她。……

褚：同意小郑，她劳动有毅力，她主动去拉平车。 (熙注：即平板车，每车能运土 500 斤以上)这几天她腿疼还带病工作,、照样干重活。……

还有谢、许两位再加上参加小队评选活动的张中队长和担任记录的我，也投了小郑一票。郑淑芹在小队评功中是全票通过。

到 1958 年年底，我们为之流尽汗水的郭堡水库工程基本结束，太谷县委宣布了第一批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名单，在四百多名份子中，共摘了十来名的帽子，其中就有郑淑芹。摘‘帽不摘帽，现在看来虽有些差别，但差别不大，仍属于政治另类，可在当时的右派人群中可是件仅次于生死存亡的大事。

笔记本上的记录，简单而概念化，远远不能表达出当年小郑所付出之万一，但只要想一想这样的事实，你便可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小郑站在你的面前。你想：当时山西太谷的郭堡劳动直属营(即右派劳动锻炼队)的 320 名成员，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地拚命干活，想以疯狂的劳动为自己换一片天，而小郑能得到“脱帽”的荣誉，这是容易的吗?我说：小郑是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换取来的。

除了体力的比拼以外，作为女同志，在这上千上万名男性的工地上，自有她许多难以处理、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同一小队的男同志还是很关照她的，总尽量给她以方便，但这项水库工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郭堡，县委规定锻炼大队每天劳动时间为九小时，(有人发牢骚说这不符合宪法，结果为此被开了好几天批判会，)而实际劳动时间经常在十小时上下，大家整天都投身于劳动，有时是想照应也无法照应，可以想象得到，对小郑这样一位女孩子来说，她有多少难言之隐痛。原来我们小队住在一个名叫东曲河的小村里，一个小队十来个人在一间民房的地上打统铺，小郑则和其它小队的两名难姐难妹同居一室，她们相互有些照应，情况还好_些。后来随着工程的进展，住房也作了调整，我们这个小队搬到西曲河村，大家都三三、两两地分住在各村民家，我们为小郑找了一个小单间，说小是真小，整个小屋的面积只不过三、四个平方米，有门无窗，估计原来是堆农具的，或者是堆柴草的，但毕竟是个单间，而且里面还架了一块门板做床，因天已逐渐转寒，睡地铺已不行了。小郑就这样安排好了住处。

有一天，忘了是干什么活，地上满是泥浆，男同志们都脱了鞋打赤脚干，小郑也和大家一样，脱了鞋光着脚、r 干起来，她运气不好，脚底心被扎了一根刺，踩在地上，

攒心地疼痛，但她仍坚持把活干完，当勉强回到她住的小屋时，已经走路都艰难了，这根刺扎的位置很捉狭，正好是她自己看不着的脚底心上，自己没法拔掉，住地附近没有认识的妇女同志可以帮忙，又不能去找女老乡，小队的男同志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也没有办法。小郑虽说比较泼辣，但毕竟是个女孩子，也不好意思请谁帮她拔刺，最后我想，这事只好我来，一来是因为我是小队副，按部队规矩，帮助病号本应该是副班长的责任；二来小队里所有的成员中，我和小郑最熟，相识已九年之久，也是看着她从一个女娃娃长成大姑娘的，我来帮忙不会使她难为情。于是我找了根针进了她的小屋帮她挑刺，小屋里光线昏暗，我的眼力也不济，只得屏住气息，将她的一只脚板抱在眼鼻子面前，那根刺很细，扎得又很深，我的眼力和技术又很差，因而左挑、右挑也挑不出来，挑了不少时间，真是费了牛劲，才算把这根比绣花针还细的小刺完完全全挑了出来。当我放下她的光脚板表示大功告成时，她轻轻说了声：　“老西，谢谢了”。这时，我见着她的表情显得有点腼腆，在‘假小子’小郑的脸上，这种女性特有的表情是很少有的。

大约是 2004 年，许贻士战友来到苏州我家里，漫谈中我说起了我在修改一篇纪念郑淑芹的文章，他接口就问，你还记得那一年你为她挑脚刺的事儿吗?我说：我在文章中也写到了。我很奇怪这小小的细节他怎么会记得呢?许说：这件事印象太深了。当然记得。哦!想起来了，当时我们都在

三小队，我是小队副，而许贻士是小队长。这件小事也许当时也曾使他感到无奈，所以印象深刻。

这件小事是较顺利地解决了，但不会凡事总是这般顺利的，她孤单单一个女孩子，长期生活在那种环境中，可以想象得到，日复一日，不知道要遇上多少难解的题，而她，都挺过来了。

水库工程结束后，她先是调到山西榆次的晋中文工团，后来又调回了海政文工团，并与她的另一半张云星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我知道她有两个女儿也是拉小提琴的，在海外学有所成。多少年以来，从北京传来的有关小郑和云星的消息，大多是喜讯，我和苏斐都常为她的幸福而高兴。1994 年在北京聚会时，苏斐还专们到小郑家去住了一天，畅叙别情。

右派改正后大家心情都好了许多，我也想找个机会和小郑一起叙叙往事的，第一次华东海政文工团战友杭州聚会，我们都忙于八方寒暄；第二次北京聚会，我倒是不忙了，可是小郑和张云星都在为大家服务而忙得不可开交，第三次南京聚会，我和小郑都不忙，但云星已离开人世，小郑也重病在身，往事太辛酸，谈不得也么哥!吃饭时，我

只是有意坐在她身边，没说什么话，一个劲儿地看着她那高高兴兴、满不在乎的神情，心想：还好，还好，这回她一定也会挺过来的，待她病愈后再聊吧。但是，这一次她却没能挺得过来，按我的分析，那是她年青的时候太劳累了，她在精力上预支得太多太多了，她还没来得及咀嚼和回味一下生命的辛辣酸甜，就匆匆而去。今后，那些四十多年前的荒诞岁月的往事，我能和谁聊呢?

郑淑芹啊郑淑芹，魂兮归来!

2002 年 1 0 月 6 日初稿·2006 年 3 月定稿

生为党员　死亦党魂

——悼苑青

许贻士 周永熙 唐正光

在郭堡水库锻练大队的工地上320人中，有这么一个人，经常引起人们多看两眼。他30多岁高高的个头，一口河北口音。热天穿一件旧衬衣，一条黄色短裤已快洗得发白，仔细看一看，就能知道这是将长军裤剪短了来穿的。天冷了以后穿一身旧军棉衣，从上工开始，就拉着一辆装满土的平车，由山上土场拉向大坝，而后，又拉着空车，爬向山坡，一直拉到下工。他跑上爬下的速度，不紧不慢，既没有激情的奔跑，也没有消极的偷懒。在水库的八个月，他天天如此，平时不大与别人交谈，默默地做拉车的工作。这与大多数年轻人比起来，似乎是落后了，但每当计算工作量时，他从不少于别人。他就是苑青，人们都叫他老大哥。

1959年起，这些从部队来的右派们的工资，国防部不再负担，也不再负责这些人的粮食供应。锻炼队的右派们势必都要就地重新安置，分配的范围基本上是太原市和榆次专区的范围内。苑青被分派到太谷拖拉机站，继续劳动锻炼。

过去搞技术工作的战友们，到了工厂、矿场，一般都从事与技术有关的劳动，而苑青，他是从战场上成长的，他来山西以前在部队从事的是政治工作，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尉衔助理员，到了这家小厂，厂领导和他自己都发现了这样一个难题，不知道该给他安排个什么工作，最后不知是谁，想到了让苑青去拉水，厂领导们一听：嘿，合适。虽说拉水也不轻松，但还算不上是重体力活，当然更算不上是什么技术活，就交给苑青吧!于是，他就成了这家厂的拉水工。他每天的任务就是驾起一辆平车，车上横卧着一个用来装水的大汽油筒，到供水点灌满了水，然后一步一步走过半座城，拉回拖拉机站。一车完了，就接着拉第二车，然后第三车、第四车…从早到晚，不停地拉。

太谷的自来水供水点在南门的火车站旁，而拖拉机站却在小城的东北方向，这个厂几百口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的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全由苑青一人负责供应。他依然和在水库时一样，热天一件衬衣，一条短裤，冷天一套旧的棉军服，依然是很少与人交谈，依然默默无言地低着头拉着水车。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骄阳当空，无论是春节还是国庆，无论是中秋还是端午，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从1959年起，直到1977年止，这个厂里领导也换了几批，而他全无变更，一直就是拉水，拉了

近二十个年头，直到他因病卧床，才放下手中的平车。

1976 年粉碎四人帮以后，苑青性格上也有了一些改变，他开始乐意和别人谈谈话了。有一次我们聊起了天，笑谈中问起他：“老大哥，那么多年，你都是少言寡语的，现在好像开朗多了。”他笑笑说：“老弟，我 1943 年参军，一直在部队里、在战争中成长。57 年把我打划右派，我一直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为此苦恼，一直在反省自己，所以我没法和别人交流。直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当上右派这决不是我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某些人的权力的需要，也就是政治的需要，他们需要我、也需要你们成为右派。这只是政治权术，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形势不同了，搞阴谋的不会得逞，我相信我仍会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向马克思汇报的。”当时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们还有些似懂非懂，似信非信，但形势的发展果真全应了他的分析。 ’

1978 年，苑青同志病情加重，当地医院怀疑他患的是肺癌，当时太谷对此病无能为力，苑青同志通过战友联系到北京 305 医院就诊，经该院检查，确诊为白血症，即血癌。当时该病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透析[即换血]。如在北京治疗，即可争取到医疗及用药条件，但太谷无力支付这笔费用，总政又不支持。回太谷既无经费，又无医疗条件。在此两难中。只好回太谷 270 医院休养，明说是休养，实际上就是等死。

就在苑青同志病情恶化过程中，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 [78]1 1 号，[78]55 号文件，中央军委下发了[79]1 24 号文件，都是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决定。苑青同志得知此事十分高兴，特别是听说有的同志已经在 78 年得到平反，有更多的同志在 79 年得到改正，他为党的英明而高兴，为同志们恢复了军籍，党籍而高兴。他在等待，在等待中度日如年地盼望。有的战友穿上军装了，他的平反还无消息，他等不及了，派小女儿去总政问明情况，究竟是为什么?他在焦急中盼望，他在垂危中盼望。他的夫人在病床边鼓励他：老苑坚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你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你要相信，党会还你以清白的。苑青微微地点点头。他以坚强的信念坚持着、坚持着。终于在一天凌晨，总政派来一位干部陪同苑青的女儿，带着总政党委对苑青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赶到太谷，赶到了苑青的病床前。他的夫人伏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来了，来了，女儿回来了。女儿捧着已经配戴好领章，帽徽的军装送到他跟前。他微微睁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总政来的干部立正站在病床前，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委员会关于苑青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最后读到;“决定对苑青同志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撤消原结论，恢复政治荣誉，恢复党籍。,，在场的战友和其夫人，同声说：“老苑你恢复党籍了，恢复党籍了。”话音刚落，苑青同志的左手滑落了来。在场的人都不清楚苑青有没有听

见大家的呼喊，但大家都知道：苑青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向这个世界告别的。

1979 年 5 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在中共太谷县委礼堂里，举办了苑青同志的追悼会。在苑青同志的遗像前，放着他生前获得的奖章，勋章，立功证书等。礼堂四周墙壁上挂满了挽联挽帐，花圈。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陆续走进会场，最后进入会场的是身穿新军装的原来在郭堡水库共同劳动的战友们，他们来自太原，榆次，祁县，平遥以及太谷等地。追悼会由太谷县委农工部主持，县委组织部负责人致悼词。苑青小女儿在会上回忆了父亲的一生，战友代表在会上追念了苑青同志的为人。会后由苑青夫人及女儿捧着苑青的骨灰及遗像走出会场，人们紧随其后，战友们自行列成仪仗为亲爱的苑青战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送行。

悼苑青战友

唐正光　周永熙

漫天大雪纷纷舞个不停　　你埋头拉着水车向前行
从城南到城东一里多路　　雪道上留下你的泥脚印

你走过多少崎岖行军路　　你翻过多少战壕和弹坑
难料想当年的八路战士　　怎变成服旁役的运水人

你闯得过那枪林和弹雨　　却躲不过这阳谋如陷坑
你襟怀坦白敢直言无忌　　如今才领会到沉默是金

二十年运的水千车万车　　八千日劳累得百病丛生
想当年英姿焕发一军官　　而眼前只落得瘦骨嶙峋

是的，水是清的雪是白的　　清白原本是最美的人性
是的，血是热的心是红的　　热血红心铸就你的真诚

你去了，来不及换戴军帽　　你去了，来不及听完结论
对你这也许并不算憾事　　因你有刚强的党员灵魂

安息吧亲爱的苑青战友　　安息吧我们的难弟难兄
期待的日子终究会到来　　祖国的河山将为你作证

忠诚而执着的革命者

---忆佟惠林同志

黄修仁

作者小传:

1929年11月生，河北省行唐县人， 1946年5月23日入党，同年6月参军，入晋察冀军区干训班学习。1947年4月分配至二局二室工作。1949年4月随中南军区六局南下，任科员、助理员。19s4年4月任总参三部研究所副研究员、大尉军衔。1958年6月因批评在科研上硬让人承认石子可以吃、也能孵出小鸡来，而被打成右派。离开郭堡后被分配到榆次红旗厂劳动了十数年，1970年下放到“五七”干校，还是劳动，两年后回厂，再继续劳动。至1979年改正后调安徽叉车厂工作。1990年4月离休。1964年因创造性工作被评为山西省五好职工。

我和佟惠林相识是在到郭堡以后，我们被编入了同一个大队、同一个中队、同一个小队。就这样，我们相识了。当时，大家的思想都很沉重，也很痛苦，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是什么。他同大家一样，也不轻松，可是，他却和我说：“我俩毕竟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这是不应该忘记的，而且应在我们身上体现出它的作用。不管弄到哪一步，我们对党绝不会也不能有二心。对党的利益仍要倍加维护，对党的事业仍要尽心尽责、倍加努力。”他的话正符合我的想法，特感亲切，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距离。

说来也巧，我和惠林军衔一样，都是大尉，级别一样，都是副营，因而原来的工资也都一样；被处理之后，我俩所降的级数相等，同样是降四级，所以工资仍然相同。但我们俩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部队时他已是有家有口，而我还是一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当时部队里有种流行的说法：经济上最好过的是大尉，最难过的也是大尉，这就是指成家没成家而言的。他是属于后者，成家以后，经济上本来就已比较拮据，降了四级以后，他的困难程度就更加可想而知了。在郭堡，. 平常他很节俭，从不乱花一分钱，就这样，该往北京(他的妻儿尚留北京)寄钱时，钱数还是非常有限，很是让人同情。那时已有家室的战友，很多人都遇上同样的难题，当时，我还暗自为自己庆幸，多亏我是光棍一条，要不然又多一层压力与苦恼。

惠林同志在那艰苦、超强、超时的劳动中，在二中队就干活来说是最卖力、最忘我的一个。他从不惜力，哪儿最艰苦，哪儿最需要突击力量，他总是带头出现在哪儿。哪里有危险，哪里就会看见惠林的身影，他在劳动中的表现，经常为战友们所啧啧称道。

有件事曾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水库的大坝旁，有一条临时的黄土坝，建在一条河溪上。这个土坝是作为运土的道路而临时建造的，下面是一层片石，以便河溪的水从片石的缝隙中流过，而在片石上面堆了二十多米厚相当于十来个人高的黄土层，一直将河溪两岸垫平，•形成了一条运土填坝的唯一通道，有轨斗车、人力平车、独轮车都从这里通过，人来车往，非常繁忙。这种用土法建造的临时河坝，在溪河水量少的时候，负荷不很大，短期内使用原是可以的。然而超负荷、长期使用却是很危险的，可当时在大跃进的气氛中，哪有人会想得那么多呢!不料这种情况竟被我和佟惠林碰上了。

那是在经历了一段雨季后的一天，我和惠林都正常上班运土，来来回回走过这个土坝，谁都没注意到这些天以来，由于雨水的关系，小小河溪的流水量大大增加了，土坝下方片石层的小小隙缝，早已不能胜任排水的任务，土坝的里侧，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小水库，多日以来，库里的水不断地冲刷着临时土坝的泥土和片石，坝底下已被淘空了，而上面施工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自己脚下一二十米会是一个巨大的空洞。那一天惠林走在我前面四、五米，而在惠林前面数米处的是一位拉着平车的民工，当这位民工刚走到坝中的时候，不幸的灾祸发生了，土坝突然发生了大面积的塌陷，一下子那位民工连人带车都随着地面陷了下去。在下陷的一刹那，民工下意识地拉住了横在土坝上的小铁轨，才使得自己没有随着平车一起被泥土全部掩没。第一波泥土的陷坍后，这位民工已被土埋到胸口，说时迟，那时快，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佟惠林，反应灵敏，眼疾身快，他随即跳进了直径十多米，深达六、七米的还正在陷塌的深坑里，抢救民工。当我和周围的战友，民工们赶上来的时候，土坝又发生了第二波的崩塌，泥土直埋到民工的脖子，而且也埋到佟惠林的小腿。因为他的援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大家终于把民工挖了出来，而那辆平车则早已被埋在土深不知处了。事后我问他：你没想过那有多危险?你猜他怎么说？ “面对枪口，只能扑上去，不能犹豫，犹豫会误事，会坏事，会牺牲得更多。”多么忠诚的保卫战士!多可贵的品德!多好的同志!

郭堡水库建成以后，我和一批战友被太谷县领导派往庞庄水库，进行勘测和设计方面的前期工作，而他仍留在郭堡水库工地。过了些时日，我回郭堡到锻炼大队去办事，见人们都在忙着大炼钢铁。知道惠林正在炼铁，我就到小高炉前去看望他，去时，他正在吃饭，见我来了很高兴，就端着饭碗一边吃着一边和我聊天，我也兴奋地向他讲述着我们在庞庄的情况，讲着讲着，忽听到‘咣当’一声响，一看，他的饭碗掉在地上了，碎了，再一看，惠林已睡着了!唉，他哪儿是在劳动啊，他是在拚命，是在向生命的极限挑战。

至今回想起来，还很难过，我们那么多好同志、好战友不就是在那种虚妄号召下，白白消耗掉自己的有限而宝贵的青春吗！而本来，都是可以为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写下壮丽诗篇的。郭堡水库建成以后，全体锻炼队的人集中再分配，我们就分开了，万万想不到的是从此再没能见到他。

惠林战友是一位执着而忠诚的战士，他有着一位革命者所具有的高尚的自尊，在那没有尊严，没有是非，没有廉耻的年代里，无端地受迫害、受欺凌、受敌视、受侮辱！终于，他没有能走过来！

他是我敬佩而难忘的好同志。

关于佟惠林 — 周宏达

十四岁就参军的佟惠林，在水库的干劲是无人可比的，他总是默默地出现在最困难最艰苦的劳动岗位上；可是在文革中，他受到别人的诬陷，又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听说斗争他的时候，让他戴着几十斤重的捣米石臼做帽子，残酷至极!最后，他终因不堪迫害而投水库自杀。这个水库就是我们大家都曾经为之流过血、流过汗，而佟惠林流得最多的郭堡水库。可惜他没能赶上改正，可惜他再没机会在新的工作中大显身手，可惜他再不能与当年的战友兼难友聚首话旧，可惜他没能亲见他两个可爱的女儿的成长，可惜他没能和他的爱妻吕萍同志安享晚年……这一切，不是单单用“遗憾’’两个字就能表达的。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人性的悲剧!

是谁害了我的亲弟弟佟惠林

佟桂增（佟惠林之兄）

今天，2006 年 9 月 6 日，是我弟弟佟惠林含冤离世四十周年纪念日。

四十年前这一天，弟弟在郭堡水库被害的噩耗传来，全家人辛酸泪下，悲痛万分。从那以后，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是谁害死了他？是谁？是谁？

自从 1956 年从整风转入反右派开始，直到文革的十年浩劫，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全国城乡、大江南北喊得震天响。特别是文革以后，两派斗争动刀枪，红卫兵造反派随便抓人，揪斗、游街、打倒、喷气式、挂铁牌，摧残人身，折磨精神，诬蔑声誉，污辱人格，侵犯人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那个乌烟瘴气使人窒息的年代，谁有点不满文革的情绪流露，谁就会被打人‘反动派’的泥坑。我弟弟佟惠林就是在那种环境中掉人陷阱，后来更遭到被人落井下石，逼死在绝境的悲惨命远。

惠林弟在郭堡是右派身份，政治上是一直受欺凌的。按说，文革初期，当时群众运动的斗争对象应是各单位的所谓当权派，这本与惠林无关。听说当时郭堡水库的领导人闹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故意将群众的斗争矛头转向惠林，诬蔑惠林在任管理员时有贪污行为，连续数日昼夜不停围攻揪斗，据说游街时所挂铁牌是用钢筋及铁板焊成，达八十余斤重，以此逼迫惠林认罪交代，认识惠林的战友都知道他是个铮铮铁汉，为人正直

坦诚，当然不会随意认罪，而他公私分明，财库两清，也无从交代，于是更遭毒攻，他的死亡始终是一谜案，至今仍难排除是有人将他围攻致死，而故意制造惠林在水库投水自尽的假象。如今惠林死亡的真象，已经永远沉于水底，而亲人们的悲痛则正如郭堡周围的溪河般无止无尽。我们还是要问：是谁杀了惠林！该谁来负责！该谁来偿命！

作为他的哥哥，他的骨肉亲兄弟，每年的九月六日，都是我无尽伤痛和悔恨的日子，首先是在五七年前后，我没有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关心弟弟，明知他年轻天真，爽直坦诚，却没有关照他多加小心，在政治道路上还有着不少陷阱。结果他是一心为党，反而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其次，在他遭遇厄运的头几年，我也曾作过努力，想托人为惠林调动工作，以改变环境，使他能发挥所长。我曾托过当时任河北省建设局局长的亲戚和河北省水利局局长的老首长，但那个年月，政治运动频繁，每当稍有希望时，一逢运动冲击，人人皆顾虑多端，故而终未办成，而我自己因为是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有时也怕别人指责我立场不稳，也就没坚持再作努力。当时的环境和心态就是如此。总的说；还是事前及事后对他关心太少，不然的话，他的命运也许会有一丝改变的希望。今天看来，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是要再三争取的。这就是我伤痛和悔恨的原因。

我失去了我的亲弟弟，吕萍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惠林的孩子失去了坚强的父亲……然而，损失最大的是我们的祖国，他失却了像佟惠林这样的在战斗中勇敢坚强，在思想上忠诚正直，在事业上奋发有为、埋头苦干的好战士。这是个悲怆的历史事件，将永远为人们记住！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悼张正中

张兆瑞

一、自已报名当右派

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人，其所经历的过程大都相似，按“阳谋”布置：上级心诚情热，反复动员；于是你不能不信，不得不鸣；然后突然变脸，风暴倾刻而来，接着你就得捡讨、挨斗、受批判；再按既定方针，加冕戴帽，赶离军队，扫出北京，态度何其坚决、冷酷；倒小霉的降职降薪，倒大霉的一撸到底。至于党籍、团籍、军籍，一律都砍得干干净净，片甲不留，真叫你无籍一身“轻”。

但也有极少数例外，譬如说战友张正中，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张正中原是海军后勤部营房处的中尉助理员。反右本来没有他的事，他既无红黑言论，又无大小字报，他对斗别人不感兴趣，别人斗他又无辫子可抓，照说，这一关他满可以轻松地“迈步从头越”了，可是按照革命的逻辑，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就在反右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刻，他工作的海军后勤部营房处的反右运动出现了新情况，原因是营房处打出来的右派太少，没有完成上级按比例划定的指标，处长受到批评，被认为领导不力，思想右倾。这位处长很明白形势的严峻性，右倾和右派只差一个字，改变这个字，在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下很容易，而且已经有过先例：某单位头头对运动领导不力，没有按比例打够右派人数，因此该头头自己就被上级定成右派来充数。说实话，如果时间充分，营房处要再打一两个“右派”出来，经验老道的处长还是有办法的，可如今时间只剩下两三天，反右斗争即将结束，要从头再动员、排比、批斗……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这位处长急得团团转，急中生智，突然想到了张正中。 ‘

张正中是北京人，1930 年生，父亲是傅作义部的师长，起义后驻天津，是我军驻守天津的部队首长。北平解放时，张正中在交通大学材料系学习，当时的大好形势，激起了他的革命豪情，他决心要投身革命。1950 年抗美援朝时，他是当时最早热情报名参军的大学生之一，在广播里，在报纸上，都曾报导过他的事迹。后来被分配到海军。他平日只顾埋头工作，总是能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由于才能出众、人缘又好，多年以来，他在战友之间和上下级之间，始终都保持着很友爱、融洽的关系。

当时，听说处长找他谈话，他像平时一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办公室，处长赞

扬他工作能力强，阶级觉悟高，勇于承担责任，善于为领导分忧。再从全国的大好形势一直讲到本单位的运动成果，一桩桩、一件件，张正中听得心潮激荡。处长接着叹了一口气，话题一转，诉起苦来，他为了爱护本单位的同志，如今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没有人能在这个时刻挺身而出，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番动情的话语只说得处长自己差点涕泪横流。张正中是个血性汉子，哪里经得起这番作秀，为了不让自己敬重的领导为难，党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当场表态，他愿意来顶这个空缺着的右派名额。他怀着"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精神，马上进入角色，第二天就提起扫把和那些已经正式确定的右派们一起，勤勉地打扫厕所去了。

至此，慷慨赴难这悲壮的一幕结束了，另一场血泪斑斑，凄风苦雨的人间悲剧随之开始。

第三天，1958 年的 4 月 19 日，他和海军领导机关打出来的三十多位右派，同乘一辆车离开海军大院，来到同一个地点——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工地。到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已被抛进深深的泥潭里去了。人间居然有这等荒唐事！上有阳谋、中有阴谋，受苦受难的则是底层的基本群众。待他想通了这一点，一切已经悔之晚矣。

若问：自愿跳火坑，自愿当右派，这怎么可能呢，人再傻，也不会傻到这个份儿上吧。

答日：这正是时代的悲剧。多少年来，确立了一个基本观念，党永远是正确的，而上级首长就代表了党，张正中是一直是听党的话的。

总之，张正中以最快的速度当上了右派，省略了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宣布处分，法院判决等等一系列繁琐的走过场的程序。

二、何止十二项能耐的‘十二能人’

张正中的父亲要求子女很严，四子一女都很出色，尤其是长子张正中，更是勤奋精干、心灵手巧，走一处亮一方，常常是所在单位的核心人物。

记得在郭堡水库工地，曾经成立了一个十分简陋的"万能"工厂，他任木工组长，组内除了我们两个老右，还有二位木工师傅，他在最短的对间里学会了木工手艺，为土高炉作模板，为水库造船，出了不少力。木工组新船下水时，水库领导高兴地说：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们都造出来啦。他在郭堡还担任过一段炊事班长，老张很会做饭、做菜，让大伙在繁重的劳动之后，都吃得很香。

1959 年我和老张先后来到祁县轴承厂，他是厂里技术负责人，1960 年轴承滞销，

厂里自谋生路，打造了一些烟囱簸箕之类的黑白铁活计，他跟着干了几天，很快成为熟练工，他自信地告诉我们说： “黑白铁这活计，我完全能行!”

收音机的修理是他自己钻通的，掌握了十分熟练的修理技术，曾带了几个徒弟，并让徒弟们靠修理收音机养家糊口。1963 年轴承厂一度下马，他调入东观供销社任售货员还兼管修理收音机。我俩自 1958 年同乘一辆汽车离开部队，又同乘一列火车来到山西，朝夕聚首，风雨同舟，已历五载，直到此时方才分手。不久他又调入东观铁厂，当时的东观铁厂主要靠手工制造和修理一些小农具。他去了之后，设计制造了一些专用设备，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一年厂里组织技术攻关，试制活络扳手，是他，作为技术员刻苦钻研，保证了试制成功，从此活络扳手成了厂里的支柱产品。就在这时，他的“十二能人”的名声大振，工人们绘声绘色地述说着他们的张师傅：钳、铆、铸、锻、电、各种工艺，他都是专业能手；铣、刨、碹、磨、钻、各种机械、他全能熟练操作。他还有两项远胜他人的绝活：他画的图纸非常标准，画面干净、设计合理；而他那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字更是远近驰名，无人不赞赏。依我看，说他有十二能，真是委屈他了，他的能耐哪止区区十二项啊!

文革中，他冤枉被捕入狱，可厂里又离不了他，后来不知用什么办法，竟把他从狱中弄了出来，在很短的时间里，给厂里设计了一套 80 吨磨擦压力机(一种锻造机械)，大功告成以后，再把他送回监狱。这是后话。

他平时言语严谨，说话有根有据，没有吹牛拍马，夸夸其谈的习惯。早在 1960 年就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大跃进、拔白旗、反右倾、四清运动，以及逢年过节公安局来厂调查右派动向时，他都能轻松过关，在祁县的老右们都羡慕他很“幸运”。

可是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这一关他过的太难了，太惨了，几乎断送了他的性命。

三、反对反革命的反革命

文革初期东观铁厂党支部书记杨贵恒交给张正中一个任务，让他加一个夜班，把一套设计图纸搞出来。张反复说明：搞设计不容易，一夜之间是搞不出来的。谁知这一下子激怒了杨书记，他把张正中叫到办公室大骂不止，骂得张正中不知所措，是一位工人听不过去了，硬是把他拖出办公室，才算躲过一劫。

不久，杨书记凭借他的权力，硬把张正中揪出来。杨贵恒没什么文化，是当年很

走红的大老粗干部，他只有一只眼睛，背地里人们叫他“独眼龙”。是个心狠手辣的恶人，因其贵为书记，没人敢惹他，杨贵恒四处收集张正中的罪名，主要是这几条：1、1957年趁共产党整风之机，曾向党猖狂进攻；其次，他父亲曾是傅作义部的师长，从前是反动军官；第三，他和工人们聊天时说过：“林副统帅也算是经过考验的。”杨某怂恿造反派们硬说这是句反话，是指林彪虽然经过考验，也会走赫鲁晓夫的路，随着文革中林彪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老张的罪名也越来越大了!说什么这分明是对林副统帅不信任，实际上是在暗示林副统帅也不一定经得起考验”。张正中此时已无法为自己辩白了。

杨贵恒对整人很有妙招。工厂里批斗张正中时，工人们不肯开口更不肯动手，面对这种冷冷清清的运动形势，他不动声色地由外面请来自称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又调来了一批不明真象的退伍兵，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一下子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了。“革命小将”们变着法儿折磨张正中，侮辱他，毒打他，会上会下，杀声阵阵：“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砸烂张正中的狗头!”连日的毒打、折磨，使他感到生不如死，于是他愤而投井自杀，幸亏被人发现，有人一声喊：“张正中跳井了!”工人们蜂涌而至。好在井不太深，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救了上来。车间主任马献标师傅冒着保护反革命的罪名把他背回来安顿在宿舍里，这样，他又捡回来一条命。值此动乱年月，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者有之，用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者有之；但不顾政治风险救人于水火之中的人也不少。

然而，造反派们对“畏罪自杀”的右派分子是决不会同情的。老张自杀未遂后，他们更是毫不手软的、变本加厉地残酷折磨他。

一位叫李兴的木工，作为目击者，他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惨象：“唉呀，那个打呀!打得一声一声的惨叫啊!这些狗 x 的，真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想想人家张师傅对咱厂有多大的贡献，硬把人家逼得跳了井。从井里捞上来打得更厉害了，惨啦!可惨啦!”

不久，张正中被五花大绑逮捕入狱了!

张的爱人许灵川是轴承厂的会计，闻讯不断地去看守所探望，送去些吃穿用的东西，亲人的探望对狱中的张正中来说真是极大的抚慰。

许灵川原是北京第二机床厂的会计，1958年4月张正中被遣送到山西来劳动锻炼后，许灵川带着他们的三个幼小的男孩留在北京，由张的母亲帮助照料艰难度日。1965年北京有个疏散人口政策，规定“男女双方有一方在外地者，留在北京的一方必须迁出北京到配偶所在地去……。”这一年祁县来了不少北京家属，我的妻子和许灵川都是此

时被调入祁县轴承厂的。，许灵川只把长子带到山西来了，次子、三子都留在北京由张正中的老母亲艰难照料。

张正中入狱，许灵川成了反革命家属，厂里议论纷纷，许多人估计她迟早要离婚的……

许灵川和我爱人住在同一条胡同里，男人都在受难，在上下班路上两人难免互相劝勉几句。许灵川表现的十分通情达理，她看似柔弱，但性格坚强，她说："离什么婚，这不是还没有最后定案吗，怎么也得定了案再说啦!要离我现在也不离，现在我要提出离婚不是往绝路上逼他吗?" 越到后来，许的态度越坚定："孩子都这么大了，还离什么呀!" "他就是成了反革命我也不和他离婚!" "将来他没有工作了我养活他!"她相信张正中，她更相信天会亮。

一个人落难全家遭殃，此时的造反派的目光也盯紧了许灵川，看看这位"反属"有何异常，以便乘机教训她。一天，一项"大错误"终于被抓住了，这便是轴承厂轰动一时的所谓"鸡蛋事件"。

祁县看守所在县城东北郊，距南门外的轴承厂约三、四华里，她全靠步行，去一趟七八里路。几趟跑下来就搞得她心力交粹了，连日来她寝食不安，本身的会计业务又十分繁重，身体虚弱，无法支撑，她就去传达室的炉火上煮了一个鸡蛋吃。不料被"革命群众"发现，竟掀起轩然大波："男人是反革命，她满不在乎，不和反革命划清界线，还要改善生活煮鸡蛋吃，这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她偏偏要拿到厂里来煮，她是什么意思？作给准看？……"这点事在厂里、在车间讨论了好多天，有些人心怀恶念，一直在搜集罪证材料，以便对她采取革命行动。无奈许人品极好，再没有任何其它辫子可抓，大部份群众也不积极参与，最后虽然没有采取什么革命行动，但对许灵川来说，一柄利剑始终在她头顶上高悬着，随时都有可能砍杀下来。她就在这种满怀恐惧的心态下，熬过了六个年头。

直到 1972 年，林彪集团已经败露，我刚调到祁县城东的化肥厂等候处理，才听说张正中出狱了。不知他怎么样了？是奄奄一息等死?还是筋断骨折、成了残疾人？我不敢多想，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流不止。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仍然恶劣，我只能默默地为他祈祷。

一天晚上，我在厂里加班到深夜才回家，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身心非常疲惫，慢悠悠骑车刚由化肥厂的小路拐上公路，一辆自行车擦身而过，走着走着，心里忽然一亮，那那影这么熟悉，难道是他?我发问："你是谁呀？" 他也听出了我的声音，

连忙回答：“哎呀！是我呀！” 果然是张正中。我俩都连忙翻身下车，六年不见了，真是百感交集。他居然还能骑自行车，比我想象的好多啦！万幸！万幸！老天保佑！当时不仅天色漆黑，而且路上绝无行人，于是我说：

“你受苦啦!”

“都过去了!以前我是想一死了之，自杀不成，头脑反到一下子清醒了。我为什么要去死?我不能顶着这顶莫须有的罪名不明不白地去死!我要活下去!我没有罪，‘我不怕他们!想通了这一点，后来无论怎么折磨我，我都一声不吭，不喊叫，不向他们求饶，天总会亮的!”

“在狱中你受苦了吧?”我换了一个话题。

“不!在狱中我比外面好受多啦，”

“小声点!” 尽管四周无人，找还是十分警觉，他这话要是被上纲上线，再进监狱也是完全是有可能的。我又试探性地问：

“你蹲大狱真的会比外面还好受么?”

“那当然!”他的语气是十分肯定。

我终于明白了他蹲监狱比外面“好受多啦”的原因：当时的公检法虽然也存在着有法不依和野蛮执法的现象，但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惨无人道的兽行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我想安慰他几句：“林彪已经是反革命了，阁下早就识破林彪，应该说是远见卓识，好样的，或许你还会红起来。”

“不!我依然是反革命分子。是反对反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说着，他与我道别，拐向通往他家的小路，消失在夜色中。听着他那破烂自行车渐渐远去的吱呀声，我似乎也受到了一点启示：也许我们的苦难快到头了。

四、这是为什么?

1979 年改正之后，张正中回了趟海军后勤部，许多熟人依然健在，彼此相见自然是几分亲热，几分愧疚，更有几分凄凄然。

当时情况是：调回北京很不容易，户口问题、工作问题，都是难以解决的。不过，海军后勤部还是派出了得力干部，克服重重困难，费尽周折，把他们夫妻调匾故乡北京，俩人分别担任海军后勤部汽车大修厂的技术科长和会计师。从此他们和老母亲、两个儿子又在北京重新团聚了，可惜的是，他们带到山西在洪洞县插队的长子，同样是心灵手巧、不多言语、颇有乃父之风的张兆平只活了三十二岁，便在山西英年早逝了，给这个

不幸的家庭增加了新的伤悲。　　、

由于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多年的精神抑郁，严重地损害了张正中的身心健康，五十多岁查出胃癌，62岁便走完了坎坷而痛苦的一生。噩耗传来，深为悲痛，写下两行字，权作挽联以寄哀思：

风云诡谲往事沧桑兄之音容将永在

度尽劫波于今忽去弟向何处话衷肠

张的夫人不幸身患半身不遂，与儿孙相伴，定居于北京南口，张的老母亲今年(2006年)104岁，依然健在。

借用1957年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是为什么?”伟大领袖发动的反右运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造成多少人受伤害，受株连，以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横尸荒野的人间惨剧，由此带来了有史以来罕见，举世亦称少有的三年大灾，十年大劫，影响巨大，流毒深远。这一切究竟

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怀念战友陈广

汪雅雄

作者小传：

汪雅雄：1929年生。1949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小学教员、华东革大学员，空四师十工团、十一航校、十二航校地勤，山西军区训练团学员。离开郭堡后，在祁县通用机械厂、水暖器材厂劳动。1963年1o月退职回乡、在寿昌城中生产大队，直至改正，在建德县砖瓦厂技术科工作时退休。本人喜爱书法艺术，1981年以来，屡次在地区、县书画展中获书法奖。

战友陈广于2001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四时因心血管病住院治疗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我顿时热泪盈眶，悲痛万分。万万没料到像陈广兄如此高大魁梧的身材，会被病魔轻易地夺去了生命，这是我们众难友的一大损失。悲哉！痛哉！

郭堡水库劳动时，我与陈广并不相熟，水库劳动结束我分配到祁县晋中通用机器厂，而徐树泰、陈广、王林则分配到太谷县一家工厂企业。我与徐树泰是在山西军区训练团同时被扣上“右派”帽子的，在训练团时，彼此就非常要好。而祁县与太谷县是相邻县城，只须5角钱买火车票即可到达，每逢星期日，我们经常你来我往。正是由于徐树泰的介绍，我才认识了陈广。结识陈广后，对其第一印象就是他平易近人，性格开朗、谈吐平和，是位颇有社会知识的人才。

老陈少年即投入革命队伍，学历不高，可他富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坚强的学习毅力，所以知识非常丰富。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经常书信往来，电讯发达后彼此常以电话聊天，非常投机。每次看他的来信，都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且不说内容，单看他那一笔好字，秀丽畅达，就令人眼前一亮。我自己也酷爱书法，我看得出，他的字是经过长时期的苦心练就的，我往往自叹不如。

老陈生活朴素，为人正直，对人真诚，没有空话、虚话、假话、骗话，而且有一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原来习惯吸烟和嗜酒；为了身体健康将许多年的烟瘾下定决心戒掉了，酒类能通经活血，尚有可取的一面，他稍稍仍喝几口，可非常克制，每次与他同桌用餐，不管是在他家里还是在我家里，他午餐、晚餐都只倒一小盅，再劝也不行，他是说话算话的硬汉子，别人只好作罢。

从外观上看，他真似一条东北大汉，看不出有一点书生秀气，可他天资聪敏，思想豁达，做事稳重善于思考，凡事必经熟虑之后，方做出决定。1990年，两位乡友约我

同做山西煤炭的生意，他们知道我在太原有朋友。由他们出资三万元作资金，我跑腿联系。真是从不学剃头，出门就剃了个癞痢头。我建议将三万元现金存放陈广帐户上，那两位乡友不放心，要从银行将钱款直接汇到对方煤老板的帐户上，谁知道煤老板有两个帐号，一个在榆次市农行，一个在乡下，款子汇出之后迟迟不见煤炭发运过来，于是到榆次市农行查帐，可是银行电脑查不出外来汇款记录，为此陈广颇着急，陪我到榆次农行查询，方知煤老板有两个帐号，款子拨到了乡下农行去了。时过一月，煤价频频直上，按原定合同价老板不肯发煤，因此只好将款子取回，头次做经营没有赚钱反而蚀本千把块。陈广不辞辛苦陪我到处跑，这种难能可贵的真挚友情使我内心感激不已。我们在榆次的时候，陈广还带领我去和许贻士等战友会晤，大家畅叙别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广生平有一个爱好，喜欢周游全国各地名山大川，他曾到西双版纳，去领略过兄弟民族的生活风貌；他曾去九寨沟、张家界，欣赏过这些名胜宝地的奇景；他曾畅游桂林，饱览过漓江两岸的山水如画，他还攀登过四大名山，峨嵋、黄山、普陀、五台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和足迹，因为他喜欢周游祖国各地，我称他是“徐霞客第二”，他自豪地笑了。我想，如果有条件，也许他真的愿意浪迹天涯，走遍全国，做一名现代的徐霞客，来抒发他热爱祖国的激情。

他曾先后三次来过浙江建德(新安江)，到寿昌与我相聚，他对新安江的青山秀水及城市面貌赞不绝口，寿昌附近有诸多旅游胜地，如灵栖洞、悬空寺、千岛湖、诸葛八卦村、金华双龙洞等。他的见识之广是好些人不能比及的， 1997 年 9 月下旬，陈广携夫人李琴第三次到寿昌与我相聚，这年正是他 70 岁寿辰，十月初离开寿昌回到苏北盐城，兄弟姐妹们为他 70 寿辰操办庆典。他对寿昌新安江蛮感兴趣，说身体好的话以后还来寿昌相聚。离别时彼此依依不舍，欢迎他以后再来。

陈广是位热心肠的人，他对我们每位战友都很热情，愿意牵头为大家办事，而他又胸有谋略，由他牵头办的事，总能按照他的部署得到相应的成果。陈广走了，走得太快了，可惜没有亲眼见到将来对错划右派的新的决定和措施。历史不断发展，民主法治逐步健全，全国所有健在的错划右派都希望对五七年的事能有一个更合乎实际的结论，希望不要将 50 年前的错误历史经验延续下去。啊，陈广，你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这本是你长远以来的愿望，这一愿望如能实现，我知道，你在天上也会得到安慰。

您走得太快了！走得太早了！如果能等到那一天，我们能够共庆彻底平反的日子到来，该有多好啊！惜哉!惜哉!

他为建立人民空军立大功

——悼空军离休干部何健生

张英敏

何健生，1909年生，广东连平县人，师范毕业后，考入军阀陈济棠办的航空教练队，毕业后任领航轰炸军士；后来陈济棠的空军被蒋介石收买，何健生成为国民党空军的一员，任上尉领航员。老何的飞行技术十分精湛，被称为国民党空军的四大金刚之一。

抗战期间，苏联支援国民党一批sB轰炸机，大约在1941到1942年，何健生参加轰炸越南河内的战斗，完成任务后返航时，飞机被敌人击伤。何健生跳伞后不幸落人日本人之手，日本人将他送到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汪曾经接见何健生，并让老何在汪伪空军里当教练，还委任他为上校参赞武官，驻常州机场。

抗战末期，老何与一些思想苦闷的汪伪空军人员感到前途茫茫，希望寻找一条出路，经过许多波折，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在党的指导帮助下，何健生和它的同伴组织了伪空军的扬州起义。他们分两批到达解放区，其中一批人驾着汪伪空军的一架日制九九式运输机建国号直接飞往了延安。而何健生、白起等一批人，则在新四军掩护下抵达苏北解放区。其时日寇已投降，东北已建立解放区。老何等奉党的指示，要到东北去组建我军自己的航空学校。在赴东北途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有一架日本飞机因故障被迫降落在海滩上，山东海阳县民兵张吉俊徒手夺得这架飞机。正好，何健生他们途经此地，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帮助修好飞机；然后由白起任驾驶员，由何健生任领航员，共同将这架飞机飞到姚村。据说，这是我军在敌人手中缴获的第一架敌机。

随后，在东北建立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白起任副校长，何健生任训练处长，开始培养我军第一批飞行、机械人员。王海、赵宝桐等战斗英雄，都是从这所学校里出来的，他们都是老何的学生。也就是说，在组建中国人民空军的历史过程中，何健生他们曾立下过汗马功劳，这是不容否认的。

空军司令部成立后，他被调到空司，任情报处照相科科长。照相科有相机、胶卷等器材，当时空司的首长、头头们时常向老何借用照相机玩，有些人较自觉，有借有还；但也有些人却是有借无还。这些人都是领导，官位都比较高，老何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向他们讨还，而‘三反’时，这些器材的损失都算是老何贪污。虽然掌握运动的领导人也很了解这些情况，但老何依然被按‘贪污、浪费’定性，最后被开除党籍，并从团级

降到连级，从科长降成参谋。老何对此很有意见，他说：　“我没有贪污公家一分钱，拿走相机的都是头头们，他们没事，反过来整我。我热爱党才参加革命，即使把我降成战士，我也没意见；但应该保留我的党籍。”后来组织上为照顾老何的身体，给了个副营级，能吃中灶。肃反时，认为老何的历史复杂，又将他划为斗争重点。说什么：“起义人员没有一个是清白的，他们都参加过国民党，都有不同程度的劣迹。”老何听了不服气，说：“我是带着飞机，个人还带着黄金来参加革命的，为何这样对待我?_″老何在‘三反’时，曾被捕坐过禁闭室，还被公审过：‘肃反’时又被批斗，限制人身自由将近一年。两次运动，最后都是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为此，老何在整风时提出了意见：“你们对待我是狂风暴雨，而对待自己却是和风细雨。”　“全处的官员说闲话聊天，我一个人埋头写文章。”就为这些，他受到无情批判，说他是反对‘肃反’，‘反对党的领导’，‘思想反动’；最后给他戴上右派帽子，行政降四级，从副营级降成副排级，送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

修完水库以后，他被分配在太谷机械厂劳动，后来又到饮食服务公司、照相馆、饭店、澡塘等处劳动，1973 年从太谷县的一家澡塘退休。退休后，他到北京和妻子邱淑仪一起生活。长期以来，他的退休工资，每月人民币总共四十五元。

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好转，老何向空军党委提出意见说：“我从国民党空军起义投奔共产党，这是人所共知的。而现在，我却是以一个澡塘工人的身份退休，我海外和台湾的故旧亲友们知道了以后会说什么?他们会说：‘看，何健生投奔共产党以后，落了个这种下场!’这对今后党的统战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何健生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在历尽几十年坎坷以后，他没有诉苦、喊冤，而仍然在考虑党的影响。顺便提一提，当年和他一同起义，并曾任我东北航校副校长的白起同志，与何健生命运相同，1957 年也被打成了右派，并送河北承德水库劳动。错误的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和军队建设所造成的损失多么巨大啊!

空军司令员王海同志对何健生的情况是了解的，自己的老师么!在王海的关心和帮助下，老何历史上的三次冤案（三反、肃反、反右），都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平反。他恢复了党籍，恢复了正团级待遇，并从一名澡堂退休工人恢复为空军的离休干部。至此，他蒙受左祸之害已达三十年之久。

何健生同志 1 985 年在北京去世。他的事迹已刊在《革命史资料》第 12 期和《纵横》杂志等刊物上。他在世时，他在美国的旧日朋友曾专程到北京来访问；还好，他接待朋友时的身份已恢复为堂堂正正的空军离休干部，而不再是澡堂的退休工。

敬怀黄尧南

乌维达

黄尧南 1932 年生于无锡，1949 年考入清华大学采矿系，当年参加天安门开国庆典的游行，深受新中国独立解放，万民欢庆自己当家做主人的激励，立志建设新中国的航空事业，读完大学一年级，申请转读航空系，受学籍管理之束，未果。1950 年毅然弃读清华考入浙大航空系，不惜复读

大学一年，足见锲志不移之壮志。1951 年坚决响应抗美援朝之号召，坚决要求从戎参军，终以追加的名额到了杭州空军预科总队。继而转到空军航校助教班，走上培养空军飞行员的讲坛，他深钻教材和教学方法，亲手制作教具，因人施教；善释疑难，组织教学有新意，深得飞行学员的喜爱和好评，成为学科中的骨干和佼佼者，1957 年整风会上，谈及 “苏联军援”被划为极右份子，由中尉副连级一撸到底，每月发生活费仅十八元，经历了繁重的体力锻炼和艰苦生活的磨练，1 960 年摘“右派分子”帽子，分配到山西盂县仙人公社仙人中学教数学。他曾经两次复读过名校大学一年级，1955 年又派往航空学院研修数学，有着坚实的数理科的基础，又有航校授课的先进教学经验，讲数学游刃有余，很快鹤名显出，学生们在数理课方面遇到疑难，都愿找黄老师研讨，他又以一题多解见长，无疑，他肩负了教学的重担在那饥不饱腹、物资匮乏的六十年代，十六年的农村清苦教学生涯，使他终于积劳成疾，身患肝癌而未为人知，依然带病授课，毫无懈怠，1974 年秋，终因肝癌肿瘤破裂而死在手术台上，年仅四十二岁。

发殡那天，方园数十里不请而自动赶来加入送葬队列的农民劳动者，竟有五六百人之众。出自当地劳动人民这种自发悼念故人的祭奠行为，实为罕见。县教育局和学校领导公认他是县里数学教学的权威，他的学生们和当地的百姓们异口同声颂扬着说：在我们这里，黄老师是人品最好、学问最高、知识最广而明白的事理最多的好教师；他忠实厚道、待人诚恳热心，诲人不倦……人们的眷恋仰慕之情，根植于心而溢于言表。共产党人讲求盖棺论定，不知道这能不能使当年力主划定黄尧南同志为极右份子的始作俑者感到愧疚，而备受良心的谴责!事实不容篡改. 历史将返归真实，黄尧南一生，虽然是半生冤难，然而从他热爱新中国空军建设事业开始，到热忱为农民子弟教育事业服务终生，鞠躬尽瘁，至死不渝。他不愧是站在教育战线最前列的奋斗者。他的家属后代将为他感到自豪，作为他的同志，我也因有这样的战友而引以为骄傲。

执笔至此，我敬仰和怀念之情更甚!

怀友二章

陆文若

作者小传：

1928年生。1950年12月入团，1951年1月参军，复旦大学肄业，曾在空军一航校学习，后在空军工程部订货处及空军军事计划部工作，中尉军衔。离郭堡后曾在祁县水暖器材厂及胡村公社机电站工作，1965年回原籍江苏沙洲县务农，改正后，在张家港市电机厂任工程师，1990年退休。

忆沈保民

沈保民走了，走得无声无息，人说他去见马克思了，是否见到马克思，活着的人是无法知道的。

历经坎坷一生的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将自身化作泥浆，浇灌到天堂大厦的基石里去后销声匿迹。只有难友们，劳动营三百二十名营员，迄今尚存者，在回忆那段可悲、可恨、可痛的历史事件时有些微弱的心灵振动，这个振动，随着岁月流逝，逐渐衰减，最后变成千万人的遗憾而消失。

沈保民，1920年出生在江阴的农村中(现为张家港市晨阳镇)，高中文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成为新四军的一名侦察兵，他一生经历了许多对敌斗争的惊险故事和化险为夷的离奇遭遇。

1957年，那场了无人性的风暴刮来，沈保民在空军训练部编审科长的位置上被刮倒。1958年4月离开北京，和其它遭难者一样被军事法院一纸莫名的判决书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遣送到太谷郭堡水库劳动锻炼。他担任第二锻炼大队大队长，管理相同命运的锻炼队员。由此我们相识，。我在他领导下劳动锻炼，并知道他是江阴人，是老乡。

1959年1月锻炼队解散，队员们分别安插到地方各单位，继续劳动锻炼。生活、费用转由地方承担，我去了晋中通用机器厂，地点在祁县，老沈去了什么地方，不清楚，相互再也没有联系。

岁月匆匆，不觉过了二十多年。1984 年我们各自分别都回到老家沙洲县(即现在的张家港市)，经过了改正，不用说，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了，巧的是两人都被选上县人大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我们不期而遇，意外地见了面，两家相距不远，我们开始有了来往。我在一家工厂上班，他已经离休，但仍然忙得很，到各地中小学去讲他亲身经历的

革命斗争故事，成为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战线上的一名尖兵。同时穿插着为乡镇企业收集好人好事，好产品好经验，撰写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如：《比翼齐飞》，还有与别人一起编著的《张家港市乡镇企业家风采录》，后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他给儿子取名萌芽，给孙子取名听松，周围的人都赞赏这个极含文化底蕴的好名，现在儿孙们都有了工作，遗憾的是妻子已经离婚，且有老年痴呆症，进入了一个弱势群体之中。

忆孙兴暂

孙兴哲是我熟悉的老朋友，东北人，早年就读于吉林大学并从学校参军。50 年前，我们还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军委空军军事订货部计划处供职，他在计划科搞航空备件军事订货计划，我在国外订货科搞贸易订货计划。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办公室、宿舍相距不远。我们都是青年团员，他是团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我们常常在一起商量团的活动。

1957 年那场风暴刮来时，老孙第一个被确定为检查对象；以学习的形式开始，先批判报纸上的各种右派言论，联系思想畅谈看法。他作了好几次检查，最后他把别人对他的批评全部接受。一揽子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结果不用说了：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军籍、团籍，行政降两级处理，转地方劳动锻炼。

1958 年月 4 月我们一起到太谷郭堡水库劳动锻炼。1959 年锻炼队解散，他去了榆次皮革厂、橡胶厂等几个厂，改正后到了市科委，从高级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休。他发明的家用煤气发生器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创办了兰光研究所。

他的妻子是小学的校长，模范教师，夫妻俩感情深厚。他的去世不仅他的家人感到莫大的伤痛，我们熟悉他的众多难友，也为失去这样一位共患难的知心朋友而感到深切的悲哀。

无　题

汪雅雄

园中昨日百花繁　　一夜寒风尽摧残

既舞飞雪漫天白　　犹歌烈焰遍处燃

万岁定计有阳策　　群蛇出洞难生还

此情毕竟何终局　　问天无应泪难干

忘不了的苑青

郑开宸

作者小传：

天津人，33 年 7 月生，49 年 3 月参军，参军前初中文化，参军后在防化学校(现防化学院)当学员，58 年来山西劳动锻炼后分配到山西地质勘测区域调查队(在榆次)当工人，直至 93 年离休。

苑青同志是老党员，大尉，原总政组织部助理员。在郭堡劳动时，他是我的分队长。

我在水库工地上劳动不久，就犯了一个大错。当时我们中午饭后，有短暂的一点午休时间；供人们抽口烟、喝口水什么的。那天中午，我吃完窝头咸菜之后，正逢午休，我见旁边有个小木箱，木箱的一侧，画有一张象棋的棋盘，旁边还有现成的一付象棋子，记不得是哪位战友，正好走过，被我一把拉住，我将木箱侧倒，棋盘朝上，两个人就你出马、我出车地杀将起来。正玩在兴头上时，进来一位工人，见状大惊，他说这箱子里放的是电瓶，木箱侧倒后，电瓶水全部跑掉，电也就跑光了。一见惹祸了，我也一时没了主意，这时苑青过来，了解了情况，他知道我的确是捅了个大漏子。

这种事说小，则批评几句了事，说大，任何罪名都是套得上的。我很快便被叫到指挥部，苑青怕事态扩大，也陪着我一起去。到了指挥部，那个曹指挥虎着脸审问我，我就将实际情况一一说明，并再三解释我的确不知道木箱中装的是电瓶，曹指挥根本不听我解释，他厉声呵斥道："不用讲了，你知道吗，你这是破坏！"这'破坏'两字一出口就像一块炸弹落地，震得我人都蒙了，我那时年青火旺，正想据理力争，以说明我决没有破坏的动机……。苑青这时正站在我身旁，他不让我说下去，毫不犹疑地迎上前对姓曹的说："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是小郑的分队长，是我没有管好我的分队员，是我没有察觉这只木箱的情况，我有责任。"姓曹的正在火头上，看了他一眼，说："不用你说！"猛然又一声断喝："你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吗？"一听到这句话真如尖刀挖心，怎能教人受得了，但我抬头看苑青时，只见他不愠不恼，气正神定，既不畏惧，也不惊慌，仍然是不卑不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承担责任！"这位曹指挥倒给镇住了，面对着这样一位敢于承担责任的老同志，他也不得不收俭地下台，转而改用教育的口气，给我们作了一番关于问题严重性的分析，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可

以说，多亏了老苑在身边，让我免了这一劫。

苑青自到水库以来，一直是全心全力投注在劳动上，很少与人交谈，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沉默，不大开口，然而为了保护我这名小难友，他却挺身而出，准备着自己承担罪责。这件事，使我多少年来，一直印记在心上。1979 年，他病逝于太谷。传说他在临终时，才明确了自己已经被改正，他是手捧着改正通知而咽气的。

早春逢严寒

----悼张凤春夫妇

陈　挺

张凤春 1926 年生。1945 年 10 月入伍，是解放军报社正营级编辑，大尉军衔。妻子小丁是报社资料室资料员。整风时张凤春批评了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和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由此而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张不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赫然写着：我是右派分子，请大家批判。这张大字报一出来，震惊了整个报社，左派们认为张凤春是摆出了要和左派抗争到底的架式，于是对他发起了更猛烈的围攻。

此时，他后院起火。他妻子小丁的顶头上司、资料室的组长苏某，以左派的身份，假借关心部下的名义，常常趁着张不在家的时候，到张家做所谓“争取右派家属” 的工作，就此趁火打劫，软泡硬磨，诱奸了苦恼中的小丁，一次，再次……直到被张凤春当场捉住。张凤春怒不可遏，他把满腔怒火，全发在妻子的身上。心想：我在会上被残酷地批斗，你却在家里偷情，哪儿还有点儿夫妻感情!他不堪蒙受这奇耻大辱，坚决离婚，妻子虽然百般忏悔，苦苦乞求饶恕，张坚决不允。

当时解放军报社党委李书记和张是多年的战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一次遭遇敌机轰炸，张凤春用身体保护了李的性命。张的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李书记永记难忘，他深知张凤春对党一贯忠诚，战斗勇敢，工作极积，作风正派，为了想让张躲过这一劫，李书记曾多次找张谈话，一方面让他原谅自己的妻子，另外一再暗示他只要写个检讨，承认错误，就可以不戴帽子。但是张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左派的谬误低头，同时也决不向背叛自己的妻子让步。结果张被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降两级，发配到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锻炼。他在三大队担任二小队长，整日闷头苦干，不多言语，1959 年 1 月份到介休中学教高中语文。他的妻子小丁则被开除军籍和公职，并遣送回乡。

至于那个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左派小丑苏某，却只受了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一年后又说他大方向坚定，是左派；而搞女人，属生活小节，无碍。于是党籍恢复，军官照当，级别照提，后升为副师级，并任解放军报社的总编室副主任，最后以正师级离休，可说是毫毛未损。而他利用权位、利用形势所诱奸的弱女子，却从此被逼上死路。

小丁被开除公职以后，被遣返回成都市郊区农村劳动，她自幼上学，接着就参军，从来未干过农活，当时又正赶上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她那手无缚鸡之力的身体，只靠她挣的那几个可怜的工分，养活自己尚且极为艰难，又怎么养活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儿

子!小儿子不久便因严重营养不良而得了佝偻病。她举目无亲，孤立无援，并且整天生活在众人歧视的目光下，压抑、悲伤，凄苦万般，无奈中，只得将实情向张凤春倾诉求援。张对小丁母子三人的悲惨情状实感意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和当初过份的绝情，是多么沉重地打击和损伤了她母子。他不断的自责和内疚，于是在每月的工资中，除留下一点最低的生活费用外，其余的全部寄给她。即使如此，也只是杯水车薪，仍然难救她母子于水火。她本是四川名校华西医学院的毕业生，岂能不识饮食卫生的重要，可为了首先满足孩子的需要，自己只能常受饥馁之苦，在实在难忍难熬之际，为了活命，饥不择食，凡能填进肚子的东西一概吞咽下去。结果大量蛔虫卵乘机而入，并在体内肆意繁殖，造成严重的肠梗阻，离开部队仅两年左右，就告别了这个对她太不公平的世界。

1960 年，张凤春千里奔丧，他把小儿子留给妻妹代养，并将大儿子随身带来山西。他将小丁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床边，经日为伴，后来他终身未娶，这意味着他已原谅了妻子，并恢复了往日的感情。他已认识到他的妻子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文革中，那些红卫兵们在‘造反有理’荒谬口号的煽动下，将他们平素很敬重的、教学成绩很卓越的张老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革命彻底性。他们重新给张凤春戴上右派帽子，挂上‘右派分子张凤春’的大牌子，并将他遣送回河北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使张凤春再次受到非人的折磨。张家原是地主，所以才有可能供养他到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念书。在大学里，他接受了地下党的教育，终于背弃了自己的地主家庭而参加了革命的队伍，他信奉的理想就是要解放劳苦大众，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贫下中农们只照最高指示办事。他们认定右派就是敌人，更何况张凤春又是个地主崽子，对阶级敌人自然不能温情，于是张凤春当然地成了这班人的‘天天斗’的活靶子，岐视、虐待，各种花招，层出不穷。最后，待到文革结束时，张凤春已是百病缠身。

到了 1979 年，右派改正后，解放军报社也深感应特别关注张凤春，故安排他回北京，在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图书资料室任副主任。杂志社给他分配了套房，他不去住，宁可和儿子挤在办公室里住。有战友给他介绍对象，希望他再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他一口谢绝。他明知病魔缠身，却不肯住进医院治病：他平日少言少语，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是想再抢回一些时间，以弥补那流失的光阴。但是，时日晚矣，他受苦太重，身心俱伤，终于在 1982 年 10 月 2 日去世。算起来，回到北京还不到两年。

这一年，他五十六岁。

呜呼!

张凤春二三事

丁　乙

张凤春河北人，在军报是大尉编辑，凤春为人非常忠厚老实，反右时，他有一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其中有些言词触犯了领导，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他爱人小丁也在解放军报社工作，在资料室任资料员，当时军报资料室的负责人苏‘某’趁运动之际，对小丁有不规行为，可能还发生了非法的

男女关系。张凤春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被发配到山西太谷郭堡水库劳动，同时小丁的事被揭露，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军报、离开北京回到四川老家务农。张凤春修完水库后，分配去介休县，我则在孝义县，我常去看望他。后来听说他爱人小丁在四川病故，孩子只好都由他带。我去看他时，见他带着孩子，又当爹又当妈，日子过得很艰难。

1978 年落实政策，军报特别照顾张逢春，把他从山西调回北京，安排在社会科学院。我回北京后常去看他，他的思想情绪大变了，很少和别人说话。我和我爱人很想为他介绍一个对象，希望他再安下一个家，但他多次谢绝了。他说：我在婚姻上受的害、受的罪太大了，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谈结婚的事。

在北京，组织上给他分配了一套住宅，但他不去住，宁可每天在办公室的桌上睡觉。回北京后的第二年病故了，作为他的战友，我们都为此十分痛心。

风定莲菊自在香

---悼傅飞

张英敏

离 休 感 怀 — 傅飞自题

自笑未省有春光

一瞬韶华近夕阳

盛世沫恩始收网

暇视人间短与长

荣辱浮云等闲过

诗洒澹泊健而康

老马不知归途晚

风定菊莲自在香

上面这首诗是老傅在右派改正后的一个初春季节写的，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老傅虽然历尽人生坎坷，饱尝人间冷暖，但依然心态平和，视荣辱为浮云，凭诗酒而澹泊，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素质。

傅飞，1930 年出生，黑龙江呼兰县人，毕业于伪满时期的铁道学院。东北解放后.他才十几岁就报名参军，　原在东北空军司令部，建国后调北京军委空军司令部，任指挥所通讯参谋，大尉军衔，党员。

参军后，傅飞他一直全身心投入工作。反右期间，他正值新婚，加上自已从小参军，从未想到自己也竟然会被阳谋所陷，但恶浪汹涌，他也终遭没顶之灾。就因为他曾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就被无限上纲，认定是仇视党、仇视解放军的言论，　终于被戴上右派帽子。帽子一戴，新婚的妻子即与他划清界限离婚而去，他则被发送到郭堡来修水库，直到 1963 年，他方在祁县与王爱华女士重组家庭。

离开水库后，他先后在太谷县综合大学农学院，太谷兽医院，农业机电修配厂等

单位劳动。1961 年起在祁县机电所、农机公司、农机局工作。1979 年改正后，调回太谷，在山西中药厂任高级工程师。傅飞才思敏捷，分析总结的能力极强，耳听汇报，提笔成章。日语基础好，翻译过不少日文资料，他又善于和他人相处，在厂里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时，工作很有成效，人们戏称他具有外交天才。

由于积劳成疾，导致乳腺癌复发，傅飞战友于 1999 年 11 月 10 日病故。按其生前遗嘱，未通知任何亲友，不搞一切仪式，和他的平素性格一样，他就这样静静地走了，病重时，许贻士、陈广等战友曾去探望，但我和张兆瑞闻讯赶去探视时，晚了一刻，已送火化场了。我们直等到他的亲人们回来后，只能向他的遗像默然致哀；永别了，老傅，亲爱的战友，我们会长时间地想念你的。老傅去世一周年时，我曾和诗一首，以作纪念。

傅飞兄逝世一周年祭

张英敏和前韵

傅兄飞去悲秋光

音容宛在映残阳

太平难忘漫天网

劫后更觉左祸长

心如静海千帆过

志存幽谷伴杜康

花美无论早与晚

一样自在一样香

介休哀歌四阕

杨育雄

哀陈国伟

陈国伟是抗美援朝时参军的，后在十航校工作，被打成右派后，1958 年 4 月到郭堡水库锻炼大队，我们在水库时，原来并不相识，水库劳动结束后，我俩同时分配到介休，并一块儿在介休机械厂工作。

这个厂曾先后改名为农机厂、水泵厂，厂领导也换了好几任，作为厂里的主要技术骨干，国伟的工作一直没有调动。他虽在 1959 年就摘掉右派帽子，可是工资一直很低，而他有四个孩子，家庭负担特重，生活十分艰难。因为熟悉技术，学习能力强，故而他出差机会很多，为了补贴家用，每次出差，他都不肯买卧铺，原因是不乘卧铺，差旅费补助就可以多一点。他经常出差，有时去西安交大，有时去北京农学院，这种长途跋涉，长时期睡眠不足，对身体健康无疑是影响很大的。再加上他生性好强，即使不出差，他夜晚还要去学日语，当时有些人不理解，觉得他是不是太刻苦自己了，在那种环境里，学了日语有什么用呢，但国伟不管这些，仍坚持学下去，不但开阔了视野，而对他深入学习技术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评定职称时，多掌握一门外语，这也是对他有利的条件之一。

在那些最困难的岁月里，他因他坚毅踏实的劳动态度和高超精湛的技术水平，博得了领导和群众对他的尊重，终于遇险而安，跌跌冲冲地走过了这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道路。

1979 年改正以后，正逢全国都掀起了改革的热潮，春到江水绿如蓝，许多科技人员就在碧水波涛中想努力体现自身的价值，陈国伟已具有晋中地区所授予的机械工程师的职称，有了这个法定的资历，自然他便可以找到更适合自己发挥才干的单位和部门，以求改善工作环境，使自己的专业上作出更大成就。当时，为了招揽人才，有些单位还为这些有能耐的科技人员提供优惠的生活条件，如七十平方的一套居室和提升两级工资等等。当时我俩曾商量，这家县办小厂不是久留之地，应当设法另谋出路。于是我们到一家省级工厂去打探情况并寻找机会，这家工厂了解了我们的资历和能力以后，满口同意，甚表欢迎。我们便回到介休水泵厂去开介绍信，原以为这是件很简单的事，办后方知，其实难度很大，虽然化了不少力气，但这封介绍信就是开不出来。一计不成，再生

一计，我们就动了动脑筋，我们都是在部队‘改正’的，原属的部队有责任关心我们俩的工作安排。正好我原来的部队离介休较近，回到部队一反映，部队领导同志满口答应，很快便派人来联系，在部队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地调了出来。可是老陈的运气没我好，他原属部队单位已撤消建制，他得不到帮助，自然调厂的愿望只能落空，我走了以后，他只好依旧留在水泵厂。

不过世界上有些事物所发生的变化，一时是很难预测的。陈国伟想走没能走，这本是件很令人失望的事，而陈国伟的专业水平和工作上的献身精神，早已为许多人知道，他这次未调成功的事，传到县里，却惊动了几位县领导同志。他们可能想到：像陈国伟这样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长期放在

一家小工厂里，是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迟早还会被别的单位挖走，与其别人来挖，不如自己来重用，于是，没过多久，县里下达一纸调令，把老陈调到县政府任副县长，主管全县工、业。

在别人眼里，老陈这真是青云直上，可是老陈依然是老样子，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为了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他只得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辛劳。可是他这二十多年以来，过度的劳动使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调到县上才两年多，得了重病，即送到北京就医，动手术开刀后，方知已病人膏肓，回天乏术。他勉强回到介休来，没多久就去世了。逝时年仅四十余岁，真可谓英年早逝。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到：如果这二十多年里，他若没有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这种太大太猛的挫折，他若没有承受过我们所承受的这种太苦太悲的打击，他的身体状况决不会垮得这么快，决不会垮得这么急，那他就可以为祖国、为人民贡献更多才华和知识，然而他毕竟经历了那么多，也承受了那么多。

他过早地去世了，我们深感痛惜，为了他，也为我们的祖国。

哀唐廷雄

唐廷雄是郭堡水库锻炼一大队三中队成员，我了解他是在水库蓄水时，他在水中修理闸门，整日都泡在水中，可以说是在合生忘死地干！令我敬佩。

后来我们都分配到介休，有时见到他，但相互也很少打招呼，我在水泵厂，他在水泵厂的上级机关农机局工作。在文革中，我知道他曾和农机局局长一起挨过斗，我想大概是斗当权派时叫他陪斗吧。也没有很在意，因为这种情况发生过许多次，我们见怪

不怪，都习惯了。

有一天农机局来人找我调查，来人先问我有没有和唐廷雄在一起吃过饭？那时我是自己烧饭吃，有时候谁碰上了就在一起吃，我回答说这是非常可能的，接着他又问：吃饭时唐廷雄有设有发过‘瓜菜代’的牢骚？我说我从来没听见过，来人不得要领Ｉ而归。我在想，这些人又在用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上纲，编织‘反党’材料了。没过几天，突然传来消息，说是唐廷雄自杀了。为什么？他是位很坚毅的同志，怎么会批斗几次就自杀呢。是怎么自杀的呢？我想打听又不敢打听，自己暗暗在心中纳闷。说来也巧，自己想打听而不敢打听的事，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听到了。有一天，我去农机局，因为工作原因进入了局里的地下室，陪我一块几进来的一位小徒工神情有点紧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反问我：“杨师傅，你怕不怕唐廷雄？”我说：怕什么，老唐不是死了么？”小徒工说：“唐廷雄就是死在这间地下室里的。” 他还告诉我老唐就是在这间地下室里，用锋利的凿刀敲破脑壳而死的。我听后不胜惊讶，为什么呀，要用这样狠心的手段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小徒工就将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那一天下午开完批斗会后，造反派头头当众宣布：给唐廷雄第二次再戴上右派帽子，第二天还要将他遣送回原籍劳动。当天晚上，唐廷雄就用凿刀自杀。后来听说：唐廷雄是将锋利的凿刀捆绑在床柱上，然后用自己的脑袋撞上去而死的，不管他是怎么死的，反正，他是死得非常惨烈的。可是处在那么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有谁能够去弄清这些问题呢。

1979 年后，右派改正列入日程。我在介休县是较早办理改正手续的，也是介休县里的右派人群中，第一个穿着刚领回的新军服在街上走的人。许多当年的右派或其家属，都来打听办理改正手续的经过，唐廷雄的爱人也到我家来了解情况，她想知道唐廷雄人已去世，还能不能办理改正?我告诉她：右派已去世的，也要办理改正，我是先回到部队原单位申请平反，部队正式发文批准，然后再办手续。后来她也去老唐的原属部队申请平反，最后顺利地为老唐办理了改正，并获准带子女返回原籍广西南宁，重新过不受欺辱、不受歧视的人的生活。老唐啊老唐，你可瞑目于黄泉矣！

哀张文炜

张文炜是山东人，他在海军时原授大尉衔，为人正直，胆大肯干，魁梧英俊，干活争先，地地道道的一条山东汉子。

在郭堡水库，张文炜干活不怕苦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建水洞还是修水塔，不管是

翻斗车运土还是建小高炉炼铁，他作为中队长，没有一．项劳动不是冲在最前面的，哪儿最困难，哪儿就有他的身影，他这样一带头，全中队都跟着上，所以这个中队的劳动任务也总是完成得很漂亮。就拿翻斗车运土这一项来说罢，它是郭堡水库的一大创举，三国演义上讲木牛流马能运粮，我们这翻斗铁车能搬山，利用山上装土后翻斗车自身的重量，顺着铁轨把土土带到大坝上，而在冲下山的同时，又将空车带上了山，张文炜就带着我们将低坝一天天填成了高坝，在他的奋不顾身的带动下，我们也从劳动的成就中获得了自豪感，使得大伙儿在这一时间里，竟忘掉了赎罪的心态，完全投入在热情激扬的劳动气氛中。有时，我甚至于会想象得到当年在战场上的张文炜，那画面一定是一幅雄纠纠一往无前的战斗英姿。

有一次，我和他同押一列翻斗车，(每列四车，每车用一人来踩煞车)，他在前，我在后，不知是装士时土堆得不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翻斗车上了大坝以后，竟将张文炜甩下了车，我当时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要知我那时只是光棍一个，自己吃饱，全家不饿，可老张不一样，他是有老婆孩子的人，真要是摔坏了，将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这还正在惊慌中，不料老张他没事般自己爬了起来，弹弹土，朝我笑了笑竟又干起活来了。那一天，我们又是超额完成运土任务。我不禁沉思、自问：就像我们这样劳动，这样干活，会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吗！

水库建成后，我们又投入了大炼钢铁的洪流中，到深山老林去找矿石，没日没夜地砌高炉，炼铁水，虽说这一切都是一场空，却使我们的汗水都白白流尽，在这些艰苦而又无效的超强力劳动中张文炜总是干在最前列、出汗最多、出力最大的一个。

离开太谷后，张文炜被分配到介休水泥厂，他仍然和以前一样，最艰苦的活，最危险的活他总是奋不顾身地抢在前面，结果有一次发生了意外，在一次没有防护的情况下，他从电杆上摔了下来，摔成重伤。治愈以后，身上留下了严重的残疾，他连小便都完全不能自控，更不用说正常的夫妻生活了。有一次，我见到他，‘谈起家庭，他不无伤感地对我说：“我老婆现在守了活人寡。” 不过我知道，不管是在他受伤前或受伤后，他爱人一直对他很好，他们在一起厮守了二十多年。

改正后，他调回山东淄博老家工作，但终因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他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但他在劳动中的一言一笑、一声吆喝，一次扬手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间，我相信，也会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位在世战友的心间。

哀孙友乙

孙友乙原是海军司令部的参谋，他个性和善，很少参加喧闹，说起话来轻轻缓缓，文艾静静，从没见过他和哪二位战友有过强烈争执，更别说与人粗脖子红脸了，所以他和战友们都相处得很好。劳动中，他虽不能说是特别拔尖出色，但也从不自甘人后，大家都知道，他的确是尽了他的最大力量的。

我和孙友乙还有一段论诗的交情，那是我们都还在郭堡的时候，有一天，他负责整理同志们写的诗稿，他读到了我写的一首诗：　《峡谷山中炮声隆，车如流水马如龙；红旗招展坝堤上，跃进须乘破浪风。》他很欣赏最后的一句，跃进须乘破浪风。后来，我们同分配到介休，见面时，有时还会谈谈诗，因而也为我们之间的友谊打下基础。

一开始，他在介休似乎生活工作都还比较稳定，他是在机关里做秘书一类的工作，他很胜任，心情也好。后来过了一段时候，他对我说，他的领导陈副县长即将退休，他将去介休中学去担任语文教师。当时我感到新的工作岗位还是很适合他的，他文学基础好，人又耐心细致，再加上他在北京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很好，学校里有寒、暑假，他回家探亲也更有条件……。总之，遇事多往好处想，这是我们这帮子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思考方、法。可是，对孙友乙来说，这次却是事与愿违，他再也不会想到，他去了学校没多长时间，就赶上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时节，风起云涌，特别在学校里折腾得更历害。读书的是革命小将红卫兵，教书的都成了臭老九，孙友乙是臭老九中的摘帽右派，当然又更低人一等。在介休中学，他和‘走资派’都被管押在一起，每到食堂领饭菜时，都要自报姓名和身份，报一声：右派孙友乙，然后才能领上一份饭菜。白天听命令使唤，参加劳动或写检查，晚上还要开会，互相揭发，互相批斗。有一天下午，我偶然遇到孙友乙，他黯然说：“我要是被他们再戴上右派帽子，我看我是活不下去了，我老婆有病，我也有病。”当时只当他是内心烦躁，说说而已，就稍稍劝慰几句。哪知没隔多久，听说他留下遗书，真的上吊自杀了。这其间，他倒底又受到什么迫害？又遭到什么威胁？是否有人诬告，给他增加了压力？是否有人动手，使他身心两伤？这都成了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就我所知，当时曾通知了他的家属，家属没有来，也不知是无奈还是不敢，而我们在介休的战友，多半都承受着压力，无法去看也不敢去看。直到 1979 年改正时，孙友乙的骨灰已找不到了。家属及战友也曾要求为孙友乙召开一个追悼会，但也迟迟未有任何答复，不知其中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友乙啊友乙！归根到底，你是被‘右派’这顶帽子活活压死的，现在，右派的问

题已获改正，一切别人强加在你头上的不实之词，本来就不能算数，如今更是衬托出你的善良和忠厚。你永远是我们的好战友，安息吧，孙友乙同志！

睛日抒情 1978

龙凡斯

戊午腊月荡春风

世易时移回不同

畴昔风骤长空暗

而今雨霁漫天虹

迎日共须羲和力

仰天可赞女娲功

宠辱恩怨何足论

华夏新容一览中

忆郭堡二友

张兆瑞

一、悼史贵宪

史贵宪，我们的郭堡战友之一。他本是一名士兵；毕生享受了唯一的一次正排军官待遇，那就是被打成右派，然后遣送到郭堡来修水库。

他是南京人，抗美援朝时他才是位十六岁的高中生，为了响应国家召唤，热情参军。经过学习、培训，一直在空军的基层单位理头苦干，到了 1957 年，当他山西省临汾机场当见习机械师时，正赶上部队要复员一批战士，他那时只是个副排级，还算不上是军官，于是被列入复员名单。他对复员也无怨言，想着能回到家乡再求学或Ｔ作，也能开辟另一个新天地，所以很高兴地服从安排，来到复员大队参加集训，只待集训结束，就踏上新的征途。在复员大队时，生活不象在机场那样紧张，除了听报告和小组讨论以外没什么更多的事，闲下来，这些即将离开部队的战士们经常在一起谈谈学习心得，或是展望今后的新生活。所以，尽管社会上的反右斗争运动己波涛汹涌，这里却仍然比较平静，并没有什么风吹草动。因为按规定：在整风和反右时，工厂、农村和县、’团级以下单位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运动，也不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抓典型、搞批判。就部队而言，有一条明确的杠子，就是在副排以下的人员中，不抓右派。所以反右以来，在大学和机关里早就斗得红红火火时，复员大队里却并没有很大的反响。

可是，世界上总有些奇奇怪怪的事会发生。巧而又巧，有一天学习完了，史贵宪回到宿舍和几位复兄聊天聊地。闲聊嘛，谈谈吃的，谈谈玩的，谈谈找对象，谈谈轧朋友，什么不好谈呢，他们谈着谈着，你一言我一语地却谈起了国家大事，谈就谈吧，又不是作报告，那么大声干什么，可几个年青人正聊在兴头上，哗里哗啦毫无顾忌，那就把房门关紧点吧，大概是香烟抽多了屋子里有点闷，大门特意还留了个缝，正好就在他们大声喧哗着嘻笑时，有位阶级斗争观念坚定并具有超强嗅觉的老兄走过了这里，他一闻，味道不对，再一听，话音刺耳，于是马上在心里作下了纪录，经过作了分类归纳、突出重点的加工以后，随即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一听，有份量，再逐级汇报上去，于是被铁定是反动言论。各级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平地里拾到了个大西瓜，于是摆开了架势，大批大斗。对这椿天外飞来的横祸，一下子将史贵宪弄懵了。他坚决否认，据理力争，他想靠他的反驳能为他争取公道，却不料他完全想错了，在政治运动中从来就没有公道，

讲理就近乎是亵渎，辩解只等同于顽固，他再三解释别人也不听，他的罪名反而越背越重。他虽然只是个副排级的准干部，可正排级以上的军官在运动中才能享受得到的待遇，一件也不缺，他全都享受到了。

开了几天的批判会后，眼看许多复员的同伴一个个奔向新的岗位，或者返回了自己的故乡，而他被软禁住动弹不得，这时真是教人欲哭无泪。指导员及时找他谈话，进行疏导，指出：别的同志都已经回家了，你只要承认就可以回家了，何必硬顶呢。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及早离开这个场所，他

归心似箭，终于承认了自己已到达右派的边缘，领导说还是不深刻，于是只好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本以为虽输了口气，但总算可以结束了，哪知结束虽是结束了，但不是他想的结果，结果是两开一降。开除军籍、开除团籍，行政上降三级，还戴上千斤重的右派帽子，到郭堡来劳动锻炼。史贵宪这才知道自已上了个老当。

1958 年他才 23 岁，因他对自己‘罪行’的违心承认，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无奈中度过了二十一年不堪为人言的艰难生涯。而更不幸的是改正之后，幸福之神也没有降临到他的身上。他那饱受磨难的躯体、他那不甚和谐的家庭，都在折磨着他的生命，可以说，他一直没有恢复过元气来，前些年，终因患肺癌而去世。

如果真有苍天在上，就要像屈原一样，发出新的天问：“天哪！当年那位二十三岁的小青年何罪之有！

二、悼莫维嵩

小小的个子，满口浓重的的四川口音，干起劳动活来，娴熟老练，一些身材高大的战友都赛不过他。他还有样拿手特技，因为他是农村里出来的，所以他还学会了杀猪，而且是位能手，我们郭堡水库锻炼大队的伙房每逢要打牙祭时，常常请他来执刀，看他在现场的那股指挥如定的熟练劲儿，真能教人看呆了。他在郭堡水库的劳动，也给人们留下极深的印象，因为来郭堡的锻炼大队的三百多号队员中?绝大多数都是些从机关学校来的知识分子，干活虽异常卖力，但总是有点不大像。可是莫维嵩就不一样了，他那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扬手一抬脚之间，那种得心应手的风度，别人是学也学不像的，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劳动本色吧。

1959 年，莫维嵩从郭堡水库来到祁县轴承厂当一名工人。过了一年左右，他的妻子怀抱着幼小的女儿来到祁县，她这次来不是为了夫妻相聚、全家团圆，而是来和他商

量办离婚的事。这件事惊动了祁县的郭堡难友们，特别是当大家都知道了他俩并非是由于感情不合而要分手，却是由于我们都理解的一个原因：妻子实在是承受不住政治上的压力，才提出要离婚的。面临着这样的情景，他们夫妻双方都伤心黯然，而我们这些旁观的战友们也心中深感不是滋味，大家纷纷劝说，想想也许由女同志来谈会更贴心一些，于是又找来曾同在郭堡劳动的方坚予大姐来做工作。这时，莫维嵩坐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紧紧搂着那不懂事的小女儿，默默流泪。虽然经过了那么多人的调解和劝慰，但现实是残酷的，莫维嵩为了他心爱的妻子能避免和减轻那些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她仍过得稍微轻松一些，也为了，女儿长大后不要在父亲不幸的阴影中生活，他想通了，他一点也不怨恨他的妻子，我们看得出他心中悲痛万分，既为了本来很甜美的家庭生活从此不再而悲苦，同时也为自己无力改变现状而伤心。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遥望未来，谁也看不出这种悲惨的命运要到何时才是个尽头；与其大家都无望地苦撑苦熬，确实不如分手，自己也能比较心安。莫维嵩终于强忍着悲痛而违心地同意了离婚。

他和妻子最后还共同生活了几天，过完那几天无比凄惨的日子以后，妻子带着女儿永远地走了，一场骨肉分离的惨剧就这样悄悄地收了场。

1963 年，四清运动前夕，形势相对宽松，他在农村供销社任售货员，经人介绍和一位农村妇女结为夫妻，因对方不能生育，后来就收养了一子一女，过着完全是贫苦农民一样的生活。

1999 年，在他 68 岁时，我曾专程到三十里外的村里去看望这位多灾多难的战友。这时他双耳已差不多全聋了，双目也近于失明，满口牙齿全部脱落，思维迟纯，步履蹒跚。救心丸之类的急救药时刻不能离身……许多年来，他的躯壳里被注进太多的苦水，他似乎已经无力承受了！

我劝他：心脏不好应该注意营养，救心丸只是急救药，是不能治病的，要吃药控制病情。他无奈地默默摇摇头。他是 1949 年 11 月参军，1958 年 4 月在空军十航校任管理员时被打成右派，如果一切正常，即使在城市中，他现在也应该过着中上等的生活水平，然而就是这一场反右风暴，几十年以来，将他扫进了贫穷的深坑，他本是劳动出身，身体原很壮实，然而几十年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压力，把他压得没有挣扎之力。他这时只是一名国营困难企业的退休职工，每个的工资只有 210 元，只相当一些新参加工作的人员工资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一家人糊口尚且不足，哪有条件吃

什么营养品和药品，我看见他家中最豪华、最奢侈的陈设就是一台早被千家万户淘汰了的 14 寸黑白电视机。

此次见面后仅两个多月，有一天，他早晨起床晨练，刚坐起来又倒下去了，一家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务，谁也没有在意。忽然老伴惊呼：他不喘气了！于是家人慌忙请来医生打了强心针抢救，‘哪里知道他的心脏骤停，英灵已在蓬莱仙境做客一个多小时了。

他的一生证明了什么 ？证明了那场痛失人心的政治风暴 ，曾残酷地伤害了难以计数的无辜的生灵！

父亲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记父亲葛福

葛 方

葛福小传:

1927 年 4 月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的一户中农家庭，小学文化。1945 年 8 月末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战车大队。先后在坦克一师、三师、北京装甲兵司令部任技术职务；右派改正后，曾任山西太谷县汽车修造厂副厂长，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第三工程处安检员等职；1 983 年 1 0 月离休；2006 年 3 月 9 日因病逝世，享年 79 岁。

今年，2006 年的四月，应该是父亲葛福八十大寿的吉辰，可是，就在 3 月 8 月，离他寿辰之日不到一个月，他便因患胃癌而去世。父亲的身体素质，一向很好，自我前年调来上海工作以后，我_直有一个愿望：要让爸妈都到上海来．安度晚年。而如今，我只能将年迈的母亲接到身边来，而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于离家不远的公墓。作为他们的独女，我没能在父亲有生之年，实现全家欢聚在一起生活的愿望，这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要死了，怎么办呢?”我听了心如刀绞，从父亲的语气中我听出了许多的无奈。父亲是睁着眼睛离世的，他还有许多心事未了，他还有许多问题期待解答，他还有不少委屈有待申诉……，他是带着诸多遗憾离开我、离开妈妈、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他问：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机械维修方面是个大能人，也是个大忙人。离休前就不用说了，就在他离休以后，他也很少有在家的时候，不是这个人请他去帮助，就是那个厂‘叫他去解决难题，每天到家里请他帮忙的人总是络绎不绝。父亲他技术精湛，再加待人热情，所以总是有求必应，从没有任何计较，他一直不停地在钻研技术、奉献社会，所以生活非常充实。他先后被邀请到广州和唐山等地帮助开办汽车修理厂并负责技术指导。而对自己的过去，父亲却很少和我谈起。为了解读父亲未了的心事，丧事一办完，我就投入了整理父亲遗物的工作。父亲除了保留了几枚奖章、几个奖状外，还有不少未写完和未发出的信和申诉材料。我一遍遍的研读，慢慢我理出了些头绪。

1927 年 4 月父亲出生于吉林省东丰县的一户中农家庭。青少年时代的父亲由于社会动荡和家庭变故，他曾流浪街头，乞讨度日。当他十八岁的时候，东北解放了。他在

1945年8月参加东北人民自卫军战车大队。成了解放军里第一代坦克战士。他虽然没有较高的学历，但他悟性极高，又能勤学苦练，钻研技术，故在驾驶坦克和维修业务上，很快就成了能手，他所得到的奖章和奖状，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著名的辽沈战场上，有着他驾驶战车纵横无敌的身影，在抗美援期战争中，无数辆坦克都是经过他的检验和维护后，才开过鸭绿江驶向前方的。

当年，我们所有的坦克和汽车都是二手货，有些是在战场上从国民党和日伪军队手里缴获的美国造和日本造，有些是苏军遗留的，这些战车来自不同的国家，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型号和用途，对这些战车进行维修和检验，是一件极不寻常的工作。特别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要求维修人员要用最快的速度判断出机械故障，并把它维修好以适应前线战事的需要。连年的战地维修使父亲在坦克和汽车内燃机的修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上可以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曾多次受到所在部队的表彰。在遇到发动机故障时，他站在一旁仅凭耳朵听发动机运转时发出的声音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发动机故障的原因，并当即提出正确的维修办法。

父亲为人质朴、思想单纯，特重友情，但是想不到当1958年父亲在五一速成中学学习时，竟为友情所累，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从此，他忍辱含屈，度过了二十多年。曾听妈妈和父亲的战友们说过，在山西太谷修建郭堡水库时，他一方面亲自驾驶碾压机，日日夜夜碾压大坝，一方面还要培养新手，同时还要修理所有的机械另配件。劳动之辛苦，是旁人所难以估量的。

我记得，后来父亲在山西太谷汽修厂工作时，一直没日没夜地为农村机械化而辛劳，从没有节假日。特别是农忙时，那更是不管白天黑夜、路途远近，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父亲还为厂里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他带的徒弟后来都成为了汽车修理的技术能手。认识父亲的人总会不解地问：“像老葛这样全心全意为我们老百姓做实事的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虽然只是老百姓的口碑，却简单地说明了一个事实，父亲遭受到的是一椿不折不扣的冤案。

随着时代的进步，法制的不断健全与完善，许许多多的历史问题都得到了澄清。我相信，当年的反右运动倒底是怎么回事，终究也会有一个正确的负责任的答案的，只是，远去的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　　、

父亲走了，我确切地感受到他是带着半个世纪的遗憾走的，他摆不脱这一场沉重悲剧的影响，以至于使他身心受到伤害，一直到死，还没有终结。　　.

对这一切，我也想问一声：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提起郭堡　难忘葛福

乌维达

葛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始建装甲一师时就在编的一名战士，十数年与坦克为伍，曾刻苦钻研战车驾驶与维修技术，自学有成，对装甲兵建设作过贡献，曾多次获奖并立有三等功。1958 年蒙冤被遣送到郭堡水库劳动。

当时，水库的拦洪大坝是整个郭堡水库建设的主体工程，成千上万民工，加上劳改犯，也加上锻炼大队的队员们，大家最最主要的劳动就是运土上坝，而这个拦洪大坝上每垫土 30 公分就要用履带式推土机拖带“棘齿铁滚”进行来回碾压，以替代人工夯实，这是加快筑坝进度、提升土坝坚实度的重要环节。而当时的水库指挥部虽有几辆推土机，但时常带病运行，有时在操作中不听使唤，会有抛锚现象；而更严重的问题是缺少驾驶人员，眼看工程压力越来越大，作为坦克教练出身的葛福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向几个从来没有接触过推土机的锻炼队员周永熹、陈通鉴、农坤、唐廷雄等同志细心传授驾驶技术和维护保修的技能，并采取轮班驾车，歇人不歇机的措施，保证在拦洪大坝一天天迅猛升高时，压实度都要达到标谁。由于是日夜不停地操作，机台的启动机、高压油泵、喷油咀、变距器、离合器、链轨、导轮等另部件，都很容易发生机械故障。这时，我们的葛福更是显示出不平凡的身手，他不但亲自守候在工地现场，而且还带领驾机手们一起动手，从解体、拆装、到调整，都是一气呵成。遇到损坏的另件则由赵森林仿制：遇到电器的配修，则由邢从周和王书锵操持：这一组人员亲密无间的协作，形成了最佳组合，葛福正是其中的核心和主导。

太谷县负责工地的一位县工业局局长，明知他是锻炼大队的成员，是右派，仍然向他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之意。我们曾在一起奋战的当年的战友们，只要一提到水库劳动，总会津津乐地道提起葛福，这个说他身手不凡，那个今他功夫到家，这个说他教学诚心，那个夸他待人平和，在我们的回忆中，他既是师傅又是战友，而且是好师傅，好战友。

葛富后来留在太谷县农机部门，曾帮助范村等不少的村镇拖拉机站解决了农机的大修和机耕手的培训工作，凡是葛福到过的地方，总能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故事、佳话，真正是口碑如云。我觉得在赞他的话中，最贴切、最真挚的赞词，是经常挂在人们嘴上的一句话：葛福是个好人。

葛福是个好人，可是他承受了好人不应当承受的命运!

悼葛福战友

唐正光

你是当年的坦克兵战士，

驰骋在辽阔的东北战场，

你驾驶无畏的钢铁战车，

气势排山倒海，无人阻挡。

如今你来到了晋中大地，

依然一往无前，斗志昂扬，

劫难没有挫伤你的意志，

不管流落何方，钢还是钢，

是你，又重新跨上了铁骑，

是你，又焕发出新的力量，

坝上才有了坚实的土地，

山间才呈现出碧波荡漾。

技术精湛，至今为人称道，

豪迈热情，永远教人难忘；

你好!我向远方对你呼唤，

群山多情，传来声声回响。

回赠英敏兄赠诗　　陈　广

1999 年元日

九零元旦英敏兄赠诗

与君相逢灾难时　　峥嵘岁月费神思

青春年华陨乱世　　黄金岁月付虚无

风雨过后花蜕色　　晚霞到到叶辞枝

难得心胸宽如海　　诗词书画伴酒壶

望其意易其韵改动数字回赠之　　陈　广

君我相识在山村　　峥嵘岁月煞费神

黄金年华陨乱世　　锦绣前程遭沉沦

风雨过后花未凋　　蓝天白云夕照明

襟怀坦荡宽天地　　诗书相伴度晚晴

编后小语

在 2003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有十来位原来在郭堡的战友桐聚在晋中市，欢声笑语间，兴高采烈，几几乎都忘了自己已是白发老人；有战友谈到自己正在撰写回忆录，有战友也说起自己也正在动笔写自传，还有战发说：干脆，我们各写几篇印成一本书互相传看吧，这就是编印这本回忆录的缘起。

当然，既是回忆文章，就应以各人往事经历为主，而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经历，都有段共同的背景，就是我们都在郭堡啃过窝头、拉过平车，流过热汗、唱过战歌。自然而然，郭堡前后生活的回忆，便成了这本书的特色。我们想：以这本书告慰已逝的战友，以这本书作为珍贵的发情和自己一段不平常生活的纪念，也以这本书留给我们的后人，让他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亢奋和悲凉。